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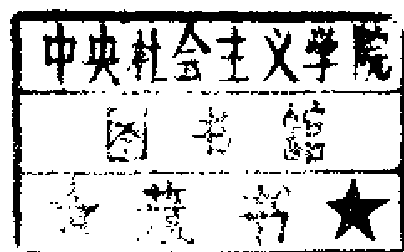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古籍版本研究组

书目文献出版社

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
古籍版本研究组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阳海清主编；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ISBN 7-5013-1215-X

Ⅰ.版… Ⅱ.①阳… ②中… Ⅲ.版本学-研究-文集 Ⅳ.G25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2109号

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组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排版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大32开本　12.875印张　330千字
199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ISBN 7-5013-1215-X
G·326　定价：15.00元

前　言

三年前，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分委员会在宁波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编辑《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藉以检示成果、推动研究、嘉惠后学，委我董其役。当时大家商议，其收罗范围，可以上溯清代中叶，下迄一九八九；其篇幅，则宜控制在三十万字左右。我与本馆特藏部诸位同仁一道，广查线索，搜得二千余条款目；继议体例，原拟分辛亥革命前、民国时期和建国以后三段，详近略远，按“一般理论”、“版本源流”、“版本鉴别”、“版本学史”、“研究综述”五个方面，依时序列。后在审视材料时发现：民国以前之资料较为芜杂、细碎，且大凡带关键性的文字，多在后人之研究成果中引用；民国时期，除《书林清话》一类专著外，有一批论文，但其要义和重要材料亦已溶入后人论述之中，故予割爱，仅取建国后大陆学者之撰述。在序列上，鉴于文章内容多有交叉，故不设类目，采用“暗分明不分”的方式，粗依前述五个方面编排。

从广义上讲，中国的版本学可谓源远流长。它发轫于两汉，继起于隋唐，昌盛于宋代，成熟于前清，集成于当今。显而易见，版本学是随着书籍的发展而发展的。几千年来，中国图书之载体由甲骨而金石、而简策、而缣帛、而纸张，其制作形式或书写、或雕版、或排印、或影印，在流传中有存有佚，在篇帙上或全或残，在校勘上有精有粗，在印制上或优或劣，在装帧上代有变化，在风格上几番变更……凡此变迁，必然导致同一种书的各个本子之间产生这样那样的差异。差异就是矛盾。研究书籍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矛盾运动，版本学即应运而生。说到底，科学的本质在于揭示特定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让人们运用这些规律去能动地将该事物推向前进。既然版本学源自图书之变迁，既然图书的这种变迁又包含

着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那么版本学的内涵就必然是：从一书版本之源流出发，序其先后，审其异同，辨其全残，判其真伪，定其优劣，并从群体上寻求其变迁规律，探求其鉴别方法。这里有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规定是相一致的。倘若不对各种图书的版本变迁（同一种书的各个本子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积累丰富的感性认识，版本学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倘若不将这种感性认识，放到审视和研究众多图书版本变迁中去检验、归纳和升华，版本学就难能形成一门学科；倘若不将这种认识过程循环往复地进行，版本学就无法得到发展和提高。我们所搜集到的这两千余篇文章，以及有关的专著，是历代和当代学者在版本学这个领域里所已经获得的认识的结晶，本集所收录的论文则应是当代版本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我们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来确定论文之取舍的。

凡事必须知其源方可理其流。版本学源于图书之变迁。从事过版本学研究和版本鉴定的人都知道，如果对于中国书籍制度和版刻发展过程缺乏明晰的了解，如果对于中国古籍百花园没有轮廓性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研究和鉴定中产生盲目性，甚而导致鉴定失误。这是不难理解的。进行版本研究、版本鉴别虽然总是从某一种书（扩而广之，是从某一时代某一地区的出版物或某一人的著述）入手，而它在中国古籍群体中既有着自身特定的位置，且其版本变迁又必定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不弄清这种“位置”和“环境”，我们在旁稽参核时便不能左右逢源，在鉴定版本时便难以得心应手。因此，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地下文物（如甲骨、竹简）的大量出土和某些罕见书籍的发现，便有一些学者以发展的眼光、从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书籍的沿革和版本的变迁进行考察和研究，这自然是版本学的一次升华和飞跃。本集选收了有关这方面的几篇文章，庶几可据此对中国书籍制度的变革和版本发展的源流得

到较为完整、较为系统的认识。

版本学从来就不是孤单深入地向前挺进的。它与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书史学等有着相辅相成、互补互用、彼此促进的关系。可以说，它们是同源而异流。所谓同源，是指它们均以书籍作为研究对象，都产生于书籍的发展和变迁；所谓异流，则是指其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主要职能互不相同。本来，各个学科应该自有畛域，不然便难能形成独立的学科；但是，它与相关学科又并非绝若泾渭，往往有着程度不同的血缘关系或交叉关系。不唯清代和清代以前版本学的研究成果常与目录学、校雠学等相交融，就是在学科已经逐步细分的现代和当代也并未完全相分离。集中收录若干篇论述版本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的文章，或许有助于读者加深对版本学产生、发展、完善过程的认识，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与区别版本学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版本学又是一门致用科学。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前人在版本鉴定上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近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使这方面的研究陡然升温，引发了许多人去进行思考，并产生了一大批论文，其研究领域相当辽阔。它们或对前人经验进行归纳和阐发，或就鉴定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出揭示和探讨；或在宏观上展开综合论述，或在微观上从事专项剖析。我认为，这是中国版本学研究领域的一次极为难得、极有价值的大会战，不唯拓展了版本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实践中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对于这次会战的意义和影响无需等待后人去评价，在今天我们便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诚然，因为是会战，时间仓促，任务繁重，其中有些文章未免失之粗糙，有些文章停在就事论事，但毕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问题，摆出了事实。苏东坡说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大家在实战中有机会从横、侧、远、近、高、低去审视版本和版本学方面的问题，必然会有助于加深对“庐山真面目”的认识。我们在收录这方面的文章时，便

充分注意和顾及到了各个角度，以便读者能从中获得较为全面、较为实在的鉴定版本的知识与方法。

中国之版本学既源远流长，但关于版本学史的研究似尚处于拓荒阶段，有待深入耕耘和开发。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浩如烟海的版本学资料去进行挖掘和整理，编写出一部观点鲜明、脉络清晰、史料翔实的中国版本学史，是摆在版本学界的严峻课题。本集所收诸篇，或从通代、或从断代给我们大致上划出了一条史的发展线索，对我们了解版本学的发展进程有所帮助。

继晦庵《书话》之后，近年人们已注意对新书版本进行观察和探讨，这无疑是对版本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若从辛亥革命算起（事实上还可往前推若干年），新书的发展已走过了八十多年历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材料，给新书版本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学术总是在争鸣中得到繁荣和发展。一部中国学术史，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无一不以生动事例证明了这一点。版本学也不例外，时至今日，依然有些问题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有些领域则还有待去认识和开发。比如，关于版本学的源流、界说、定义、对象、任务，关于版本鉴定的原则、依据、功能、方法、技巧，以及与之相关的某些问题，即令集中所选文章也程度不同地在理解上存在着歧异，有的甚至意见完全相左。我们认为，这是好事，因为争辩将使学术得到进步。

去年年底，古籍版本研究分委员会在武昌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审阅并基本通过了本书初稿。同时确定同一作者限收一篇文章，重申凡论述一书、一人、一地版刻的文字原则上不收。据此，我们作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和补充。

入集的文章，凡能访知作者现今通讯地址的，均曾函询本人意见，有的还寄来了增、删和订正材料。文章绝大多数曾发表于各种报刊，我们仅改正了原排版时产生的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余皆一仍其旧。

在编辑过程中，不少同仁来信荐稿，限于篇幅和体例，有的文章未能采用，感激之余，并致歉意。

这是建国以来编成的第一本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限于水平和闻见，编辑中的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诸君教正。

四十年来的版本学研究是有成绩的。我们衷心企盼，这块园地里将会有更多的人来耕耘，将会有更好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阳海清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

于湖北省图书馆

目　次

中国版刻发展过程

赵 万 里

中国是发明造纸和印刷术最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纪，已有纸张出现，二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但是，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所以生产量仍是很有限的。我们祖先经过长时期的钻研，到了八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的书一次印成，书籍的生产量，比过去手写本时代，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早期的刻版印刷术，是广大市民阶层传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民间需要的歌曲、日历、韵书，就首先出版流通。唐时白居易的诗，人民大众都欢喜歌唱它，元微之为白诗作序，曾说有人拿白诗印本来换取茗酒。九世纪初，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和四川民间都刻印日历，政府曾下令地方政府不得私置日历版片，可见在那时以前民间已有印本日历了。公元 865 年即唐咸通六年，日本入唐僧宗叡，携回日本杂书中有西川印本《唐韵》、《玉篇》各一部。近年敦煌发现的印本韵书和乾符四年、中和二年两种唐历，就是这些刊物的现存最早刻本。

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八百纸，可见那时已有寺院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敦煌发现的公元 868 年及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印书，用纸七张缀合成卷，第一张扉画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成熟期的作品。这卷举

世闻明的唐刻本，已于五十多年前为英人斯坦因盗去，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

九世纪末，黄巢起义后，成都顿时成为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其地盛产麻纸，这就构成了刻印书籍的有利条件。柳玭随着唐僖宗逃到成都，在书店里看到许多字书和迷信用书，都是刻版印本。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像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到了五代，蜀中统治阶级和佛教徒们都提倡刻书。公元 923 年昙域和尚出版了贯休的《禅月集》。公元 935 年蜀相毋昭裔叫人写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世。那时成都已一跃而为西南文化出版中心。所以宋初中央政府倡刻《大藏》时，成都工人担任着全部刻版工作，这就给两宋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唐时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五代时冯道看到吴蜀之人鬻卖印版文字，种类不少，但没有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需要的书籍；因和李愚等建议政府国子监校刻经典。公元 932 年即后唐长兴三年开始工作，先刻《九经》，后及他经和《经典释文》等书，到公元 953 年即后周广顺三年校刻完毕。这就是宋人所称的旧监本，可惜后来都亡失了。

北宋国子监除了翻刻五代监本十二经外，又遍刻九经唐人旧疏和他经宋人新疏。以及大规模地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和《文选》、《文苑英华》等诗文总集。这些书籍，多数均送杭州刻版。杭州在唐五代时，经济繁荣，生产发达，浙东西盛产纸张，就更刺激了出版工作的加速向前发展。公元 975 年即北宋开宝八年吴越国王钱俶倡刻的《陀罗尼经》，是现存最古的浙本，字体工整，和后来杭州刻的小字本佛经相似。近年浙江龙泉发现的北宋初年刻的佛经残叶，字体宽博，和南宋官版书也相似。可见杭州和浙江其他地区从五代末年起，已有大批刻版技术熟练的工人在工作着，这

就无怪乎北宋监本多数都是浙本了。

北宋时运往汴京的监本书版，靖康之变，全为金人掠去。南宋初年重建国子监于杭州，除了向附近地方政府索取史书、子书版片入监外，远在四川眉山井宪孟倡刻的南北朝七史版片也移送到监。同时，又由杭州工人翻刻了许多重要书版。宋亡后，这些版片，转送西湖书院存储。元时，余谦、叶森等曾督工整修印行。公元1375年即明洪武八年，明朝政府又把版片转存南京国子监。这些残缺断烂的三朝版，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因为遭受火灾，才荡然无存。

从十二世纪中叶起，杭州中瓦子街和众安桥一带书坊林立。从汴京搬到杭州的荣六郎书籍铺，公元 1152 年即宋绍兴二十二年翻刻了葛洪《抱朴子》。象荣六郎那样的旧店新张的书铺，在当时杭州决不止一家。十三世纪中叶，住在棚北大街睦亲坊的诗人陈起父子把篇幅比较精短的唐人诗歌和南宋江湖诗人的作品大量出版，对繁荣当时诗歌创作，是有帮助的。杭州书坊又刻印了许多民间流行的话本小说和杂剧南戏。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唯一的旧刻本。元时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尚仲贤、王伯成、石君宝的作品和杭州书会中人编写的南戏，杭州书铺也出版了不少。这些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的大量流通，对当时和后代民间文学的改进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宋时除浙本外，建本和蜀本也颇有名，而且影响深远。现在先说建本。福建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盛产竹木，造纸工业非常发达。十二世纪初，建阳麻沙崇化两坊书肆除了出版经史百家和唐宋名家诗文外，书肆主人和当地文人合作，还编印了许多适应科场需要的大型类书和市民阶层日常参考的医书、百科全书。宋末平话小说盛行，建阳书肆出版《武王伐纣》、《乐毅伐齐》、《前后汉》、《五代史》、《宣和遗事》等书，对后来历史小说的加工和再创造起了促进作用。入明，建阳书肆刻印的戏曲、小说和其他通俗书

籍，风行四方，有增无减。十六世纪中叶，刘龙田、熊冲宇、余象斗等书肆出版的书籍，门类更多，销路更广。这一出版中心，直到清初，才逐渐衰落下去。

公元 971 年即北宋开宝四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五千余卷，这是一次规模空前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得名。到了十二世纪左右，这一出版中心，逐步向眉山发展。成都眉山地区刻印的书籍，一面把中央政府颁行的标准本很快翻印出来，如现有传本的蜀刻《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和《史记》、《三国志》南北朝七史，都是根据监本为底本。此外李太白、李长吉、孟东野、刘梦得的诗歌，苏老泉苏东坡父子、秦淮海的散文以及许多地志、医书、类书都有蜀刻本。这些书籍，开版弘朗，字体遒劲，纸张洁白，校勘精审，可和浙本媲美。到了十三世纪中叶，成都眉山和四川其他地区，遭受元兵大肆焚掠，因此，流传到现在的蜀本，比浙本和建本都少得多。

北宋亡后，平阳代替了汴京成了黄河以北地区的出版中心。平阳又称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其地盛产纸张，质地坚韧，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金元两朝政府设有管理书籍出版的机构。从十二世纪起，开始出版古医书、类书和其他各类书籍。当时民间盛行诸宫调说唱，平水书肆适应大众需要也刻版流通，前年苏联政府赠还我国的《刘知远诸宫调》，就是平水坊本。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里提到的《崔韬逢雌虎》、《离魂倩女》、《双渐赶苏卿》等著名的诸宫调，我们推测，当时平水书肆一定也有刻本。这些民间文艺创作的及时传播，对后代说唱文学和戏剧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平水书肆又曾刻印民间招贴画。帝俄时代考古家在甘肃张掖古塔内发现的平阳徐氏刻印的关羽像，和平阳姬氏刻印的王昭君等四美人像，画面生动美丽，是两幅巨大的富有艺术价值的版画杰作。元初，宋德方倡刻道藏，费了七年多的时间在平阳刻成。这部七千多卷的经版，后为元朝政府下令销毁，现今除《太清风露经》和《云笈

七签》零叶外，其余都失传了。这是一次非常巨大的出版工作，平水刻工的雕版技术却因此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稍后平水书肆晦明轩主人张存惠刻印的《证类本草》和《通鉴详节》，纸墨刻工，比过去平水本精美得多，达到当时雕版艺术的最高峰。十三世纪中叶后，平水书肆还继续刻印医书和《中州集》等书。此外，山西运城刻印的《金藏》，河北宁晋刻印的经书和音韵学书，也颇有名。这两个地区和元时大都即今之北京，也是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仅次于平水的北方刻书中心。

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包括宋、金、元三朝，除了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山西平阳四个文化区刻印了大量书籍行销四方并互为影响外，其他地方政府、私人和书坊也都从事刻书工作。王象之《舆地纪胜》著录的方志遍及四川、广西、海南岛等边远地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们试把宋人《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明初《文渊阁书目》和其他文献资料来统计一下，见于著录的绝大部分都是刻版印本，就可知道宋元两朝书籍的出版量是如何的庞大了。

明清两朝各地刻印的书籍，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比之前代，不知超越了多少倍。明初，南京国子监集中了杭州和江南其他地区的宋元版片，连宋时广西桂林刻印的《桂林志》版片，也运到了南京，南京立刻代替了杭州成为全国出版中心。南藏和明初的官刻书，都在南京出版。南监本史书和其他书籍的补版翻版工作，也由南京刻印工人担任。十六世纪前后，南京、苏州、徽州、杭州、吴兴等地私人和书坊刻印了大量医书、戏曲、小说和其他各类书籍，出版量激增，销路远及国外，对当时和后代应用科学和文艺创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一部分徽州刻工搬到了南京，南京又成了彩色套印木刻画和技术革新的中心。

明清两朝的首都北京，也是全国性的刻版中心。北藏、道藏、龙藏和明代经厂本、清代武英殿本，以及私人和书坊刻印的书

籍，纸墨之精、雕印之工、装潢之美，都是前所罕见的。由于书籍大量出版，需用纸墨越来越多。随着社会的发展，手工业生产发达，棉纸、竹纸、开化纸、毛太纸等新品种不断增加，就更为大量刻印书籍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以江浙等省的藏书家如袁褧、胡震亨、毛晋、黄丕烈、鲍廷博等同时又是刻书家，他们翻刻了许多对学术研究有益的参考用书，行销全国。各地书坊还刻印了大批通俗书刊如驻云飞、挂枝儿、山歌、弹词、鼓词等唱本，为广大市民阶层所喜爱。大中小城市都有刻字铺。明清方志的木刻本遍及各边远地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一时期各地刻版印刷工作的蒸蒸日上和空前发达。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由于近代印刷术输入中国，上海、广州、汉口等地陆续铸造铅字，出版书报。古老的刻版印刷术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才逐步走向衰落。

活字版印刷术是公元1045年前后即北宋庆历年间毕升发明的。它比德国的谷腾堡早了四百年。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又一伟大贡献。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版，先用黏土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排列在铁制的框子里，印书前，把铁制框子放在敷有药品的铁板上，加热，等药品凝固后，便可以印书了。十三世纪末即元大德初年东平人王桢发明了转轮排字架，用特制的木活字，安放在转轮上，试印六万多字的旌德县志，不到一月就印成一百部。毕升和王桢发明的快速印书法，和刻版印刷的工作进度简直无法相比。

宋元人活字版印书，很早就失传了。现在流传的最古的活字版，要算十五世纪末苏州、无锡、南京一带盛行的铜活字印本，出版量最大的有无锡安家和华家。这两家印的古类书、唐宋人诗文集和水利专业用书，行销各地，为后来藏书家所重视。此外徐某印的《曹子建集》，杨仪印的《五岐公宫词》，张习印的《范石湖集》、《孙贲西庵集》，都是苏州出品。张某印的《开元天宝遗事》，贾咏印的《庄子口义》，都是南京出品。又有人用铜活字印了大批唐人诗集，分

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也是这一时期苏州一带出品。同时，常州人还用铅、锡活字版印书，可惜现在都早已佚失了。

公元1726年即清雍正四年，陈梦雷用新造的铜活字排印了六十四部《古今图书集成》，每部五千二十册。公元1773年即清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的排字工人又用木活字出版了若从《永乐大典》发掘出来的宋元佚书和《畿辅安澜志》、《琉球国志》等书一百三十三种。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活字版印刷工作，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运用前人遗法加以大胆革新的，要数泰山徐家的磁版和泾县翟家的泥版。住在山东泰山一带的徐志定，公元1719年即康熙五十八年创制了磁版，出版了张尔岐《周易说略》。公元1841年即道光二十四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费了三十年心力，创制了泥活字十万多个，印了黄爵滋的文集《仙屏书屋初集》、自己的诗集《泥版试印初编》和《翟氏宗谱》三书。此外明末和清代的京报，各地家谱和民间小唱本，用活字版排印的也不少。

远在刻版印刷术出现以前，中国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七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王玠刻的金刚经扉画，和敦煌发现的许多宗教画，艺术已渐趋成熟。宋元木刻画从宗教画发展到百科全书、文学、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书籍，《证类本草》、《三礼图》、《宣和博古图》、《事林广记》、平话小说的插图，出现了不少艺术质量很高的作品。明代各地书肆刻印了大量佛经、戏曲、小说和其他通俗书籍，几乎没有不附插图的。十五世纪初叶，徽州派版画兴起，直到十七世纪末，徽派版画独步一时。徽籍刻工在徽州、杭州、吴兴、苏州、南京等地镌刻的木刻画，特别是戏曲、小说的插图，具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时代风格，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当时著名的画家，曾为木刻家创作画稿，如丁云鹏为木刻家黄鏻、黄应泰等画的程氏墨苑，陈老莲为木刻家黄子中画的博古叶子，清初萧尺木为木刻家汤尚、汤义、汤复画的太平山水图画和离骚图。许多木刻家的创作能力，通过艺术

实践，得到了改进和提高。明末浙派项南洲，清初徽派鲍承勋父子创作的木刻画，精丽动人，构图和镌刻技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此后木刻画转趋消沉。直到二十世纪初，北京的木刻家和画家合作，木刻画又渐盛。鲁迅、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公元1340年即元至元六年湖北江陵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木刻套色印本。十六世纪末，吴兴、杭州、南京等地书肆用朱墨和多色套印的通俗读物和戏曲、小说逐渐增多。公元1600年徽派刻工刻印的《程君房墨苑》，其中天姥对廷图、巨川舟楫图等都是用各种颜色涂在一块版上印刷的，显得画面格外绚丽夺目。稍后，木刻家和印刷工人合作，便发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明末徽州人胡正言运用当时流行的饾版、拱花二法，编印《十竹斋画谱》、《笺谱》二书，把彩色套印木刻画推向新的技术高峰。画谱全用饾版法，把刻好的一块块小木版顺序付印用来表现画面的深浅浓淡。笺谱则兼用拱花法。拱花和近代凸版相似。印时用纸压在版面上，天际的白云，江上的流水，禽类的羽毛，花朵的轮廓，就一一凸现在纸面了。入清，画家王蓍等创作的《芥子园画谱》和苏州、杨柳青等地出版的民间年画，用饾版而不用拱花，也都是彩色套印的。解放后郑振铎委托北京荣宝斋翻刻的《十竹斋笺谱》，全用徽派遗法，比原本毫无逊色。

中国历代刻版书籍、活字版书籍和版画，是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给我们留下许多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资料，而且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版刻艺术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相信，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有优良传统的彩色套印木刻一定将会得到提高，并大放异彩。

（原载《人民日报》1961年5月4日）

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

刘 国 钧

书籍，作为一种工艺产品，在一定社会的一定历史时期，基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必然具有一定的材料、形态和生产方法，也就是具有一定的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这种制度也必然发生变化。

我国书籍大约已经有了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书籍的材料、形式和生产方法，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曾经起过几次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纸和印刷术的发明。由于这两大发明，书籍的材料和生产方法发生根本改变，便使我国书籍制度的发展形成三大阶段——简策制度、卷轴制度和册叶制度。

一、简策制度

简策是我国书籍最早的形式。简策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书经·多士篇》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如所指不仅是卜骨刻辞，那么，在商代就已有简策了。自西周直到东汉之末，简策行用很久。东汉以后，纸书虽逐渐流行，但两晋公牍还常用简，直到东晋之末，桓玄篡位，才下令废止。然此后封建帝王于其举行所谓大典时仍要用册。这可说是简策制度的残余，但作为书籍制度，在三国以后便不见了。

简策的材料是竹、木。竹制的叫简、策；木制的叫版、牍。王充《论衡·量知篇》说："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可见所谓简牍不过是写了字的竹竿木版而已。

竹木是容易得到的材料，又容易着墨，其制造方法很简便，所以能成为普遍的书籍材料。

单独的竹竿，有时是木条，叫做简。编连起来的简，叫做策。策也写作册。这是现在称一本书为一册的起源。编连的简可以卷为一束，如永元五年兵器簿那样，已是卷的原始形式。编简所用的绳或是丝质或是皮革，通叫做编。载于策上的通常是首尾完整的文字，就叫做一篇。因而篇就成为书籍内容计数的词。

简策长短有定制，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和八寸（都是汉尺）三种。长的用以写经典、法律，短的用以写诸子、传、记。一尺二寸的则汉人用以写《孝经》，此外，有一种长六寸的只用作算筹或符传。还有一种更小的竹竿叫做笺，乃是读书时随手注释，系在相应的简上以备参考的。后人称注释为笺，起源于此。

至于版牍则主要是作为通信、画地图、官书公牍、奏章、短文等等之用，不用来写书，这里就暂且不说了。

简策上的文字都用笔写。有人认为最早的简策是刀刻的，就是说，在书籍生产方法上，在笔写之前有过一段契刻时期。这恐怕难以置信。笔墨的发明很早。仰韶时代彩陶上所画的纹饰只能是笔墨之类的产物。其起源当在殷以前。殷代甲骨文有先写后刻的痕迹。刻比写费工。这些都使我们难以相信简策文字曾有过刀刻时期。这种误解，恐怕是因为古人常提到"书契、""刀笔"而引起的吧。至于卜辞和金文之所以必须刀刻乃是所用材料的性质使然，不能以之为简策也须刀刻的佐证。

简策制度大体如上所述。但简策两词的意义似仍有问题。上文根据王国维、马衡两先生的遗说，而王、马两先生又都本于唐人孔颖达、贾公彦之说。王国维还以为"策"字本义是鞭策而为"册"的假借字。就汉以来策册两字混用的情况看来，这是正确的。但若就两字本义说，则似可商榷。据《说文》，册的本义是符命，其形状"一长一短，中有二编"；而简的长度一致，编连之后，何来一长一

短？如此，则"册"未必是编简的通称，而"策"也就不能是"册"的假借。我近来颇疑孔、贾编简成策之说不甚恰当，不如颜彪之说较近情理。顾彪认为简策之别在于长短，短者为简，长者为策。惟其简长有二尺四寸，颇似马鞭，所以可借鞭策之策称呼它。此外，简也不一定是未编连的单札。刘熙《释名》："简，间也，编之篇篇有间。"简之得名正由于编连之后根根分明，条条有别。所以我颇疑简是通名，策是长简，编连后之整体大概就名为篇或编，而册则是编简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专名，古人计书之数以篇，不以策或册，也是一证。但这不过是个人臆说，姑且写出，请读者指教。

二、卷轴制度

春秋以后，私家著作丛起。简策已觉不便，早在战国后期已出现以帛为材料的帛书。此后，经汉魏至南北朝，帛书的使用连绵不断。在悠久的年月里，作为书籍材料的帛有许多种名称，如缯、缣、绢、素等等都是。战国前汉，帛书简策并行，后汉则简、帛、纸同用，但都以简策为主。三国以后，纸书渐多，简策逐渐不用，而帛书仍然通行。至南北朝，用帛作书籍的渐少，但仍用以通信和作画。隋唐以来，绢素专用于作画，而书籍都为纸制。

用帛作书籍，可以随文字长短写在整匹帛上，然后裁下。裁下的帛，仿照编简后的形式，卷成一束，称之为卷。这才有卷之名。用细小竹木棒作为卷舒的中心，这便是轴。于是出现了卷轴形式。于是书籍就以卷计数了。

帛上写字，往往先画成直行，这叫做界。卷端为了防止破损，还另留一段空白，后来变为另外用一种帛接上，称之为首或褾。帛上文字有时也分用朱墨两色来区别不同作用的部分。后汉时，宫崇所献于吉的《太平清领书》（现在残存的《太平经》），就是"素书朱介，青首朱目"，五色斑斓的一部帛书。西晋荀勖编《中经新簿》也"盛以缥囊，书用缃素"。

帛书的出现是书籍材料一次重大变化。帛轻便柔软，易写，易携带，易收藏，又不易散乱。这些优点大大胜过了竹木的简策。然而它有很大缺点，它的产量太少，不如竹木普遍，价格又太贵，不是普通人所能用得起。帛书在三国时代已成为帝王贵族显示阔绰的工具。如曹丕以自著的《典论》用素写一部送孙权，用纸写一部送张昭，就是一例。因此，尽管它有很大优点，普通人民还是不能利用它。它在前既不能排斥同时的简策，在后也不能排斥同时的纸结果成为一种奢侈的特殊书写材料。

帛在书籍发展上虽不能独占一个时代，但却有极大影响。它不仅引进了卷轴制度，而更重要的是它促使人们追求一种既具有缣帛的优点，但又没有它的缺点的书写材料。于是纸便被发明了——起先是丝质纸，后来是植物纤维纸。

过去都说，纸是后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所发明。现在知道这是不够确切的。在蔡伦以前，很早就有一种由丝绵制成的纸。纸字的本义就指的是这种东西，许慎《说文解字》中，“纸”字的解释可以为证。此外，一九五七年西安灞桥西汉墓中出土的古纸也是丝质。据说，这墓不能晚于汉武帝。那么，纸的发明可以早到西汉初年或以前。只是由于后人习惯于植物纤维纸，便觉得丝质纸不是“纸”了。其实这种丝质纸可以裹物，可以写字，其性能完全与植物纤维纸一样。汉成帝时赵飞燕以赫蹏裹药授宫人，并于其上写字，密令毒杀曹伟能（公元前12年事）。赫蹏就是一种纸。东汉刘炟以纸书《左传》一通赐贾逵。这些纸当然都只能是丝质纸。而且在蔡伦以前也已有了植物纤维纸。关于这方面近人的论证相当多，不再备举。蔡伦的功绩在于总结了当时民间用树皮、麻头等等植物纤维造纸的经验而加以改进、提高并予以推广。当然，这一功绩还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这一改进使得纸有大量生产的可能，使书籍有了代替缣帛的材料，从而便利了书籍的生产，符合了文化发展的要求。

纸书的出现巩固了并推进了卷轴制度。

纸尤其是丝质纸的形状性能都和帛相似。因此，初期纸书就沿袭了帛书的形式——卷轴。三国以后，卷轴制度日趋华丽。轴一般虽以竹木做成，而帝王豪富却往往用象牙、珊瑚、琉璃等贵重材料。褾一般虽然用纸，但帝王豪富也往往用绡、绫、锦等丝织品。褾上系以丝带以便卷后捆扎。轴端系上一个小签，上写书名卷次，以便插架后检寻。�也有用象牙做的。一部书不止一卷时，往往五卷或十卷用帙包在一起。帙以织锦做成，或以细竹丝编成帘再衬以锦。卷、轴、褾、带、笺、帙是卷轴制度的组成要素。隋唐公私藏书往往用不同颜色的轴、带、褾、笺来区别门类。

为了保护纸卷不至断裂，往往在纸的背面裱上一两层纸，这叫做褙或装背。六朝以来装背成为一种美术工艺，有许多考究。隋唐国家藏书机关都有专门的装背工人。

为了保护纸书不致虫蛀，还发明了许多防蛀方法。最著名的方法是用黄蘗汁染纸后再行书写，谓之人潢或潢治。人潢后，纸色发黄，叫做黄纸。黄纸写书较白纸为贵重。隋唐国家藏书机构也有专门的染潢工人。

此外，还发明了能使粘连纸张永不脱落的浆糊或胶水。敦煌发见的六朝隋唐写本虽极破碎，其粘缝也不脱落，足为明证。

由此可见，卷轴书籍的装治技术是很高的。今天我们书籍生产已不用这种技术了，但是国画的装裱技术却是继承这一传统而来的。在六朝隋唐时代这种技术既用之于装治图画，也用之于装治书籍。因为那时的图画和书籍在外表上没有什么差别。

唐代文化发达，出现了许多工具书。这种书专供读书作文时的查阅参考。但卷子往往长达几丈。在一部大书中检寻片段的资料，非常不便。于是在唐朝后期就出现了改卷轴为册叶的风气。这一风气由于印刷术的发明而固定了下来。

印刷术的发明是书籍生产方法的大革命。自有了印刷术书籍

才能大生产。我国劳动人民首先发明了雕版印刷，随后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对世界人民作出了无比重大的贡献。

我国印刷术导源于印章和石刻，是这两种复制方法的结合。但是在何时发明却还没有定论。目前公认的意见是唐代发明了印刷术。但在唐代何时依然意见纷歧。个人认为大约在武后玄宗之间，即七、八世纪之间，唐代生产力达到高峰的时候。这还有待于深入研究。问题之所以不易解决是因为这一伟大技术是由普通工人在印章和石刻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拓石技术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来的。当时用来刻印人民日用所需的书籍，不为知识分子所注意，因而就没有被他们记载下来。直到九世纪，印刷术已相当流行了，才在他们的记载中找到一鳞半爪的记录。然而也还不过是说当时已有印本书而没有人能追溯它的缘起。"文献无征"，我们只好从事于推测了。

印刷术发明以后，最初只在民众之间流行，刊印人民大众所需要的读物，如字书和工具书，如日历。九世纪开始前后，佛教徒着手利用它来刊印经典，以利宣传。九世纪末，才有文人用它来刊印自己的文集。十世纪三十年代，即五代后唐时，统治者才看到对印刷术可资利用，而开始刊印九经。北宋统治者继承这一传统而加以发扬。大量书籍才在全国开雕。此后，印本书籍成为书籍的主流。书籍成为真正的工艺品。印刷术本身也不断提高，活字印刷术和套色印刷术相继出现。为封建社会文化放出了灿烂光芒。

三、册叶制度

当印刷术在晚唐开始流行的时候，书籍制度已开始向册叶制度过渡。最早的过渡形式是梵夹装或经折装，就是把一个长卷反复折叠成长方形，而在其前后用厚纸作成封面和封底。这个形状颇像外来的贝叶佛经，因而有梵夹或经折之名。这样，要查书中哪一叶就可翻开那一叶，避免打开长卷又要卷起的麻烦。由梵夹装

不久就变成旋风装。这就是用一张整纸对折起来，一半粘在书的最前面，另一半从书右包到书后，粘在最后一叶之上而成的形式。因其首尾相连，回旋不断，所以叫做旋风装。这两种形式唐人统叫做叶子。卷子变为叶子，是由卷子不便查阅所引起，这一点宋人欧阳修、元人吾丘衍都说得很明白，但这只是装而不订，是长纸而不是散叶，还和以后的册叶不同。但宋人已有把经折装叫成册页的。现在也有人把册叶一名专给经折装的。

但我以为真正的册叶应从蝴蝶装开始。而这是由印刷术巩固下来的。

印刷术为什么能够巩固一种新的书籍形式呢？最早的印本书籍，唐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还是继承着卷轴形式。现在还不知道初期印本书有没有梵夹装或旋风装的形式。但大约是可能有的。这几种形式都要求先将印成的散叶粘连起来。但梵夹装或旋风装经久之后，折痕就会断裂。断裂开来的纸叶恰好相当于一张印叶。把印叶直接装成书本比先粘成长幅要省事得多。这样，在旋风装之后，就出现了蝴蝶装。蝴蝶装是以印叶反折而将折口粘在包裹书身前后的护叶上而成的，同时，在前后加上硬厚的封面，因此可以竖立在书架上。但当时习惯以书口向下而不是像现在的书以书根向下。

蝴蝶装起源于五代。北宋时已盛行。司马光教导其子读书时保护书籍的方法，张邦基记王洙论作书册的方法，指的都是蝴蝶装的书。南宋崇文院有专管装书背的人。直到元代，蝴蝶装才为包背装所代替。

蝴蝶装积叶成册，才是真正的册叶制度。元代王桢曾名之为“集册”，以别于唐人的叶子。在这基础上，经过几度变化，书籍才具有现在的形式。

南宋中叶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发展出包背装。这仍然以整纸包裹书的前后，但改书叶反折为正折，使折口向外而将散口粘于护

叶，成为书脊。这种形式更便于阅读。但这样一来，如果仍照蝴蝶装式样排架则易于磨损书口，破坏书页中缝。因此，就改竖放为平放了。

从包背装发展出了线装。这首先因为包背装的书籍部分是书的左右阑外空白，如果一一粘连，徒然费工费事而无用，因此就在空白外打眼穿订，便之成为一册，然后再加封面。这时才有装、有订。最初用纸捻订，后来改用线订。同时，包背装的书已经平放架上，没有用硬封面的必要。于是将整纸封面改为前后各一叶的软封面，连同书叶一同打眼穿订，这样，就出现了线装。这大约在明代中叶嘉靖初元前后。

用线订书似乎很早。敦煌遗书已有线订。宋人论作书册方法已有缝缋不如粘叶（蝴蝶装）之说。但这些方法并未传留下来。现今的线装则是从包背装演变而来的。

线装书的出现完成了我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展过程。直到目前，还为雕版书籍所沿用。而初期的铅印书也是这样。

总上所述，我国古代书籍制度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的，而这一过程又是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

奴隶社会的殷周人民以竹木为材料，创造了简策制度，而封建社会则创造了卷轴和册叶，一开始就以缣帛为材料而创造了卷轴。但由于缣帛贵重难得，仍然继承了并发展了前一时期的简策制度。但是帛书的使用促使人们不断追求一种轻便而易于生产的书写材料，从而导致纸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纸就代替了竹木和缣帛而为制造书籍唯一的材料，直到如今。纸巩固了并提高了卷轴制度。但卷轴发展到唐代后期已经不能适应当时文化的需要，不能适应当时用书方式的改变，于是产生了叶子形式，为册叶制度打下基础。而印刷术的发明不但使书籍有大量生产的可能，还促使书籍由叶子转变为册叶。由此可见，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前一时期的末期孕育着后一时期的新因素，新因素逐渐发展，最后代替了旧因

索，而后又为更新的因素所代替。

书籍制度的发展主要是劳动人民的辛勤创造。当劳动人民创造了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时，统治阶级起先总是轻视、忽视、甚至排斥。只有等到这些新东西在人民中间行开了，他们才开始注意，并转而利用这些东西为自己服务。当然，在统治阶级掠夺了人民创造的果实以后，也可以做一些改进和提高的工作。然而主要的动力，促进书籍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是来自人民——来自普通劳动人民。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发展的经过正是这样。

（原载《光明日报》1962年，2月17日、20日、22日、24日）

中国古代书籍的发展

冀淑英

我国是最早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国家，随着纸张的大量生产手写本和刻版印刷的书籍，都大量出现了。这两项伟大的发明，对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有极大贡献的。

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以前的文字记载

在未有纸张以前，我国最早的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距今三千多年前（前1300—1150）商代的统治者，无论遇到战争、祭祀，或其它事件，都要用龟甲或兽骨卜一下吉凶，卜的结果，就由当时的史官刻在甲骨上。这样，大量的记载着文字的甲骨被保存下来，这就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以来，在河南安阳小屯等地出土的甲骨文字。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文字。

商、周时代（前1300—200年）我国的祖先也曾把文字铸或刻在青铜器上，青铜器上的文字，后来称为“铭”。铭文多是纪念性

质，记载当时的重大事件或制器的人。有盖铜器，文字在盖内或器内，铭文的字数、字体，也因制器的时代先后有所不同，这种文字，通常称为钟鼎文或金文。

古代一般的书籍是使用狭长的竹片或木片，叫做简牍，作为记载文字最主要最普遍的工具。简牍的使用是很古的，《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即指简牍，似乎很早已经使用。历史上，我国曾多次出土竹木简牍，如西晋太康二年（281）在及郡（河南卫辉）战国魏安厘王墓中，曾发现大批古简牍，其中发现两部书，即《穆天子传》和《竹书纪年》。这些竹简没有保存下来，但对当时和后来的学术界影响很大。近半世纪以来，尤其在建国后，由于考古学家的发掘，大量的简牍被发现了，如1953年长沙仰天湖出土竹简、1959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仪礼》、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医简，更重要的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两座汉墓，两座墓葬中都有简牍出土。经整理，一号墓出土竹简有4942枚，这是目前为止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这批竹简大部分是古书，重点是兵书。二号墓出土竹简有32枚，系"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前134），基本完整，是现在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简上文字全部为隶书，用毛笔蘸墨书写，每简字数多少不等，整简每枚多达四十余字。联缀竹简的编绳早已腐朽，在有的简上还可以看到一点痕迹。用墨书写的文字，除个别字漫漶难辨外，绝大部分很清晰。

除了简牍，古代也用丝织品作为记载文字的工具，这就是缣帛。缣帛不象简牍那样笨重，使用比较方便，不过价钱很贵，一般人是不能用的。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现帛书，是古代的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实物，说明古人所谓"著之竹帛"，是切合实际的。

在古代记录文字的工具中，也有利用刻石的，如秦朝的石鼓文（籀书）。我国在印刷术未发明以前，人们读的书都是传写下来的，错字和纠纷自然难免。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曾把当时一般人

必读的儒家经典，刻石立在洛阳太学前，作为当时的标准读本。后世称为熹平石经(隶书)。魏明帝正始年间（240）也刻过石经立于洛阳太学，每一字用当时通行的三种字体(古文、篆文、隶书)来刻，所以又称作"三体石经"，或叫做"正始石经"。

这些都是纸张发明和普遍使用以前的古代书籍。

用纸写的卷子本

公元一世纪我国已经知道造纸。根据书上记载，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蔡伦总结了当时应用的造纸技术，在此基础上，造成了一种新纸。由此推行开，纸的生产和使用逐渐普遍，我们有了大量写在纸上的书，简牍文化很快地被卷轴文化代替。卷轴的形式是粘合幅度相等的若干幅纸，由后向前卷成一卷，纸面有直线和边栏为界，前后加以签和轴，便于舒卷，后世称作卷子本。普遍的卷子本多用竹签木轴，讲究的用象牙、玉、珊瑚等，所以古人有"牙签玉轴"之称。现存的古卷轴，包括四世纪至十世纪的写本，绝大多数是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在甘肃敦煌鸣沙山莫高窟发现的。莫高窟发现的古卷轴，总数约有二万卷，这里面有我国现存最古的刻本，写本书和古代绘画。在 1907 年至 1908 年，先后被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盗去其中精华约一万卷，剩余下来的八千多卷，以佛经居多，当时由甘肃移送北京学部图书馆，现由北京图书馆保藏。这是过去我国文化遗产遭受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惨痛一幕。我馆保存的敦煌卷子曾由陈垣主持编出目录，即《敦煌劫余录》(1931 年出版)，总计有 8700 多卷。建国后新入藏的有1803卷。这里面时代较早的写本有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写的《律藏初分》，北魏太安四年（458）写的《戒缘》。从现今敦煌卷子看，其中除封建社会必读的经书外，还有大量的应用书籍，如医书中的《脉经》、《本草》、药方等，还有历书、算书、兵书、史书、诗文作品，包括相当数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如变文杂曲之类，这些书中有不少

是后代已经失传的。其中占绝大多数的还是佛经，以及一部分道经和其他宗教的书。整个敦煌宝藏，反映了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的辉煌发展和成就。敦煌宝藏发现后，引起了欧洲、日本和其它国家学者们的极大重视，研究者日多，形成当代世界学术中一股新流；这项研究，称为敦煌学。

雕板的兴起和早期雕板印刷

印刷术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重大贡献之一。关于印刷术的起源，历来学者们是有不同看法的。根据文献记载，有的认为六世纪末的隋朝，已有了刻版印刷，也有的说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用刻版印刷，这些说法也有人认为证据不足，还不能肯定。现存最古的刻本，有敦煌所出九世纪唐朝的卷子本《金刚经》。这卷金刚经前面有扉画佛说法图，以下是经文，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题记。（这卷经现存英国博物院）。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卷中的图和经文，刻得精练圆熟，看来是雕板印刷技术已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达到熟练程度的作品。可以说印刷术的发明要比刻这卷经的时间早得多。敦煌所出刻本还有唐代乾符四年（877）和中和二年（882）的历书(现藏巴黎图书馆)。从这些实物看来，初期的雕板印刷术，是兴起于民间，为广大市民阶层传播文化的有效工具。凡是人民大众生活中需要的书，就首先刻印流通，如日历，诗歌、佛经、小学韵书等。唐代白居易的诗，是人民大众喜欢读的，元微之为白诗作序，曾说有人拿白诗来换取茗酒。九世纪末，因黄巢起义，唐僖宗和当时的统治集团，逃避到成都，成都顿时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其地盛产纸张，为刻印书籍构成有利条件，柳玭随僖宗逃避到成都，在书肆中看到许多字书和迷信用书，都是刻版印本。近年成都唐墓中出土一张梵文陀罗尼经咒，上刻成都府卞家印，这是国内仅存的唐刻本(已印入《中国版刻图录》)。这些实物，反映佛

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敦煌也出现有单张刻印的佛象和捺印的小块佛象。这些说明唐代刻印的书籍，还多属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和佛教经典。

大规模地刻印儒家必读的经书，是在雕板印刷术流行后，过了相当时期才开始的。五代时的宰相冯道说："尝见吴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因建议政府雕印九经。当时国家的学校兼出版机构——国子监，因冯道等的建议，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开始校刻九经，后又增刻《论语》、《孝经》、《尔雅》、《经典释文》等，这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至后周广顺三年(953)才全数完成，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五代监本"。五代监本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后世国子监刻书，和宋代刻版的经书，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五代监本影响的。

雕板印刷的广泛传播——宋、金、元以来刻书概况

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包括宋、金、元三朝，是我国雕板印刷史上全面发展的时代。由于雕板印刷的盛行，书籍的传播数量发生了空前飞跃的进步，同时文化学术的传播，也得到巨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书籍的需要更加迫切，因而也推动了印刷技术的提高和改进。这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大量刻书，私人也刻书，专门从事出版事业的书肆也在各地出现了。刻印的书籍不仅数量空前之多，刻书的范围更是空前扩大，经书、史书之外，重要的子书、医书药物学的本草、建筑学的《营造法式》，算学、诗文集、文选等各门各类的书都已雕板印行。

宋代的雕板中心地区，除北宋首都汴梁(开封)外，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是三大文化区域。北宋以国子监为首，刻书的范围，除重刻五代监本十二经的经注本，又遍刻九经单疏和《论语》、《孝经》、《尔雅》的新疏；继又校刻十七史，以及重要的子书、医书、算书、文选等等，这些书籍由国子监校定后，多数均送杭州雕

板。杭州在五代时，属于吴越，是政治经济中心，良工集中于此。浙东浙西又是盛产纸张的地方，所以宋代的国子监本，多数是在杭州雕板的。南宋时，杭州成为首都，雕板事业有增无已。因此，宋以来的雕板印书，浙刻本实处于领导地位。影响所及，杭州邻近地区各地方政府，也都大量刻书。如绍兴、温州、台州、明州（宁波）、婺州（金华）等地，刻书都很多。专以刻书为营业的书坊也到处建立，杭州就是书坊集中地之一，如陈道人书籍铺是其中最有名的，刻书的数量和质量，都十分可观，后世称这些书坊刻本为“书棚本”。浙江地区刻本既多，技术力量集中，因之所刻的书表现了鲜明的地方风格，浙本字体方整，刻法圆润，版式疏朗，刻印水平较高，在宋版书中，可说居于首位。

宋高宗赵构南渡后，定都临安（杭州），重建国子监，将当时就地保存的一些史书雕板，如《史记》，前后汉书的十行本，《新唐书》的十四行小字本，继续修补出版，同时又重刻一些经注和单疏。所以流传至今的宋刻本，绝大多数都是南宋刻版，北宋刻版极少见，也是因这个缘故。南宋国子监除新刻书版外，又征取一部分地方刻版运到杭州入监，作为国子监本，如淮南、江东漕司刻的《史记》、前后《汉书》，衢州刻本《三国志》、台州刻本《荀子》、温州刻本《唐六典》等都是。因此，南宋国子监中的书版，成分较杂，只有一部分是国子监自己校刻的。宋亡，这些书版都转入西湖书院，元时曾大事修补，继续出版。明代洪武八年，又将这些书版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修补再印，这些一再修补的有名无实的三朝版，直到清朝嘉庆时，才毁于一场火灾，全部告终。现在流传的宋版书中，有许多宋刻元印、宋刻元明递修本，就都是由这些书版传下来的。

福建建宁府所属建阳、建安，地处闽北山区，当地盛产竹木，宋代造纸工业已经很发达，这对于印刷事业是个极有利的条件。福建历来又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北宋元丰时，福州东禅寺曾刻“万寿大藏”，全藏六千四百余卷。北宋政和二年至南宋乾道八年

(1112—1172）福州开元寺又刻“毗卢大藏”，今藏六千一百余卷，由此可见福建地区当时雕板事业的基础和实力。从十二世纪起，建阳地方书肆开业的逐渐增多，他们的出版方向力求迎合时代，面向广大群众。所刻的经书，把经、注、疏、释文合为一体，给读者很大方便。同时为适应读书人科场应试或一般参考需要，书肆和文人们合作又编纂出版了不少新型类书。如：《艺文类聚》、《纪纂渊海》、《山堂考索》、《翰墨全书》等，在当时流通量很大。此外人民需要医卜星相等杂书，日用百科全书，如《事林广记》、《居家必用》，话本小说等等，建阳书肆也大量刊行。因为书肆是以营业为主的，在校勘刻版上不如一般官刻、私刻严谨，差误难免，当代和后代的人们都认为建本质量最差，但建本的产量最高，流通最广，在当时也是事实。

四川的雕版历史最久。九世纪末，成都已有雕版书籍流行。唐代以来，四川的经济基础较好，由于人才多，文化高，雕板印刷事业很发达。北宋初，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宝四年（公元971）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全藏五千多卷，这就是后世所称的“开宝藏”，可见当时四川的出版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一定占有很大比重。以后，雕板中心逐渐由成都移向眉山，眉山的出版事业，一方面翻印国子监校刻的书籍，一方面适应大众需要，出版了大量唐宋人诗文集和类书、医书等等，刻印的精美，不在浙本以下，因此可以说，蜀本实兼浙、建二本之长。宋末，四川因遭元兵焚掠，眉山文化区全部毁灭，因此，蜀刻传本较少。

由北宋后期至南宋中期，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在金王朝统治之下，金代的雕板中心在平水（山西临汾）。金刻本流传不多，就现存的少数金本看来，刻印的水平很高，刻本的门类也很广，大概是北宋亡后，汴梁刻工有的迁徙北方，逐步发展，到十二世纪才形成的。从金到元，平水地区书肆业也十分发达。最典型的金刻本，应提到“金藏”，金藏系金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三年（1148—1173），解州

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主办，由女子崔法珍断臂苦行，向晋南人民募刻成书的。原藏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因又称"赵城藏"。1942年日军侵入山西，欲掠走此藏，经八路军抢救保全。全藏仅存四千三百余卷，全为卷子本。1949年由华北人民政府移送我馆入藏。这部藏经纸质坚韧，字体遒劲，可谓金代雕板水平的代表作。

元代的雕板中心，仍属杭州、建阳两大地区。元代杭州刻书盛况，比之宋代，有过之无不及，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刻书，如：《文献通考》、《元一统志》、宋、辽、金三史、《圣济总录》等，都在杭州雕板。杭州书肆业在原来基础上，也日益发展，大量通俗文艺书如平话小说、杂剧、戏文等都刻印流传，杭州的书坊业，自宋至元，盛况不衰。建阳地方书肆，从宋以来，更是风起云涌，历元至明，出版品有增无减，从现在流传的宋、元、明刻本看，建本占的比重仍是最大的，当年雕板数量也可想见了。

宋、元以来，地方官吏和儒学、书院全都提倡刻书，有所谓漕司本、公使库本、郡斋本、书院本、儒学本等等。元代各路儒学大刻史书，后世称之九路本史书。

明代政治中心是南京和北京，南京国子监和北京国子监都作出版工作，当时内府刻书，由司礼监太监主管，故称"司礼监本"，又称"经厂本"，因司礼监有"经厂库"系藏书版之地。明代私人藏书家多，刻书很盛，地方政府、藩邸贵族们也刻了很多书，传布流通。各地书肆业也普遍发展，杭州、建阳以外，南京、北京、徽州、苏州、吴兴等地，都是刻书盛行的地方，出版量极庞大，形成各自不同的地方风格。也正因为出版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也就在所难免。

清代初期，官刻本较少，各地民间私人刻书较多。民间刻书沿明代风气，以方整的写刻体为主流（或称仿宋，欧体）。康熙中期以后，清王朝统一逐渐巩固，内府刻书日多。又在武英殿设修书处，派翰林词臣掌管，刻印俱精，称为"殿版"。当时又盛行用精楷写刻，蔚为风气，一直到乾隆、嘉庆时期，楷体字写刻书仍源出不穷，

后来称这样的书为软体字写刻本，这些大多数都刻印精美，形成一代特色。清代考据之学大兴，一般学者和藏书家多精于校勘，所刻的书不止数量多，门类广，质量也好，有的内容方面学术参考和应用价值也高，有些又流传较少，所以清代刻书尽管时代较近，还是要予以应有重视的。

抄　本

虽在雕版时代，写本书依然大量流行着。古时书不易得，一般读书人只好靠互相借阅传抄，还有的遇到难得罕见资料，没条件刻版流通，也就先传抄一部。我们现在所见的抄本，以明清两代的抄本占绝大多数，多属于这种情况。这中间，抄本的内容、价值、抄写质量，也有不小的差距。因此，抄本不容忽视，但要区别对待。

明、清两代有世界知名的两部抄本书流传到现在，一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三年命解缙等编纂的一部大类书，即《永乐大典》，编纂时搜集资料极为广泛，首先采用明朝宫廷中文渊阁藏书作为基本资料，又派人分赴各地采购图书，集中了经、史、子、集、释藏、道经以及戏曲、平话小说等各种门类的书不下七、八千种，依照《洪武正韵》韵目，将这些书籍一字不易地整部、整篇、或整段按韵编入，至永乐六年（1408）全部缮写告成。全书连目录共计 22937 卷分装 11095 册，因卷帙过多，始终未能刊版。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宫中一次失火，大典因抢救得法未毁，世宗仍命徐阶等摹录副本一部，历时六年，至隆庆元年（1567）副本写成。大典在明代共有两部，一部是永乐时写的正本，一部是现在流传的嘉靖副本。正本不知毁于何时，副本在雍正时由皇史宬移至翰林院（东交民巷）收藏，乾隆时重点，仅存九千余册；这九千余册，在编纂四库全书和全唐文时曾大起作用。从中发掘出许多珍贵资料。大典遭受的最悲惨的命运，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的时候，大典被烧毁了一部分，未烧为灰烬的全部被帝国

主义者挟之而去，盗运回国。从那时起，欧、美、日本各大图书馆均藏有大典若干册不等，我馆藏有二百二十册（内六十册存美）。

1960年9月，中华书局将现存大典全数影印出版，共印出730卷；1962年2月台湾世界书局也影印大典，较中华所印多十二卷。目前据日本岩井大慧所编小册子统计，大典存在有797卷，约合原数（22937卷）的3.4%强。

再一次大规模的写本是清朝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九年（1772—1784），清高宗弘历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这是一部按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编成的一部大丛书，规模宏大，卷帙繁重，其中共收入古今图书3470种，79018卷，按照一定格式（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缮写七部，分藏七阁，计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行宫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后来文源毁于咸丰十年（1800）英法联军入京焚掠圆明园之时，文汇、文宗毁于兵火，文澜也有一些损失，但经抄补配全，文渊于解放前夕又被运往台湾。现存只有文津、文溯、文澜三部，文溯现在由辽宁省图书馆移交甘肃省图书馆保存。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1915年由承德运至北京，交我馆前身京师图书馆保藏的，移交时，曾由鲁迅先生监点。全部共计36304册，6144函。书的封面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用绿、红、蓝、灰四色的绢装成，全部保持原来式样保存。

印刷技术的革新——活字印刷、套印和版画

雕板印刷术发明以后，大大提高了书籍的生产量，给学术文化的传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文化发展也促使人们在印刷技术上寻求改进。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这是印刷史上重大的改进工作，比德国谷腾堡始用活字早约四百年。毕升创造的活字是用胶泥做的，在宋人沈括著

《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毕升之后二百多年，元代的王桢发明了木活字印刷，他在安徽试制了一套木活字，依法试印《旌德县志》，共六万多字，不出一月，便印成一百部，成绩很好。这些最早的活字印本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王桢在他著的《农书》中，详细说明了木活字的创制和印刷方法，为我国印刷发展史，留下一份可贵的资料。

明代中期（十五世纪中叶后），苏州、无锡一带盛行铜活字印书，著名的有华燧会通馆、华坚兰雪堂、华珵、安国等家，同时其它地区还有金兰馆、碧云馆、建业张氏芝城、建阳游氏等许多家的活字印书，从这些流传下来的活字印本，可看到十五六世纪以来，各个地区活字印书的水平和盛况。明代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不多举了。清代曾两次大规模地应用活字印书，一次是雍正四年（1726）用新制的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这也是一部大类书，全书有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之多，因为卷帙庞大，所以只印了六十四部（一说六十部）。第二次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武英殿另制了一套木活字来印《聚珍版丛书》。这套木活字共有二十五万多个，当时由金简承办，他写了《聚珍版程式》一书，详细说明木活字制造及印书的方法和程序，在我国印刷发展史上，很有参考价值。另外，清代一般木活字应用也很广泛。如《红楼梦》的流传，除早期抄本外，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1791、1792）曾两次用活字印行，因为是高鹗和程伟元主持，后来就称这两次活字印本为“程甲本”、“程乙本”。清代官方出版的京报从乾隆至清末，都用活字印。民间应用则更普遍，如家谱、小说、弹词、宝卷等通俗读物，多用活字印行。活字印书，方便经济，效率也高，当然为人所乐用。清代道光时，应用活字印刷工作，又有所革新，苏州人李瑶，自称“仿宋胶泥版”，制成泥活字，印《校补金石例四种》；泾县人翟金生，以三十年精力，制成一套泥活字，印行自己的诗集《泥版试印初编》和《翟氏宗谱》；福建林春祺以个人力量制出一套活铜

字，印行《顾氏音学五书》。这些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所印的书，质量也好，其余活字印书甚多，不一一列举。

我国木刻画的历史也是很久的，现存九世纪唐代咸通九年刻的《金刚经》，卷前扉画佛象，雕板技术已很纯熟。宋代雕板印刷盛行以后，版画的应用更广，因之技巧也随着提高。当时刻印的许多佛经，卷首都有精美生动的宗教画；另外有关应用科学、考古学之类的书，如《证类本草》、《宣和博古图》、《三礼图》等也都附有精致的木刻插图。元代的版画更为发展，因出版面扩大，书籍刻印的数量、品种越来越多，医书、佛经等等刻有插图，平话小说和其它通俗读物，更是几乎都附有木刻插图，这风气一直传到明代，尤其明代中叶，十六七世纪以来，木刻画更为盛行，当时南京、建阳、杭州、徽州等地刻印的大量戏曲、小说和其他书籍，书中插图都精益求精，南京书肆的富春堂、世德堂、继志斋等，都因出版附有版画插图的戏曲、小说书著名于世。专以版画为主的画谱也出现了，如杭州刻的《历代名公画谱》、徽州刻工刻的《程氏墨苑》，还有《唐诗画谱》、《诗余图谱》等等，已是纯艺术性的版画作品。从明代万历以来到清代初期，版画成绩所以这样突出，还因当时有许多画家与木刻家合作，供给木刻家以艺术水平较高的画稿，如丁云鹏画《程氏墨苑》、陈洪绶（老莲）画《博古叶子》和《水浒叶子》，肖云从（尺木）画《离骚图》和《太平山水图画》等。清代康熙时除书中插图外，一些木刻家又从描绘宫廷及官僚生活方面，达到一定成就，这时创制了一些规模很大的插图书，如《万寿盛典》、《职贡图》等。以后木刻图逐渐消沉，直到清末，北京木刻画又盛行，呈现了多年未有的盛况。

还应该提到的中国印刷术的又一成就，即套印技术的发明。套印技术的兴起也是很早的，元代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刻《金刚经注》，佛像下的灵芝，即用朱色印，这是现存古书中最早的套色印本。明代十六世纪以后，朱墨套印书风行一时，吴兴闵齐

伋、凌濛初二家刻书，几乎全是朱墨套印或四色、五色套印，书的正文墨印，评或注印成红、绿、蓝、紫等色，看来十分醒目。精工细致的还是木刻画的彩色套印，万历年间（1600年前后）已有象《花史》那样，在一块版上涂上几种颜色，印成彩色画的作法，徽州刻的《程氏墨苑》，最早印本也是把几种颜色涂在一块版上刷印的。后来发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一幅画按颜色不同刻成许多块不同形式的版，能印出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与绘画无异，把彩色木刻画印刷方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明末胡正言应用当时流行的“饾板”、“拱花”二法，编刻《十竹斋画谱》、《笺谱》二书，设色妍丽、刊版精工，达到当时套印技术的高峰。清康熙中王概、王蓍兄弟编刻《芥子园画谱》，也是彩色套印的，这些木刻画已不是一般书中的插图，而是画家临摹用的彩绘课本了。1934年郑振铎委托北京荣宝斋翻刻的《十竹斋笺谱》，采用胡正言“饾板”、“拱花”遗法，比原本并无逊色。近年荣宝斋在原有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有所革新，用木刻水印翻印了许多名画，在丰富多彩的近代印刷术中，也是极出色的。

（原载《北图通讯》1979年第1期）

我国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比较研究

丁 瑜

从印刷技术的发展考察，活字印刷比雕版印刷是更为先进的工艺技术。虽然现在印刷技术已发展到了照相代替手捡铅字排版，并把激光、电子等先进技术使用到印刷工业中去的时代。但是，一般广泛流通阅读的书报刊物，往往还是采用活字排印。因此，国内外所有研究印刷史的著作，对活字印刷非常重视，并特别强调它

在文化学术领域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甚至称它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最伟大的发明”；“是文明之母”。我国自明、清以来，藏书家的藏书目录中，往往是把活字印的书籍选为“善本”（珍本）给以特别著录。不过从现存古代印行的图书或是在前人藏书目录的记载中，都可以发现活字印本图书的数量比雕版印刷的图书数量相差极为悬殊，活字印刷像是印刷术中的一种点缀，它只是与雕版印刷相辅而行，真正作为普及文化、传播学术的有效方法和工具，还是雕版印刷术和用这种技术印刷成的书籍。它在文化领域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居于首要地位。这种情况，我国与欧洲是不大相同的。

公元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升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套活字。当时的著名学者沈括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作了详细记载。活字印刷的方法是：“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沈括不仅把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详细记录下来，而且把毕升制造的泥活字也保存起来，传给了他的后人。但是，他的子孙对这批活字似乎没有利用过，或是很少利用。因此，还没有发现过北宋时期有关泥活字的记载，就更谈不到用活字印刷的书籍了。与此相反，从现存宋人著作的藏书目录和留传到后世的宋刻本图书来看，可以看到雕版印刷技术到南宋，却形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兴盛时期。

宋代刻印书籍，数量多，技艺高超，流传的范围也极为广泛。宋代的中央和地方官府、寺院、私人和书坊都有从事刊印书籍的专门设施，从而形成了几个刻书业的中心，如当时的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四川、江苏等地区都有著名的刻书中心。其中尤以浙江

地区为最发达。至今尚有宋朝时候在这些地方刻印的书籍被保存下来，像南宋绍兴二年（1132）湖州王永从一家出资刊刻的《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共计五千四百多卷。北京图书馆即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一部，计四千六百四十七册。这部五千多卷的佛教经典，从开始雕版至印刷完成，仅仅用去一年时间。参加刻经的工人多达二百六十余人。这样众多的刻版工人能集中到一起，刊刻一部书，就可以想见当时雕版印刷事业兴盛的状况了。

再从当时刻工的劳动经历考察，也能看出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兴盛的情况。例如曾在湖州刻《思溪藏经》的刻工董明，他在刻完藏经之后，于次年又去绍兴刊刻《资治通鉴》。绍兴九年（1139）到临安府刻《汉官仪》，同年在临安还刻过《唐文粹》。绍兴二十八年（1158）又去明州（宁波）刊刻《昭明文选》（注一）。在这期间他当然还刻过不少书，如在湖州刻《北山小集》、在临安刻《后汉书》等，就不一一列举了。以董明繁忙地刻书经历和他的劳动成果为例，如实地反映出了宋代雕版印书业的发达和普及。

南宋初年著名藏书家尤袤编辑的《遂初堂书目》是最早记载图书版本的藏书目录。这部藏书目录分为四部四十四类，其中虽有京本、监本、杭本、江西本、川本大字、川本小字之区分，但无活字本的记载。稍晚于尤袤的目录学家陈振孙，编撰成我国著名的解题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注二），收录图书三千九十六种。他在解题中介绍了雕版刻本、抄本、摹拓本。但未言及活字印本。尤袤、陈振孙都是南宋时人，距沈括和毕升的时代相去不远，在他们编撰的有关记载版本的图书目录中，均未涉及活字印书。可见活字印刷术自毕升发明之后其流传不广，甚至从没有得到流传。当时作为传播文化的书籍，除去抄写之外，惟有赖于雕版印刷的广泛利用。

《宋史艺文志·序》中记载“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版，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宋史》的作者脱脱、欧阳玄是元

代人。他们虽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推迟到五代末年，但在《艺文志》和《序》中，并未涉及到活字印刷书籍的史实。只是明确地指出由于有了刻版印刷的书籍，读书人才避免了抄写的劳苦，能够方便地看到前人的著作。

元朝继宋兴起之后，由于民族间的复杂关系，使得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一种特殊形态。元朝统治者既要压迫限制汉族人，又要吸取汉文化以提高蒙古民族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元世祖忽必烈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四十多万户，安置在全国各大市镇。其中也有许多雕版印刷工人。那时又因元世祖尊崇孔子，不改汉制，并发放官款雕印汉文图书，刻书之风大为盛行。《元史·百官志》谓"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兴文署，召工刻经史子版，以《资治通鉴》为起端"。又说："延祐二年(1315)增置百人，兴文署掌刻经史，皆属集贤院"。可见元代雕版印刷事业非常发达，而且有完善的组织机构进行管理，是宋代所不能及的。并且当时所刻的史书极为精美。例如兴文署刻的《资治通鉴》、元大德间江南九路刻《十史》(注三)。官府刻书之外，各地书院所刻的经、史、子各部书，也都为后世所推崇。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记载有："闻之宋元刻书，多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精工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由此亦可得见元代书院刻书之精善，是得到后世学者的称颂和赞扬的。

元代刻书，除官府、书院之外，书坊刻书亦极为发达。因为书坊刻书以盈利为目的，必须刻印易于出售为广大群众欢迎的图书。像医书、科举用书等日常使用的书籍为主要刻印对象，有的书坊还刻印上图下文的小说。这种新形式，是雕版印书技术的又一次重大改进。在山西平阳(今日临汾一带)又形成了北方的刻书业中心。当时集中于平水地方的著名书坊有曹氏进德斋、高氏尊贤堂、王氏中和轩、司家颐真堂、张氏存惠堂、晦明轩、段宅、许宅等等。

可称得起是书坊林立，充分显示出当时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盛况。综观元代建国九十年间，从中央直属的秘书监、兴文署到各路儒学刻书机构，以及各地的书坊，约计一百数十家，印刷书籍约三千余种，凡流传于今日或见于公私藏书目录均为雕版刻本。记载元代活字印刷书籍的文献，仅见于元朝丰城县尹王祯所著的《农书》中。他为了推广活字印书的方法，在《农书》中以专文作了介绍。

当时活字印刷的程序分为：写韵刻字、镂字修字、做盔嵌字、造轮、取字、做盔安字、刷印等七个工序。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木板上刻字，用小细锯将每个字都分别锯开，再用小刀削修整齐，按韵编号排在字盘中备用。在排版时先以木板做印盔，削竹片为界栏，排字成行，再用竹片夹紧。印盔排字既满，用木楔楔牢，使字不动，然后用墨刷印。

为了减轻排版检字的劳动和提高效率，王祯还创制了韵轮字盘和杂字轮盘，以便于检字排版。这两项改革发明是印刷技术的一个飞跃。可惜这项技术发明没有得到当时经营刻书业者的注意和重视，未能普及使用。就是王祯自己著作的《农书》也未能以活字排印。因此他在《农书》的跋语中说："前任宣州旌德县尹时，方撰《农书》，因其字数甚多，难于刊印，故尚己意，命匠创活字，二年而工毕。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版，使知其可用。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挈而之官，时《农书》方成，字嵌印。今知江西现命工刊版，故且收贮以待别用。然古今此法未有所传，故编录于此，以传世之好事者，为印书省便之法，传于永久。本为《农书》而作，因附于后。"从这段跋语中，可以看到王祯命令匠人用两年时间制做的数万个活字，只印行了一部《旌德县志》，此后即不曾利用。更为可惜的是那部用活字印刷的《旌德县志》也未曾流传下来保存到后世。

明代的印刷事业，在我国印刷史上是最为兴盛的时代。尤其

是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以后，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经济与文化都获得较快的发展。书籍印刷除去广泛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之外、活字印刷技术也逐渐兴起。明嘉靖间俞泰在无锡桂坡馆刻《初学记·跋》中记载："经史子集活字印，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明蔡允谊辑《华氏传芳集》卷四有："著《九经韵览》又虑稿帙汗漫，乃为铜版锡字，翻印以行"。明弘治间唐锦著《梦余录》有："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的记载。清人龚显在《亦园脞牍》中谓："明人用木活字版刷书，风乃大盛"。这些记载都反映出明代在利用活字印刷技术方面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制做活字所用的材料也不局限于只用某种单一的材料。不仅有木活字，也还有铜活字和铅活字等。从现存明代活字印的书籍可以看到当时木活字印本较少，使用铜活字刷印书籍是大量的。

明代用铜活字印刷书籍，主要流行在江苏的无锡、苏州、南京等一带地区。其中无锡华燧会通馆的铜活字创制最早。华氏在弘治三年(1490)刷印了《宋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以后又印《锦绣万花谷》、《容斋随笔》、《文苑英华》等书。稍晚于他的有华坚兰雪堂在正德八年（1513)印有《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以后又印《蔡中郎文集》、《艺文类聚》、《春秋繁露》等书。至嘉靖初年，无锡人安国也用铜活字印书多种，如《吴中水利通志》、《颜鲁公文集》等。此外尚有建阳游氏、建业张氏、五川精舍、五云溪馆等都有少量印本流传至今。同时又有不知名氏的人用铜活字印《唐人诗集》，所收均为初唐至中唐人的作品。这些诗集版式如一，字体秀劲古雅，当是同一家编辑刷印，惜无总目录留存，对其刻印渊源也就不可考了。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搜集全国所藏，经过编辑整理定名为《唐五十家诗集》影印出版。

这里值得提出注意的是明代活字印本书籍，尤其是铜活字印本，在弘治、正德、嘉靖三朝七十多年中，虽有较多的出现，而总数亦不足百种。在此之后即逐渐消失了，大量书籍的印刷依然是利用

雕版技术。

自嘉靖末年至万历崇祯之间，刻书事业更为繁荣兴旺，全国几个刻书中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南京的三山街，书坊栉比鳞次；徽州、杭州书坊林立。这些地方所刻的戏曲小说，往往附有精美插图，当时的各类书籍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显著增加，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了很大变化。以万历至崇祯时的几个著名刻书家为例，可充分反映当时雕版印刷事业发达的情况。如徽州歙县人吴勉学，在万历年间开设师古斋书坊，刊刻经、史、子、集四部书百余种。流传到今的还有《五经》、《四史》、《资治通鉴》、《二十子》、《四唐汇诗》等卷帙繁多的书籍。这些书都是用工多、费时久，必须雇用众多的刻字工人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始能完成。

和吴勉学同时还有钱塘人胡文焕，他原籍也是安徽人，后在杭州经营会文堂书坊。他除刻各类单行书籍之外，还辑刻丛书多种，选取罕见书和日常用书数百种刊刻《格致丛书》、《百名家集》、《寿养丛书》等。

还有金陵唐氏富春堂、陈氏继志斋刻印的插图本戏曲。杭州容与堂刻印的插图本小说，都达到了雕版印刷的高峰，使得这些书籍文图并茂大放异彩。

明末刻书兼有质量高、数量多的应以虞山毛晋汲古阁为最。毛晋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大约在他三十岁时，就开始刻印书籍，经营出售，一直到他去世后，他的儿子毛扆继承父业经营刻印书籍。据《汲古阁校刻书目》记载，毛氏父子共刻书板十万九千六十七叶。若以每叶刻三百字计算，则刻有三千二百八十七万多字。这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版刻数字，而且使许多濒于失传的罕见古籍，依靠毛氏汲古阁刻本得以流传于后世。例如汲古阁刻印的《六十种曲》中即有多种稀见的戏曲。其他如《三唐人文集》、《唐人选诗》、《唐人八家诗》等，都是为后世所称赞的精刻善本。又如他刻的《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等，虽是寻

常之本，或是收购别家转售之版，但部帙浩繁，版片众多，数量之大反映了当时雕版印刷技术之普及。

满清入关建国之后，对辉煌的汉族文化很为重视，因此图书的刊印从未衰退，活字印刷亦有所发展。清世宗雍正四年用铜活字排印了一部巨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零四十卷。清高宗乾隆又命金简用木活字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8种2416卷。此后，民间亦多所效仿，活字印刷术逐渐兴起。虽然有帝王提倡在前，民间响应在后，活字印刷犹不能与雕版印刷并驾齐驱，用活字印刷的书籍究竟还是少数。这可从清末目录学者邵章编著的《增定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以下简称《标注》）所收历代不同版本的书籍作一比较。《标注》共著录历代书籍7748种，每种书都标明版本，分别为刻本（雕版）、抄本、稿本、活字本等。约计不同版本二万部，其中活字印本只有220余部，约占雕版印本的百分之一强。再以解放后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为例。这个目录共著录历代善本书1.1万余部，其中明、清两代的活字印本亦仅只150余部。

综括以上引用的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历代古籍图书，都反映出我国自发明印刷术之后，雕版印刷术在传播文化、交流学术等方面，一直起着巨大作用。而活字印刷术自北宋庆历年间创制之后的八百年间，却没有得到推广普及和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劳动人民的发明很少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不易得到传播普及。

第二，我国的汉字，每字一形，不若西方拼音文字之简单，制做活字必须有数以万计的单字，方便于排版使用。

第三，活字印刷技术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为一般人所不易接受使用，可归纳为：

一、泥活字以烧土做成，易于残损，不易长久保存。

二、木活字木质有伸缩性，沾水后高下不平；又易粘动，取用不便。

三、锡活字难于沾墨，印刷字迹多模糊不清。

四、铜活字在当时未能制作字模(范)，一字一刻费工费时。

五、金属镌刻活字，价格昂贵，非一般书坊所能经营。

六、活字存放易于丢失错乱，不便保存。

七、活字排版后，容易分合移动，易使文字错乱，文章发生讹脱。

以上几项是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未能迅速发展普及的直接原因。到了清代末年，欧洲的印刷术及设备大量流入我国，许多经营出版印刷业者开始采用照相石印和铅字排版等印刷技术刊印书籍，我国流传使用了千余年的雕版印刷技术逐渐被淘汰了。但是，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永远闪耀着辉煌的光彩。

(原载《图书馆学研究》1984年第二期)

注一：宋绍兴刻本《汉官仪》、《资治通鉴》、《文粹》、《文选》均藏北京图书馆。

注二：《直斋书录解题》五十六卷。原本久佚，清乾隆时据《永乐大典》辑为二十二卷，此处故以二十二卷称之。

注三：九路本《十史》。元大德间以建康路为中心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等十种史书。或称九路本《十七史》，实误。

我国最早的金属活字

张秀民

自北宋毕升发明泥活字后，元朝又有人利用锡铸造活字。由泥活字到金属活字，这在印刷技术上是一大进步。元王桢《造活字印书法》中谈到"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这是我国用金属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他所说的"近世"，

似指元朝初年，这比欧洲谷腾堡用金属活字印书，几乎要早一两百年。王氏文中明白地说："铸锡作字"，可见锡活字是铸造的，而不是在锡上直接刻字。既是铸造，那么一定要经过刻字模，熔锡，浇铸，修整等工序。那些锡字每个字身大概都有小孔，所以能用铁条穿得起来，排在字盘内，再用界条隔开来印刷；但是因为锡活字不像木板一样容易使中国墨，往往印坏。因此这个新发明，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普遍流行。至于锡活字创自何人？始于何地？印有何书？现在都不可考了。

明代是否沿用锡活字印书，记载未详。不过有人曾提到无锡会通馆主人华燧"范铜板锡字"，会通馆除著名的活字铜板外，似乎又铸过锡字。至于清代是否有过锡活字，也苦于文献无证。其实不但有人铸造大批锡字，并且也印成了书。

佛山镇据广州上游，扼西江、北江两江之冲，为清代四大镇之一。自鸦片战争后，商务虽为香港所夺；但是它的手工业仍极为兴盛，各种纸行、墨行、刻字行、书籍行林立镇内，刻工精巧，书籍行盛时，单是印刷折叠的工人就不下千人。它的出版品不仅风行内地，并且远销南洋群岛。如同治十一年(1872)佛山福禄大街金玉楼刻板的越南人著作《皇越地舆志》，印好后即运往越南西贡提岸发卖。可以说佛山是清代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又因为工商业发达，市面畸形繁荣；赌博也特别兴盛，豆豉巷有大赌馆十余家，"门前车马，幕后笙歌"，赌徒们过着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其中最大的赌博是"闱姓票"（类如后来之奖券、彩票）。以文武乡榜中姓氏为赌，令人依百家姓的姓氏挑选二十姓为一票，发榜后其票得姓最多者为头票，次为二票、三票，皆以一得六十倍之利(三票以下算输)。每值乡试之年，广州、佛山一带所押的"闱姓票"赌注，不下数百万两之巨，真是骇人听闻的豪赌，为他省所罕见。又有一种利用《千字文》天、地、玄、黄等前八十字，点出二十字，令猜者随点十字，每一票投银三厘，猜中五字，乃有彩

得，全中十字，可得银十两，名"白鸽票"。广州城乡各处，俱开有票厂，猜票者以串投之，每日猜一次，男女老少趋之若狂。又有一种名"山票"，亦仿白鸽票之式，以千字文一百二十字为底，每票投银一毫五仙，头奖所得至五六万金。佛山镇有一位唐姓书商，为了印刷这两种彩票，就在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铸造锡活字，在当年5月以前就铸成了两副活字，字数超过十五万。

他的铸造方法：是首先在小块木头上刻字，把笔画刻清楚，用刻好的木字印在澄泥上，再把熔化的锡液浇入泥模中，一次铸四个活字，活字取出来时，泥模即被敲碎，利用碎泥，第二次仍可做泥模，然后把这些活字修整成统一的高度。这与十五六世纪朝鲜人用黄杨木刻字，以木字印海浦软泥，把铜液浇入泥模的铸铜字法，是不谋而合的。这种泥模铸字法，据说比西洋用铜模铸字，既简便，而又经济。他为了节约金属材料，所铸活字比外国铅字低，只有四分多高。印刷时他把活字一个个排列在光滑坚固的花梨木字盘内，四边扎紧，以免印刷时活字跳动，字盘三面各有一脊，高与活字齐，印时即成为书的一面（即半页）的边阑，用纯黄铜条做界行，半页十行，同雕板书一样中间被板心隔开，把一页分成两面。当稿子校正后，就仿照通常的印刷方法，用刷帚来印刷。

他化了一万元以上的资本，前后造成三副锡活字，统共二十多万个。一幅是扁体字，一幅是大字长体，又一幅则为小字长体，作正文的小注用。其字体比当时流行的印刷体明体字（俗称宋字），美丽大方，他不但在造模、铸字与排印方面得到成功，并且也解决了中国墨不易被金属活字所吸收的问题。印成的书本大字悦目，纸张洁白，墨色清楚，这在印刷技术上是难能可贵的。

他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咸丰元年（1851年或作在1852年）印成了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名著《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钉成一百二十大册，凡一万九千三百四十八面。不过在书上并没有印上出版者自己的姓名，因此这位书商兼印工的名字不可考，我们

只知他姓唐而已。

唐氏这次印刷试验很成功，并且大有希望来广印群书。恰巧咸丰四年(1854)六月，由箍桶匠出身的三水人陈开率领人民，武装起义，号称"红巾军"，来响应当时天京(南京)的太平天国，占领了佛山镇。旬日之间，广东数十州县纷纷乘机起事，脱离清朝的统治。起义军由于军事上的急需，就利用唐姓印刷所的锡活字造枪弹，来打击清军。清方受伤的兵士中，有的就是被这种锡弹所击中的。铅字的威力有时胜过枪弹，而陈开的义军用锡活字造成的锡弹，直接来打击敌人，这在中外印刷史上是少见的。

西洋活字，自谷腾堡以来主要用铅字，朝鲜在铸造金属活字方面，有其光荣的历史，但他们用的材料，主要是铜，间或用铅或铁，来铸成铅字、或铁字，却没有用过锡，因此这一部锡活字印本《文献通考》，在板本上也是别开生面很珍奇的。《通考》现存元、明、清各种雕板，木活字板、铅、石印本约十六七种，而藏书家著录从未有所谓锡活字本的。它的出版距今不过一百十年，只要大家注意，在广州、澳门、香港一带图书馆或收藏家中，或许还可能找到它。

(原载《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4日)

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

王重民

套版印刷法是印刷术发展过程中的新成就，用套版法印成的图书，既便于阅读，又能使人感到赏心悦目。这一新方法是用两块或两块以上的版片，使用不同的颜色，套印在同一书叶上，印出两色或两色以上的图书和图画。

我国是首先发明印刷术的国家，也是首先发明套版印刷法的国家。据我的考证，这一先进印刷法是在十七世纪初年，起源于安

徽省的徽州，然后从徽州传到湖州，又传到南京、苏州、杭州等著名的出版城市。十七世纪的二十到五十年代，套版印刷在南京和湖州达于极盛；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直到十八世纪，在苏州，和从欧洲传来的西洋画风结合起来，又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与普及。欧洲在十八世纪才知道套版印刷，后来，虽说铅印、石印、胶印发展得很快，可是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从我们的套版印刷法演变出来的。所以可以说，套版印刷法是我国在全世界印刷史上的第二次大贡献。

用套版印刷彩色的图书和图画，是广大人民很早以来在文化生活方面所渴望着的一种要求，它经过了不少人的努力研究和试验，才获得成功。这一先进方法为什么能够起源于徽州呢？这必然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地方的特殊条件。这些问题，在这篇短文里头，都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在写本、印本初期对套印所反映出来的要求和表现

图书和图画，不论在手写手画时期或印刷时期，为了使读者阅读方便，或为了美观，都往往采用朱色代墨色，或兼用朱墨两色以至更多的颜色来写书印书。早在一世纪人工造纸还未十分通行的时候，贾逵（30—101）研究《春秋左氏传》，写成《朱墨列（别）》一卷。① 稍后，董遇也以研究《左氏传》著名，他的著作有《朱墨别异》，②这都是用朱墨两色来分别“经”和“传”的。把《春秋》的“经”和“传”用朱墨两色钞写，就给了阅读和研究的人以很大方便。

后来，不但传注越来越发达，著作的体裁也越来越多样化，需要用颜色来加以分别的地方当然就越来越多。陆德明在七世纪初年著成《经典释文》，他在卷首“条例”内指明这书的钞写方法是：“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用相分别，使较然可求”。在同一书叶上用两种颜色来钞写不是容易的，所以，除非是特别贵重的书才这样

这种方法。敦煌所出的写本，其中用两种颜色钞写的已经不多，我所见到的有唐明皇御注《道德真经疏》，[③]经文用朱书，疏语用墨书；这当然因为它是御注。至于敦煌出的《经典释文》，就已经不是陆德明的原来写法了；一律改为墨书，只于经文上点一朱点，使之醒目而已。这样的变通办法是比较省事的，正如刘知几所说，"昔陶隐居《本草》，药有冷热味者，朱墨点其名；阮孝绪《七录》，书有文德殿者，丹笔写其字"，[④]这样，既节省了钞写的麻烦，又达到了朱墨分别的目的，当然还不失为进步的方法。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仍然只能刷印一种颜色，还是不能解决用两种颜色来作分别的要求，所以还是继续着用朱笔来作辅助的方法。

从敦煌发见的印本书内，可看出有许多已经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如五代刻本的《大唐刊谬补阙切韵》，每当变反切的时候，便用朱笔在正字上加一小朱点；又有一幅刻本的观音像，也用毛笔涂上了一层淡淡的粉红肉色；这都是有了雕版印刷以后而还要求有彩色印刷的表现。

稍后，发明了在雕版上刻阴阳文来代替两种颜色的办法。如我国记载药物的经典——《本草》一书的钞写是有朱墨传统的。自从六世纪陶弘景的《本草》与《神农本草经》合并以后，钞写的人都还遵守着这样的一种方式："神农本经以朱书，名医别录以墨书"。[⑤]但到北宋开宝（968—975）年间要改为刻版，就想出了"凡神农所说以白字别之，名医所传即以墨字"[⑥]的办法。这虽说是一个进步，但仍不能满足阅读上的需要。彩色印刷的出现仍为广大人民所等待着。

二、论1341年朱墨印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解》和这一时期内对于彩色印刷提出了更多的新要求

如前所述，我国自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以后，在长期的发展过

程中，由于广大读者对图书和图画的阅读方便与美观有了进一步的需要，乃自然地提出了彩色印刷的要求，而这一要求，越到后来越强烈，因之，终于在 1341 年出现了用朱墨两色合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解》。⑦

这个印本的经文是根据鸠摩罗什的译本，注解是资福寺僧思聪作的。正是采用了《经典释文》的方法，经文大字，朱印；注解双行，墨印。每页上的经文不到几个字。它的印法虽说使用了朱墨两色，但恐怕不是两版套印，而只是用一版涂上两种颜色印成的。（当然也不是用一块版，涂两次色，印两次。）这是朱墨印法第一次创造性的试验，是朱墨套印法的发明必须经过的阶段。从这样的试验和实践过程中，自然就能够提出新的启示和更进一步的追求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部朱墨印本是用套版印刷的，但我认为由于这个印本的本身显示不出套印的痕迹，就每页上仅有的几个红色大字看来，反倒强烈地显示出可能是用一版涂两色印成的；另从当时对于彩色套版印刷的要求来说，如果那时已经发明了套印法，从此就一定会盛行起来。但印刷史却明明告诉我们，套版印刷法实际上是直至十七世纪初年才试验成功的。

这可回溯到十二世纪南宋渡江以后，当时有一些古文家为了帮助青年学子学习古文，开始使用一些标抹和批语，用以指示读者诵习。这一方式和方法得到了一般读书人的欢迎以后，刻书的人也就争取出版有标抹和批语的书。

这一批点书籍的风气，在十三、十四世纪是流传得非常广泛的。而其开始，好象是始于吕祖谦（1137—1181）的《古文关键》。陈振孙在当时看到了这书，说是"标抹注释，以教初学"。⑧其次是楼昉的《迂斋古文标注》，陈振孙也著录了，说是"大略如吕氏关键"。⑨到了真德秀（1178—1235）的《文章正宗》和谢枋得（1226—1289）的《文章轨范》，于标抹以外使用"圈点"，⑩更扩大与发展了这一方法。影响所及，古文家采用这一方法来论文，出版家采用

这一方法来刻书，天下学宫里的教师和学生也都采用这一书法来教学，并且除古文以外，对于经书、史书，也都一律采用了同样的教学方法。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著录了王霆震编的《古文集成前集》七十八卷，这就是批点书籍这一风气下的产品，可以作为一例，来就它的印刷形式，说明只有发明了彩色印刷，才更能有助于这种风气的发展。这部《古文集成》是宋元之间的刻本，后归傅氏双鉴楼。傅增湘先生记云："文类上加黑盖子，所采批注人名书名悉用白文别之。篇中有批有注，行间有点有掷(按"掷"当即"抹")、有大小黑圆围。所引批注，有西山、迂斋、东莱、松斋、槐堂、敩斋、郎学士诸家，有《古文标准》、《蒇溪笔谈》、《复斋漫录》、《东塾燕谈》、《渔隐丛话》诸书。刻工明湛，点画围掷，悉臻精妙"。[11]若是把这些"点画围掷"用颜色分别开来，岂不更能"悉臻精妙"么？

在程端礼(1271—1345)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里更说明了这一方法在学校里施行的重要意义，尤其在使用不同的颜色上，显示出了彩色印刷在这时候的迫切需要。

程氏所谓的《分年日程》，是指的青年学生在八岁、十五岁、二十岁这些阶段上，所采用的不同的学习方法和所阅读的不同的书籍，而这些不同的书籍，无论经、史、古文，都需要使用一定的批点方法。尤其在二十岁以后，程端礼主张需要有二三年的时间，专力学古文，要着重采用真西山(德秀)的选本和谢叠山(枋得)的批点法。他在《批点经书凡例》里介绍了几家著名的批点法，如《勉斋批点四书例》，其中点抹的使用方法，是红中抹表示"网"和"凡例"，红旁抹表示"警语"和"要语"，红点表示"字义"、"字眼"，黑抹表示"考订"、"制度"，黑点"补不足"。在点抹上使用了朱墨两色，就能表示出这样多的意义。

他又介绍了《批点韩文凡例》，这就是他自己的"广叠山法"。[12]更详细，也更复杂。他使用了点、侧点、圈、侧圈、侧抹、中

抹，又各使用黑、红、黄、青四色，以表示更多的文法。对于章句，他又使用了"画截"和"半画截"，也用颜色作分别。使用法是：黑画截使用在一大段意尽处，表示应"于此玩篇法"；红画截使用在一大段内的小段结尾处，表示应"于此玩章法"；黄半画截使用在一小段内细节及换易句法的处所，表示应"于此玩句法"。批点方法发展到这样详细的时候，可以说已达于极盛，再加其经常使用两色、三色以至四色，这就向套版印刷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也只有套版印刷法发明以后，才能满足这些要求。

在套版印刷法没有发明以前，就只好和过去一样，还是采用人工批点。程端礼也介绍了史蒙卿的一个方法，他说"所用点子，以果斋史先生法，取黑角牙刷柄，一头作点，一头作圈，至妙。凡金、竹、木及白角，并刚燥，不受朱，不可用也"。角牙刷柄，毛笔和不同颜色的丹青就是批点书籍的工具了。程端礼生活的时代，正是资福寺用朱墨印行金刚经注解的时代，资福寺若果然是采用了朱墨套印法，则当然极易被这些古文家利用来印刷古文的批点本，可是程端礼和天下许许多多学古文的人(包括刻书的人在内)只是推行角柄毛笔这些工具，丝毫没有想到在印刷上解决这种迫切需要的问题，这就是套版印刷法在当时确还没有被发现的反证。

三、综述套版印刷法发明前夕印刷术的发展情形

从1341年又经过了大约二百五十年的时间，直到十六世纪的末年，才由我国有高度智慧的印刷工人，首先发见了走向套版印刷法的道路。胡应麟(1551—1602)的《经籍会通》里面，说当时的贵重图书印本有"双印者"，好象有可能就是指的朱墨套印本。所以这是一篇值得研究的较古的文献。

胡应麟，兰溪人，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兼藏书家。徽州在婺水的上游，兰溪在婺水的中下游，交通便利。他好象没有到过徽州，却藏有不少的徽刻本。他著的《经籍会通》是我国图书目录学

里面一部重要著作，是和《校雠略》、《校雠通义》相类似的书，但注意它的人很少。《经籍会通》卷四，著重的讨论了版本学上的各种问题，当他谈到当时的印刷法时，他说：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⑬

胡应麟把“双印”和“单印”对言。单印是用一版一色刷印，当无疑义；双印则一定是用两色，但可能是用一版，也有可能是用两版。《经籍会通》有著者作于1589年的自序，比下面我所说的徽州人发明套印法的时间还早十几年。从历史经验看来，胡应麟这段记载也可能正确，因为一桩伟大的发明在正式出现前也很可能有它的试验时期的不太成熟的产品的。但也可能这书是他老年——即1589年以后曾经更改过的（进一步的阐述，详后。）。

在封建社会时代，科学不发达，对于技术上的发明，统治阶级不但不帮助，还要加以摧残，所以有些发明是偶然的，不可强求的。虽说如此，但只要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技术，它早晚总会产生。拿印刷术来说，从有石刻到发明拓本就经过了一二千年；知道拓法以后，单是把石刻阴文转为雕版上的阳文，就又经过了两三百年。从在雕版上分阴阳文（如《本草》）到用一版印朱墨本（如资福寺印《金刚经》），又约经过三百多年；再从一版印两色到用套版印两色，大约又经二百五六十年。虽说从石刻阳文改为雕版阳文，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转化，可是在发明过程上，就需要高度的智慧，和一定的时间。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不是晚于我们六百多年，而套版印刷法也晚一百多年吗？所以我国套版印刷法的发明，除了应归功于我们伟大民族的崇高智慧以外，还必须细致地考查当时的环境与需要。

十六世纪初年，我国著名的古文大家，如杨慎（1488—1559）、归有光（1506—1571）、唐顺之（1507—1560）、茅坤（1512—1601）、李攀龙（1514—1570）等提倡批点，又煽起了宋代吕祖谦、楼昉、真

德秀、谢枋得时代的风气，中间经过刘辰翁、程端礼等人的推进，到了这时候，往往采用两种或四、五种的颜色来批点书籍。兹以杨慎批点的《文心雕龙》为例，他的批点法和他使用的颜色见于《与张禺山书》。[14] 书云：

"批点《文心雕龙》颇谓得刘舍人精意。其用色：或红，或黄，或绿，或青，或白，自为一例，正不必说破，说破又宋人矣。盖立意一定，时有出入者，是自乖其例。人名用斜角，地名用长圈，然亦有不然者；如董狐对司马，有苗对无棣，虽系人名地名，而俪偶之切，又当用青笔圈之，此岂区区宋人之所能尽"！

杨慎在批点的时候固然没有想到能够在雕版上表现出来，当时也不可能表现出来。可是到了1593年梅庆生为他付刻的时候，已经是发明套版印刷的前夕了。到了这时候，单印法远远不能满足这样的需要，这就催促着双印法的产生。我们看了梅庆生的变通方法就更能明白了。他的《校刻杨升菴先生批点文心雕龙音注凡例》云：

"圈点杨用修之用红、黄、绿、青、白五色笔，今刻本不能为五色，因作五种区别以代之：

其红色圈作◎，点作ᕳ；

其黄色圈作⊙，点作ᕳ；

其绿色圈作□，点作△；

其青色圈作·，点作◥；

其白色圈作○，点作ᕳ。

其人名元用斜角，地名元用长圈；今人名地名已为注释，二法无所用。"

这是对于圈点的变通办法；至于对待批评的办法，《凡例》又说：

"《雕龙》五十篇，杨用修间有批评。一篇之上，或总批，或另批；今总批则附本篇之末，另批则入本段之中，俱用双行小

字，以便观者。”

这个本子是在南京刻的⑲。南京消息灵通，又是雕版印刷最发达的大城市，如果当时已经有了套印法，梅庆生还何必作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大约在三十年以后，套版印刷法不但在徽州已经发明，而且在吴兴已经由凌闵两家套印了大量的极其鲜艳的古书；杨慎批点的《文心雕龙》也由凌云套印出来，正确的反映出了杨慎的五色，而且在加以变通之后，更美丽，更清楚了。凌云套印的《凡例》说：

“杨用修批点，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别，则阅之易溷，宁能味其旨趣？今复存五色，非曰炫华，实有益于观者。”

这就极其分明的显示出：一版墨印和套版五色的区分，即套印法的价值所在。凌云的《凡例》又说：

“五色，今红绿青依旧，独黄者太多，易以紫；白者乏采，易以古黄。改之，特便观览耳。若用修下笔，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

在这样对比之下，极其明显的反映出：非有套印法，不能在书本上表现出批点的精神和神旨。在这一次由杨慎等领导的批点古文的复兴运动中，促成了套版印刷法的发明；而这时候，也的确具备了这一条件；所以这一先进方法就自然能够在这个时期产生了。

四、徽州印刷工人发明套版印刷法和当时地方上的特殊条件

如前所述：1589年胡应麟在《经籍会通》里所记的双印本，如果有可能是指的套版印刷；那么1593年梅庆生在南京便可利用套版来印刷杨慎批点的《文心雕龙》了，可是他没有使用，所以胡应麟的记载还是可以怀疑的。

现在，我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判断徽州人发明套版印刷法应

在1602年以后。郑振铎先生得了一部《彩印本花史》。[16]在《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页77，规定约为1600年印本，这大概是郑振铎和赵万里两先生的意见，我是同意的。（这是后印，则初印还稍前。）郑先生在引言里说明这时候的彩印方法，"是用几种颜色涂在一块雕版上的，如用红色涂在花上，绿色涂在叶上，棕色黄色涂在树干上，然后复上纸张，刷印出来"，我也是同意的。总之：在套版印刷发明的前夕，彩色版画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来印刷的。有些书本，如上批下文，或书叶上仅有极简单的大字标题，也都可以采用这样方法的。即远在1341年资福寺印的《金刚经注解》，也毫无疑问是采用了这样的方法的。所以，在没有发见更好的新文献以前，就仅能判断套版印刷法是徽州在1602年以后发明的。兹举三例如下：

（一）《闺范》十集六卷　北京图书馆藏书。据现在所知，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用套版印刷的书。

《闺范》的原版是《女范编》，有1602年一版单印本。所载列女，从周秦到明代邹元标妻，每人立一传，绘一图。所以又名《古今女范》。传是黄尚文（字希周）作的，图是程起龙（字伯阳）绘的，版是黄应瑞（字伯符）刻的。黄尚文、程起龙和黄应瑞都是歙县黄家坞人。

《闺范十集》是套版双印本。墨版就是《女范编》的原版，朱版上有批评和圈点，是新刻的。《女范编》仅四卷，《闺范十集》的前四卷改换了原版的书题，由于剜补不很工致，新书题的六个字——《闺范十集卷×》歪斜不齐，卷五题为《闺范十集补遗》，也有剜改的痕迹，当亦改换为朱墨套版以前所原有。卷六为《皇明内训》、《女孝经》及曹大家的《女论语》和《女诫》，则疑为这次补刻的。朱墨套印本上铲去了撰书、绘图及刻工的姓氏，但在图角上增刻了程伯阳的题名，这暗示着程伯阳（即起龙）可能参加了这个朱墨套印本的改制工作。《女范编》原有黄惟兆、程起龙的两篇序文，朱墨套印本都删去了而换上了程涓的序，这又显示着朱墨套印本的版权，好象已

由黄家转移到了程家。程涓死在1607年，[17]所以这部最早的朱墨套印本应产生在 1602—1607 年中间。[18]

（二）程氏《墨苑》十二卷　这是歙县岩镇程大约家的制墨图绘。徽州制的墨是全国有名的，程氏又是徽州很有名的一家，同时同地的方于鲁家也有名。方于鲁少时从程家学徒，后来独立经营，在1583年刊行了《方氏墨谱》六卷，借助于墨谱的宣传，渐有驾乎程氏之上的趋势。因此，程大约带着忿恨的心情来和方氏竞争。从1589年，他一方面努力振兴他家的墨业，另一方面出来和天下文士们交游，在题诗题字、和美术设计上获得了新的成就，所以，在1594年开始刊行《程氏墨苑》。地方上著名的学者程涓和大约是同宗，他们很相得，共修"净业"。在1601—1605年间，几次增订重修他的《墨苑》。这时候，还都是用一版单印的。1603—1604年间，方于鲁、程文登联合起来和程大约起讼，致令程氏墨业中歇。1605年又恢复起来，从此，和方于鲁的竞争当然更要激烈，为了向外宣传，抬高声价，改进《墨苑》的印刷——用彩色来印刷，当然是较好的手段。郑振铎先生从1941年购藏了当时我国仅有的彩色印刷本《墨苑》，经过长期的鉴定，约定为1605年间的印本，[19]正和我在上面所考定的年月相同。郑先生曾有题记，说他那部《墨苑》里，"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渍于刻版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20]这就是说、它的印法还和1600年以前的《花史》一样。但在这个地方，我提出进一步的意见，就是用彩色印刷《墨苑》的时候，为套版印刷的《闺范》作序的程涓正和程大约做着好朋友，给《闺范》绘图而且参加过套版印刷的程起龙和黄氏刻工们都在参加着《墨苑》的改进工作，他们是会把套印《闺范》所创造的经验移用到《墨苑》上来的。我以为《墨苑》的四色、五色图不一定使用了四版或五版，但有些地方，显然是使用了两版的，这正反映了起源时候的质朴情况。

（三）《风流绝畅图》　图上刻着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丙午）

新安黄一明镌。在这几幅小巧的版画上，把用套版印刷《墨苑》的经验，作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技术上的表现显得更纯熟了，更优美了。

从上述三例，我们还可以知道：用套版印刷图书的批点，和用套版印刷彩色版画，所使用的既然是同一技术原理，也就容易为同时同地由同一批先进工人创造出来。过去一些人把朱墨套印书的发明放在1341年，把套版印刷版画的发明放在1605年以后，我认为是不对的。我的意见是：自从徽州这次发明了套版印刷法，就由这一批先进工人，在几年之后传到了湖州，发展成为闵版书；十多年之后，传到了南京，便发展到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和《画谱》。

根据上面考证的结果，若再回顾一下胡应麟所说的双印本，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有些怀疑他的话了。《经籍会通》的自序是作于1589年，所以他所见的双印本，仅能是在一版上涂渍两色所印成的双印，而不能是套版印刷出来的朱墨本。（《楹隅书录》卷五有明铜活字本《栾城集》，绿格墨印。又《续编》卷三有明铜活字本《墨子》，绿格蓝印，是前后用两版，一版刷格，一版印字，亦可称双印。）

李克恭的《十竹斋笺谱序》说："明代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华，然未盛也。至中晚而称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非常正确地说明了这一发展过程和年代。1600—1606年，正是"万历中年稍尚鲜华"的年代，"然未盛也"。

这一伟大发明为什么能够产生在徽州？这一光荣称誉，为什么应该独属于徽州的刻书工人？就当时的经济和地理环境来说，我愿意指出下列三点：

（1）徽州本来是地瘠民贫的地区，所以从较早的时期，商业和手工业便特别发展。大的如盐商和典当业，小的如各种手工业商品的制造和贩卖，在全国范围内由徽州人经营的都是占多数。[21] 在手工业商品的制造和贩卖之中，有许多特产和专长是和文化事业有关的，如造纸、制笺、制墨、刻书都是。这样，徽州人以商业、手工

业和农业相结合，就使得一般人民的经济和生活比其他地区并不低，而人民的文化教育反能有更高的水平。又由于对外的交流和游览较其他地区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在文化的某一些方面，也往往较其他地区的成就为高。徽州人在造纸、制笺、制墨、刻书的技术提高上有较大贡献，即由于此。

（2）造纸、制笺、制墨、刻书，这些与文化事业有关的手工制造业所用的原料与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既然比较接近，所以常常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从而造成了发展和进步的更多机会。如刻书的艺术进步了，就可提高制笺的方法，也可以影响到商品包装封面画的改进；又如想提高铸墨的美观，就要研究雕刻墨型的技术，就要改进在墨方的题字或图画上施色贴金的方法。改进这些手工业的艺术和技术，在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之下，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可以得到新的启发，给新发明和新创造提供更多的思考机会，自然就容易产生创造性的发明。

（3）印刷的进步是非常曲折的，由石而木，由拓而刷，由墨印到彩印，都是在长时期的思考和经验中发明出来的。徽州印刷工人首先发明套版印刷法，恐怕最初是在印制艺术小品的实践中得到的。如在一种墨型里铸成墨方，可能利用同一墨型也可能利用另一墨型去涂金，或著一些颜色。又如制信笺，在使用一版印上了一色的图画以后，很快就容易摸索到在一版上使用两种颜色，更进一步便可得到使用套版的启示。如前所述，徽州的制墨、刻书多是世世相传，全宗全村的人都作一种手工业；而制墨和刻书，如程氏和黄氏，他们在业务上的关系又是那样密切，当印笺的人有了使用套印法的要求的时候，直接从自己工作里想不出来，但当偶然看见制墨的朋友用两个墨型施彩涂金的时候，具有崇高艺术性的套版印刷法就许被发现了。

上面当然都是一些推测，但这一伟大发明，大约就是从这些复杂的条件里获得的。

五、套版印刷法的从徽州向外传播和进步

我国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的时期既然可以考定为1602—1606年间，则这一先进印刷法向其他地方传播的路线和年代都可从而解决，并且对于明代套印本在年代著录上不正确的地方，也可以得到纠正。

从1606年以后，还不到十年，套版印刷法便传到了湖州的吴兴；吴兴的凌闵二家出版了大量的套印本书籍，风行到全国。凌闵二家曾经雇用过徽州的印刷工人，培养了新的刻工，使这一印刷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吴兴刻书家首先使用套版印刷的是闵齐伋（生于1575年）。他刻成的第一部书大概是《春秋左传》十五卷，所以在《凡例》中特别记录了朱墨本的优越性。他说：

> "旧刻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

并且在卷末题着"万历丙辰夏吴兴闵齐华、闵齐伋、闵象泰分次经传"。万历丙辰是1616年；还有韩敬的序，也署1616年。因此，可以确定这书是1616年夏秋之间刻成的。同年秋天，又刻成了《檀弓》、《考工记》各一册，《檀弓》有齐伋自序云："皇明万历丙辰秋九月，剞劂告成。雕镂既极人工，为之一笑"，语言中也带着初次试验成功的神气。

次年（1617），又刻成《孟子》二册。据说这部《孟子》是苏老泉评本，"朱黛犁然"，闵齐伋"特存其旧"，使用了两次套版，一朱一黛，从两色增为三色，又发展了这一艺术，所以他在跋文内带着自豪的口气说道："勿以点缀淋漓为观美而诧异也"！

闵氏早期刻本，还有1619年刻成的《国语》九卷，五册；

1620年刻成的《楚辞》二卷，二册；《史记钞》九十一卷，二十四册。到能够刻《史记钞》这种大部头书的时候，也就是闵氏套版印书的技术很发展的时候了，陈继儒为之作序，写出了一些赞扬的语句，但也是大致符合实际的。他说：

"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升再变而为活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书日富，亦日精。吴兴朱评书错出，无问贫富好丑，垂涎购之，然不过一二卷或数卷而止；若《史记》，卷帙既重，而品骘尤真。正如黄帝张乐，洞庭之鱼龙怒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毕出，非读书破万卷者，岂能搔其痛痒一二哉！"

当闵氏套版书发展到这样成熟的时候，凌氏也开始了同样的事业，终明之世（就是到1644年），两家出版的套版书约达一百来种。

吴兴茅氏也是大族，茅兆河也"雅好剞劂"。我见过他在1621年用朱墨套版印刷的《解庄》十二卷，六册；《皇明将略》不分卷，四册。当然也是从闵家学来的。

闵齐伋常住南京，他所经营的套版印刷业在南京也有分所。如有名的闵版《会真六幻》，就是在南京刻的，所以自序末题"三山瘦客闵寓五"。又有《绘孟》七卷，四册，有1624年龚惟敬跋，说是闵寓五"刻于南都"的。这样看来，闵版书在南京刻的也不少。

我所见到的套版书，在闵、凌、茅三家以外，还有1623年王凤翔刻的《顾邻初先生批点四书大文》七册（在南京）、庆云居刻的《左传文苑》十册（似在苏州）等数种。这表示出套版印刷法向南京、苏州各地区的传布。极负盛名的十竹斋也在南京，他接受了徽州和吴兴的双重影响，所以他在套版印刷的艺术上能有更高的成就。

1644年以前，套版印刷的起源，传播地区和年代，大概如此。

正由于前人对于套版印刷的起源，传播地区和年代没有认识清楚，所以在历史的讲述和版本的年代著录上，时常发生很大的错误。就是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也有所不免。当我们正确地认识

了这一发展过程之后，就不至于发生很大的错误了。如《书林清话》的作者叶德辉在他那部专门著作中有一节讲"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22]他举例说："四色套印则有万历辛巳(九年)凌瀛初刻《世说新语》八卷，其间用蓝笔者刘辰翁，用朱笔者王世贞，用黄笔者刘应登也。"万历九年为公元1581年，前于开始发明套版印刷法者约二十年，是不是可以根据这一点来反驳我所考定的起源年代呢？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一种四色套印本的本身。凌瀛初也是吴兴人，据我前面考证，吴兴闵氏套版书始于1616年，是凌氏还在1616年以后。凌氏开始经营套版印刷的凌濛初(1580—1644)，这一年(万历九年)，他方才两岁，还不能经营套版印刷甚明。按《世说新语》有凌瀛初的跋，说："家弟初成(濛初字)得冯开之先生所秘辰翁应登两家批注本，刻之为鼓吹"，[23]所以凌瀛初刻《世说新语》一定在凌濛初长大成人以后，一定不是1581年，也一定不是在1600—1606年间，所以不能动摇我所考定的起源年代。反之，按套版印刷的艺术进步来说，四色套版还应该后于三色套版，就是说必须在1617年闵齐伋用两色套印《孟子》的同时或稍后，方合历史的发展轨迹。这时候，凌濛初已经三十七岁，正是有能力刻书的时期了。所以叶德辉不能动摇我所考定的起源年代，反可以根据我所记述的历史发展轨迹，去纠正叶德辉的错误。(叶德辉所以致误，由于凌瀛初的跋没有年月，乔懋敬的序署"万历辛巳"，而不知乔序是给王世懋底批本作的。)

又如《明代版本图录》是鉴定和著录明代刻本书的一部专著，具有相当高的水平。里面讲套印的一部份，[24]首先袭用了《书林清话》的一段，但是，把叶德辉的错误删去了，在图版中也没有载《世说新语》，却载了《吕氏春秋》，说是"万历十七年凌氏本"。但万历十七年为公元1589年，和我考定的年代也很有冲突，我检查了这一书的原印本，知"万历己丑"(十七年)是凌稚隆自序他的批点的年月，而我所见的两部印本都有1620年凌毓枬的刻书跋。所以《吕

氏春秋》是1620年刻成的，决不会是1589年。这也和我考证的套版印刷历史发展轨迹相符合。(凌毓枬是凌湛初的儿子，凌濛初的侄子。湛初死于1574年，年二十五，则凌毓枬当还比凌濛初大十来岁，所以凌氏套版，最初应该是由凌濛初，凌毓枬共同经营的。)

凡是已经模糊了或者紊乱了的历史发展轨迹，当然就要给后人更多的模糊印象，就要从而制造出更多的紊乱，现在许多讲版本、编目录的，对于1600年以前的套版印刷法，常常无意中讲出反历史的话；对于1600年以后才产生的套版本，往往放到十六世纪的年代里去，都是由于自己没有研究，在因袭了前人的模糊和紊乱说法之后，更制造出来的新错误。

我这篇研究，主要是分析了1600年以前——套版印刷法没有发明以前，在长时期内对于套版印刷法的客观需要，和印刷法在各个时期内的一些发展线索，同时，还叙述了1602—1606年间，套版印刷法在徽州的起源情况，也附带地极其简略地说了说套版印刷法向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由于我掌握的材料不多，当然还有一些缺点和不完备的地方，但有了这一初步探讨，我认为对于鉴定套版书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原载《安徽历史学报》创刊号)

注：

① 《隋书经籍志》著录贾逵的《春秋左氏传朱墨列一卷》，依董遇的书名《朱墨别异》，故疑"列"应为"别"之误。

② 见《三国志·魏志》卷十三王肃附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儒宗传。

③ 此写本裂为两段，分别著录在伯二八二三和三五九二号，拙著《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二辑卷三、页十八有说明。

④ 见《史通》卷十五"点烦篇"。

⑤ 见嘉祐补注《本草》"序例"掌禹锡的注。

⑥ 见同上"序例"(《政和证类本草》卷一)。

⑦ 原本现在台湾。《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的第七期刊有影片。

⑧ 见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

⑨ 见同上。但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三载明刻本，作《迂斋先生崇古文诀》，当是后来改名，明刻本"旁有标抹注解"。

⑩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三有元刊本《文章正宗》，说"文中标抹圈点俱存"。谢枋得在真德秀之后，这一方法更臻完备。所以他的《文章轨范》在最近五六百年来，不但是我国青年学生一般采用的古文读本，也是朝鲜和日本的古文读本。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三，著录了朝鲜国刊本及1853年日本松崎纯俭翻元本。余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翻刻本，标抹圈点极精。

⑪ 见《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八。

⑫ 在《读书分年日程》卷二页三下，他说"端礼有叠山批点法，及韩文叙事议论，批点成书两册"。

⑬ 《经籍会通》即《少室山房笔丛》的卷四。所以这一条是在《笔丛》卷四。

⑭ 张禺山名含，这封信载刻本《杨升菴批点文心雕龙》卷端。

⑮ 有1593年顾起元的序和梅庆生的题记。单看刻风也知道是南京刻的。

⑯ 见《劫中得书续记》一一〇页。

⑰ 程涓著有《千一疏》，他的卒年是从《千一疏》的序跋里考出来的。

⑱ 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第九页还著录了刘某增订本的"女范编"，把原来的题名都铲去，而换上了一群姓刘的，这一改换本又应在改换为朱墨套印本之后。

⑲ 见《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七七页。

⑳ 见《劫中得书记》三五～三六页。

㉑ 有关的记载颇多，但缺少统计数字。但据《明神宗实录》卷四三四，万历三十五年(1607)六月丁酉河南巡抚沈季文所说的："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赀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从河南一省的数目，可想到在江苏、浙江、江西的更多了。

㉒ 见《书林清话》卷八，页十四～十五。

㉓ 据凌瀛初的跋，大概是凌濛初先用两色套版刻过刘辰翁刘应登两家评语，瀛初刻本又加上"王次公批点"，把"敬美缀以硃"(王次公和敬美是王世懋，叶德辉误为王世贞)。我见过的套版《世说新语》，有六卷本的，有八卷本的，知道八卷本是剜改六卷本而成的，可惜没有考查

六卷本是几色几家批语，因我现在疑六卷本亦为康初原版，八卷本为嬴初改版也。姑志于此，以待将来考查。

㉔ 《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卷十的全卷。

中国古代的民间刻书业

肖 东 发

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可概略地分为官刻、私坊和寺院三个系统，其中尤以民间私坊刻书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在由唐至清长达千年的历史中，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刻书世家，他们子承父业，世代相沿，苦心经营，历久不衰；不仅在刻书内容和版刻形式上形成了特有的风格，而且为保存我国古代典籍，传播民众文化以及促进印刷术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刻书业始自民间

我国雕版印刷术究竟发明于何时，至今还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发明于唐代中期，即公元7～8世纪间，由于当时印刷品的材料是以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纸张，所以保留到今天的唐代印刷品十分稀少，然而在现存的几件实物中，仍可发现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们大都标有“××家”的字样。如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1953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经咒首行印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说明唐代已出现私坊印本。又如在敦煌发现的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和中和二年（882）的两部历书，有“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字样（这两部历书现在伦敦）。北京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各藏一部《金刚经》残卷，卷末均有“西川过家真印本”七字

识语。此外还有长安东市大刁家印的历书、李家印的医书等。

从以上数例不难看出，印刷术起源于民间，而最先发展起来的又是四川地区的私坊刻书业。当时刻书的内容以民间需要的日历、医书、韵书等为多，后来又逐渐为佛教徒用来传经布道。其时上层统治阶级尚未重视这项新的技术，唐文宗还曾下令禁止民间私置印历板。直到五代时，雕版印刷大为普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后，才引起上层社会的注意，用来印儒家经典。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 ）宰相冯道奏请刊刻九经，在奏疏上说："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五代会要》卷8）这是官刻首创之举，也说明政府刻书业是在民间刻书业的影响下产生的。

历史悠久 世代相沿

宋代是我国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四川、浙江、福建是有宋以来的三大刻书中心，在这些地区聚居了很多刻书世家。如南宋行都临安（今杭州）的中瓦子和众安桥一带，就有不少以家族命名的经坊、书籍铺。因他们所刊刻的书籍、形式、字体和风格相近，所以，被统称为"书棚本"，其中仅陈姓书铺就有 4 家之多，其中以陈起父子最为有名。陈起，字宗之，号芸居，称陈道人，又称武林陈学士。他在文学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好刻唐人诗集；有"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之誉。他还编印了《江湖集》，收集的是当时被称为"江湖诗人"的著作，对一些怀才不遇、贫而好学、买不起书的文士，陈起还可以赊账，故诗人黄元易曾有怀陈起诗云"独愧陈徵士，赊书不问金"。陈宅书籍铺所刻的书，雕印精良，为历代藏书家所重视。

辽宁省图书馆藏有一部绍兴二十二年荣六郎家刻本《抱朴子内篇》，在卷20之末用75字明确地记载了荣六郎家书铺因靖康之难举家南迁，由开封迁到杭州，老店新张，据旧本校订重印等各方面的情况，是研究中国经济史、文化史和图书史的重要文献。

福建的私家书坊刻书，主要集中在闽北建阳县麻沙和书坊二镇。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曾说："建宁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福建通志》中也提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村皆以刊印书籍为业"。此地书坊林立，所以早在宋代就称为书林，后改称书坊，至今仍称书坊公社书坊大队。我国雕版印刷史上著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在书坊镇，建安是建阳的古代郡名。《书林清话》曾说："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早在 12 世纪，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经书就为余氏赢得声誉，岳飞的孙子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评价当时的经书说："世所传本，互有得失，难以取正，前辈谓兴国于氏本及建安余氏本为最善。"由于余氏刻本流传广远，清代乾隆皇帝还敕令福建巡抚钟音派人专门查访余氏家族刻书的兴衰始末。宋代余氏刻书家，除余仁仲外，还有余唐卿等；元代余氏书坊有双桂堂、勤有堂等，其中以余志安勤有堂刻书最多、影响最大，至今可知见的刻书仍有 30 余种；明代余氏刻书家达数十人之多，根据《书林余氏宗谱》，知道他们或为父子，自立门户；或为兄弟各自开业；还有的祖孙几代共用一个堂名。直到清代康熙年间，余氏后裔仍有人在从事祖传的刻书世业，而这上距北宋初年余氏祖先定居书林并开始刻书，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

与余氏同时或稍后，书坊镇还有熊、陈、郑、叶等姓，在其东北20里的麻沙镇，还有刘、蔡、虞等诸家，也都是从宋代到明代累世刻书，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至今流传下来的各家刻本仍有数十种之多。

除四川、浙江、福建外，山西平水（今临汾）、北京、南京、苏州、徽州等地也都相继成为刻书中心。例如明代的南京，在三山街、太学前集中了数十家刻书坊，其中以唐姓为最多，有唐对溪富春堂等十余家，次为周姓，有周曰校万卷楼等 7 家。可见其事业的兴盛。

这些家族子承父业，世代刻书，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少有的现

象，可惜我们至今还没能为他们写出一部“书林列传”来。

独具特点 穷工极变

上述的这些刻书世家，从他们所刻书籍的内容和形式特点上来看，在中国图书的历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私家书坊刻书内容十分广泛，既有供文人操觚射鹄的字书小学、经史文集，又有供平民日常应用的农桑医算、类书便览，而戏曲、小说、评话、弹词之类的民间通俗文学作品更是私坊刻书中最富有文学史料价值的一部分。自有雕版印刷以来，这类作品就源源不断地问世。唐代诗人元稹给白居易诗集作序，就提到当时江浙一带已有人将他们两人所作的杂诗刻板印书，炫卖于市肆，甚至拿诗集印本换取酒茶。宋代杭州陈宅书籍铺出版的唐宋文集和笔记小说近百种。中瓦子街张家书铺出版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小说中最早的旧刻本。元代建阳书林虞氏刻的《武王伐纣》等5种“全像平话”，是后来演义长篇小说据以加工的祖本。后世的《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等长篇讲史小说就是在建阳书林余氏、熊氏所刊行的《北宋志传》、《大宋中兴英烈传》、《全像列国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冯梦龙《警世通言》卷40《旌阳宫铁树镇妖》和《醒世恒言》卷12《吕洞宾飞剑斩黄龙》直接取材于余氏萃庆堂刊印的《许仙铁树记》和《吕仙飞剑记》。明代还出现了一些专刻戏曲小说的刻书家，如南京的唐富春，苏州的叶敬池，建阳的余象斗等，他们不仅刻印了大量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而且对当时和后世民间文学的演进和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

在版刻艺术方面，这些刻书世家也勇于创新、不断改革，创造了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

经注合刊本和汇注本　唐五代以前的经史典籍，其正文与注疏是各自分开的，雕版印本书籍出现之初也是这样。南宋私坊刻

本中，产生了“三位一体”和“四位一体”的合刊本，即把注疏、音义、释文等用双行小字与经史正文附刻在一起，这对初学者最为方便。其最著名的像建安黄善夫家塾刻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建安刘叔刚的《附释音礼记注疏》。还有一种“汇注本”，即把各家不同的注释汇刻为一书。有利于读者对各家注释进行参互比较．如元代中叶建安余氏勤有堂刻的《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注》和《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即是这一类型的本子。由于这种形式颇受读者欢迎，这两种书的书版在元末转到叶氏广勤堂手中，明代又转到北京书估汪谅手中，曾多次进行重印。明代刘氏安正堂也刻印了这两种书。

插图本　插图是帮助理解正文的内容，增加图书的通俗性、趣味性，提高读者阅读兴趣的有效方式。早期插图本有余氏勤有堂的《列女传》，虞氏刻的“全像平话”5 种，均为上图下文，类似后来的连环画。明代后期，戏曲小说附有木刻插图的本子更为兴盛，各家争奇斗艳。仅以金陵唐氏富春堂为例，所刻传奇约有十余集，每集 10 种，而每种传奇少则三、四图，多则三、四十以至百余图，若以平均 10 图计，其插图创作就在千幅以上。这仅不过是一家一堂，若各家所刻书籍的插图加在一起，其数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活字本　无锡华氏和安氏可称为用铜活字印书的杰出代表。华氏一家四代从事活字印刷，其中以华燧会通馆时间最早，刻书最多。弘治三年(1490)他就试印了《宋诸臣奏议》50 册，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他后来又印行了《绵绣万花谷》、《百川学海》等十多种卷帙浩繁的大部头书籍。华珵是华燧的叔伯辈，他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逾 70 之后，还印行了《渭南文集》、《剑南续稿》等书；华坚是华燧的侄子，堂名兰雪堂，曾印行《蔡中郎集》、《白氏文集》等；华坚之子华境也印过书，并曾为兰雪堂印本的《艺文类聚》写过后序。无锡安氏于正德十六年(1521)开始印行第一部书《正德东光县志》，这是现知的我国唯一的一部用铜活字印的地

方志。安氏桂坡馆印行的书虽不如华氏多，但质量较华氏本高。

套印　套版印刷术在我国出现虽早，但到17世纪才得到广泛应用。这是和吴兴闵氏、凌氏的努力分不开的。闵齐伋、闵齐华、闵象泰等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成的第一部《春秋左传》是朱墨两色，第二年刻的《孟子》苏老泉评本，又从两色增为三色。在闵氏套版书发展到极为成熟时，凌濛初、凌汝亨等也开始了同样的事业。据近人陶湘的不完全统计，两家共刻印了117部计145种套印书籍，其中已知有三色套印本13种，四色套印本4种，五色套印本1种，这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除闵、凌两家外，当时刻过套版书的还有吴兴茅兆河、南京王凤翔和庆云馆等。套印本书籍在内容上虽较少特殊贡献，但雕版印刷的技艺却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一步。

饾版与拱花　在插图本和套印本的双重影响下，明朝末年，在安徽和南京又出现了一种分色分版套印版画的新工艺，因其堆砌拼凑，有如饾饤，故称"饾版"。其不着墨色，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凸出线条的则称为"拱花"。胡正言的《十竹斋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就是用这两种方法印制的艺术珍品，这样的印刷品，一幅画不仅要分刻数十块版片，根据其色调套印和选印，而且对纸张的湿度、颜色的浓淡、以及印刷时的轻重缓急都有严格的要求，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时甚至利用十指来帮助捺印，这样才能使鸟雀毛茸茸的羽毛、花叶的鲜嫩柔润、行云流水的波纹摇曳之态，一一呈现于纸上。李克恭在《十竹斋笺谱》序中对之推崇备至，认为这是"汇古今之名迹，集艺苑之大成，化旧翻新，穷工极变"。胡正言的这两部木刻彩色水印书籍，确实使雕版印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据此可以看出，私刻书较之官府刻书和寺院刻书有更为鲜明的创新精神，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受的思想束缚较少，了解并重视民间需要，敢于革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从而促进了图书的改进和印刷术的发展。

有功当时　惠泽后世

我国古代刻书世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们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保存、传播、发展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保存文化典籍方面看，宋元时代的图书保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经过历史上的天灾人祸，多次劫劫，我们今天仍可看到六、七百年前杭州陈氏、建阳余氏等工艺精美的产品，由此也可以想见这些刻书家在当时印书数量之大。明代中期，在刻书家中盛行复制宋本书的风气。由于技术精湛，有的能达到乱真的程度，这在没有现代摄影复制技术的当时，无异是把一部部濒于亡佚的旧本书籍化为千百部的最好方法，既保存了古籍、便利了学者，也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从传播文化方面看，由于这些刻书世家从它们诞生时起就是生存于民间，并以人民大众的需要为动力，所刻的书逐渐形成了雅俗共赏、重在实用、不断创新以及品种多、印量大等特点，所以就更有利于书籍的销售与流通。以明清之际的常熟汲古阁毛氏为例，毛晋苦心经营刻书40余年，刻书600多种，积累板片十余万块，他所刻的书又几乎都是大部头的丛刻，诸如《十三经》、《十七史》、《宋六十名家词》、《六十种曲》、《乐府诗集》等，仅《津逮秘书》就包括15集，共收书145种，刻板16,630块。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至传奇小说广为镂版"。他比起那些一旦得到珍本，便束之高阁、秘不示人的藏书家，确实更值得称道。毛晋死后，毛扆继承父业，直到清康熙中叶，其刻印书籍的活动才逐渐衰落。然而在百年后的嘉庆年间，仍有人利用遗存的汲古阁所刻的板片印刷书籍。直到今天，只要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其藏书中都每每可以找到汲古阁的刻本。

从发展文化方面看，尽管刻书世家的某些刻本存在着诸如纸墨粗劣、校勘不精等缺点，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贡献还是主要的，

特别是在普及文化，满足群众需要以及促进印刷术发展等方面。他们的刻书活动还繁荣了当时的文艺创作，活跃了书籍贸易，推动了造纸、制墨等有关手工业的发展，对后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其深远的影响与意义。西方的铅印、石印、胶版印刷术后来虽然发展较快，但其基本原理与方法，却是从中国的活字印刷、套版印刷术演变出来的。18世纪中叶，日本画工奥村正信尝试的“红绘”，就已吸收了我国朱墨套印的方法。此后，他又仿照五色套印，创成了多彩套版印刷的“浮世绘”，日本人称作“锦绘”，成为风行于日本的风俗版画。十竹斋用饾版、拱花法印制的画谱、笺谱，后来有不少仿制品，清光绪年间，北京荣宝斋还出色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工艺。解放后这个古老的行业又不断革新，现在新的木刻水印印品已流传于全世界，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而成为全球艺苑中的一支奇葩了。

（《百科知识》1984年6期）

浅谈坊刻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薛意宏

唐代末期，出现了书坊刻书。五代时，政府刻书、私人刻书也相继出现，形成了我国刻书史上的三大系统。而书坊刻书是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刻书系统。

一

历史上，书坊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初期刻书几乎全是坊刻，五代时虽有了官刻、私刻，然坊刻居多数。当时刻书中心主要分布在四川及长江下游两岸，到唐末五代时，成都和长安都已书坊林

立。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刻书地点几乎遍及全国。据考证，到南宋时，全国刻书地点已有一百七十三处（张秀明：《南宋刻书地域考》）。这些刻书地点中，以书坊刻书最活跃，分布最多，从书籍的总生产量看，坊刻本的比例要大于官刻本、私刻本。宋代刻书中心基本上集中在福建建宁、杭州和成都，北宋都城开封也是盛极一时的刻书中心。有人说，宋代的刻书福建要算第一，这是对的。建宁的坊刻是当时最发达的，它有两个主要坊镇，即建安崇化、麻沙，当时"号为图书之府"，销路四至，许多外地的人都专程到麻沙来购书，"麻沙本"名扬天下。到了元代，刻书沿着南宋风气发展，书坊刻书比宋代更加发达，北方刻书中心，有山西的平水，河北的宁晋，平水书坊尤多；南方仍以福建为盛。到明清时期，中国书坊刻书发展到顶峰，书坊遍布各地，刻书中心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明嘉靖以前，有福建、杭州、四川，嘉靖以后，湖州、歙县异军突起，万历崇祯间南京、苏州、常熟书坊又兴起，北方，明都城北京也是书坊林立。清初，吴兴、歙县渐衰，北京变得更加重要，南方刻书中心在南京、苏州、扬州；嘉庆年间，建安麻沙镇遭火灾，建宁从此衰落下去；晚清，刻书主要分布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一带。

在书坊刻书事业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历史悠久、世代相沿的老书坊，它们充满了活力，主人经营有方，坊刻质量也高，为中国刻书事业、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于历代许多刻书中心往往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因此也就形成一些历史悠久的书坊。宋代最有名的书坊要推建安余氏。余氏从北京迁居建阳书林开始刻书，世代相传，历经宋元明三代，时间长达六百年之久，这在中国刻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余氏的书坊牌号先后就有"万卷堂"、"明经堂"、"励贤堂"、"勤有堂"、"勤德堂"、"双桂堂"、"自新斋"、"萃庆堂"、"三台馆"、"克勤斋"、"怡庆堂"、"近圣居"、"直方堂"、"兴文堂"、"存庆堂"、"永庆堂"、"居仁堂"、"西园堂"等十几个，还有许多是没有牌号只有姓名的。这些

堂号虽改易主人，而老字号仍不变，万卷堂的牌号一直沿用到明代。余氏刻书质量较高，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宋代许多官刻的书，也由他刊印。据记载，胡炳文《朱子四书通》卷二十六后，有张存中的跋，说"养正三年，存中奉浙江儒学提笔志行杨先生命，以胡先生《四书通》，大有功于朱子，委令赍付建宁路建阳县书坊刊印，志安余君，命工镌梓，共越三稔，始克就……"。余氏刻书，纸板俱佳，颇受推重，堪称书坊史上最著名者。南宋临安棚北大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是诗人陈起父子相继经营的著名书铺，几十年间，父子俩先后刻印了一百多种书，包括唐宋人诗文集和江湖诗集。南宋临安府荣六郎经籍铺，北宋时就在京城汴梁刻书卖书，随王朝南迁临安后，继续刻书卖书，绍兴二十二年(1152)刻过《抱朴子内篇》。元代许多书坊如麻沙刘氏南涧书堂，刘锦文日新堂，虞平斋务本堂，郑天泽宗文堂，叶日增广勤堂，刘氏翠岩精舍，刘氏慎独斋等历史都很悠久，一直持续到明代。他们的刻书都很丰富，现存元代坊刻古籍，大部分是这几家的刻本。清代最著名的书坊要推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其历史也很久长，开设于明朝万历间，经清、民国，直到建国后1954年才关门，长达四百余年，刻印经、史、子、集、笔记、小说、通俗读本等各类书籍数百种，清末民初，还增置铅印、石印等先进技术设备，为中国书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些书坊之所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一方面是由于当地刻书事业兴旺，它们大都是著名刻书中心的书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家书坊的主观努力，这些书坊的主人们世代相继，经营有方，书坊因之充满了活力。例如，扫叶山房开设后不久，招人嫉妒，有人别开卷席斋，企图起而代之，可结果恰恰相反；还有人开设扫松山房，把松字写成古体，和叶字差不多，用以混淆，可是亦同归于失败。可见，书坊要持续发展下去，非等闲之辈所能为，这些老书坊大多刻书累累，成绩斐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图书发展中的重要核心力量。他们是历代书坊的代表，为中国书史

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二

书坊刻书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起官私刻书，要逊色一些。这主要因为书坊刻书旨在谋利，态度不及官刻、私刻认真，所以其刻书往往粗制滥造，出现不少讹误，纸墨低劣，印刷也不精，这是坊刻致命的弱点。著名的“麻沙本”就因为粗制滥造曾闹过笑话，据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记载，宋元符初，杭州学教授姚祐“堂试诸生，《易》题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诸生疑之，因上请”，“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姚考官一查，果如所说，“大惭”。此事在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中均有记载。

但是，我们所说的坊本滥恶只是指部分坊本而言，并不能代表全部坊本，更不能代表整个坊刻事业。书坊为了速刻牟利，有时粗制滥造，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也必须赢得一定的信誉，才能生存，所以坊刻本不可能全部滥恶，一文不值。恰恰相反，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许多书坊，刻印精工，纸墨俱善，刻了不少好本子。如前面所说的陈宅经籍铺，刻书就比较认真，雕版工整，字体清秀，行格疏朗，纸墨精美，被人推为坊刻中的上乘。流传至今的《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唐鱼玄机著），镌刻极其精湛，是陈氏刊本中的代表作。清代晚期北京书坊聚珍堂，刻了不少书，字画清晰，纸墨刊工，亦属坊本中的上乘。类似这样的书坊很多，历代都有。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中，有许多种就是以坊刻本为底本影印的，据所知有宋余仁仲万卷堂绍熙二年所刻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和《春秋谷梁经传十二卷》，南宋临安陈宅书籍铺所刻的《周贺诗集》、《朱庆余诗集》、《李群玉诗集》、《碧云集》、《披沙集》、《李丞相诗集》、元代叶氏广勤堂于至顺元年（1330）所刻的《新刊王氏脉经二十卷》，郑氏宗文堂至顺元年所刻的刘因著的《静

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这个本子是《静修文集》最古最完备的本子。这些是《四部丛刊》影印时所据的底本。另外所知还有，元代建阳刘氏日新堂至元六年(1340)所刻虞集《伯生诗续编》三卷，被罗振玉影印《云窗丛刊》时作底本；明代北京岳家书坊于弘治十一年(1498)所刻《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五卷，1955年商务印书馆曾将此本影印复制，依原样装订，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坊刻中有许多质量较高的刻本，并非全部滥恶的东西。

在流传下来的古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坊刻本。因为它们刻印数量较多，分布也很广，故比官刻本和私刻本更容易流传下来。如果没有这些坊刻本，也许今天我们就根本看不到唐代的印本，流传下来的古籍数量可能也会大大减少。这批传世的古籍坊本，对我们现在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和有关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研究都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在研究民间文化及民间社会发展方面，其参考价值更高一筹。唐代印本除佛经外就是坊本，1944年在成都市郊唐墓中发现的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陀罗尼经咒》，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唐印刷品(现藏于四川博物馆)，上面刻有古梵文及小佛像。其它的唐印本还有在敦煌发现的唐乾符四年(887)刻印的历书和中和二年(882)成都府樊赏家刻印的历书残页，都是当时的坊刻品，成为今天研究唐印本图书的主要依据之一。北宋刻的书，流传很少；南宋刻书，临安、建阳较盛。临安书坊刻印了许多民间流行的话本小说和杂剧南戏，许多传本对研究当时的民间文学是极其珍贵的史料，临安中瓦子街张家书籍铺刻印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宋人平话中唯一的旧刻本。金代平水书坊刻书多是些医书、类书以及民间盛行的诸宫调等，诸宫调是盛行于宋金元时期的一种说唱文体，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刘知远诸宫调》残卷五则就是平水坊本，是今天研究金元时民间诸宫调说唱仅存的几种诸宫调之一，郑振铎先生在《中国

俗文学史》中对《刘知远诸宫调》作过专深的研究。宋金元三代古籍至今传世的,大多数都是坊本,由于年代久远,专家们把它与官刻本、私刻本一样重视。所以说,在现存的古籍中,尤其是年代较长久的,坊本占了不少的比例,它们对于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民间的大众文化,促进今天的科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三

书坊刻书束缚少,创新多,尤其是在刊刻工艺方面,对刻书事业的发展贡献很大。

书坊刻书在刻印前代书籍时,往往在形式上进行一些加工。例如,南宋以前经书的疏与注本是分别印行的,到了南宋,建安书坊有人开始把两者合起来刊印,以便诵读。宋代书坊为了迎合广大群众,往往还为一些书添制插图,增加参考资料,刻些所谓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的经书和子书。明代这些加工创新依然存在,明代前期建阳书坊杨氏清江书堂倡导了刊刻小说图文并举的先河,弘治年间建阳詹氏进德书堂在牌记中央往往绘制人物图画,这是书中插图版画之始。另外,一些书坊为了方便群众,吸引读者,匠心独运,把许多相关的书刻在一起,例如,天启年间清白堂刻邓志谟编辑的"七种争奇",这就是《花鸟争奇》、《童婉争奇》、《蔬果争奇》、《风月争奇》、《山水争奇》、《梅雪争奇》、《茶酒争奇》。万历年间,金陵著名书坊唐氏富春堂把十种戏曲合刻在一起,名曰《绣剧演剧十种》(《限于篇幅,从略)。其实,类似这样的合刻,在书坊刻书中是相当普遍的,加还有所谓"四梦"、"十才子""四大奇书"、"笠翁传奇五种"等等。

书坊刻书的创新在刊刻工艺方面显得更突出。古籍版式中的黑口、书耳,都是出于书坊之手,黑口是建阳书坊中最早发展起来的,它是古书一页的中线,便于折叠;书耳是版面左上角处的一个小方格,可刻简短篇名等,便于翻检,今天某些书的栏外题就是由

此而来。

刻书字体的变化，书坊也是主要源泉。南宋时，刻书多半双边、细字、密行，书坊中渐渐产生一种秀劲圆活而字体狭长的字体，大约为福建建安所创。元代多用赵孟頫字体，并出现简体字，坊刻尤多。明代嘉靖以前，字体沿袭元代，尤其是私刻、坊刻。

有些书坊在板框设计上也别出新裁，不用简单的直线打框，而在板框四周刻上某种图案花纹，构成边栏，这样可以起到美观的效果。明万历间唐氏富春堂在刻《绨袍记》、《白兔记》时就用了"卍字栏"。古籍中还有"竹节栏"、"博古栏"的，非常美观。

书坊的这种创新性，是保守的官刻、私刻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的创新随着时间的变迁，往往为官刻、私刻渐渐接受、利用，这样就把整个刻书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份功劳是应记在书坊刻书身上的。

四

书坊刻书的服务对象是人民群众，因此它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普通需要，这与官刻、私刻的目的迥然相异，它的刻书内容因此也与官私刻不同，大都是为人民生活所需要和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这是书坊刻书的主要特点，是官私刻书所无法替代的。

根据刘国钧先生的研究，坊刻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前代的著作，这类书籍以宋元居多，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主要供人诵读。第二类，是日用参考书和许多著名的文集、医书、历书以及类书，这一类主要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生活需要，在坊刻中所占比例不小，实用价值也高，为历代劳动人民直接利用。每为专家们称引的福建书林陈德宗万历所刻《新锲两京官板校正锦堂春晓翰林查对天下万民便览》和明末师俭堂萧少渠所刻《鼎镌十二方家参订万事不求人博考全编》，便是坊间刊刻的日用参考书。医书的刊印在元代以后比较突出，元代燕山窦氏活济堂乃是

专门刻卖医书的书铺，余氏广勤堂刻的《新刊王氏脉经二十卷》，流传到现在，是有名的医书，余氏勤有堂也刻过《新编妇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辨识修药物法度一卷》，明代种德堂着重刻印医书，曾刻《新刊太医院校正图注指南王叔和脉诀》和《八十一难经》等，清代本立堂也刻过《医学入门》。这些医书在大众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给当时的人带去了许多方便，为民间医生提供了参考资料。历书是下层人民最需要的东西，人们要从事耕种，就不能没有历书。早在坊刻初期，坊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数日历了，唐统治者曾经下令禁止私置历日版，冯宿在奏文中说"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王谠在《唐语林》中对江东坊刻历书的情况也有记载，"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卖者，每差互朔晦"。唐以后，书坊刻书继承了这个传统，继续刻印历书。第三类，是儿童启蒙一类的读物，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以及《四书集注》等等，这些童蒙读物数量较大，对普及民间基础教育，为提高大众水平奠定基础是很有用处的。但是除坊刻外，官刻、私刻很少有人刻这些童蒙读物，这是坊刻的独特作用。第四类，是科举考试用书。为了满足士人科举考试的需要，书坊刻一些帖括、策论、字书、韵书、文选以及经过加工的纂图互注、重言重意的经书、子书，还常刻一些供夹带抄袭用的书。这类书价值不大，但很受士人欢迎，每逢考期临近，书坊还专辟门市部，为士人们服务，但在清代废除科举后，书坊就不再刻印这类书了。第五类，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戏曲、小说、诗歌、评话、弹词、宝卷等。这是坊刻品中价值最高的部分，它保留了历代许多民间创作，反映了民间文学的发展状况，这是书坊的特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研究。宋、元、明、清四朝大量流行于民间的话本小说、戏剧及文人偶然寄兴所填的民间小曲等作品也是靠坊刻本保存至今。书坊刻印的民间口头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品，对于

丰富历代人民的精神生活，促进民间文学的繁荣，对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一个莫大的贡献。

五

（一）书坊刻书对国内外文化交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书坊刻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分布是极其广泛的，宋以后就已遍布各地，它的影响也相当大。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书坊刻书促进了国内文化交流，因为书坊刻书是商业活动，它所刻的书全部是供流通的，这在客观上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的作用。历史上许多著名书坊刻印的书往往销售到全国各地，据《福建省志》记载，宋时建安"书坊之书盛天下"；清代扫叶山房刻印的书极受欢迎，"贩夫盈门，席氏之书不胫而走天下"（《中国雕板源流考》）。这些广泛流传的坊刻书籍，客观上沟通了各地的文化交流。

有些坊刻书籍在流传过程中，被带往海外异国，所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外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坊刻初期，坊刻书籍的外传，促进了印刷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据记载，唐咸通年间在长安留学的日僧人宗睿携带回国的书籍目录《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就有标明"西川印子"的《唐韵》和《玉篇》各一部，所谓"西川印子"就是四川印本的古称，《唐韵》和《玉篇》是唐代刊本，恐就是当时刻书中心四川的坊刻本。另外据记载，十六世纪前后，南京、苏州、徽州、杭州、吴兴等地方坊刻印了大量医书、戏曲、小说和其它各类书籍，出版量激增，销路远及国外（《中国版刻图录序》）。可以相信，除此以外，其它时候一定也有不少坊本流传到国外，刘孝文、斐非在所著《谈中国古籍外流与搜集》文中（文见《吉林省高校图书馆通讯》1986年第三期）分析了中国古籍外流的九条渠道，其中民间贸易和书贾售书渠道就包括书坊在内。

（二）书坊的发展对近现代出版事业的产生、发展也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

书坊是我国古代商品图书流通分配的主要场所，它是早期的书店，兼营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相当于今天的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的联合，许多书坊都拥有自己的刻工和印工，有专人编辑或由坊主亲自动手。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现代印刷术的传入，雕版成本高，获利少，一些书坊才专事销售。因此，在一千多年的刻书发展中，书坊一直是商品图书市场的主角，它的存在满足了我国人民的图书需要，可以说，书坊刻书是我国古代的出版发行事业，是出版事业的先驱，因此它的发展也为近代新式出版事业的发生奠定了一部分基础。随着西方印刷术的传入，一些书坊如上海倹宝斋、竹间斋，又首先采用西方石印法，这对西方印刷术的传入，对近代出版事业的产生作出了更直接的贡献。

（原载《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第2期）

书院刻书漫话

曹 之

书院始于宋代，终于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0)，共是960多年的历史。书院的主要任务是讲学，但有些书院在讲学之余，也刻了不少书。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历代书院刻书的情况。

宋代书院刻书不见著录，暂且存而不论。元代书院刻书见于著录的有十七家之多。这些书院及其所刻书是：兴贤书院至元廿年(1283)刻《濙南遗老集》；广信书院大德三年(1299)刻《稼轩长短句》；宗文书院大德六年(1302)刻《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梅溪书院大德十一年(1307)刻《校正千金翼方》、泰定元年(1324)刻《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泰定四年(1327)刻《书集传纂疏》、元统二

年(1334)刻《韵府群玉》、后至元三年(1337)刻《皇元风雅》等;圆沙书院延祐二年(1315)刻《大广益会玉篇》、延祐四年(1317)刻《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和《皇鉴笺要》、延祐七年(1320)刻《山堂考索》、泰定二年(1325)刻《广韵》等;西湖书院后至元五年(1339)刻《文献通考》、至正二年(1342)刻《国朝文类》、至正二十三年(1363)刻《金陀粹编》;苍岩书院刻《标题句解孔子家语》、《纪纂渊海》等;武溪书院泰定三年(1326)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龟山书院至顺四年(1333)刻《道命录》;建安书院至正九年(1349)刻《蜀汉本末》;屏山书院至正二十年(1360)刻《止斋先生文集》、《方是闲居士小稿》;豫章书院至正二十五年(1365)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南山书院至正二十六年(1366)刻《广韵》;临汝书院刻《通典》;桂山书院刻《孔丛子》;梅隐书院刻《书集传》;雪窗书院刻《尔雅郭注》等等。

明代书院刻书见于著录的有十六家之多。这些书院及其所刻书是:紫阳书院成化三年(1467)刻《瀛奎律髓》;正谊书院弘治中刻《铁崖文集》;白鹿洞书院正德十年(1515)刻《史记集解》;陕西正学书院嘉靖五年(1526)刻《国语》;大梁书院嘉靖六年(1527)刻《于肃愍公集》;义阳书院嘉靖十年(1531)刻《何大复集》;无锡崇正书院嘉靖十一年(1532)刻《事类赋》;九峰书院嘉靖十五年(1536)刻《元好问中州集》;广东崇正书院嘉靖十八年(1539)刻《通典》;芸窗书院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荀子》;云间俨山书院嘉靖二十三年(1544)刻《古今说海》;洞阳书院嘉靖三十八年(1559)刻《唐王右丞诗集》;籍山书院万历十九年(1591)刻《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另外,还有繁峰书院刻《侯鲭集》、东林书院刻《龟山杨文靖集》、龙川书院刻《陈龙川先生集》,等等。

清代书院刻书最多,著名者有二三十家。诂经精舍刻有《诂经精舍集》八集。学海堂共刻书3334卷,其中包括《学海堂经解》(亦名《皇清经解》)1400卷、《学海堂文集》四集九十卷、《四库总目提要及附存目录》230卷、《十三经注疏》416卷、《擘经室集》62卷、《学海

堂丛刊》27卷，等。《学海堂经解》搜集清初至乾嘉间的经学著作74家180余种。《学海堂文集》收集了五百人的著作。广雅书院设有广雅书局，规模最大，共刻书5746卷。其内容除《无邪堂答问》五卷之外，多经、史、小学、文集之类。《广雅堂丛书》收书159种，其中史书97种，几乎囊括了唐宋以来的主要史书。南菁书院亦设局刻书，刻有《南菁书院丛书》144卷、《南菁札记》21卷、《南菁讲舍文集》6卷等。其中《皇清经解续编》工程最大，共1430卷，共110家209种书。王先谦在谈及这部书的编刊经过时说："臣昔于阮元所刊经解外，搜集说经之书，为数颇多。抵任后，尤苏省为人文荟萃之区，檄学官于儒门旧族，留心搜访，时有采访，共收书近二百种，都一千数百卷，类皆发明经义，为学者亟应研究之书。稔知宁、苏两书局，近来经费不甚充裕，未能刊此巨帙，因就近于江阴南菁书院设局汇刊，曾函知督抚臣在案，臣已捐银一千两，鸠工缮写。"① 尊经书院为光绪元年(1875)四川总督吴棠和提学张之洞所创，设有尊经书局。该书局一方面利用原成都书局所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书版片印书，另一方面也自刻了《蜀秀集》等多种书籍。菊坡书院刻有《菊坡精舍文集》等书；大梁书院刻有《经苑》、《近思录集注》、《人谱》等书；正谊书院刻有《学古堂日记》等书；关中书院刻有《志学斋日记》等书；经训书院刻有《经训书院文集》等书；育才书院和五华书院也各刻书一二十种。另外，端溪书院、鳌山书院、宏道书院、玉山书院、东雍书院、龙江书院、嵩山书院、庐峰书院、梅华书院、正义书院、凤仪书院、解州书院、唐氏书院、紫阳书院等都刻书多种。

书院刻本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书院师生自己的著述。许多书院常把师生读书的心得或疑惑记在日记册上，然后把日记加以整理，编刊成书；如正谊书院刊《学古堂日记》、关中书院刊《志学斋日记》等便是这样。有的书院还把学生写的文章刊印成书，如诂经精舍刊《诂经精舍文集》中的两千多篇文章便是学生

的研究成果。不过，书院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对此类文章要求甚高，《白鹿书院志》在谈到经费开支时曾有如下一段记载："今查会文定刻十篇，未必俱可传世，似宜拔其有骨品、有脉理、有先正之体裁章法者选拔，庶不失为天下第一大书院人文。每年汇刻一卷，附于天下宗师考卷后，以公海内"，"如无名世真文，即不必妄灾梨枣，以耗物力"。[②] 书院刻本另一类内容就是历代文献，这是主要的。在历代文献之中，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因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统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钜"，[③] 所以书院刻了不少丛书，兹将《中国丛书综录》中所录清代传世书院刻本摘录于下以见一斑：

魏贞庵遗书　清康熙中龙江书院刊本
蔡氏九儒书　清雍正十一年(1733)庐峰书院刊本
镜烟堂十种　清乾隆中嵩山书院刊本
皇清经解　清道光九年(1829)广东学海堂刊本
十一经音训　清道光十年(1830)大梁书院刊本
容城三贤文集　清道光十六年(1836)正义书院刊本
国朝文录　清道光十九年(1839)瑞州府凤仪书院刊本
惜阴轩丛书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宏道书院刊本
二洪遗稿　清道光中梅华书院刊本
经苑　清道光咸丰间大梁书院刊本
木钟台全集　清咸丰六年(1856)唐氏书院刊本
三通　清同治中广州学海堂刊本
正谊堂全书　清同治五年(1866)福州正谊书院刊本
五经评说　清光绪七年(1881)大梁书院刊本
鄦冰壑先生全书　清光绪十一年(1885)东雍书院刊本
皇清经解续编　清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刊本
南菁书院丛书　清光绪十四年(1888)南菁书院刊本
有诸己斋格言丛书　清光绪十四年(1888)山西解州书院刊本

武英殿聚珍版书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刻本

端溪丛书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番禺端溪书院刊本

玉山朱氏遗书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玉山书院刊本

纪事本末汇刊　清光绪中广雅书局刊本

书院刊刻这些丛书，对于保存古代文献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丛书至今仍然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

在众多的书院刻本中善本也是很多的，让我们看几个例子：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刻印俱佳，堪称元本的代表作。元大德三年(1299)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其中有辛弃疾酬和范先之词十首，宋刻四卷本刊于宁宗赵扩即位前，范先之作范廓之原来范先之本名范廓之，广信书院的祖本刻于宁宗一朝，故避宁宗赵扩名嫌改为光之，可见广信书院刻本渊源之古。此本后来流传甚广，明嘉靖十五年(1536)王诏刻本、嘉靖二十四年(1545)何孟伦刻本、毛氏汲古阁刻本、清光绪间王鹏运四印斋刻本、1955年中华书局本等均以此帙作为底本。明正德十年(1512)白鹿洞书院本《史记集解》据南监集解单行本翻刻，在正文注疏合刻盛行的年月，这种单行本实属难得。明嘉靖十八年(1539)广东崇正书院刻《通典》也是善本，该书前南海方献序云："嘉靖戊戌侍御连江王君十竹来按吾广，首谋于提学秀水吴君默泉访求善本，爰加精校，乃请于提督都宪侯官蔡公半洲嘉乐赞成，遂付之梓。"可见此本底本优秀、校勘精审。清广雅书局刻《三国志补注》是传世最早之本。清人赵一清采摭史书、地志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有关三国遗事遗文，以补《三国志》裴注缺佚。然成书后向无刻本，光绪间广雅书局始据抄本刊刻。1935年北京大学印本即据此本。另外，清康熙四年(1665)紫阳书院刻《铁桥志书》也是善本。铁索桥在贵州晴隆县盘江之上，明崇祯元年(1628)朱家民倡修此桥，三年完工。清顺治十七年(1660)又加固重修，此书详记修桥始末、盘江地理，并附有诸家吟咏。正因为书院刻本优秀，所以一些家刻、坊刻常常假托

书院之名刻书，例如元代所谓“虚谷书院”刻《牧潜集》、“古遇书院”刻《增补文选六臣注》、“建阳书院”刻《古今源流至论》、“圭山书院”刻《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集》、“梅溪书院”刻《郑所南先生文集》、“师山书院”刻《春秋经传阙疑》等都是冒名之本。清人叶德辉针对这种情况曾经指出：“元时讲学之风大昌，各路各学官私书院林立，故习俗移人，争相模仿。”④

那么，书院为什么能够刻书，而且刻得那样好呢？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书院拥有大量藏书，其中多有善本。这不仅可以为刻书提供较好的底本，而且是校勘工作的重要保证。底本不好，就会谬种流传；校勘离开善本，就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历代书院非常重视藏书，许多书院都有藏书楼。据记载，清代广雅书院藏书43500册。大梁书院有《大梁书院藏书总目》一册，根据该目著录，大梁书院共有藏书2491种，34876卷。其中经书700种，8936卷；史书106种，13203卷；子书184种，3480卷；集书290种，5037卷；丛书1121种，4218卷。可见藏书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书院藏书的来源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上赐之书。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赐白鹿洞书院监本九经，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赐岳麓书院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清代赐书最多，就拿白鹿洞书院来说，康熙廿六年(1687)4月赐《十三经注疏》121册、“二十一史”511册；康熙四十六年(1707)3月赐《渊鉴古文》24册；康熙五十四年(1715)2月赐《朱子全书》38册；康熙五十五年11月赐《御纂周易折中》12册。为了保存这些书，白鹿洞书院专门建立了“御书阁”。⑤ 乾隆一朝赐各书院的书也不少，据《清通考》乾隆十六年(1751)上谕云：“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南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聚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其次是赠送之书。白鹿洞书院接受赠书也不少。

早在南宋时，朱熹就赠送《汉书》44通。清代赠书最多。江南巡抚张伯行赠61种147本；太守周灿赠14种190本，提学吴霖赠4种375本、星子知县毛德琦赠3种14本。⑥其它书院也接受了不少赠书，另外，书院本身也购买了不少书。书院藏书大部分是靠自己买来的。清代诂经精舍买四部书1300余册。清冯光裕建贵山书院，“购经史群籍数千卷”。⑦曾钰“以督粮道故总司通省书院事，公乃为延名师主讲，广购东南诸官局所刻古籍”。⑧黎培敬“视学贵州，葺诸书院，以边隅贫僻为广购经籍，逮收令律例医药之书，罔不毕备”。⑨

第二，山长学术水平较高，精于校勘，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刻书的质量。“山长”就是书院的首领。为什么叫山长呢？天下名山僧占多，书院受禅林的影响，院址也多在山林名胜之处。如岳麓书院在岳麓山抱黄洞下；嵩阳书院在嵩岳太室山南；石鼓书院在石鼓山回雁峰下，等等。因为书院多依山而建，故其首领就叫“山长”（也有叫洞主、洞正或堂长的）。清代乾隆年间，山长曾一度改名为院长，乾隆皇帝认为：山长“名义殊为未协，既曰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为院长”。⑩山长多由名师硕儒担任，著书立说者甚多，就以元代而言，景星书院山长黄泽著有《易学滥觞》；南阳书院山长王申子著有《大易集说》；道一书院山长胡炳文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先贤书院山长王天与著有《尚书纂传》；东湖书院山长赵文著有《青山集》；和靖书院山长龚璛著有《存悔斋稿》；上蔡书院山长陈孚著有《观光稿》；美化书院山长胡助著有《纯白斋类稿》；安定书院山长任士林著有《松乡文集》；临汀书院山长刘将孙著有《养吾斋集》；丽泽书院山长袁桷著有《延祐四明志》；澄江书院山长许恕著有《北郭集》；贞文书院山长周闻孙著有《鳌溪文集》等等。大量事实表明，山长确实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们在讲学之余，对于著书和刻书极为热心，他们校勘的书，讹误甚少。如果山长不学无术，他们就不会关心刻书这件事。即使刻书，也不可能刻出善本。

第三，书院拥有大量学田，这是书院经费（包括刻书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政府所拨“经费”，大多是拨给田产；私人筹措经费，亦多捐赠田产。书院经费收入主要靠田租。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曾经指出：“郡县之学，自宋以后，所设日多，其经费大抵恃学田也，即书院亦然。”⑪不过，具体到一个书院来说，田产多寡是经常变动的，白鹿洞书院在宋淳熙七年（1180）有学田870亩，明万历三年（1575）有田地山塘2800亩，万历十九年（1591）有田701亩，清康熙七年（1668）有熟田1496亩。⑫大梁书院明天启间有学田120亩。安徽龙溪书院清嘉庆间有田184亩，紫山书院有田140亩。书院把这些田租给佃农，按时收租。明人陆深曾说：“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⑬ 不仅元代如此，明清亦然。据记载，白鹿洞书院清康熙七年（1668）所收学粮折合租银二百九十九两三钱三分五厘二毫；康熙五十五年（1716）所收学粮折合租银三百三十二两三钱八分一毫二丝。每年刊印会文共用白银四十六两。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才得以使书院刻书不断发展。顾炎武曾经指出：“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刻书有三善焉：山长无事，则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版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⑭所谓“版不贮官”，就是说版片不贮存于官府，自己保存，根据需要，可以随取随印，非常方便。

总之，书院刻书时间长、数量多、质量好。在中国雕版印刷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们应当认真加以研究。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2期）

注：

① （清）王先谦：《自定年谱·奏报岁试五属情形及设局刊书事宜》

② 《白鹿书院志·知府廖文英申详减租文》卷10 25页 康熙五十九年（1720）刻本（下同）

③ (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古今人著作合刻丛书目》卷5
④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4 97页
⑤⑥ 《白鹿书院志·书籍》卷5
⑦ (清)钱仪吉:《碑传集》卷71
⑧⑨ 同上书卷32、卷28
⑩⑪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隋唐以下》丁帙 1098页、1079页
⑫ 《白鹿书院志·田赋》 卷19
⑬ (明)陆深:《金台纪闻》
⑭ (清)顾炎武:《日知录》 卷18

中国对日本雕版印刷的影响

梁静波

印刷术自唐代发明之后，应合着封建社会盛期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国内广为流传，并迅速地流传到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印刷术传入日本的确切时间并不清楚，但其对日本雕版印刷的影响则是深远而又显著的。

观察日本雕印的书籍，无论是在形制还是在内容上，几乎都可以看到中国影响的痕迹。

文 字

谈到中日的历史关系，人们常谈到“同种同文”。汉字大约在三世纪初就已传入日本，《宋书·蛮夷传》中记载的倭王武(即日本雄略天皇）致刘宋顺帝的表文就是现存日本最古的汉文。日本文字初期直接使用汉字，以后创造了由汉字演变而成的假名，而称汉字为“真名”。“名”就是字，这原是中国的古意，如今却保留在日本语言中了。汉字以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为背景，具有极为丰富复

杂的内容，包括有儒、墨、法、诗文辞赋、佛道教等各种思想内容，传入日本后，不仅加深了日本语言的内涵，丰富了日本的文化思想，而且对印刷事业影响也很大。从现存日本最早的一些印刷品看，除佛经中偶尔有一些梵文外，所有佛经、儒书、医典、课本及文学作品，都是用汉字印成的。后来为了便于日本人阅读，出现了“训点”、“和点”或“倭点”，但它们也不过是对汉字的注音。即使是在元亨元年(1327)日本第一本附有平假名的《黑谷上人语灯录》及康永三年(1344)有片假名的《梦中问答集》出现之后，日本的印刷依旧是少数，影响也不大，汉文典籍的刻印一直在日本早期印刷事业中做为主流和先导而存在着。

纸张、墨板

日本受到中国造纸术的影响，创制出了颇具特色的日本纸。日本纸，也叫和纸，种类有麻纸、楮纸、檀纸、雁皮纸、斐薄纸、纸屋纸、鸟蛋纸等，制纸方法与中国造纸术极为相似。以楮为例，每年十月割楮，切段煮后剥皮晾干，再放到水中浸泡，在大桶内拔净灰汁，煮成碎片，加入石灰，使色纯白，放在木台上敲打，然后用桁抄抄纸，贴在板上晒干或烤干，纸便做成了。只是日本人认为中国纸偏薄，只宜挥毫作画，不宜印书，因此和纸多比中国纸厚而坚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国纸而在唐代受到皇帝的赞赏。印书用墨，中日古代制法相似，都是以灯火烟、石墨、皮胶等为原料，在日本类书《文艺类纂》、《古事类苑》中都有记载。

正是由于日本在造纸术、造墨术等方面，走了一条与中国相同的道路，才使得其雕印术有了形同中国的基础。

装帧、版式

在书籍装帧上，日本几乎全盘重演了中国书籍形式的演变过程，同样有卷子装、折本、梵夹装(日称叶子形)、包背装(粘叶装)、

线装(缀本)等等。卷子装可从宋代日僧然向宋太宗进献的卷子看出，其为金缕红罗褾，水晶做轴的《郑注孝经》与《越王孝经新义》各一卷。与中国相同，卷子一般放在经筒和书帙中，经筒有木制和竹制两种，每只筒子由两片组成。书帙中有经袋，放经典之外的书帙称为书筒或书囊，开始用质地较粗的白布，后用绢绸，甚至还有用金烂缎子这种高贵的料子。此外，书帙还有用细竹丝编成的，叫做竹帙。

与和纸一样，日本书籍册叶的装订也有和装。所谓和装，在基本形式上就是中国的蝴蝶装，但也有其特殊之处。我国宋代为了方便印刷，一般在书的一面印字，然后折叠起来，装订成书，这种习惯一直沿袭到近代。日本古时由于纸张比较贵重，质地又比较厚，印字后不易渗透到反面，所以采用双面印字的方法，再将其装订。到平安朝后期(1185年左右)，日本蝴蝶装(日称大和缀)趋于完善，其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将数页纸叠在一起再折，然后在中间折缝处订上丝线，这种本子也叫丝缀本，另一种是将上述折页又重叠在一起，背部折缝对齐，前后再加上表纸，这叫背缀折本。

到江户时代(1603—1867)，书籍形式主要为线装，与中国线装书的区别在于中国常用两根细丝线装订，而日本只用一根较粗的线；中国用较薄的纸双折后复于书的前后，日本则用一张较厚的表纸；中国订线部分的距离要长些，日本的则窄一些。同样，日本线装书也使用书函，其形式与中国的函套相比，略有小异。

在板式上，从日本雕印古籍的一些实物图片中可以看到，除照版翻刻中国书籍的不提，就是日本自编自雕自印的书籍，其版式也脱离不了宋本的胎模，甚至如不看序跋文就很难区分是哪一国的刻本。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中国古籍几乎全部自右向左竖行写下，而我国新出版的图书已很少再有这种情况(重印古籍除外)，日本却把这种竖排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至今不衰，可见影响之深。

内　容

佛经在日本雕印书籍的事业中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日本早期的刻书几乎全是佛书，佛经以外的书籍不但刻印较少，而且也是由禅宗僧侣主持进行的。刻印佛经的盛行是佛教从中国传向日本的必然结果。佛教通过西域在公元一世纪的后半叶传入中国，其后据《日本纪略》载在钦明天皇十三年(552)传入日本，但据《扶桑略记》和《法王帝说》的记载，民间的流传至迟在钦明天皇元年(539)。佛教一经传入日本，就受到了皇家的重视，推古天皇的后代圣德太子(厩户皇子)就十分热心于佛教，建设了著名的法隆寺、四天王寺等七大寺院，宁乐时代又建筑了作为全国中央寺院的东大寺。为了造寺、雕佛、写经，国家虽然花费了不少资财，但佛教终于取代了日本原有的神教而成为日本的国教。在此基础上，又分成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等大小各个宗派。

佛教的兴盛，使许多日本僧人日益感到，本国的经典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入唐僧和入宋僧曾多次出入于中日之间，从中国带回去许多佛经和其他书籍。宋代日本的俊芿和尚就曾从中国带回佛经、儒书、堂帖、杂书 2013卷，其中仅杂书一项就有 463 卷。日僧大道一以编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收从中国传去的书籍有几千卷，其中凡是手抄本，都注明为写本，可见其他必是印本无疑。这样大量的印本汉籍传入日本，对日本佛学、儒学、诗文学的兴盛所起的作用自不待言，仅其对日本印刷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日本，国家、各寺院及民间私人为了保国安民，祈求功德，利用印刷术都曾雕印过许多佛家经典，不可胜数。其中寺院的僧人首当其冲，京都、镰仓一带就出现过仿刻中国版刻的浪潮，泉涌寺成为当中的先驱之一，而参加刻印经典这一举动的僧人，几乎都是入宋僧或是他们的弟子。因此这些人刻印的书籍，很可能都是仿

刻由宋朝带回来的宋版佛典。

日本刊刻的其他书籍与佛经相比较，数量不多。为什么在中国广为流行的儒学在日本并不如佛学盛行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日本历史上，在奈良时代，曾出现过一段儒书刊行受到阻碍的时期。其原因主要有二种，一是古代日本刻印佛经是为了消灭今生罪障，得到来世冥福，而要想通过刊刻儒书达此目的，则被看成是愚蠢而又不可能实现的；二是当时汉文字在日本只在贵族社会中按照师承口授的途径传播，并未能达到普及的程度，一般人对阅读儒书及流通不感兴趣，自然刻印也就不多了。一直到宝治元年(1247)陋巷子刻了《论语集注》十卷，这才是日本第一次刻印儒书。这一举动在当时杂书开版颇为困难的情形下进行，又是私人独立完成，不能说是件容易的事。其后佛儒二家渐渐趋向于融合的状态。在醍醐天皇元亨二年(1322)素庆刻的《古文尚书孔氏传》十三卷的跋文中，就可以看出这一倾向，这种情况为后来日本禅僧多习儒学，多刻儒书打下了基础。

尽管佛书之外的书籍刻印的数量不如佛书，但仍在日本刻书事业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甚至有许多书反复刊刻多次。其中《论语》就分别有著名的宝治本，正平本，天文本之分。《聚分韵略》这部书，也有明应二年(1493)版、享禄三年(1530)版和天文八年(1539)版三种。史书中，著名的有保存至今的“庆元版”三史，即《史记》、《汉书》和《后汉书》。

谈到日本的雕版印刷，首先就要遇到有关百万塔陀罗尼经的问题。海外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经卷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物。

在日本史书《续日本纪》卷三十中有这样的记载：

神护景云四年四月戊午，初天皇八年乱平，乃发弘愿，令造三重小塔一百万基，高各四寸五分，基径三寸五分，露盘之下，各置根本、慈心，相轮、六度等《陀罗尼》，至是功毕，分置诸寺，赐供事官人已下，仕丁以上一百五十七人，爵各有差。

在《东大寺要录》卷四《诸院章》中又有一段记载：

一东西小塔院

神护景云元年丁未，造东西小塔院，实忠和尚所建也，天平宝字八年甲辰秋九月一日，孝谦天皇造一百万小塔，分配十大寺各笼《无垢净光陀罗尼》折本

口传云惠美乱诛之间忏悔料。

陀罗尼是梵文的音译，意即咒语。此经是佛教流布最广的重要经典之一，全名为《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共包括六部，每部都有一节故事和一段经咒，用故事来解释经咒的用法。705 年，由出身中亚细亚吐火罗（音译）的一名僧侣弥陀山第一个翻译成中文，但只译了故事部分，经咒部分只有音译，使用的是近似于梵文音的汉字。百万塔陀罗尼经就是这种汉字音译的梵文经咒。

从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来看，大概是在日本天平宝字八年（764）平定了惠美押胜叛乱之后，（惠美押胜是八世纪中期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的御赐姓名，因和当时孝谦女皇所宠信的僧侣道镜争权，起兵叛乱，不久兵败被杀，史称惠美押胜之乱），称德天皇（女）曾发弘愿制造一百万座三重小木塔，内藏陀罗尼经中的根本、慈心、相轮、六度四咒，分置于东大寺、法隆寺、弘福寺等所谓十大寺中。

现在这些经已大多毁坏，只有法隆寺存有一部分。用纸是一种黄麻纸，高二日寸，宽一日尺二日寸左右，每张大约三十行，每行五字，做成卷子，装在塔中。现在日本、英国等都有收藏。日本学者和一些西方学者，都认为这陀罗尼经卷就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并根据各人的观点和分析发表了几种不同的见解和论说，主要分成日本创始说和大陆传入说两种。这种陀罗尼经，我国没有收藏，但对于其是否为最古的印本，尚有一些疑问。

首先，持印刷术为日本创始说的人认为，在应用印刷术之前，日本已通用印衣法，（又称拓衣法），即在木板上雕刻花纹，印在布

帛上，因此印刷术是从印衣法发展而来的，在此之后出现印本陀罗尼经，应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种说法已被许多日本学者所反驳。印刷术和印衣法并不相同，一种是为了代替书写文字，传播文化；另一种则是为了装饰美观，只有草木、花卉、鸡雀等，而且在有陀罗尼经的奈良时代，印衣之风早已废除，只是在大尝祭（新天皇登极后第一次在新谷登场时的尝新仪式，称为大尝祭）等特别崇尚古风的情况下才偶尔使用。

第二，在《日本现报善恶灵异》中有关大伴赤麻吕犯罪忏悔文的记载，大伴赤麻吕死后变为黑斑犊，其家人及同僚大发忏悔，希望消除罪障，就纪其颠末，"此事可报，季叶楷模"。于是有人将"楷模"二字拆开，认为模即为印模，就是印版，并由此推断天平胜宝二年（750）的大伴赤麻吕犯罪忏悔文就是印本，可见日本早有印刷品，770年的陀罗经当然更不为奇。这种观点相信迷信且不论及，仅结果也不免是望文生意，牵强附会，既无实物，又无旁证，不能做为科学的论断，中国不是也有因见"悉令雕撰"之语而推定中国印刷术始于隋代的错误见解吗？

第三，记载不明。仅从上文所引的两段文献记载来看，并无提到雕印之事，只在《东大寺要录》中提到"摺本"二字，这两个字在中文中"摺""折"相通，摺只有"折叠"和"折子"（如奏折）二意，并无印本之意，因此由它并不能推断出陀罗尼经就是印本来。

第四，时间混乱。《续日本纪》上记载的时间是神护景云四年，为公元770年，《东大寺要录》记载的时间是神护景云元年，为公元767年，后又记有天平宝字八年，为公元764年，言而不一。人物也混乱。在日本历史上，孝谦天皇从天平胜宝元年（749）开始统治全国，直到天平宝字二年（758）止，从这一年开始，淳仁天皇登基，继续使用天平宝字的年号。称德天皇在天平宝字八年（764）上台，第二年（765）改元为天平神户，过了一年又改元为神护景云（767）。因此，统治期相隔十六年的两位女皇不可能同时从事同一件事情，

陀罗尼经的印刷也不可能在相隔七年的两个时间里同时完成。

第五，经文本身并无具体的刊刻年代。我国发现的868年刻印的《金刚经》中明确记载有唐咸通九年的刊刻时间，对此，无论谁也不会产生疑问。而现存的几卷陀罗尼经原本，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不能说明它们本身所处的年代，因此，也不能断然决定它就一定是770年的东西。

第六，假定其为印本，那么印至一百万卷的数量，一定是件浩大的工程，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不是一、两个刻工就能担负得起的。大批刻工的存在，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不产生影响，甚至对印刷界没有丝毫触动，这是根本说不通的。任何历史事物的产生一定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是一条普通的道理，但是，在此后二、三百年中日本既无印刷的文献记载，也没有印刷的实物，成为一件孤立的事物，这不仅在情理上讲不过去，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物的发展规律。

第七，对经文本身的看法自相矛盾。对这四篇陀罗尼经，有人认为是木刻，有人认为是铜版，有人认为是活字，各据其理，众说纷纭。因其数量多达百万，而字形并未漫漶，木板柔脆，无法胜任，是版当为铜版。有人反驳说，若为铜版，文字点划波折不露锋芒，不象此经毕现剞劂痕迹，此经虽未漫漶，是因文同版异的缘故，同一经咒印迹又微有差别，所以应当是木版雕印。又有人认为各经不单文字有大小之差，略有倾斜，就是楷法书体也参差不一，应为活字。这种活字说也有人反对，因为如果是活字版，那么同一字的字形各版必然相同，但比较数种版本，却又字迹各异，而且日本活字印刷术从朝鲜输入的最早时间是十四世纪，因此这种说法亦有不足。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些经卷认识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又是由经卷本身情况的混乱造成的，各种说法不免都有与实际情况相似或相违的地方，使人不可信一。

第八，有人研究日本法隆寺所藏的各卷经文，认定其中三卷是

手写成的，其体裁纸质与被认为是印本的经卷没有什么不同，但审其楷法笔意，应当是出于奈良朝写经生之手，与天平写经的文字十分相肖。

以上几点，只是对过去的几种说法提出自己的怀疑，并无真凭实据（我国国内并无原经文），但对百万塔陀罗尼经是最早的印刷物这一观点实在不敢苟同。那么，日本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印刷术的呢？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奝然入宋求得印本大藏经的历史事实。

奝然入宋求书在《宋史·日本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件事，并本国职员今（当为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奝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品官也。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太宗召见奝然，存抚之甚厚，赐紫衣，馆于太平兴国寺。

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五十一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宋太宗子越王贞，新义者，记室参军伍希古等撰也。奝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二年，随台州宁海县商人郑仁德船归其国。……

奝然是日本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京都人，出身于藤原氏，原是个有相长身份的人，幼时入东大寺为僧，跟随住在该寺东南院的观理学习三论宗，还跟从石山寺的元杲学习密教，一直升到大法的位置。永观元年（983）八月带徒六人乘宋商陈仁爽、徐仁满的船入宋，在浙江台州上陆，参诣天台山，同年十月获准进京，进谒太宗，对答帝问，获赐紫衣，授法济大师，第二年巡礼京中大小寺院之后，三月到五台山，洛阳，龙门等佛家胜地朝拜游历。宽和二年（986）乘船回国后，988 年又遣弟子嘉周入宋谢礼。

奝然从宋朝带回国的物品有太宗所赐新译经二百八十六卷

(《宋史·日本传》遗漏了这件事，但日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则有记载)，著名的旃檀释迦像，十八罗汉画，其中最重要的是印本《大藏经》。

所谓大藏经，是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也叫一切经。内容分经、律、论三藏，包括天竺和中国的佛教著述在内。中国刻印全部《大藏经》是根据宋太祖的敕命雕印的著名的《开宝敕版大藏经》，也称开宝藏。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派高品、张从信到当时已成为雕版印刷中心的成都募工雕刻大藏经，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雕成，共5048卷，计有十三万板，约有4362万字。按宋代的雕版工效来说，以十二年的时间完成此项大规模的工程，至少需要招募技术熟练的刻工一百多名，加上印刷、装订，为数至少要在二百人以上。奝然入宋晋谒宋太宗，恰在开宝藏完成的太平兴国八年(983)；在此之前，中国并无刻印全部《大藏经》的先例；做为一名大国天子亲自召见一个外国的游历僧侣，甚至"抚之甚厚"，不能不被看作是件重要的事，由于这三点原因，可以肯定，太宗赐给奝然的印本大藏经，就是开宝藏。

第一次雕印全部的大藏经是佛教历史上首要的大事，也是印刷史上的壮举之一，由此影响到后代多次刊印大藏经，并对日本印刷事业起到了启迪和推进的作用。

宋版书是世人公认的珍本，从它刻工精良而大大地超过了前人与后人，日本人认为宋版书"校订严密、谬误极少、笔划不苟、纸质精良、用墨纯秀、印刷鲜明"，又由于开宝藏是根据皇帝敕命刊刻，又是在印刷基础相当雄厚的蜀中进行的，因此刻印的质量更高一筹，开宝藏一到日本，就成了众僧抄经的蓝本。石山寺、法隆寺、高山寺等的古抄本经典就有不少是从开宝藏中抄下来的。仅仅靠抄写并不能满足当时佛教盛行的社会需要，于是许多日本人便学着中国印本书的模样，开始刻印起各种经典来。当时在京都的贵族首当其冲，为了祈福、追荐等目的大量地印刷天台经典，从宽弘六

年(1009)到嘉应元年(1169)就印制各种经典六千多部。这样的刻经活动还在当时的南都奈良进行。从此开始,日本国家及各寺院、私人都开始了各种规模的刻经活动。在刻经越多,积德越重的思想影响下,善男信女们无不把刻经、传经作为信仰佛教的主要举动。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日本的雕版印刷也出现了各种版刻,它们和中国蜀刻、杭本、建本、婺州本、平水本的情况相似,各自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著名的有春日版、高野版、五山版、大内版、临川寺版等多种名目。名目虽多,胎模未脱中国刻风。尤其象五山版,几乎有一半是中国书籍,另一半则是日本人自己的撰述,前者多为照样翻刻,不差分毫,后者的版式也完全模仿中国刻本,很难区别,其刻工大概也有许多是流寓日本的华工,刻印字体秀丽,工技精良,这一最主要的特点使五山版在日本雕印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日本各种版刻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日本的书籍,繁荣了日本的文化,而且使日本雕版印刷事业逐渐走向高潮。

到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德川幕府奉行了一套奖励文学的政策,儒学、朱学、阳明学派、国学等纷纷复兴,刺激了日本的印刷业,于是大兴起官版、藩版来。将军五代冈吉、八代吉宗先后受幕府之托负责刻印的书籍称为官版,其内容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日本地方诸藩刻印的书籍称为藩版,大藩、小藩无不趋此风气,竞相刊印。其间,民间出版也逐渐发展起来。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末期活字重新盛行的时候。

中日在几百年的刻书交往中,还出现了板木及雕工来往于两国之间的现象。在镰仓时代(1186—1333)中叶以后,许多到日本去的宋朝僧侣在镰仓办起了新的刊印所,刻印了一些书籍。还有人趁赴宋之便,把日本书籍带到中国来刻板,然后将板木带回日本去印行,如《大觉禅师语录》的卷末就有"大宋国绍兴府南明孙源同

刻川石稿刊"的字样，日本学者一致认为此书为南宋刻本。但用纸却完全和五山版的相同，使用的是和纸，可见是将板木带回日本印行的。

在元代，许多为避战乱而从中国（主要是福建）移居到日本的优秀刻工，为日本南北朝出版的黄金时代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当时日本著名僧侣春屋妙葩刊行的《宗镜录》（一百卷二十五册）中几乎每张版心都刻有刻工的名字，数量多达三十人。如加上其他书的刊载，当时在日本的中国刻工可知的就有五十多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俞良甫和陈孟荣。

俞良甫是福建省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人，在日本从事刊印事业达二十五年之久，已知由他刻印的书籍就有十种，甚至"凭自己财物置板流行"（《传法正宗记》）。他刻的书在日本被称为博多板（也叫堺板）。

与俞良甫齐名的是陈孟荣，他是江南人，已知刻的书有四种。其中贞治六年（1367）刻印的临川寺版《禅林类聚》，是重刻的元版书，共二十卷，一千多页，它是仿中国版中的大型出版物之一。

这些亡命异域的中国人，牺牲自己的财物，辛勤劳瘁，从事刻版事业，用自己优秀的刻工技术，为发展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功绩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原载《四川省图书馆学报》1983 年第 3 期）

略论我国古代书册的形式美

何 禹 光

图书，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象征。它与具有思想内容美的同时，还有着文字形体、书册装潢及外观上的形式美。

据古书的记载和出土文物的佐证，我国的书册，在殷商时已有了。如《尚书·多士》载："唯殷先人，有典有册"。1976年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早期甲骨文中，也有"典"、"册"等字可证。在这些甲骨上还有供编连成册的钻孔。小屯乙编四五二八片更有"四册、册凡三"的刻辞。这些甲骨文，虽系占卜之辞，但它们既是当时的档案资料，也是至今留下的最早的汉文典籍。即使至今对于这些有文字的甲骨，尚未称其为如现代图书，但是追溯我国古代书册形式美，仍应以它们为其发端。

作为原始书册的甲骨文的形式美，首先，从其形、音、义组合而成的方块形体的汉文字结构而言，乑(未)有左右对称之美，⿱(东)有上下对称之美，⿰(北)有离心倾向的平衡之美，⿱(莫)有向心合力的平衡之美，⿱(壶)有上下平衡和谐之美，⿰(卯)有左右平衡和谐之美，而象一轴二轮，一舆一辕，一衡一轭之形的⿻(车)字，则又有上下左右中、横竖折撇捺等多样中的统一之美。仅就《甲骨文合编》所选收的共约五万片甲骨文字，均可从形体结构上获得如上的审美感受；其次，从甲骨文之精湛契刻而言，刻甲削骨，以刀作字，笔法之美，全赖刀法之精，甲骨文契刻之刀法，方折得体，圆转自如，细笔道，瘦劲挺拔，纤而不弱；粗笔道，浑厚雄壮，古朴而不笨拙。且章法随甲骨的形状、大小，忽而严正端庄，忽而错落疏朗，虽多变而有致；再次，就钻凿之布局而言，龟腹甲的钻凿，以甲之中缝为向心点。左右之首甲、腹甲和尾甲的钻向，彼此相向，形成对称、平衡之势，如系居于中心地位的中甲，其钻凿为偶数者，则大都一一相向，或两两相应，从总体上，形成对称、整齐、平衡、和谐与多样统一之格局美。在已发现的甲骨文原始书册中，约有单字四千五百个左右，可释者为一千数百字。每片甲骨上契刻的字数，少者几字，多者几十或百余字。不仅甲骨形状有自然之美，而其文字有如上述形象、契刻刀法和章法，以及钻凿格局方面如许的形式美。

我国古代图书之文字的制作方式，大抵由契刻而缮写，而雕版

以至活字印刷。下面就按此演进程序，来探索古代书册形式美的发展概况。

1.契刻书册之形式美：我国用契刻方式制作文字的原始书册，已如前述始于甲骨文，其形式之美，也已如前述。在我国古代早期的文字记载方面，尚有刻铸类似甲骨文的钟鼎彝器款识，通称金文。它也有供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的文献价值的内容美，以及铸刻文字的形式美。但是它是附着于原有固定用途的器物之上，并不如甲骨文具有原始书册形体的特征。所以，虽早在春秋时，晋国即有刑鼎之铸，也只能作为一种古文字记载，而不能以书册论之。因而，在甲骨文原始书册之后，论及以刀作字，具有图书文献之功用，并有书册形式之美者，当推石刻一道。

迄今所见石刻之最早者，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十块鼓形石刻。每块各刻歌颂秦国君王游猎情事的四言诗一首。其刻制目的，在于供人阅读。以其形体似鼓，因称为石鼓文，所刻字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籀文。自唐初发现后，历来对其文字之古奥，书法之精湛，以及石体造型之美观，均有很高评价。如韩愈曾作《石鼓歌》赞其文辞、字体、书法和石鼓文饰之精美。张怀瓘的《书断》，则专论其书法文字之美。苏轼的《石鼓歌》，也对石鼓文之书法和镌刻技艺等作了高度的赞美。此外，杜甫、韦应物、李冰阳、康有为等各代名家，都曾对石鼓文多有题咏。所以，石鼓文素有我国"书家第一法则"的美誉。

后来，进而以石作碑，刻制儒家经典者，以"熹平石经"开其端。它是东汉灵帝于熹平四年（175）所刻，刻制主旨，原为正儒家经典传抄之讹，所以立于洛阳鸿都门太学，以供读书人抄写、校对和拓印，便于阅读的。然而，它不是由经学大师挥毫而成，却是特命书法家蔡邕写样付刻。可见当时不仅重视书法艺术，而且是非常重视石刻书册的形式审美意义的。随后，魏正始间（240—248），刻有籀、篆、隶"三体石经"。唐文宗于开成二年（837）刻成楷书

"开成石经"。五代时，有蜀刻"广政石经"。北宋有篆、隶二体的"嘉祐石经"。南宋有"宋高宗御书石经"。还有现存于北京比较完整的清乾隆时刻，嘉庆八年（1803）磨改的"清石经"。凡此众多石刻经籍，都讲求其文字的形体美。如魏正始时，籀、篆已非其通行字体，而篆书也非北宋嘉祐时的常用写法。且楷书雕版印刷，宋时业已盛行。若当时仅从实用的功利观点出发，大可分别用当时通行字体勒石，既可省时，也能节用。然而，却用籀、篆、隶刻成所谓"三体石经"、"二体石经"者，除统治者好大喜功，炫耀所谓"文治"外，显然还有讲究形式美的意图与作用。如其他一体石经也都是出自名家手笔，甚至如南宋偏安一隅的赵构，也推出所谓"御书石经"。可知石刻书在勒石字体方面，是如何讲求书法之美了。

石刻的碑身造型和文饰之美，也大有艺术特色。如陕西西安碑林，建于宋元祐五年（1090），原为保存唐"开元石经"而建的，有包括"石经"在内的各种碑刻约一千数百块。其形制，有长方形的碑，有圆首形，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碣。其碑首，正如王芑孙在《碑版文广例》卷六所说："或刻螭、虎、雀以为饰，就刻其中为圭首。或无他饰，直为圭首。方锐圆椭，不一其制。"其额书，除隶、楷外，还有篆书的所谓"篆额"。碑座有龟座、几座等形式。这些造型、文饰之美，至今，仍为艺林所珍视。

由甲骨文到"石经"之勒多种字体，讲求刀法、书法之美，并注意石碑的造型和饰以文采，这就是契刻书册形式美发展的高峰。

2.缮写书册之形式美：简策与帛书是我国最早的正式图书，也是我国最早的缮写书册。简、牍由竹、木削制而成，是春秋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主要书写材料。若干简、牍用牛皮绳、麻绳或丝绳编连在一起，谓之策（策与册通）。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新疆塔里木河出土竹木简起，其后，甘肃居延、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山东临沂、甘肃武威、敦煌及其他地方，先后所得竹简、木牍，共约四万余枚，其文字均系毛笔墨书。虽缮写材料粗笨，但仍求形式之美

观。大都在简之形体上，力求刮削“杀青”之美；在文字书法上，力求笔力遒劲，章法整齐的书法艺术美；一策多简，则每简缮写字数相等，整齐一律，神韵连贯；并无论韦编、丝编，凡一策之编连绳迹，悉在同一水平线上。1930年，居延烽燧遗址发现的《汉永元兵物簿》是这样。1972年，武威出土的医简，其上、中、下端所留供编连的对应空格，也分别在同一水平线上。这说明当时在编连工艺方面的审美要求。

帛书，是用丝织缣帛等作缮写材料的另一种缮写书册，它与简策并行于春秋战国，以至汉代，且多为卷子形式。在文字书写上，亦如简策一样，更讲求书法之美，非常注意运笔、单字结构和章法的风神气韵。除此，尚有卷子本身的美化措施，帛上有织或画的界行，红色的称朱丝栏，黑色的称乌丝栏。卷端表糊有不同于卷帛颜色的丝织品一方，名之曰褾或首，既作保护书文不致磨损之用，也有美观的效果。在缮写用色方面，有朱、墨杂书，分别表示不同意义。如东汉末于吉的《太平青领书》，全卷白素，卷首为青褾，朱丝栏，墨写正文，红色缮写小标题。其悦目娱情，实可想见。惜其久佚。但这种美化式，却可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得其证。如帛书《老子》甲、乙本都是墨书正文，朱丝栏，除有上下边栏外，还有各种不同的符号，以表示重文、另起章节等。这些符号的大小，及其在上下文之间的居中地位，甚趋一致。可见，即使在如此细微处，也颇重视其美的形式。书法也极为精美，甲本近篆体，字的形体大小，参差有方，错落有致，结构圆转，舒展自如；乙本字体，隶兼楷意，点画均匀，曲折有势。两本字体虽异，但二者章法，均得气韵连贯之妙。诸本帛书，就其文史价值而言，自是国之珍宝；就古代书册而言，亦实为我国现存帛书的上乘至品。

随着纸被发明，纸写的书卷很快盛行起来。两汉时纸走过了从开始发明到能完全书写的全过程，于是，纸写卷子便伴随简策、

帛书而并行于世。后自东晋桓玄发布"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的号令，经南北朝至隋唐，便出现了纸墨写书的全盛时期。

初期的纸墨书册，是由帛书卷子发展而来的卷轴形式。在形式美方面，即在书法、界行、边栏等方面，保持着帛书的许多审美特点，但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尤以装潢之精美，为其特色。明代周嘉胄所著《装潢志》，即有"轴品"专论一条。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炀帝秘阁藏书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又《旧唐书·经籍志》说，唐玄宗集贤院御书，经部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当时的宰相，后封邺侯的李泌，其私人藏书的装潢也甚为讲究。他的经部书悬红牙签，史部书悬绿牙签，子部书悬青牙签，集部书悬白牙签，号称"邺架"。韩愈曾有诗咏其事："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当时卷轴的褾，不仅多用绫罗绢锦，注意褾色与卷纸颜色的协调，且重视形成各自的风格，如唐太宗尚紫罗褾。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喜用黄麻纸褾。而南朝梁又以青罗褾为贵。保护卷轴的帙，即书衣，则或以彩色布或绢缝制，或以细软竹丝编织而成。工艺之精，实为佳品。所以，宋代谢灵运所撰《书帙铭》有"亮为勤玩，无或暇逸"之句。此外，唐代朝廷藏书，还力求字体规范化。如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秘书省曾规定以颜师古的字体为写书的标准字体，称"颜氏字样"。后又有颜元孙的"干禄字样"，张参的"五经字样"。以朝廷的名义，再三规定标准字体，说明当时对于写本书法的审美要求，是何等重视。

在我国古籍中，有两部卷帙浩繁的写本书，虽出于活字印刷术业已盛行，书册形式已是册页装订之后，但就其书册形式美而言，却有其代表性。它们是明代的大类书《永乐大典》，清代的大丛书《四库全书》。现以《大典》为例，以见一斑。此书的编排体例，是以洪武正韵为纲，依韵排字，以字系事。为使纲目明晰，采用朱墨杂

书方式。凡正文与释文为墨书,释文所引书名为朱书，断句、圈声也用红色,与版面事先印就的红色界行、边栏、中缝文字和鱼尾等,相互映衬,使版面清新悦目,美观大方。扉页纸质细软如绵，以纸衬黄绫为封面,包背装。黄绢书签题“永乐大典”四字,下注卷次。书签四周印黑色双线,外围以蓝色绢镶边。右上角贴黄绢蓝边小方签,题某韵,次行低一格题隶属某韵的册次。书外套以黄色龙纹锦函,以白牙签封函,函上的书签和题韵部的小方签等，一如封面设计,全书富丽堂皇,实是令人叹为观止。此书有正副二部，正本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于八国联军侵华时惨遭焚掠，现存国内的副本,只为原书二万二千八百余卷中之七百稍多。璀璨国宝,仅剩凤毛麟角,殊堪痛惜!

3.雕版印刷书册之形式美，由于我国刀刻文字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经过甲骨文、金石文的正写阴刻,印章文字的反写阳刻(也有阴刻),又由于有用纸张拓印石刻文字的实践经验，终于在唐代将反刻阳文与拓印技术结合起来,而发明了用木雕版印刷图书,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最伟大的发明。也从此使我国古代书册的形式美,更加多姿多采。在继承缮写书册形式美的基础上,更有如下较为显著的创造:

(1)在刻印字体方面,著重名家手写付梓,并形成了各代风格。如宋刻本字体尚颜、柳、欧书。清人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称宋真宗时所刻《白氏六帖类聚》，“欧书极精”。明王世贞跋元赵孟頫所藏宋刻《前后汉书》时,甚赞其欧、柳笔法。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图版 39—42 释文说，宋咸淳廖氏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与《河东先生集》,“书法在褚、柳间,秀丽绝伦”。大抵北宋时刻书笔法,崇尚整齐峻厉,以古朴为美,南宋时雕版,字画圆活，以秀丽为佳。元人承袭南宋风气,时人又推崇赵孟頫书法,故刻书又以柔软秀丽为美,终成所谓“元字体”一格。后又演为依照手书楷体的“软体字”雕版风格,并持续到清代乾、嘉间而不衰。明季以仿刻北宋

端楷是尚，惜其渐流方板，终至肤廓，变为横轻竖重的所谓"宋体字"，却实失宋刻楷书风范。但仍有气息雅静，格局疏朗之美。

正因为自宋至清，重视刻版的书法艺术美，所以在此期间，不少名家的诗文集，是自写付刻的。如南宋岳珂在其《玉楮诗稿·后记》中说："此集既成，遣人誊录，写法甚恶俗不可观，欲发兴自为手书，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无事，遂以日书数纸。至望日，访友过海宁，携于舟中，日亦书数纸，迨归而毕，通计一百零七版。"岳珂为求其诗稿书法之美，在旅行舟中，尚手不停书，求美之心，堪称殷切。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也曾以其自称为"六分半书"的字体，手书其《板桥集》付刻，更是"波磔奇古形翩翩"（蒋士铨题郑所画兰诗句），美妙之至。

(2)讲求纸墨之精。明胡应麟在其《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中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东纸次之，顺昌纸又次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他以纸之坚白润厚为美。孙从添《藏书纪要·鉴别》以"墨气香淡，纸色苍润"为美。《天禄琳琅·后编》，元版集部说曾巩《元丰类稿》"麻纸浓墨，摹印精工，为元刻上乘"。这又以麻纸为佳，浓墨为美。周密《癸辛杂志》说："廖群玉九经本最佳，以抚州草钞纸、油烟墨印造。"周氏以抚州草钞纸为上，以油烟墨为美。总之，自宋以来，凡印刷图书，是很讲求纸墨之精的。

(3)讲求精美的多色套印。缣写书册盛行时所用的朱墨杂书方法，在雕版印刷图书时，演变为朱墨套印，现知最早的朱墨套印本，是元至元六年（1304），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著《金刚经注解》。该书卷首的"灵芝图"为朱墨套印，书中经文为朱印，注解为墨印。这种套印的求美方式，以明、清为盛，并由朱墨两色，发展为三色、四色，乃至五色、六色不等。如明万历时（1573—1619），凌稚隆刻《世说新语》用四色套印，正文用墨，刘辰翁评点印蓝色，王世贞评点印红色，刘应登评点印黄色。清道光

时（1821—1850），卢坤刻《杜工部集》，用墨印正文，评语分别用五色套印，明王世贞评用紫色，王慎中评用蓝色，清王士祯评用朱色，邵长蘅评用绿色，宋荦评用黄色，实是六色套印。展卷纵目，墨香纸润，色彩斑斓。

（4）扉画、插图，蔚然成风。现存印本书中，最早有附图者是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雕印的《金刚经》。自该书卷首撮取经文主旨，绘为"祇树给孤独园"扉画起，宋、元刻本渐多扉画、插图。至明代中叶形成专门艺术，并由宗教画发展到百科全书、文学、医书、博古等方面的图书，都绘有各种扉画或插图。如宋刻《尚书图》，书版分上下两截，下为文，上为图，图达七十七幅之多。宋刻《欧阳文忠公集·考异》中，有"九射格图"一幅，所绘熊、虎、鹿、雕、雉、猿、雁、兔、鱼，各个形象生动，神态逼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刻《纂图新增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书中凡农桑、医学、文艺、胜迹等五十三门，各有插图，真可谓繁花似锦，琳琅满目。读其文，审其图，于增长文化知识之余，复得艺术欣赏之乐。明万历时，顾曲斋刻《古杂剧》，收元人杂剧二十种，每种插图四幅，纸墨晶莹，图像古丽，诚为徽派名作。又如明刻套印本《董解元西厢》，附图十二幅，疏秀淡雅，隽永喜人。是又以另一风格取胜。清初刻本《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有明末画家陈洪绶绘制的插图六幅，精美绝伦。书有插图，虽起源很古，在《汉志》里即早有记载。但至明末清初，刻工与名画家合作为书插图，并用彩色套印，实为雕版印刷书册之形式美的一大创造。

（5）多式多样的边栏和牌记。边栏，在宋、元以前，原为线条式的单边或双边。双边即外边为粗线，内边为细线，称"文武边"。这较之单边，已有美化之意。但在明、清两代，出现了用各式各样花纹组成图案线的所谓"花边"。如明富春堂刻《锦袍记》、《白兔记》等，版框四周用卐字花纹组成边栏，称"卐字栏"。清刻《陶渊明集》的边栏，是以竹节花纹图案组成的，称"竹节栏"。《词坛雅政》的边

栏，则又是以各种古乐器花纹图案组成的，号称“博古栏”。又康熙年间刻的《红萼轩词牌》，更仿“酒牌”形式，每半页刻词一首，以某种花纹图案组成一种花边，全书花边的图案无一雷同。其求美之心，可谓良苦。

牌记，也称刊记、木记或图墨，原为记载刻书时间、地点和刻书人而作，一般为长方形，或纵式椭圆形。但为了美观，也有于长方形，或椭圆形上加以纹饰，或另用其他造型的。如蒙古海迷失后元年（1249），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除书中所记本草绘有精致插图外，其牌记造型也很雅致。书中牌记共有三式：卷首为长方形螭首龟座牌记，牌语为“泰和甲子下己酉晦明轩刻书”。目录后为琴形牌记，牌语是“平阳府张宅印”。另一牌记为古钟形，题“晦明轩记”牌语。在其他书中，类似这种牌记式样的，还有炉形等等。较为罕见的是，明弘治五年（1492），詹氏进德书堂刻《大广益会玉篇》的牌记。它的画面是一幅“孔子授徒图”，图中孔子盘膝而坐，一手托书，一手指书，双目视书，作讲授状。孔座前绘两弟子，头向孔子手中书，作凝神聆听状。孔座后，以山水画屏作远景，近景则以门帘、栏杆限之。这个牌记的牌语，是作为“授徒图”的题额与楹联处理的。即以“玉篇广韵指南”题额，以“三峰精舍弘治壬子夏之吉”与“詹氏进德书堂重刊”，分居左右作联。楹联四角还绘以蝠状文饰。整个牌记图文并茂，巧夺天工，堪称牌记中之甲观。

在雕版印刷盛行后，由于书册形式的演变，在形式美方面，尚有扉页、封面的纸质与颜色，书签的用料与书法，装订的索线与针眼，以及所谓“锦函牙签”等方面的审美要求，但限于篇幅，姑置勿论。

我国古代书册之形式美，主要表现在书册文字、装潢和插图、扉画三个方面的艺术美，是图书美学的一个课题。它所应研究的方面甚多，除本文所涉及的外，其余均未论及，而已涉及的，又极肤

浅，也难免有错误，仅以此作引玉之砖。

（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

版本学与图书馆

顾廷龙

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为科学研究者特别是图书馆工作者需要研究的两门科学，这是大家公认的。还有版本学和校雠学，也很重要，也需要大力开展研究工作。校雠学在过去有人写过《校雠学史》及《校雠学》等专书，成为一门专门科学是没有问题的，而版本学，虽则常有人称为“版本之学”，但只认为它是目录学的一部分。我以为自有图书以来，从时间说，年代久远而获得长期的流传，是一书必有许多本子相嬗递的；从空间说，传播广泛，无远弗届，国内一印再印，国外也有各种文字的翻译。因此，要了解哪个本子好和哪个本子差，这个本子从哪个本子派生而来，其中问题很多，事实上需要加以成立一门科学。

什么叫作版本之学？有人把它看得很狭，好像仅仅限于讲究宋元旧刻。讲究宋元旧刻，固然是版本之学的一项内容。但是在雕版以前的简策，缣素，一写再写，不也就是不同版本吗？现代铅印和影印的出版物，一版再版，不也又是不同版本吗？依我看来，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在九世纪以前，经过不断的传写，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经过不断的刻印，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本子。有了许多不同本子，就出现了文字、印刷、装帧等等各方面的许多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其规律，这就形成了版本之学。所以版本学的内容实在是相当丰富

的，如关于图书版本的发生和发展，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制版和印刷的技术，版本的鉴别，装订的演变以及研究版本学的历史等等，应该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

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勉学》一篇里记载了一则有关版本的故事：

“江南有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如此。”

此因读误本，造成笑柄，所谓“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可见选择版本的重要。清代学者卢文弨云：

“书所以贵旧本者，非谓其概无一讹也。近世本有经校雠者，颇贤于旧本，然专辄妄改者，亦复不少。即如九经小字本，吾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旧本之为可贵也。”

卢于宋本《白虎通》虽有误字而尚多佳胜，尝云：“一二误书，尚可循形与声而得其本字。若近世本则不加思索而径改矣。”这就说明了本子的优劣，非经校勘不可。段玉裁云：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是非之难。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

所称“底本”，又称“必先定底本之是非”，是谓究极根源，求得其祖本，以明其是非。近人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尽力搜集旧本以求校正今本，有很多新的发现。例如：《四部丛刊续编》中《愧郯录》各本都缺十叶，后得祁氏淡生堂钞本半部，其中就有此十叶，得以弥补了向来的缺憾。又如《史记》在宋刻黄善夫本未出以前当推殿本校印最好，但经张氏校勘下来发现殿本

误夺甚多。如《孝武本纪》:“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下，黄本索引正义，比殿本多出二百又三字。还有《汉书》，景祐本在《外戚传》上，一叶之中，颜师古注比殿本增出十二段四百十一字。其它各书也各得补正甚多。以上所说，都为版本学的作用。

版本之学，始于何时？观于商周彝器，秦诏莽量，往往有同文异范的，如《虢叔钟》，《史颂敦》之类，此可谓版本的权舆。直至西汉则扬雄、刘向用不同本子的书篇，大事校雠。当春秋战国之世，中国学术，是从“官守”变而为在“私门”，从“致用”变而为“明理”；在“尊旧闻”变而为“贵自发舒”。诸子百家，开展争鸣，学术昌明，撰著纷出。到了汉武帝时，罢斥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然可述。成帝河平三年(前 26)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刘向死后，子刘歆继续前业。校书需讲版本，才能比勘文字。刘氏所校各书，搜罗的本子，有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某书等等。《列子叙录》说：“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又说：“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在布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晏子叙录》说：“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又云：“中书以‘天’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刘向为校雠学之创始者，实亦为版本学之创始者。到了宋代，版本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岳珂校刊《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覆参订。这是校雠家之言版本的。藏书

家尤袤广搜众本，尝编《遂初堂书目》著录了不同版本，如成都石刻本、杭本、旧监本、京本、高丽本、江西本、川本、严州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旧杭本、旧本、川本小字、川本大字、旧杭本等，这是藏书家之言版本的。到了明末清初，藏书之风渐盛，研究版本之学亦大盛，毛晋、钱谦益、钱曾、何焯、季振宜等相继而起，并有撰述。乾嘉以还，考据之业，可谓鼎盛，于是研究版本之学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做研究工作的人，必研究版本；藏书家也必研究版本。卢文弨、钱大昕、段玉裁、阮元、顾千里等是为校雠而研究版本的，近人余嘉锡介绍他们的工作情况说："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它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它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制度，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之误，宋元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这是一派。鲍廷博、吴骞、陈鳣、黄丕烈等是为搜集版本而从事校雠的，所谓"识书之道，在广见博闻，所以多留重本"，又称"古书源委，必藉他书以证明之"。(黄丕烈语)这是又一派。还有邵懿辰、莫友芝等从事知见传本之研究，一目之下，详列众本，不仅版本源流，可以考见，而且版本的存佚，也可探索。这是又一派。自汉而宋而清，是版本学从创始到发达的三个时期。

解放以来，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在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示的用批判的态度清理我国文化遗产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绩。清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清理文化遗产，为了继承它和发展它。凡是整理出版的古籍，首先要调查各种版本，再进行校勘和注释。有人说，整理古籍要从校勘、训诂、辨伪直到分析、批判、解剖、总结形成一条战线，互相配合。打个比喻：校勘、训诂、辨伪是后勤工作，分析、批判、解剖、总结是前方工作。没有后者前者就没有目的，没有前者，即古籍未经初步整理，难以卒读，真伪莫辨，后者就没有"粮

章”。因此校勘、辨伪都很重要，实为先行者。也就是现在我们对于版本之学更为重视了。1957年新整理出版的《资治通鉴》是根据元胡三省的音注本，加以校点，并参考章钰的《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择要附注在正文之下，总结了过去各家的校勘工作。1956年郭沫若等编著的《管子集校》参考了现存的各种版本。郭沫若云：“余曾广泛收集各种版本，并四处调阅各种稿本。此种物质条件为前人所不能具备者，非居今日，殊不可得。”梁启雄等编著的《韩非子浅介》也经过各本详校的。根据王先慎的集解，但集解校得不够细，有新的错误，再访求了宋明各本和日本各本重校一次。影印方面，也必访找最好底本，再事检阅，印刷不清、或有残缺的，仿觅同样版本加以配补使成完整。如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根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其中有不清楚或破损之处借北京图书馆藏本补足，使成完本。又如缩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比原印本为善，原本《魏书》卷109乐志第十四阙第十二叶，现在据陈垣辑补的印入了；《宋史》卷360至385列传119至144，原用明成化本配的，现在其中的《岳飞列传》已觅得元刊本补入。总之，现在整理出版的古籍，既根据各种本子校勘过，或加些注释，各书前面都有一篇出版说明。说明很重要，这书的著者，内容，版本用新的观点来介绍，对读者很多启发，要比原来各个旧本都好。

不仅古籍有版本问题，新书，外文书同样也有版本问题。例如《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卷有1951年北京第一版，1952年7月第二版，上海曾三次印刷；第二卷1952年3月北京第一版，同年8月第二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三卷1953年2月北京第一版，1953年5月第二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四卷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在第二次重印时，由于《矛盾论》从第二卷移入第一卷，注释排版格式和页码都有所改变，因此曾作为第二版印行。第四卷出版，将不再印行第二版，但是为了照顾多数读者方便，第四卷的注释，排版格式和

页码衔接都按照第二版处理。此外有普及本，精装本。毛主席著作在各个革命时期所写的重要论文，每篇都有很多印本，内容虽少出入，而装帧版型的风格各有不同。从各地印本的众多，可看到尽管在白色恐怖之下，而广大人民是迫切要求学习的，影响之大是史无前例的。仅据上海图书馆所藏初步统计：《论持久战》就有16种本子，《论联合政府》有 56 种本子，一种本子又有若干版。抗战期间好些地区曾编印过《毛泽东选集》，1944 年中共晋察冀日报社出版过五卷本，1947 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过六卷本等等。又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41 年出版，1949 年三联书店沪地版，1949 年修订本第一编入民出版社北京第一版，1953 年北京第二版，1953 年上海重印一版，全面修订，几同重写。倘今天学习通史再用三联本，枉费精力了。又如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1936年上海商务珂罗版，所附《石鼓文》拓本影印甚精。1954 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时，作者加一弁言，叙述了获得拓本的经过，综述了考订的成果，为商务本所未有。又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有 1927 年商务初版，1935 年重排第一版本中有插图多幅，1955 年北京三联重印时，前面增印了戈宝权的前言，介绍作者生平和思想转变，但插图制版不便，均未印入。从上述几种书的版本看，某些早期印本，应作为文献保存的，有的需要同时参考的，如《石鼓文研究》及《中国报学史》等。如果不讲究版本，《中国通史简编》只看三联本而不看修订本，文章中引用起来，就会造成错误，如果讨论问题，更会造成无的放矢。

外文书也有版本问题，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文本第一卷 1867 年初版，1873 年第二版作了些修改，又在各处新加了注文，1883 年第三版，1890 年第四版。1872 年有法文译本，最切要的地方有所改订，1886 年有英文译本。德文本第二卷 1885 年第一版，1893 年第二版，把第一版误排的一些地方订正了，若干文体上疏忽的地方除去了，若干重复的短句删除了。德文本第三卷 1894 年

初版。这是外文方面有许多本子。中译本也有许多本子，像第一个中译本，为1930年陈启修所译，根据的考茨基的俄文译本，是歪曲马克思原著，在译文中，错误与歪曲很多。直到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合译成三卷本，1947年再版，1948—1949读者出版社出版了东北版，1950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上海第一版三卷。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第一版到1956年出了第七次印本。随后即另印了50面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文的一些更正)小册，译文改动之多，可想而知了。这些版本问题，实为读者不可不知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出版物不断改进和提高，新书版本问题很为重要，因此，文化部特在出版事业管理局之下成立了"版本图书馆"。看它编辑的《全国总书目》所收图书，包括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新书，改版书和一部分机关、团体、学校出版的图书。凡修订本、增订本、第几版、修订再版等情况，目录上都分别注明。这就说明了版本之学，已成了专门的科学了。

版本学与图书馆的关系最为集中，最为密切，因此，图书馆工作者特别应该加强研究。采购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就古籍说，某书历来传世者有多少版本，现在某本稀见，某本习见；某本校勘精善，某本粗疏，某本由某本出，辨其源流。例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书钞本十余种，刻本十余种，现在最通行的两本，一为商务印遗书本(商务尚有《万有文库》本)，一为中华印《四部备要》本。商务本出于刘氏嘉业堂刊遗书本，(刘刻印本亦有二：初印不足本32册，后有增刻本40册。)而刘本系出沈复粲藏钞本最足本；中华则出于湖南菁华阁本，《文史通义》之文字及篇目颇有出入，应以刘刻为善，是商务本胜于中华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刘公纯标点本《文史通义》根据刘本比旧刻本增内篇一卷补遗八篇，后附补遗续五篇，则较商务本为尤胜。掌握了这些复杂情况，采购起来就心中有数。保管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版本的情况来掌握不同的保管方法。如稀见本，加工本(批校，题

跋），伪装本，特装本等等，应该和一般的版本书有所区别的。书目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一书的若干不同版本，有系统地反映在书目中，特别在著录上把一书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并列一起，可以一望而知。如《鸣沙石室佚书》有珂罗版，有石印本。为了窥见真本面貌，从事校勘，须要珂罗版；若仅一般检阅，只要石印本。因此书目中须作简明的区别。阅览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提供不同的书刊。如以《资治通鉴》一书为例，对一般读者的索阅，我们应以新出的标点本示之；老年读者的索阅，因其目力较差，可以崇文书局覆胡克家刻本示之；从事校勘的读者，可以鄱阳胡克家覆元本示之；研究通鉴版本的读者，可以商务影印的百衲本示之，其中各种宋本都有，把不同的版本满足不同的对象，这样各得其所了。当然，几乎每一种书都有它的版本问题，决不是一个人可能完全了解的，但是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适当地钻研几个门类，那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中国讲版本之学，起源很早，逐步的发展，研究对象很明确，内容很丰富。过去藏书为私人所有，非有特殊交情看不到的，而且也看不到很多的，名流学者尚且如此，劳动人民和一般知识分子更无法见到了。以致这门学问难以开展。还有自命不凡的人往往鄙视版本，以为版本仅仅是讲宋元旧刻，几行几字，边阑尾口等等。讥讽地说，版本学就是那末一些罢了。现在放开眼界看看，是不是那末一些呢？我看郭沫若的话最为真切。只有在今天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在党和政府领导之下，才能更好地从事版本学的研究，与整理古籍和其它研究工作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服务。不要为版本而版本，是很必要的。我们应该在清代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这就有待于大家的努力了。

（原载《四川图书馆》1978年第1期）

论 版 本

张舜徽

何谓版本？何时开始讲究版本？

谈到版本，首先要弄清楚"版"是什么？"本"是什么？合称"版本"，是何含义？这便需要对我们祖先记事、钞书的工具和材料，有个初步了解。在人工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古代是用竹简、木牍来记事、钞书的。《论衡·量知篇》说过：

> 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

可知古代专以竹简写书，木版可兼用为奏牍。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曾就《春秋经传集解序》所云："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加以分析指出：

> 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

竹木简牍有出土实物可证的，最早是战国时期的遗物。但《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似乎在很早的时代，便已使用简策了。我国历史上从汉代以至于今，出土竹木简牍的事实，有记载可考的，不下数十次之多。其中有公元281年（西晋太康二年），汲郡古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古书。近年便有1959年9月在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的《仪礼》，和1972年11月在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医简。至于出土竹简古籍种数、字数之多，则以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所发现的为

最。其中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墨子》、《管子》、《晏子》等大量秦汉以前的古书。临沂银雀山汉墓的时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初年，距今已两千一百年。在两墓中发现的竹简，共四千九百多枚。每简字数多少不一，整简每枚多至四十余字。文字全部为隶书，字迹有的端正，也有的潦草，是用毛笔蘸墨书写的。我们从这里面，便可比较完整地看到古人用简牍写书的原始形式。

但是用竹简、木牍写书，所容字数，究竟有限。如果记载详细事物，钞写丰富篇章，古人便改用缣帛。早在《论语》，便有"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墨子》也有"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的话，可知周末记录文字的材料，已经是简牍和缣帛并用了。

古人用缣帛记事、钞书，写得很长以后，便要把它捲起来，才好保存。里面必安一木轴，以利收捲。捲字本只作"卷"，古音读与"衮"同（如"龙卷"即"龙衮"），今人称卷物为衮，即古代遗语。书的称卷，实原于此。那时一卷书，正和今日书画家所藏手卷的形式一样，古人就称书籍为卷轴。许多卷轴积存在书架上，轴头都是露在外面的。这轴头，便是所谓"本"。《说文》："木下曰本"。"本"的原义，和"根"相同。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说：

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

这话是对的。因根计数，起于卷轴。就卷子中的木轴而言，可以称根，也可称本。那末，"版"的名称原于简牍；"本"的名称，原于缣帛是确无疑义的了。后世因合二者而连称"版本"，为时也已很早。自从有了雕版印刷术以后，人们习惯于用版本二字作为印本的代称。有如叶梦得《石林燕语》云：

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误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葛祐之《齐民要术序》云：

此书乃天圣中崇文院版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

王明清《挥麈录》云：

蜀中始有版本。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

尹少稷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

朱熹《上蔡语录跋》云：

熹初到括苍，得吴任臣写本一篇，后得吴中版本一篇

像这一类的直称印本为版本，在两宋时已盛行了。他们所称版本，乃对写本而言，是专指雕版印成的书。和"版本"的原意虽不相符，但是约定俗成，也就相沿不改。并且由原来单纯的书本名称，一变而为学术界的专用名词了。于是出现了"版本学"的专门研究，成为校雠学的内容之一。

宋人刻书，也经常采用多种版本去校勘一书。《石林燕语》卷八所谓"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末题用十三本校"，便是一例。至于公私书目，著录群书，尚未标明什么版本。到南宋时，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才开始提到不同的版本。

重视版本和讲究版本的风气，开始于南宋，而大盛于清乾、嘉时。尤氏《遂初堂书目》中所登载的版本，一书多到许多种。例如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等名目。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沿革例》时，其家塾中所藏不同版本，竟有一书达到二十三种之多的。

到了明末清初，编造书目的，才着重提出宋版元版的名称。李鹏翀的《得月楼书目》，开始注明某书是宋版，某书是元版，某书是钞本。而季振宜的《沧苇书目》，钱曾的《述古堂书目》，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才列宋版、元版为专名。但他们还没有详载某书刻于何时何地，一叶多少行，一行多少字，以及字形大小，墨色浓淡和后来赏鉴家们之所为，有所不同。

清乾、嘉时，于敏中、彭元瑞等，先后奉命编撰《天禄琳琅书目》，将宋版、元版、明版、影宋本、钞本，各从其类地分别叙列。乃至

刻于何时何地，何人收藏，盖有何印，都一一记载，加以考证。这便成为官府藏书目录讲究版本的开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于是私人藏书之家，相率以宋刻元刊相矜尚。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论述当时藏书家的流别有云：

> 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得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乌程鲍处士廷博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贾是也。

这段话，却对当时藏书家的高下，作了一番评比。那些“第求精本，独嗜宋刻”的赏鉴家，和那些“宋椠元椠，见而即识”的掠贩家，没有什么不同。二者同样是把宋元刻本书当作古董来玩，看成奇货可居，距离为读书而求书、藏书的作法，也就太遥远了。我们今天对于那种把讲究版本当作古董来玩的习气，必给予严肃的批判。

雕版印书，当溯源于石经

雕版印刷术，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发明，对人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呢？从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隋朝（公元六世纪后期）发明说，二是唐朝（七一九世纪）发明说，三是五代（十世纪）发明说。五代发明说，早已为事实所推翻；隋朝发明说，也有人认为不可靠；一般学者考定我国发明印刷术的时期是在唐朝。从现存实物和文献记载，都可证明

在九世纪后期，我国已有了印刷术。

但是我始终认为如果要探讨雕版印书的开始，应溯源于石经。在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把几部重要的儒家经传刻在石版上作为统一的标准读本，是从公元 174 年，即东汉熹平三年的石经开始的。当时汉灵帝吩咐蔡邕等将经传写好上石，刻成后，竖立在洛阳太学(当时最高学府)门外，以便全国读书的人，都以这石版的文字作依据，来校正传钞本的讹误。《后汉书·蔡邕传》称当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说明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钞石经，或用捶拓的方法，揭取印本。络绎于途，拥挤不堪，在社会引起巨大影响。

此后，公元三世纪初、即魏明帝正始年间，在洛阳太学，又用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把儒家经传重刻了几种，每字都是用三种不同形体写成的，所以称为《三体石经》。公元九世纪中叶、即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在长安太学用楷书写刻了十二部儒家经传(《十三经》中无《孟子》)。这时，印刷术已发明了。不久以后，儒家经传便用雕刻木版的办法代替了雕刻石版，又比较轻而易举，刷印方便。所以唐以后还有几个朝代都刻了石经，但意义和作用，都赶不上熹平石经和三体石经的大。

从石版上捶拓文字，是印刷术的先驱。石版上所刻的字，是正面而凹入的。把纸铺在上面，打平，再用含墨的絮包捶打纸面，揭下来，便成一张黑地白字的纸上文字。后来，劳动人民把这种方法反转过来，加以改进。在木版上刻着凸出而反写的字，用墨刷在版上，再将纸铺在上面，用乾刷刷过，便成白地墨字的纸上读物了。所以印刷术是石版捶拓法的发展，今天我们谈雕版印书，必溯源于石经。把石经说成是最早的印刷品，也无不可。

历代如汉熹平、魏正始、后蜀广政、宋嘉祐，绍兴年间所刻石经，大半都已毁坏，可以看到的仅存少数残字了。保存到今天还有完整拓本可读的，只有全部《唐石经》。它是公元 833 年、即唐文宗

大和七年开始刻石，到公元837年、即开成二年，刻成十二经经文，通常称为“开成石经”。但从刊始的时间算起，也称为“大和石经”。

尽管《唐石经》完整无缺，但由于群经已有木刻本行世，历宋、元、明三个朝代，从没有人过问它。清初顾炎武，才开始拿它对照今本经文校读，然而收获不大，还招致了一些不必有的误解和谬说。一直到乾、嘉间，学者们才仔细依据这一套石刻本去审定经文。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唐石经校文叙》指出：

> 若汉、若魏、若唐、若孟蜀、若宋嘉祐、绍兴，各立石经。今仅嘉祐四石、绍兴八十七石皆残本，而唐大和石壁二百廿八石魏然独存，此天地间经本之最完最旧者。……取今本与石经对校，审知今本逊宋版本，宋版本逊石经，而石经又非善之善者。……然而后唐雕版，实依石经句度钞写。历宋、元、明转刻转误，而石经幸存。以之复古则不足，以正今误则有余。世间无古本，石经即古本矣。

严氏将石经的可贵，说的很清楚。他自己曾经仔细做过一番校读工作，写成《唐石经校文》十卷。发凡起例，至为详尽。但在他之前，钱大昕也写成《唐石经考异》，所下功力也不少。钱氏又曾抽举石经中最可依据的例子加以肯定。《十驾斋养新录》卷三“王女”条云：

> 《尔雅·释草》：“蒙、王女。”《注》：“蒙即唐也，女萝别名。”案女萝之大者谓之王女，犹王彗、王刍，鱼有王鲔、鸟有王雎也。今本讹王为玉，唯《唐石经》不误。

又“今本《尔雅》误字”条云：

> 《释草》：“盂、狼尾”。今本“盂”作“孟”。“泽”、乌薞”。今本“薞”作“蘾”。《释鸟》：“燕、白脰乌”。今本“乌”作“鸟”。“鸉、白鷢”。今本分杨鸟为二字。“鸢、乌丑，其飞也翔”。今本“乌”作“鸟”。《释兽》：“麠、大麃”。今本“麃”作“麅”。此皆转写之讹，唯《唐石经》字画分明可信。顾宁人《金石文字记》转据流俗本指为石刻之误，毋乃愦愦不分皂白乎？

《释木》："桑辦有葚、栀"。辦、俗字，当从《唐石经》作"辨"。由此可见，《唐石经》是校读经文最可依据的本子，也可说是经文最早的版本。但是它，并非完全没有缺点。《十驾斋养新录》卷三、"石经避讳改字"条云：

《唐石经·毛诗》："泄泄其羽"，"桑者泄泄兮"，"无然泄泄"，"是绁袢也"，"俾民忧泄"，避世旁。"甿、刺时也"，"甿之蚩蚩"，"甿六章"，避民旁。

又《石经俗体字》条云：

《唐石经》俗体字，如雝作雍（《诗》）；灋作瀍（《周礼》、《尔雅》）；毆作殴（《周礼》）；齎作賫（《仪礼》）；總作揔（《春秋传》）；督作督（《尔雅》）；横作撗（《尔雅》）。

奕洪之奕从大，博弈之弈从廾，两字音同义别。石经《左传》"赋《韩奕》之五章"，《尔雅》："奕洪诞戎"，皆误从廾。

这又指出了《唐石经》存在的不足之处。可知版本虽早，并不是白璧无瑕，字字都可宝贵的了。

雕版印书以前的古写本

在雕版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古人所读的书，都由手写；在人工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古人写书都用简牍和缣帛。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一批古代帛书，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字最多、比较完整的古写本书籍。其中《老子》一书，便有两种写本：一种写本的字体，介于篆、隶之间，根据书中不避汉高祖刘邦讳，钞写年代至晚在高祖时期；另一种写本的字体是隶书，根据书中避高祖刘邦讳，不避惠帝刘盈讳，钞写年代略晚，当在惠帝或吕后称制时期。人们为校对、整理方便起见，称前者为甲本，后者为乙本。这两种写本，距今都已两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老子》一书的最古本子。

依据这两种最古的《老子》写本，去校勘今本《老子》，便大有不

同。首先体现在编次方面，帛书甲、乙两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和今本《道经》为上卷、《德经》为下卷的编写次第完全不同。其次，在章段方面，今存的《老子》河上公本，王弼本，傅奕本等等，都分八十一章；帛书甲、乙本都没有分章。说明《老子》原书，本不分章；而后世分为若干章，大约出于注家所为。因分章而引起的错误，确也不少。有些上下文意应连在一起讲的，被割裂为两章；有些各自为义的，反被合为一章；这便导致注释的分歧和不必有的争辨。照原文不分章，自可避免这一类的问题。

就拿分了章的今本《老子》和帛书甲、乙本相对，第四十、四十一章次序颠倒；第八十、八十一章在六十七章之前；第二十四章在第二十二章之前。这是古代书籍，久经传写，以致错乱的现象。在传世的其他古书中，也常有这种情况，不独《老子》为然。

帛书《老子》甲、乙两本文字相同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也有许多歧异。可以断定当日传钞，各有依据，不是一个本子。至于今天通行本《老子》不同于甲、乙两本的地方很多，那就更不足怪。我曾依据帛书甲、乙两本和通行本互校，发现有下列几种情况：

第一、可据甲本以订乙本与通行本之误。

甲本"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二句，承上"必以其身后之"一语而发，辞意甚顺。乙本作"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与通行本同。则甲本乃原文，而乙本与通行本皆误倒。

第二、可据乙本与通行本以订甲本之误。

乙本"故失道而后德"，与通行本同。甲本作"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文句重赘，误衍"失道矣"三字。

第三、可据甲、乙本以订通行本之误。

甲、衍句　通行本"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句下，有"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句。帛书甲、乙本皆无，与《韩非子·解老篇》合。通行本"谷得一以盈"句下，有"万物得一以生"句，帛书甲、乙

本皆无，与敦煌戊本合。下文“万物无以生将恐灭”，帛书甲乙本亦无，与敦煌本合。（严遵《道德指归》亦无此十四字）。

乙、倒句　甲、乙本并作“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下接“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文意自然。通行本作“安其居，乐其俗”，误倒一语。

丙、误字　通行本“落落如石”，帛书乙本作“珞珞若石”，与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七“硌硌”下所引《老子》合，是原文本作“珞珞”。

以上所言，不过举列显明易见者一二事以示例而已。即此可知帛书甲、乙两本之为用甚大。但此两本虽出汉初人手，在钞写过程中，也不免遗留许多错误。综括起来，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在原字基础上，误增偏旁。例如：

以“浴”为“谷”。“谷得一以盈”、“上德若谷”等句，甲、乙本“谷”字，皆误加偏旁作“浴”。以下诸例皆同。

以“盅”为“盅”。“大盈若盅”。

以“𢐀”为“彌”。“其出也彌远”、“而民彌贫”等句。

以“宵”为“肖”。“故不肖”、“若肖”等句。

（二）误省原字偏旁。例如：

以“乃”为“扔”。“攘臂而扔之”，甲、乙本皆误省偏旁作“乃”。以下诸例皆同。

以“皮”为“彼”。“故去彼取此”。

以“胃”为“谓”。“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是谓袭常”、“是谓玄同”等句。

以“禺”为“隅”。“大方无隅”。

以“免”为“晚”。大器晚成”。

以“昔”为“措”。“虎无所措其蚤”。

以“寺”为“恃”。“为而不恃”。

以“堇”为“勤”。“终身不勤”。

以“央”为“殃”。“无遗身殃”。

以“方”为“妨”。“使人之行妨”。

象这一类的例子很多，这里也不能尽举。明明是由于钞书的人，贪省笔以轻其功，有时只用一个音符以代原字，无分古今，都有这一通病。只能说是一时的误省，有人定要说成是用借字，那就错了。并且古人在钞写过程中，有时因字体较长，写掉了下节的。例如：

以“靁”为“靈”。“神得一以靈”。

以“五”为“吾”。“吾是以知无为之益”。

也有写掉了上节的。例如：

以“规”为“窺”。“不窺于牖”。

以“时”为“爵”。“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

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仍然是由于仓促写书时造成的讹脱，同样不能有任何解释来回护古人。至于古人常用本字以代后起字，保存在帛书甲、乙本《老子》中的也还不少。例如：

以“冬”为“终”。“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终于无难”、“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等句。

以“鄉”为“饗”。“若饗于大牢”。

以“官”为“馆”。“虽有营馆”。

以“印”为“抑”。“高者抑之”。

这确是汉初人经常采用的本字，和前面所举误省偏旁的情况截然不同。我们自应区别处理这些问题，而不可混为一谈。

至于明显的讹体出现在帛书《老子》甲、乙本中的，如“贱”误为“浅”，“畏”误为“是”，“渊”误为“潚”，“全”误为“金”，“淡”误为“谈”，“精”误为“请”，都是由形近而致讹，和今本一对，便清楚了。可以肯定帛书《老子》甲、乙本，虽是两千多年前的写本，有些讹字，仍有赖于后世通行本去加订正。足以说明汉初写本未必尽是，今通行本未必全非。我们没有理由把古写本看成完美无缺，盲目地信从它。谈版本的人，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刻本书的源流

雕版印刷术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初期的这一新兴技术，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凡属人民大众迫切需要的书籍，就首先刊印流传。象唐代白居易所作诗歌，通俗易懂，“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那时社会各阶层，都喜欢读他的诗。公元824年、即长庆四年，元微之为白居易诗作序，便说有人拿白诗印本换取茶酒。又如日历，是人民大众的必需品。公元835年即唐文宗太和九年的前后，四川和江东民间，都曾“以版印历日”。唐文宗曾下诏“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可见民间刊行日历，早已相习成风。敦煌所出两种唐历——乾符四年和中和二年——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就是现存唐历的最古刻本。

雕版印刷术，也很早就为佛教徒们传播文字服务、有时刻些佛像，如观音和文殊菩萨之类。有时刻些篇幅比较简短的经疏，唐末文学家司空图的《一鸣集》里有一篇《为东都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文》，下注：“印本共八百纸”，便是一例。现存最古的刊本，如发现于敦煌的卷子本《金刚经》，用七张纸缀合而成。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距今已一千一百一十年。这卷中外驰名的唐刻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院。

九世纪末，黄巢起义后，中书舍人柳玭，随着唐僖宗逃到成都，在城东南书店里看到“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和“字书小学”，都是雕版印本，足见唐末蜀中雕版之盛。但那时雕刻的书籍，还不是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服务的，主要是供给人民大众参考的。人民需要诗歌、日历、佛经和小字、韵书一类的阅读物，不需要科场应试的经史。所以五代时宰相冯道目睹这种情况，很有感叹地说，“尝见吴蜀之人鬻印版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因建议当时政府雕印《九经》。统治阶级在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约四百年，

才开始大规模地雕印《九经》和其他经传，这便是后世盛称的五代监本。这一空前未有、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一直到公元953年即后周广顺三年，才全数刻成。

从十世纪到十四世纪包括宋、金、元三朝，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时中央、地方、私人、书坊，无不从事雕版印刷工作。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出品之精，都是空前的。在某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赶得上。雕版的中心地区，宋代除北宋首都汴梁外，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形成三个强有力的文化区域。金代雕版中心在平水、即今山西临汾一带。元代雕版中心，仍在杭州、建阳。

北宋国子监刻书的范围，除重刻五代监本《十二经》的经注本外，又遍刻九经单疏和《论语》、《孝经》、《尔雅》三经新疏。继又刻《十七史》、《文选》、《文苑英华》，以及重要子书、医书和算书。这些书籍，由国子监校勘后，多数均下杭州雕版。因为杭州在五代时，已是一个政治而兼经济的中心，好的刻字能手，都集中在这里。所以宋时监本，多在杭州开雕。当时和后来，称之为浙本。浙本字体方密，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这是过去讲究版本的人，一致肯定了的。

北宋时的监本书版，遭值靖康之变，全数被金人运走，这就是后来金监本的底本。其就地保存的少数史书雕版，如《史记》、两《汉书》的十行中字本，和《新唐书》十四行小字本，到宋高宗南渡重建国子监于首都杭州以后，才继续修补出版；同时又重刻经注和单疏。宋亡，这些书版，都转入西湖书院。元代余谦等曾大事修补，继续出版。1380年即明洪武八年，又移送南京国子监，重新修补。这些叠经修补有名无实的三朝版，直到1800年左右、即清代嘉庆年间，南京皋署失火，全部付之一炬。

南宋浙东西各地方政府和官吏，也都提倡刻书。如越州(绍兴)浙东茶盐司刻的《周易》、《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将

经、注、疏合在一起，给予读者以很大方便。又如明州（宁波）重修的北宋本《文选》，婺州（金华）坊刻的《南丰文粹》、白文《九经》等书，在当时都是被人重视的本子。

由于宋版书保存下来的不太多了，藏书家们为着保存和流传那些世所稀见的宋版古书，便用影钞的方法，将原书面貌留下来，而尤以明末汲古阁毛氏的影宋钞本为最有名。清代《天禄琳琅书目》，特别分立"影宋钞本"为一类，位于宋版之后，元版之前，体现了它的价值。

元代杭州刻书盛况，不下于宋。那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刻书，如《文献通考》、《元一统志》、《圣济总录》、《宋史》、《辽史》、《金史》之类，多半是大部书。乃至余杭南山普宁寺所刊《藏经》，都是由杭州刻版的。这就说明在十三四世纪的杭州，仍然是全国性的雕版中心地区。

福建建阳，由于造纸工业非常发达，这就构成了印刷事业的有利条件。十二世纪初叶后，书肆渐多，麻沙、崇化两坊和文人学士合作，刻书不少。如刘叔刚刻的《礼记》，合经、注、疏、释文在一起，代替了越州注疏本和《经典释文》。黄善夫刻的《史记》，合集解、索隐、正义为一书，代替了集解、索隐合刻本和正义单行本。同时又出版了许多便于科场应试和诗文獭祭的如《事文类聚》、《山堂考索》、《万卷菁华》、《翰墨全书》之类；话本小说如《三国志》、《五代史》、《宣和遗事》之类，以及医卜星相杂书，至为繁夥。但由于其地多产榕树，木质松软，邑人多用以雕版印书，既快又多，因之错误不少，在宋版书中为最劣。

五代蜀相毋昭裔，在成都叫人写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雕版行世。971年、即宋太祖开宝四年，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依照《开元释教录》的目次付刻，全书不下五千多卷。但从十一世纪初期，这个出版中心，逐渐向西南方眉山发展，出版量也很大。如绍兴年间在眉山所刻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

《魏书》，《北齐书》、《周书》等七史，就是历世最久的蜀大字本。

明代官刻的书，有内府刻本，由司礼监领其事。司礼监设有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汉经厂专刻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番经厂和道经厂，则分刻释、道二家之书；后人因称其所刻书为经厂本。此外各部院及南北国子监亦有刻本，而尤以南京国子监所刻为最多。又有各直省刻本，以苏州府所刻为最多，淮安府次之。各省中，惟福建有书坊，坊刻之书，四部皆备，出版量为最大。此书坊即指建阳麻沙、崇化两坊而言。坊贾射利，人人能刻，能印。印书多而不精，后人也不很爱惜。此处藩府刻本以及私刻、坊刻甚多，不可胜数。至于刊版地区，则以苏州、常州、金陵、杭州、建阳为中心。明代二百七十余年间所刻的书极多，由于多而不精，存在缺点不少，不能和宋元刻本媲美。不过明翻宋本，也多精善。嘉靖年间所刻的书，整峭有古意。所以近代讲版本的，多推重嘉靖本。时代愈久，旧刻本愈难保存，在今天宋元本既不可多得，明刻本也自然是可珍贵的了。

宋、金、元、明刻本的不可尽据

自有刻本以来，到现在千多年了。传世的刻本书籍，以宋本为最早而最珍贵。其次是元刻本，保存的量也不多。所以讲究版本的人，便把这些看成希世之宝。清代学者如卢文弨、顾千里、黄丕烈、严可均，都深知此中利弊得失。卢氏《抱经堂文集》卷十二、《书吴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后》指出：

> 书所以贵旧本者，非谓其概无一讹也。近世本有经校雠者，颇贤于旧本；然专辄妄改者，亦复不少。即如《九经》小字本，吾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旧本之为可贵也。

这便指出了印刷较早的书，错误要比较少些；即使其中不免有些错误，也比较容易发现。所以顾氏《思适斋集》卷九、《韩非子识误序》中说过：

宋椠之误，由乎未尝校改，故误之迹往往可寻也。

黄氏《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卷上、《武林旧事六卷跋》，也说：

校勘群籍，始知书旧一日，则其佳处犹在，不致为庸妄人删润，归于文从字顺，故旧刻为佳也。

严氏《铁桥漫稿》卷八、《书宋本后周书后》也说：

书贵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阅之爽心豁目也；即使烂坏不全，鲁鱼弥望，亦仍有绝佳处，略读始能知之。

这些议论，都是深知甘苦之言！非有几十年感性认识的过程，断不能自道其所以然。近人陈乃乾在《与胡朴安书》（载《国学汇编》第一集），有这样一段话：

尝谓古书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误。出于无心者，鲁变为鱼，亥变为豕，其误尚可寻绎。若出于通人臆改，则原本尽失。宋、元、明初诸刻，不能无误字。然藏书家争购之，非爱古董也；以其误字皆出于无心，或可寻绎而辨之，且为后世所刻之祖本也。校勘古书，当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古人真本，我不得而见之矣；而求其近于真者，则旧刻尚矣。

这段话，似乎把过去学者们珍重宋元旧本的原因，都总结出来了。但我们不等于完全盲从它、迷信它。因为宋代刻书，也不免有错字、有脱句，也有经当时刻书之人任意增损的地方。如果认为旧本书一无讹谬，那就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首先，我们必须明了宋代版本很复杂，有如杭世骏《道古堂集》卷十八、《欣托斋藏书记》所云：

今之挟书以求售者，动称宋刻。不知即宋亦有优有劣。有太学本，有漕司本。有临安陈解元书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刻则尤不可更仆以数。

这里所举列的版本，还只是宋本中的一部分。其中以麻沙本为最劣，而流布最广。由于刻印过多，讹文脱字，所在皆是。在宋代时，便有人十分鄙弃。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云：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

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

周辉《清波杂志》卷八,也说:

> 印版文字,讹舛为常。盖校书如扫尘,旋扫旋生。……若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这都是宋人的可靠实录。陆游更在《跋历代陵名》中深切地指斥道:

> 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

这又是何等痛恶之情! 宋本书所以存在许多舛误,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来源:一系刻书时所造成的讹谬;一系校书时所遗留的损害。清代学者,也都一一指出来了。顾千里《思适斋集》卷十、《重刻古今说海序》有云:

> 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倩庸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以炫價,而古书多失其真。

这样的后果,自然是应由刻书者负责的。其次如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重雕经典释文缘起》所说:

> 今之所贵于宋本者,谓经屡写则必不逮前时也。然书之失真,亦每由于宋人。宋人每好逞臆见而改旧文。如陆氏虽吴产,而其所汇辑前人之音,则不尽吴产也。乃毛居正著《六经正误》一书,讥陆氏偏于土音,因辄改他字以易之。后人信其说,遽以改本书矣。

这样的后果,自然是应由校书者负责的。由此可见,宋代的刻书者和校书者,替书籍带来的损失,确是不小。宋本如此,元刻可知。我们今天,没有理由把宋元旧刻看成一无讹误的本子。

从宋代以至明、清,刻本书不外三大类:一、官本;二、家塾本;三、坊间刻本。官本,是统治阶级监造的;家塾本是一般官僚、地主人家雕刻的;坊间刻本是市井书估印布的。特别是坊间刻本为着

射利，印的书很滥杂，不暇校勘，因而替书籍带来的损害，也十分严重。这在宋元时期既不能免，到明代更变本加厉。在刻书时，有意识地对古书进行改窜，引起极恶劣的后果。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改书"条下曾经指出：

>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谬种流传，至今未已。

顾氏生于明末，从小读书，便直接受到了当时坊刻本影响。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情不自禁地痛斥了一番。远在顾氏以前的明代学者，也都知道这种弊病。杨慎《丹铅续录》卷三"《世说》误字"条，便已说过：

> 古书转刻转谬，盖病于浅者妄改耳。如近日吴中刻《世说》，"右军清真"，谓清致而真率也。李太白用其语为诗："右军本清真"，是其证也。近乃妄改作"清贵"。"兼有诸人之差"，谓各得诸人之参差。近乃妄改作"美"。"声鸣转急"，改"鸣"作"气"。"文学"改作"学文"。皆大失古人语意。聊举一二，他不能尽。

这里所谈的，只是改易个别文字的实例。而明代刻书的最大错误，还在于改变古书的整个面貌。有如杭世骏《道古堂集》卷十八、《欣托斋藏书记》所指出的：

> 古集皆手定。人不一集，集不一名。《东坡七集》、《栾城四集》、《山谷内外集》，明人妄行改窜，第曰《东坡》、《栾城》、《山谷集》而已。《朱子集》，多至三百余卷，明人编定止四十卷。李纲《梁谿集》，多至百三十余卷，《建炎进退志》及《时政记》附焉，闽中改刻，题曰《李忠定集》，亦止四十卷。前后互易，古人之面目失矣。宋刻《两汉书》，板缩而行密，字画活脱，注有遗落可以补入，此真所谓宋字也。汪文盛犹得其遗意，元大德版，幅广而行疏。钟人杰、陈明卿辈稍缩小之，今人错呼为宋字，

拘板不灵，而纸墨之神气薄矣。甚至《说文》而傪人《五音韵谱》，《通典》而傪入宋人议论，《夷坚志》而傪入唐人事迹，与元书迥不相谋，明人之妄如此！

由此可见，古书卷数太多的，明人可以任意缩减；原来名目有别的、明人可以任意混淆；又可采用其他资料傪入本书；无异于将原书改编了一次。至于书中字句的窜易，更不足奇怪了。清代学者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校书说二》有云：

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秘笈》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

这又指出了明代所刻丛书的缺点。凡丛书中所收古书，都经过了当时无知妄人的任意增损割裂，有时甚至改头换面，把书名和作者，都毫无顾忌地变了样。正如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所指出的：

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先少保公（指叶梦得——引者）《岩下放言》，商维濬刻《稗海》本，改为郑景望《蒙斋笔谈》；郎奎金刻《释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属臆造，不知其意可居！

可知明代刻本存在的缺点，至为严重。经前人指出了的弊害，我们应该知道，才不致为其所误。如果只是看到明代距离今天，已经几百年了，偶然遇着那时刻印的书籍，便惊为奇货，甚至据以改正今本，那就错了。

精校本和精刊本的可贵

过去学者们一向强调读"善本"书。《汉书·河间献王传》云："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注："真、正也，留其正本"。这里所讲的"善书"，便是后世所称"善本"。西汉河间献王刘

德，"修学好古"，每从民间找到一部善本书后，便照样写好一副本给原主，自己把那原本留下来。这一事实，可说是读书强调"善本"的开端。到了宋代，学者们便明确提出"善本"的价值。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

朱弁《曲洧旧闻》卷四说：

宋次道（即宋敏求——引者）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

周辉《清波别志》卷中说：

国朝庆历年间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尔后于《总目》外，日益搜补校正，皆为善本。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说：

《元和姓纂》，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

他们所谈的"善本"，不约而同地包含了精校的主要内容。可知昔人所谓"善本"，是由精校而来的。清末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篇》"读书宜求善本"条云：

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

又云：

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

张氏这两段话，说的更为明白而具体了。而钱塘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编辑条例，列举了善本书的四个内容，并加说明道：

一曰旧刻。宋元遗刊，日远日鲜，幸传至今，固宜球图

视之。

二曰精本。朱氏一朝，自万历后，剞劂固属草率；然近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宋椠，正统，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遗帙，择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万历以后，间附数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始行入录。

三曰旧钞。前明姑苏丛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半系钞本。至国朝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钞宋元精本，笔墨精妙，远过明钞。寒家所藏，将及万卷，择其尤异，始著于编。

四曰旧校。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星衍之手者，尤校雠精审，朱墨烂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订误字，有功于后学不浅。

丁氏所言四类，实与张氏所称三义，足以互相补充发明，都强调了清代学者精校、精刊的作用。

清代学者针对着明人妄改古书的弊害，特别讲求精心勘对，纠正俗本的讹谬。举凡群经、诸史和周秦子书，都尽力遍找宋元旧椠，精校精刊。他们在这方面，投下了不少劳力，取得了很大成绩，替我们准备了阅读古书的有利条件，我们必须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好好地倚靠它和利用它。当公元 1875 年，即清末光绪元年，张之洞编《书目答问》时，在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国朝、即清朝，系张氏称当代之词——引者）即已说过：

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即前代经、史、子、集，苟其书流传自古，确有实用者，国朝必为表章疏释，精校精刊。凡诸先正未言及者，百年来无校刊精本者，皆其书有可议者也。

这段话，是比较符合于事实的。清代学者确实替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校本和精刊本，值得我们重视。其中以乾、嘉学者们做的工夫为最专最精。当时如顾千里、孙星衍、张敦仁、黄丕烈、胡克家、秦恩

复、吴鼒诸人，都是喜欢校书和刻书的知名之士，而尤以顾氏为最负盛名。当时诸藏书家校刊古书，都争迎顾氏为助。像孙星衍所刻宋本《说文》、《古文苑》、《唐律疏义》；张敦仁所刻抚州本《礼记》，严州单疏本《仪礼》、《盐铁论》；黄丕烈所刻《国语》、《国策》；胡克家所刻宋本《文选》，元本《通鉴》；秦恩复所刻扬子《法言》、《骆宾王集》、《吕衡州集》；吴鼒所刻《晏子》、《韩非子》；都是由顾氏参加校勘，替他们设计雕印的。每书刻毕，他又综合书中校订语，写成《考异》或《校勘记》，附刊于后，给予读者以极大方便，这成绩是不可湮没的。

在当时还有一些学者，终身忠于校书，并且将他们生平最得意的校本，汇刻在一起，供后人参考，这对学术界的贡献也很大。例如卢文弨所刻《抱经堂丛书》，除附刻了他自己的文集、笔记外，大部分是他一生所校订的古书。如《经典释文》、《孟子音义》、《仪礼注疏详校》、贾谊《新书》、《春秋繁露》、《荀子》、《白虎通》、《逸周书》、《方言》、《独断》、《西京杂记、《颜氏家训》等，都经过了他的精校，而后付诸精刊的。

清代精刊本，有许多是模仿宋元旧刻去雕造的。从来谈到刻古书，莫不以宋本为重，这不单独是因为时代久远的缘故。无论从行款、字迹、纸质、墨色各方面来看，一一精雅古朴，远非后世所及。或密行细字，或大书巨册，无不使人发生美感。北宋刻本，又精于南宋。经史诸子，北宋蜀刻校勘精审，南宋便多舛误，而福建的麻沙本尤甚。有些书版虽系宋刻，历经元明相承刷印，宋体刓敝已多，无由考见宋本真貌，所以宋本书以宋刻宋印者为最上。但保存到今天的，更为稀罕。

次于宋本的为金、元本。它们之间的区别，固有刊刻年月可知其先后，即就字迹而论，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元人统一以后的刊本，写刻多用赵子昂体。近世刻书，以横轻直重为宋体字，楷书精美的为元体字（俗讹为软体字）。实则宋体字由明人仿效宋季书棚本而

失其真，元体字也仅可用为赵书的代称。明初刻书，多近元人风格，到中叶渐趋方整，万历以后，盛行今之所谓宋体。

清人如顾千里之流，多见旧本，知其利弊，能够取其长而去其短，所以校刻群书，比较精善。我们今天能得到清人的精校本和精刊本，有时还胜过宋椠元刊。况且由于印刷术的日新月异，凡前人所不易得见的书，今天都可用影照的办法，广为流传。加以过去私家收藏的秘籍珍本，今天都集中到了各大图书馆，人人可以借阅参考。所以谈到读书讲究版本，没有比今天再方便的了。

本文写作于1957年。在《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上发表时题为《中国校雠学分论（上）——版本》。

《版本通论》选录

吴则虞

版本之名义及其研究对象

古籍皆称"版"，得名是从竹木而起，金石亦因之。《说文》训"版"为半木；《尔雅》《释器》："大版谓之业"。古书刻于木，"肄业"即是"肄版"，故《管子·宙合》："修业不息版"。与版同物而异名者，有"方"，《周礼·内史》："以方出之"；又有"牍"，《说文》："牍，书版也"，《论衡·量知》："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是"版"、"方"、"牍"，俱是木质之物。古时文字尤有著在竹片之上者，则有"牒"、"简"、"筴"、"册"、"札"之类。又有金石者，如《逸周书·大聚》："铭之金版"；《素问》："著之玉版"。盖对文异散文通，故版可赅竹木金石著录之称。自雕版以后，"版本"之版，仅指木椠而言，范畴有所不同矣。本者《说文》："木下曰本"，刘向《战国策叙录》

或曰"国策"，或曰"短长"。高诱注"一曰短长书，一曰国本"，是"本"、"策"互名之证。又《刘向别录》："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御览》六〇七引)是书籍称本之始。《晋书·傅祗传》"……以禅文草本非祗所撰，于是诏复光禄大夫"。此为纸素称本之证。雕版行，锓椠之木称"版"，摅印之文称"本"，对举以称，意义别矣。

"版本"，二字连称，始于《宋史·邢昺传》"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经版几何。昺曰国初才及四千，今十余万，……版本大备"。晁公武《郡斋读书记》"……而以长兴版本为便"，是其证。

"版本学"又名"版目学"，即版目之书，其研究对象为书籍之刊者，校者、售者，藏者，年代，版次，以及书之本身：纸墨行格，装订，题识，暨真伪，优劣，价值诸问题，颇相当于 Billiography（书志学）。盖："Biblio"为书，而"graphy"为志，其研究对象，亦为印刷之历史装订插绘等事，与目录家"辨章学术"校勘家"是正文字"，有所区别。

版本学之功用及与其他学术之关联

与校勘学之关联——章学诚《校雠通义》"校书宜广储副本……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本，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版本"为校勘家之"资粮"佐证，"校勘"是"版本"之用途，然必须通过校勘家明辨卓裁，版本之早晚真伪才可论定，同时必须取徵于古椠旧钞，校勘之结果才不至于"无徵不信"。《桥西杂记》："邢蕙西购书甚富，名澧与之言曰：彭文勤公（元瑞）常诋《读书敏求记》染骨董家气，我辈读书当用力于其大者。"后阅（钱梦庐天树）《曝书杂记》引郑康成《戒子书》："吾家旧贫，不为父母兄弟所容"。考元刻《后汉书·康成本传》无"不"字，与唐史承节所撰《郑公碑》合。今本殆传刻之讹，是校勘待资于版本者有如此。

与目录学之关联——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诸生好学者，

来问应读何书？以何本为善？"案"应读何书"目录事也；"何本为善"版本事也；读书不治目录，则不知要领，即知目录而不读精校精刻，亦事倍功半。雕版日兴，宋后目录，恒系以版本，其例创于尤袤《遂初堂书目》，后之著录且加品第与说明，同时又以书籍日多，目录所载，庸有阙遗，版本所传，殊可补缺。至版本湮灭，目录犹存，即目以求，或可获得，足见其关联之密切矣。

与历史学之关联——目录校勘，为史学之一部门，鉴古证今，在要取资于历史，可是也在有助于历史故实，反映经济文化各部门情况，譬如关于历代刻工书价之贵贱，反映着当时劳动报酬及社会经济情况；又关于刻书法令，禁书等问题，可以察知当时统治者之措置；书局书坊之兴废，可以反映着文化之消长；日本、朝鲜版本，可以看见当时文化传播情形，都是历史范畴之内者。

以二三事，足以说明版本学与其他学术之关联，也即是版本自身之功用，其他如鉴赏方面，对于艺术之关系；收藏方面，对于图书馆之关系；不言可喻矣。犹有言者，事虽微小，然实际上帮助却大者，即是购求书籍问题，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夫眼界宽，精神注者，即见多识精，如果茫无所知，典籍当前，卒难辨别，是够不上谈收藏考证矣。过去一般书贾，明于横通，工于心计，果能辨别版本异同，满口版本术语，若者为象鼻，若者是下脚，某书系何时何人所著，刻于何时，何人翻刻，何人钞录，何人校勘，何人收藏，何本最精。书贾遽听之下，不敢欺弄。此种鉴别能力，是有助于采购与收藏者矣。

版本学研究之方法

洪亮吉《北江诗话》中对清代藏书家做流派之别，后来叶德辉有所修订，我以为尤袤开收藏家之派，钱遵王《敏求记》开赏鉴家派，项子京《天籁阁书目》为骨董家派，向、歆为校雠家派，郑玄为考订家派。以上所说，是研究版本学之态度与目的问题，是由于各人

之目的与要求，与其他学术成就不同，因此而有不同之流派。平心论之，除却贸易获利行为而外，一概俱应同等看待。同时研究之方法，结合着实际情况，应该分别吸收各派之专长。至于一般研究方法，有下列二事：

历史之研究

即是某书为何代何地何人所著，刻于何时，何地，校者何人，何人翻刻，何时何版，何人收藏，必须眼力精熟，考究确切，再于各家收藏目录，历代书目，类书总目，读书志，经籍考，各史艺文经籍志，文苑传诗文集序跋，考查明白，俾明梗概，专书单篇，更易取资，如明梅鷟《南雍志经籍考》，毛晋《汲古阁校刊书目》；王国维《五代监本考》，《两宋监本考》，柳诒徵《南监史谈》，向达《唐代刊书考》，戴振辉《五代刻书与藏书》，张涤瞻《宋版编年解题》，张秀民《金源私本考》，罗振玉《宋元释藏刊本考》，长泽规矩也《元朝私刻本考》等，均可资参考。

实物之研究

辨行格：江标、刘肇隅《宋元本行格表》："书之尚异本也，自尤氏《遂初目》始也；书之记行字也，自何小山校宋本《汉书》始也；洎孙氏《平津馆》，黄氏《士礼居》诸目，而益备焉。"书自有刻本以后，各施意匠，别出心裁，此异本所由起，而行格字数所以不同也，然隐隐之中，似有定律可寻，宋元旧刻行数，自四行至二十行；字数自八字至二十七字；字之中又分大小及双单行之别。关于记载行格之书，除以上所举，近人缪荃孙《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可谓详密。

辨纸墨：陈应文《清秘藏》"粤稽造纸，始于蔡伦，有网纸，谷纸、麻纸、徒存其名而已，晋有子邑纸、侧理纸、茧纸；日本有松皮纸；大秦有蜜香纸；高丽有一蛮纸；扶桑国有籍皮纸；江南有竹纸、楮皮纸；黟县有凝霜；浙中有麦麸稻杆纸；吴有白拳纸；唐有短白帘，硬

黄纸，粉蜡纸，布纸，藤角纸，麻纸，桑皮纸，桑根纸，鸡林纸，苔纸；建中女儿青纸，卵纸；李后主有会府纸（长二丈，阔一丈，厚如缯帛数重）；陶谷家鄱阳白；南唐有澄心堂纸（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箔光润）；宋有张永自造纸，藤白纸，研光小本纸，蜡黄藏经笺，（有金粟山轮藏二种）白经笺，白玉版，匹纸，蚕纸；元有黄麻纸，铅山纸，常山纸，吴山纸，上虞纸，皆可传之百世；明有大内白笺，磁青纸，高丽纸，皮纸，新安土笺，后世必见珍者也"。至于昔人言造墨之妙者，皆推金章宗苏合油烟墨，及奚廷珪墨，廷珪本名廷邽，在南唐赐国姓，遂称李廷珪。王世贞《宋本文选跋》："此本纸用澄心堂，墨用奚氏"。今世墨以北京、安徽所产为最。缪艺风《制书雅意》："印用方氏徽墨，孙氏京墨，凡墨勿用"，此纸墨之大概。明高濂《燕闲清赏笺·论藏书》："宋人书纸坚刻软，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元刻纸松刻硬，用墨污浊，开卷了无臭味；宋本书以活衬纸为佳，而蚕茧纸，鹄白纸，藤纸固美，而存遗不广。"《藏书记要》："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墨气香淡，纸色香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又案王颂蔚《藏书纪事诗序》，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叶昌炽《滂喜斋藏书记》俱云，宋元印书，多用公私簿帐档案简帖，印于纸背，莫氏谓古人文移案牍，用纸皆精好，故可他用，至明人犹存此风（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刊明印之《礼部韵略》残册即如此）。麻沙版书，则多用"建阳扣"（《闽产异录》）其质不佳。宋人又有用椒纸者，但所见殊鲜。余后详。

辨讳字：宋刻讳上名，视缺笔之某字，即可以觇版刻之先后，如《四部丛刊》景印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北宋刊本《说文解字》"恒""贞"皆不缺笔，盖北宋时镂版，大徐第一刻也，《百衲本廿四史》中之《后汉书》"恒"字作"渊圣御名"，而"构"字作"今上御名"，知为高宗时刊本，余类推。

辨碑牌：《书林清话》："宋人刻书，在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围'，以其外墨阑环之也，

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又：“其近于官刻者有宋刊本《胡致堂先生读史管见》后有长木记四行，后之作伪者，或割首尾，或剜字迹，甚而有割去墨记，以冒宋刻者，如故宫所藏元天历戊辰岁寒堂重刻宋鄱阳郡斋本《范文正公集》即将苏轼序后割去墨记之半叶，而以无字之半叶接补。又有剜填数字，以乱真者，如故宫所藏元上虞泳泽书院修补垂山嘉氏覆宋本《大学章句序》后有题记一则，剜填嘉祐丙午等八字，以冒宋椠，故辨碑牌亦为鉴别之要务，张氏有《丁氏八千卷楼刊书碑牌汇录》可参阅”。

辨字体：宋人刻书，往往一人手写或自写付刊者，如岳珂《玉楮诗稿》杨次山《历代故事》是，故字体各有面目，其中以颜、柳、大小欧阳体为多，而以率更体为最适观，以其浓纤得中，南宋时字画方板，已开宋体风光。元以后赵孟頫之书盛行，刻书多仿其体，即赵氏《松雪斋集》，字仿赵体，书刻均佳（四部丛刊景印）。其时官本刻经史，私家刊诗文集，亦皆摹拟，蔚为风尚。明初尚沿其家法，即《匏庵家藏集》（吴宽）仍不失元人遗意，又如成化五年户雍刻《辽海编》，永乐十四年内府刻《历代名臣奏议》，书法殊秀雅。大概成化弘治以前，体尚朴茂，正德嘉靖之际，渐趋方整，隆庆万历而后，古意浸失，匠体风行矣。辨字体工拙，亦鉴定之要务，识者开卷即知。

辨装订：古时卷轴装订之法，为“旋风装”，故名为“旋风叶”，从卷轴变为墨本，其始为“蝴蝶装”，其法不用线订，但以糊粘背，夹以坚硬护面，以板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金元本亦如之。迨至明初犹用此装。包背装者，以页之边际为背，贯以绵纸捻，以书衣绕背包书，蝴蝶装皆包背，而包背装者不尽蝴蝶装也。册本者即今日通行线装书之装订法，惟明切书，刀口不齐，宋元亦然。毛装本者始于清殿本，新印书籍，下纸捻后，不用切裁，其用意有二：一如初印红本，所以表示新印者也；二毛装虽有污损，订裁后，尚不失为新订者也。1932～1935年间，北新书局所印新文艺书多

如此。闻系远师法国书籍款式，不切边，不裁中缝，更防一书刊行，被人疾览之后，不以钱买。余如书衣订线，包角种种均为装订范畴，鉴别时，均须一一留意，近人李耀南有《中国书籍装订考》，李文裿《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王重民《说装潢》，均可参考。

辨款式：分宋、元、明三朝来谈：一、宋版款式大抵以白口单边或细黑口为多，赵慎畛《榆巢杂识》："宋版书其上下界画只一线罨，无二线罨"，此宋版单边之说也；孙从添《藏书纪要》："元刻不用对勘、黑口，一见便知"，此宋刻白口之说也；今《涉园书影》中《周易正义》、《尚书正义》，胡文定《春秋传》、《纂图互注论语集解》等，皆白口单边可证。然间有阔黑口者，而白口或细黑口为多。二、元刻多黑口双边，如《故宫善本书影》中之《朱子成书》、《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亦有黑口双边者，如《佩韦斋文集》、《大元圣政典章新集》、《至治条例纲目》。元刻亦有白口者，如《玉海》、《宣和书谱》、《松雪斋文集》是。三、明版多白口，黑口为稀，然《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如《岑嘉州诗》，宋邵雍《伊川击壤集》，以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所收黑口本殊多，亦不过言其风气之大概而已。

辨印章：熟悉藏书家题识，书法外，又须辨识收藏家之印记。亦足以有助于辨版本真伪，自书影行，印记亦并影出，先此藏书志记印章者，当推《天禄琳琅书目》，可是未能影印印记原形，不过徒识其收藏家之经过而已。

总之：古本既以罕而珍，人情遂以伪而相乱。《藏书纪要》："若宋纸而非宋本宋跋，宋款而非宋纸，即系伪本，或字样，纸色，墨气，无一不真，而图章不足宋镌，印色不旧，割补凑成，新旧相错，终非善本"。足见实物研究为鉴别之主要条件也。作伪之风，自明已然，高濂《燕闲清赏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背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搥细细敲过，名之曰刷，以墨浸过臭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

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用沙石磨去一角，或用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纸熏黄，俨然古人伤残痕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锥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人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扎夥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患人，莫可观测。”（又《考槃遗事·论宋版》一则与此略同）。故研究版本学者，不可不究心于实物之研究，否则理论不能联系实际，无从识真伪，定优劣，故下章详细介绍版本名称以及装潢纸墨，若夫实物取资，目前仅有三种，一为书影，二为宋元残本及明本日本书籍若干种，三为四部丛刊之影印本，博涉广求，则俟异日焉。

（原载《四川图书馆》1979年第1期）

古书版本学的起源与演变

李 致 忠

中国古书版本名学，其来尚矣。然而既名版本学，其确切概念当然应该是起自雕板印书之后，故前人论及版本学，多称始自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的确，自宋代尤袤编制《遂初堂书目》起，始在一书之下著录多种不同的版本。原因是进入宋代以后，雕版印刷的书籍已蔚为大观，无论经、史、子、集，佛经、道藏，均有许多不同的雕印本行世。版本既多，本与本之间就会产生内容、卷数以及文字等方面的差异。读书人为了获得真知，就不能不考究版本的优劣，比勘各种版本之间的异同，以便判别是非，得出正确结论。为了适应读书人的这种需要，目录学家在编制目录时也就改进编目体例，调整著录内容，增添不同版本的著录项目。版本学就这样

慢慢地形成了。这是确切含义上的起源期的古书版本学概念。但是在实践上，古书版本学的这种内涵，远在雕版印书术出现以前，那时人们讲究传本的风气早已有之；而在雕板印书术大兴以后，研究版本的人也绝不仅仅就是研究各种印本，而是把稿本、写本、传抄本、批校题跋本等的研究也包容在内了。全面研究古书版本学的这种内涵与外延，才是中国古书版本学所应承担的全部任务。

《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给这句话作注，说"真，正也。留其正本"。其意是说，河间献王刘德是位很重视文化遗产的人，他从民间得到"善书"，就很好地抄写一部，送还给书主，而把原来的正本留下自己收藏。同时他还用金帛重价收买天下遗籍，因此"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故献王"得书多，与汉朝等"。这段记载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早在西汉景帝时的河间献王，就已经很注意旧本、传本了。按说，从民间得到"善书"，抄录一部留下自己珍藏，就内容而言本无不可。可是他却不这样做，偏偏要好好地抄录一部奉还原书主人，而把原来的正本留作自己珍藏，这无疑是考究传本的先例。"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以求善价，更进一步证明了河间献王刘德珍重旧本、传本的史实。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刘向受命整理国家藏书。在大规模开始整理之前，汉成帝曾接受奏请，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搜访遗书，从而使群书毕备，为刘向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先决条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这次整理有较细的分工，由刘向总其成。亦有清晰的工作步骤和层次。大体是备众本、校异同、删重复、订讹脱、谨编次和撰叙录等程序。显然，备众本成了这次整理工作的首要环节。因为众本不备，就无法校订异同；不校订异同，也就无法删其重复；重复不删，也就无法条其篇目；篇目不定，更无法撮其旨意；旨意撮不出来，叙录就无法撰写，最后也就无法录而奏之。

足见刘向也是十分重视书籍的各种传本的。

南北朝时的颜之推，在其《家训·书证篇》中，也曾在一书之下列举过众本，如“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旧本、江南书本”等。其意也是著录各种传本，区分各种传本，以便提供人们比勘各种传本的优劣异同。此亦为雕板印书出现以前人们就已经考究传本的实例。

唐初，经书混乱，李世民曾于贞观四年(630)下令：“经籍讹舛，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证。”(见宋孔平仲《谈苑》)这也是珍视旧日传本的实例。

进入宋代以后，雕板印书蔚然成风，一书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刻本、传本，人们对版本的考究也就更加突出，以便择优汰劣，获取真知。岳珂校刻《九经三传沿革例》，称以家塾所藏唐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蜀大字旧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婺州旧本……凡二十本，又越州旧本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这更是注重不同版本的先例。

从以上简单的几例，不难看出，早在雕板印书大兴之前，人们就是非常讲求传本的。其意义与后来的讲求版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亦不过是区分优劣，校订异同。不过那时的书籍还是靠手写传抄而流布，尚不是靠雕板印刷来流传，所以不好直接称为版本学。但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和后世确切概念的版本学，在内容上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因此，确切含义的版本学固然是起自大量的雕板印书之后，但就其内在的真义讲，则是早自西汉就已经起源了。

同样，雕板印书大兴以后，版本虽已名学，并且逐渐自立于学术之林，那么是不是说人们就只研究版本，而不顾及其他一切写本和传抄本了呢？也不是。即使是再往狭义一点讲，就以版本学中最核心的内容版本鉴定而论，也很难想象只是鉴定版本、印本，而绝不涉及写本或抄本。事实上，虽以版本名学，其内容却外延至对所有印本、稿本、写本、抄本、批校题跋本的识别与鉴定，甚至包括

对朝鲜、日本早期用汉字雕印、活字排印或手写传抄书籍的识别与鉴定。从这个意义上讲，雕板印书大兴之后，版本学的内涵也没有只是局限在对版印书籍的研究上，而是把各种方式生产出来的书籍，都包容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内了。

上面是就中国古书版本学的纵向发展讲的，如果要谈古书版本学的横向内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从属关系，则就更不只是个鉴定版本问题了，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早在版本学自立于学术之林以前，版本学（早期或称为传本学）应当是从属于校勘学的。西汉刘向受命整理国家藏书，首要环节虽然是备众本，但目的还是为了校异同、订讹脱、条篇目、撰叙录。将各书叙录集中而别行，这就是《别录》。待到刘向的儿子刘歆进一步将各书叙录析出，经过分类编排而单行成为一书，便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一部目录学专著——《七略》。而《七略》一出，从内容、体例、分类、著录等诸方面，均奠定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七略》凡录一书，必著其书名、篇什、学派、家数、传本等，这样，版（传）本学又从属于目录学了。所以说，版（传）本学最初是为校勘学服务的，而通过校勘，辨别出版（传）本的异同优劣，再通过目录著作表现出来的一种学问。因此，版本学自最初的意义上讲，便紧紧地和校勘学与目录学联系在一起了。故探讨什么是中国的古书版本学，决不该脱离它所脱胎的校勘学和借以表现自己的目录学。

长期以来，世人多言版本学，但有系统、有体例地论述版本学，始终是个难题。这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学人才子，也不是因为这门学问多么高深莫测，无法问津，而是由于这门学问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及特殊的运行规律。它于枯燥无味的校勘中，使书籍的优劣异同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而后通过撰写题跋，编制目录，再把人们对它的认识和品评表达出来，这一点是自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上的天然特点。由于它只表现工作过程，而无独立形态去表现自身的结果，表现出来的多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目录著作形态，故很不

容易为人所认识和琢磨。试看古今的版本大家，如晁公武、陈振孙、钱谦益、钱曾、毛晋、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陈鳣、顾广圻、鲍廷博、杨绍和、瞿绍基、叶德辉、傅增湘、张元济等等，他们的版本学功力，无一不是透过编制目录或撰写题跋识语表达出来的。这就是世人多言版本学，而版本学又长期没有独立形态的根本原因。

版本学靠校勘学获得对书籍版本异同、优劣，系统的认识，借目录学著作来实现自己的功用，其研究的内容自然也要受目录学的制约。中国的传统目录学著作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如果单从著录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目录学著作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簿录式的简单目录，一类是著录内容较为丰富的提要目录。简目的性质似是图书的登录账，姑置勿论。提要目录便于把图书项目著录得十分翔实，诸如书名的命意、卷数的分合、著者的生平爵里、写作的要义、编撰的体例、版刻的时地、版本的系统源流等等，都要一一加以揭示。提要目录学专著的这种著录编目体例，发端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而定型成熟于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陈以降，提要目录的著录内容、编制体例等，虽然也有不小的发展变化，但总的看来却未出晁、陈规制。提要目录于图书的这种揭示范围，也就基本决定了版本学的研究内容，也无非是从书名的命意、卷数的厘订、写作的要旨、编撰的体例、成书的经过；作者的行实、科第爵里；版刻的时地、版本的源流、名人的批校题跋、递藏关系等诸方面，加以揭示和著录。这就又和目录学融为一体了。所以后世常常有人把版本学又说成是版本目录学，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版本学也有自己的脊梁，其核心内容便是版本鉴定，此在宋朝已发其端。只不过那时前代流传下来的古刻旧刊较少，多为本朝印本行世，鉴定任务尚不突出。入明以后，特别是入清之后，宋、元都已成为历史，其时所流传下来的写本、印本书也成了古

籍而陌生了，故鉴定古书的版本，开始从目录学家那里向藏书家和书贾方向游离，并逐渐演变为貌似独立的技能。

中国历史上的明、清两代，藏书家极盛。盛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作学问的需要，特别是清代考据学大兴之后，为了搜集可靠的资料，学者们便尽可能收集众本异书，于是藏书家蜂起。二是社会风尚，公子王孙、王公大臣、封疆大吏、文人墨客，几乎都要收藏一点古刻旧刊、名人字画、古物碑帖，这样便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受这种风气影响，乃至于乡村豪绅、富商大贾，虽然只是粗通文墨，却也要收藏几本好书，几幅名人字画，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民国初年和北洋政府时期。目不识丁的军阀头子也要藏书刻书，经商致富的买卖人居然也插架宏富，四壁图书。这些藏书家，有的为了学问上的需要，不得不再学一手鉴定版本的技能；有的虽无甚学问可作，但为了附庸风雅和满足茶余饭后的欣赏，于版本鉴定也得说出个子午卯酉。久而久之，版本鉴定便逐渐独立出来，沿着藏书家的道路发展。

为了适应藏书家的学问需要或鉴赏需要，社会上便又生出一批书贾。这些书贾有的开张立铺，有的行箧为家。为了赚钱牟利，他们不惜频年奔走，南泛书船，北游厂肆，乃至走乡串户，苦索冥求。一旦得到宋刻元刊、古写旧抄，又不惜望门投送，以求善价。这些书贾，无论是买进或卖出，于古书版本非鉴定准确不可，否则就要吃亏上当，蒙受经济损失。这样，古书版本鉴定在书贾行当中也成了独立的东西，又沿着书商的道路发展。

这两条道路发展的结果，便生出了从印纸墨色、字体行款、版式风格、书口鱼尾、刻工讳字、藏印题跋等方面鉴定古书版本的新方法新途径。久而久之，又有人出来加以总结，象明代的高濂，清代的孙从添，民国时期的叶德辉、张元济、傅增湘等等，都讲过很精到的话。本世纪五十年代，北京中国书店更以《古籍版本知识》为名，将这些鉴定经验编写成书，油印行世。浙江省图书馆毛春翔先

生亦撰写专著，以《古书版本常谈》为名，付中华书局正式出版。随后不久，又有辽宁省图书馆陈国庆先生著书立说，名《古籍版本浅说》，亦付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到八十年代中期，原北京中国书店魏隐儒先生，又以《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为名著成专书，由印刷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至此，中国古书版本学，似乎是真的离开它的胚胎校勘学和借以表现它的目录学而独立成书成学了。

其实，版本鉴定并不是古书版本学的全部内容，且鉴定仅靠直观判断也还不行。直观判断只能说出个大概，绝难说得具体，更难依此做出科学的结论。因为直观判断更多地是靠人的眼力去捕捉书籍表面的特点，这就容易在两方面产生问题。一是眼力属于人的主观因素，凡属主观的东西就难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二是书籍浩如烟海，形形色色，一般说来虽有时代特色和同一时代的近似风格，但特例的情况也并不少。主观经验和特例相遇，就容易发生错误。所以把这些独立出来，做为版本学的自立体系传播是不够全面的。只有还版本学的本来面目，借用校勘来断出版本的优劣，理出版本的系统源流；再运用史实考出版刻时地、主刻之人及刻书缘起，再进一步理出不同版本间的篇卷分合、内容增损等，这才是版本鉴定承担的实质性任务。这些，岂是直观鉴定所能完成！

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大兴，过去的许多公私藏书，通过各种渠道向各种类型的图书馆集中。而各种类型图书馆的基本职能，就是通过各种目录的编制来揭示藏书、介绍藏书、吸引读者、指导读者。图书馆目录的编制，特别是关于其中普通古籍线装书目和古籍善本书目的编制，便又使古书版本学返朴归真了。即一部版本目录专著的问世，能把这部目录编制者的版本学知识、水平、功力等，全部表现出来。若是提要目录，就更能表达编制者的版本学造诣。从这种意义上讲，版本学虽则借助目录学著作来表现，并为目录学服务，但当一部版本目录编制出来时，版本学也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便是中国古书版本学的实质。

当然，版本学，或者说初期的传本学，从它由校勘学脱胎而出的时候起，也就不完全从属于校勘学。时代越往后，它的功能与独立性也愈明显，并反转过来，又使校勘学为它所利用。同样，虽然版（传）本学一开始就要借助目录学来完善自身的机制，并借助目录学著作来完成自我表现，但当目录一形成，也反转来又为版本学所利用。那么中国古书版本学到底是什么呢？时至今日，假定一定要描绘、概括中国古书版本学的具体内涵，似乎可以做如下的表述：中国古书版本学是以中国古代图书为对象，以版本鉴定为核心，以考订为主要方法，凭借多学科知识、借助校勘学、利用目录学完成全面揭示图书任务；并忠实地为中国古代社会各学科研究服务的辅助性科学。它的表现方式虽然迄今仍多以目录著作的形式出现，但撰写论文，编写专著，则更可从中寻求广阔的途径。至于利用不同版本之间文字上的变化差异，研究作者的思想倾向、时代色彩、政治变化等，则是古书版本学更进一步的任务，也是各方面学者共同的任务。而当着版本学真的进入到这一步，则天地不但广阔了，其价值也就发挥得更充分了。

古籍版本与版本学

郭松年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往往同一种书，经过长时间不断的传抄或翻刻，有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本子，在这些不同的本子之间，因为刻印书籍的时代，地区和主持刻书人的不同，校勘注释的深度不同，就不可避免地在书籍内容上出现一些变化和错误，如增删篇章、修订节抄、脱误字句甚至篡改内容等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出现了原刻、重刻、翻刻和初印、后印等情况，于是在印

刷质量方面也同样存在许多问题。这样就使得学者在整理古籍进行研究工作时，产生了足本与残本、善本与误本、精注精校本与普通本等等需要加以鉴别区分，否则学说的是非得失，就会失掉确切的依据，甚至使得学者见无所从，贻误后学。正如宋代学者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所说："自书籍刊镂者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南宋大诗人陆游在《跋历代陵名》中也说："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这说明南宋时学者对刻本谬误渐增不满和读书需要审慎选本的要求。人们正是为了比较同一种书、不同版本的差别优劣，从而使用了"版本"这个名词。

"版本"两字，最初是为了区别"写本"而使用的。"版"指雕版。凡用木板刻印的书籍，称雕板印书；"本"指藏本。凡官家私人所藏未经雕刻而流传的手写本书籍称藏本。因此，雕板印书和抄写本书籍，是版本研究的两大体系，但是都属于古籍版本研究的范围。

从版本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总校群书时，已经是广搜异本，雠正一书，讲求版本之学了。《北齐书·樊逊传》称："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史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然后杀青。今所雠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阁，即欲刊定，必籍众本。"说明当时校雠书籍必先集中不同的版本，从中选出优本，然后才能比勘字句和篇章异同，做好古籍的整理工作。所以说汉刘向不仅是校雠学的创始人，实际也是版本学的开创人。此后，如梁任昉，《梁书》称其："任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唐书》称韦述："聚书二万卷，皆有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宋史》称北宋王钦臣："手自

雠正，世称善本”。他们从校雠工作出发，在整理古籍时，都要广泛收集一书的不同版本，然后选定优本，再进行校雠整理。清代文学家陈鳣在《曝书杂记》中，就更加具体地说，南宋岳珂刊刻九经三传是：“以家塾所藏诸刻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其所撰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让异，皆罗列条目，详审精确”。当时他就是运用版本之学进行古籍的整理。南宋尤袤所撰《遂初堂书目》，则具体列出同一种书的许多不同版本，如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等。以后到明代毛晋撰《汲古阁书目》时，就更加明确注出宋本、元本、影宋、校宋本等。明代李鹗翀所撰《得月楼书目》又进一步注明宋版、元版和抄本的区别。到了清初钱曾所撰《读书敏求记》，就对每种书的版本优劣、版本源流和题记、特点等都一一加以注明了，如对《王右丞文集》一书，注为：“宋庆二年正月七日王缙搜求其兄诗笔十卷，随表奉进，此刻是麻沙宋版，集中送梓州李使君诗，并如牧翁所跋，作‘山中一半雨，树梢万重泉’，知此本之佳也”。而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于敏中、彭元瑞等编撰《天禄琳琅书目》时，更以年代版次分类，将宋版、元版、昉版、影宋版、抄本都各入其类，分别叙录，对刊刻的时代、地点、收藏家的姓名，甚至对所盖的印章等等也都详加考证。如对《唐书》一书，就注明：“本纪十卷，……书首载曾公亮进书表。考宋史仁宗嘉祐五年六月欧阳修等上新唐书，是书之末前载嘉祐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进书，衔名提举为曾公亮，刊修为欧阳修、宋祁，编修官为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后载是月二十六日准中书劄子奉旨下杭州镂板颁行。富弼、韩琦、曾公亮董其事，校勘官为裴煜、陈荐文，同校对官为吴申、钱藻。按宋叶梦得论天下印书有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语，意当时新唐书成，朝廷重其事，故特下杭州镂板。详阅此本，行

密字整，结构精严，且于仁宗以上讳及嫌名，缺笔甚谨，不及英宗以下，其即为嘉祐奉敕所刊之本无疑。印纸坚致莹洁，每叶有武侯之裔，篆文红印，在纸背者十之九似是造纸家印记，其姓为诸葛氏，考宣城诸葛笔最著，而唐书载宣城纸笔并入土贡，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称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则宣城诸葛氏亦或精于造纸也。泰兴季氏、崑山徐氏藏本，又有钱唐梁氏及李安诗梅谷树德堂诸印无考。"从此以后，各藏书家、目录学家、版本学家专讲版本的书目和专著相继而起，对宋元旧刊和名人手抄，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讨论，许多专著如王国维撰《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郑德懋辑《汲古阁刻板存亡考》，缪荃孙撰《平水板本考》，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余话》，叶长青撰《闽本考》，王重民撰《老子考》，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等等。其中有全面分析综合介绍板刻的发展变化，有系统考证一时一地的板刻源流，也有不少是从"求其祖本，明其是非"出发，研究一书板刻的差异优劣，从多方面进行板刻的研究鉴定而逐渐形成了古籍版本学。

古籍版本学是从古籍的版本源流，研究古籍版本的异同优劣，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并从中总结工作规律和方法的科学。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从古代到现代各种不同版本的书籍，而古籍版本学则着重在研究旧刻、旧抄古籍版本的源流和鉴定。古籍版本学的主要研究任务，一是继承总结发展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二是研究古籍版本发展变化的源流。三是研究不同刻本、校勘本内容的异同优劣。四是审定鉴别旧刻、旧抄古籍的版本和总结提高鉴定古籍版本的科学方法。五是研究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史。总结古籍版本学的发展规律，促进鉴别版本水平的发展提高，主要是通过这几方面的研究工作，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和运用版本源流的发展规律，总结鉴定古籍版本的科学方法并能确切地对一些在学术上有较大资料价值，印刷比较精湛优异的版本作出鉴定，以供学者利用版本鉴定成果进行深入研究工作。

在古籍版本鉴定的途径和方法上，前人长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如辨认字体、刀法；核对行格、讳字、刻工；分析纸张、墨色、印章，区分原版、补版、复刻、初印、后印、活版等等，都是无数版本学家和学者，长期以来在鉴定古籍版本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智慧结晶。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继承并充分运用这些经验，这对于扩大鉴定古籍版本的途径，丰富提高鉴定古籍版本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工作，而不能轻率地不加区别地一律称之为"玄"，加以排斥。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要综合利用并且检验这些经验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但是我们也绝不能把古籍版本学的内容仅限于此，而是要强调研究古籍版本学的学术性，要从学术发展源流，古籍内容的发展变化，更要借助古籍校勘和目录学的研究成果，研究古籍版本的发展规律以及科学鉴定的方法等等方面，加强古籍版本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不断提高水平，使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版本学、校勘学和目录学三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是在相互为用、相互促进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三门独立学科。

宋代以前，目录、版本是由校勘工作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是先有校勘学而后才有目录学和版本学的产生。因此，直到清代乾隆以前的一般学者还只认为目录之学、版本之学仅是校勘学的内容之一，有的甚至根本就不承认还有什么目录、版本之学的存在。如清代章学诚在《章氏遗书》中有："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而未尽其异，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辨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论，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但是古籍数量浩如烟海，版本品种何止万千，进行任何一项专题研究都不可能仅靠某一门学科知识孤立地进行。要做好古籍的校勘整理工作，非有目录学、版本学为之所用，是无法

达到"因学究书"或"因书究学"的目的。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刻印古籍大量增加，版本种类日益复杂，学科内容越分越细，专门以古籍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样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在研究古籍的途径和方法上都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科学体系，于是目录学、版本学就逐渐脱离校勘学，各有侧重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兴盛，学术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适应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绝不以哪一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从对校勘学、目录学和版本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来分析，它们有基本相同的一面，不过也有各所侧重的区别。但从它们的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来看，则是各具特点的。进行校勘主要是要求"比勘异同，注其错伪，是正文字"。而研究目录则是着重在"部次甲乙，条别异同，辨章学术"上。那么版本研究就着重在"考镜版本源流，鉴定版本优劣"上了。就是要经过精细的研究分析考证，理出一书的板本源流，确定一书板本学术价值，并要求证祖本，明其篇章字句差异，最后达到以优本取代次本的目的。同时，还要将一书的内容、卷帙编次、版式行款、刻工、讳字、前后序跋、直到文字异同，撰成题跋，供学者进一步参考利用。另外，从三者的关系来看，版本是进行校勘选定祖本的重要依据。校勘又是论定版本真伪优劣的重要途径。目录则是进行校勘和研究版本，即目以求的关键。这样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这三门学科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参考利用和相互促进发展的。它们之间虽然各有独立的研究体系，而应该是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因学究书和因书究学的作用，使之不断发展提高。

我们今天研究古籍的版本，首先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密切配合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不断发掘整理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为学者提供更多的在学术价值上比一般本子优异，较为接近原著的刻本，或精校精注本，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古代文献资料，更好

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积极努力地多做贡献。

二是保证对古籍整理编目工作、版本项著录的准确无误，进一步提高编目工作质量。

三是通过对版本源流的研究，为学者深入研究学科发展的历史，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为发扬我国固有的文化遗产做出成绩。

四是做好古籍版本的鉴定工作，使图书馆可以保证质量地进行古籍采购、保管和进一步开展参考服务工作。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年第4期）

版本学有广狭二义论

——从版本学的对象说起

邵胜定

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学者）都认为只限于书册形态的“版本”。钱基博《版本通义》说：“自镂版兴，于是兼言版本。”吴则虞《版本通论》认为，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一书记其不同刻本）出，“言版本者直视为先河矣。”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目》言：“记一书之行款形式，期于详尽靡遗，意在鉴古，此为版本之学。”论者还有很多，但众口一词。这说明在学人中，关于版本学的对象为版刻印本的观点是普遍和根深蒂固的，但这种观点，今天看来，似可商榷，盖其学虽名“版本”，但它的对象实应包括一切历史文献资料。以下从两个方面论证这个问题。

版本学的性质与任务决定它的研究对象非止版本。关于版本学的任务，已故王欣夫教授在《文献学要略》（未刊稿）中，有一个言简意赅的准确表述：“为了检择可靠的材料。”任何一种文献资料，（无论是书或非书）如不知其产生的时地，不了解其作者为谁，搞不清它的源流、衍变、真伪、优劣，那么，这种文献资料就是没有价值

的。考鉴文献资料，上述诸项内容，就是版本学的任务，历代版本需要考鉴，其它形式的文献资料也需要考鉴，其工作性质完全一样。我国传世的最早文献是殷代卜辞，通过卜辞可以研究殷代先公、先王和百臣的世系、王朝与方国的关系以及宗教、神祇、祭祀、战争、狩猎、畜牧、农业、历法、语言等诸多问题。但在此之前，学者们先要研究甲骨卜辞的钻、锯、凿和烧灼等不同加工制作特点，以推知这些甲骨文献的不同时代；又要花费很大精力辨析各组卜辞的贞卜人，知有宾、自、子、午等人制作契刻的各组甲骨文献（这等于考释出甲骨文献的作者）；还有的利用卜辞的字体和刀法，去推知其时代与卜人。所有这些研究工作，不仅性质而且在方法上亦同于学者的鉴别版刻印本；好象根据学籍的行款、版式、字体、刀法、刻工等内容在考鉴版本。对金石文献的研究也有这种工作要做，例如1965年以来，山西侯马发现大量玉质刻辞，如果不考鉴清楚这些玉质文辞的时代和使用之人，不知其为春秋时代晋国大夫（赵氏等）间盟誓之辞，那么，这些文献就没有利用价值。对近年出土竹书的研究，许多工作也属于版本学的范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大量简策兵书，对其中的《孙子兵法》，学者们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竹书的篇名与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基本一致，传本的十三篇在出土竹书中都有文字保存，《孙子兵法》的传本和早期竹书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这不就是版本学家在比较一书古今本的异同吗？又海外华裔学者郑良树有《论孙子的作成时代》一文（见中华书局版《竹简帛书论文集》）说："本文下半部，即希望通过这批竹简（指出土竹书《孙子兵法》等）的相互关系，作个综合性的研究，为孙子十三篇的作成时代提供一个比较正确性的答案。"他果然利用竹书得出"孙子十三篇应该是这43年间（指从公元前496年阖庐卒，下推至公元前453年《吴问》作成期间）完成的"的结论。帛书研究也有很多版本学的工作。《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有周采泉《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为秦楚间写本说》一文，就从避讳

情况，字形结构及虚词用法等方面，论证帛书《老子》甲本为“秦楚之际，流行于江汉之间传写本”，正是一篇典型的版本考鉴论文。郑良树又有《论帛书本战国策的分批和命名》一文。所谓“分批”，就是考鉴各批帛书的不同来历等背景材料，经他的鉴析，知道这批帛书不出一源（一人），成书也非一时（不同时代）。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一个“版本”。具体方法是从用字习惯上进行鉴别，凡借“梁”为“梁”，称“魏”为“梁”，借“乾”为“韩”，借“勺”为“赵”，借“功”为“攻”的帛书，自然同出一源，为同一“版本”；相反，属另一批的，不称“魏”为“梁”，“韩”不作“乾”，“赵”不作“勺”，“功”不代“攻”，自然就是另一“版本”。这同鉴别古书时根据书中多简体俗体字等情况，推知该书为元代刻本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这类工作还有很多．有的根据帛书的讳字断代：“抄写的年代正是处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汉字由篆向隶演化的过渡阶段……根据《老子》甲本不避刘邦讳，以及篆书字体的关于刑德的佚书中的干支纪年表，有‘今皇帝十一年乙巳’的记载等，可以考定同类字体的帛书，抄写年代约在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左右。而隶书字体的帛书，根据五星行度中的年表已列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推定，这类字体的帛书，抄写的年代约在汉文帝初年左右。”（见《文物》1974年第九期）这和版本学家利用讳字鉴别古书毫无二致。有的甚至也根据帛书的行格字体鉴别其产生时代：“帛书大部份用朱丝栏墨书，也有一部未划行格，字体为篆隶两种，有的书写十分工整，有的较潦草，看来不是一人一时的写本。”还有的根据帛书的书体笔意断代：“帛书文字基本上是隶书，但与东汉的八分隶书不同。笔画上已改篆的圆笔为隶的方折，结构上仍保留若干篆意，是处于篆向隶演化的过渡阶段。”（均见《文物》1974年第 9 期）就都是“正宗”的版本学研究。上海及别的一些图书馆古籍部门某些老同志，常忙着从事书札的考鉴工作。近代名人书札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它们有的字迹潦草，有的未明署收发信人姓名而只有别号代称，如不

考鉴明白，这些珍贵文献就形同废纸。这些老同志的工作对象当然不是书籍，但能说他们所从事者不是版本学术吗？从文献学术界的实践情况看，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也绝不能狭隘地局限于“版本”的

另一个根据是，从中国悠久的文献学术史事实看，凡有文献整理工作，其中必有文献考鉴（即版本学）的学术实践。笔者以为，我国大规模文献整理工作始于中国文化巨人孔丘，此后，孔安国、郑玄、刘向、刘歆、陆德明、颜师古等人都从事过文献典籍的整理工作，所以他们都有文献典籍考鉴（即版本学）的学术实践。（论证从略，如有机会将另文详述）这些学者的活动时代都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他们文献典籍考鉴工作的对象当然不会是“版本”了。

是否可以这样设想，版本学有广狭二义。广义版本学就是产生于文献典籍整理工作的文献考鉴之学，它是在文献典籍整理工作中形成的文献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是文献整理工作的一种手段，它与校勘、目录、辑佚、辨伪、文献编纂和注释等学科一起，组成文献学的科学体系。版本学和它的兄弟学科一样，研究对象是一切需要整理和利用的文献资料。如果不能科学地认识这个问题，（例如认为版本学的对象只是印刷术发明前的版本之类）那就不仅不符合客观存在的文献学史实和实践，而且有悖于文献学科学体系的规定性，当然也不利于版本学的发展。

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之后，书籍骤增，时代久远，版本繁富，书版考鉴工作日益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兼藏书家开始相对独立和专门地从事版本的考证和鉴别工作。这种情况始于宋，盛于明清。这时版本开始独立名学，出现专著，并在清代中晚期呈鼎盛状态。这就是狭义版本学。但即使在清代，在狭义版本学处于颠峰状态的情况下，它也决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整个文献科学联系在一起向前发展。清代版本学的昌盛是和汉学——即乾嘉诸子所从事并取得空前成就的朴学（它基本上就是文献科学）的繁荣分不

开的，版本学是它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许多版本学家——就是孙楷第先生认为只会“记一书之行款形式，期于详尽靡遗”的人们，其实他们大多是学术上造诣高深的专家，他们不仅能言版本，也熟谙金石、碑碣等其它领域的文献，许多人也精习校勘、训诂诸学，他们能在文献考鉴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凡有志于献身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事业的人们，都要放眼整个文献科学的广阔领域，面对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珍贵文献资料，博学多识，融会贯通，而决不可闭目塞聪囿于一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在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事业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上粗浅之见，希望得到指正。

（《图书馆杂志》1985年第4期）

古籍版本学的功用

刘 尚 恒

古人读书治学重视书籍版本由来已久，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专门有一节谈《读书宜求善本》。反之不讲版本的历史笑话，在史籍中屡见不鲜。例如大家熟知的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的考官据麻沙本《周易》，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之考题。以及陆深《俨山外集》里记载的庸医教人煎药下“锡”的故事。时至今日，类似这种读书不讲版本而造成的错误（乃至笑话）并未绝迹。

读书治学要讲究版本。版本学的功用至少可以反映以下几个方面：

一、版本学帮助人们区别真本、伪本，舍伪而取真。

我们读书也好，治学也好，所读的书，所查阅的资料，究竟是真

是伪，如果界限不清，甚但自误，反而贻误。当然这里所说的伪本，不同于后人假前人之名而杜撰出来的所谓前人著作，如《古今伪书考》、《伪书通考》等所列。那是伪书，此为伪本，指版本上的伪造，即甲著冒充乙著之类的张冠李戴现象，其著作内容不伪，而撰人非是，或撰人不伪，而著作内容非是。

苏轼之季子苏过（字叔党）所著《斜川集》一书，就有真本、伪本问题。真正的《斜川集》（据《直斋书录解题》和《文献通考》著录为十卷本），南宋已稀，至清时，康熙皇帝下诏求此书，竟也未得。于是从元末到清初，都曾有书贾们将谢迈（字幼槃）的《竹友集》和刘过（字改之）的《龙州集》改题苏过的《斜川集》欺世。王士祯曾说他于"乙酉（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有书贾来益都之颜神镇，携苏过叔党《斜川集》仅二册，价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见之"（《香祖笔记》卷十一）。如此昂贵的《斜川集》恐怕还是伪本，因为一直到清乾隆年间历城周永年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厘为六卷，嘉庆间法式善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事二卷，首先刊刻在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六集中（后《四部备要》、《丛书集成》中均收）。今人栾贵明又从《永乐大典》卷一万五百四十"启"字韵中辑出《代人贺启》一篇（载《四库辑本别集拾遗》一书。如果我们不懂真本、伪本，将谢迈《竹友集》或刘过《龙州集》改题的《斜川集》（清初活字本及众多伪《斜川集》抄本内容与《龙州集》同）当作真本，当作苏过的作品，这将弄出何等笑话?! 又如《粤雅堂丛书》本明叶盛的《菉竹堂书目》，系后人抄自《文渊阁书目》，完全是伪本，清末陆心源和今人王重民都明确指出过。如果拿它来研究叶氏的藏书，同样闹出笑话。

二、版本学帮助人们区别某书何本为全，何本为缺，舍缺而取全。

读书治学自然需要完整的材料，以获得全面的了解，从全面的了解和分析中得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读书分不清全本、

缺本，同样是件大为遗憾的事。例如清周亮工的《书影》有五卷本和十卷本之别，篇幅相差一半（《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同收两种本子）。唐代张祜的《张丞吉文集》，通行的只有一卷本、二卷本、五卷本、六卷本，而《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本为十卷本（《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十卷）。其中有一百七十多首诗为通行本所未见。

再如张说的《张说之文集》（或称《燕国公集》），《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为三十卷本，然宋刻本久佚不传，通行的多为二十五卷本，此外还有十卷本、八卷本、二卷本。其中二十五卷本有两种：一是《四部丛刊》中影印的明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椒郡伍氏龙池草堂刻本，附卷一至十汪小米校宋本，正伪之外，补诗九首。一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即《四库全书》本），则据伍刻本外，又参校本传、《文粹》、《文苑英华》诸书，得六十一篇，依类补入。此本百年来推为善本。而清末以后，三十卷本复出，其中又有三种：一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仁和朱氏结一庐据彭芸楣所藏明抄本二十卷、吴仲怿所藏后五卷，并采辑佚文，以意排比，分为五卷，题曰补遗，合之成三十卷之数。此书由缪荃孙校订（《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本、《嘉业堂丛书本》即此）。二是民国十三年（1924）傅增湘所见邢詹亭家藏影宋蜀刻本三十卷，其末五卷与朱本《补遗》目录大相迳庭，且宋本有而朱本无者二十三首，朱本有而宋本无者二十六首（今《宋蜀刻唐人集》本）。三是当代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捐献于北京图书馆的清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三十卷，末附补遗一卷，系从《全唐文》中辑出佚文三十四篇，较之朱本又多十篇，为今存世最足最精之本。

三、版本学帮助人们区别某书何本为精，何本为劣，舍劣而取精。

读书治学不但求真本、全本，还得求精本，即无脱文、无讹舛的本子，或者经前人精校精注的本子，这样使材料才能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否则花去不必要的时间，而辛苦得出的结论正确与

否，还是个悬案。例如关于宋金之间战和问题原始文书汇录的《大金吊伐录》一书，就有清张海鹏的《墨海金壶》本和钱熙祚的《守山阁丛书》本两种，二者精劣相去甚远。不但张氏本只有两卷，钱氏本为四卷，而且张氏本错简脱漏，几不可读。钱熙祚在该书的校勘记中指出：张氏本"上卷《正月十四日回奏宋主》中脱'所承誓旨'以下三百三十字；《宋主致谢书》别幅、细色并杂物下错简在《宋少主与左副元帅报和书》后；《宋少主新立誓书》脱去首尾，仅存'招纳叛亡'下四百三十九字，亦错简在《宋少主报和书》中，遂并《新立誓书》篇题脱去；《宋少主报和书》'两朝和好'下别为一篇题《又白劄子》。下卷《孙传等乞立赵氏第四状》'传等无往哀痛'下五十九字，移置第五状末，而第四状无结文；其《依准制造迎接等军事状》全篇脱去，其余字句脱误，不可枚举"（《守山阁丛书》本钱氏跋文）。

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一《史部·杂史类·大金吊伐录》提要称，该书世无刊本，仅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张氏《墨海金壶》本是据常熟吴氏的超然堂藏本校刻的，吴本不知所出；而钱氏《守山阁丛书》本则据《四库全书》文澜阁本校刻的，文澜阁本来源正是辑自《永乐大典》。类似这种情况说明，读书治学不懂版本只得走弯路。

四、版本学帮助人们了解某书的版本源流，溯流而探源。

我国流传下来的古籍，都是经过历代不断传抄、刊刻，而绵延至今的，并且越是重要著述，其传抄、刊刻次数就越多，以致出现版本上的祖本、底本、初刻本和翻刻本、重刻本之类情况，这样就形成某书的版本源流。一般地说，祖本、底本、初刻本属早期的本子，或著述人当时所为，或距著述人生活年代相对近些，因此文献的可靠性大些。后起的翻刻本、重刻本，在刊印过程中难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鱼鲁豕亥之类的错误，甚至改易卷第，删节内容，远不及初刻本。

清查为仁（字心谷，号莲坡，河北宛平人，居天津水西庄）的《莲

坡诗话》，作于乾隆六年(1741)二月，八年(1743)自刊于所撰《蔗塘未定稿外集》中，为三卷，除自序外，还有乾隆六年杭世骏序。迨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石门马俊良将其刻入所辑《龙威秘书三集》中，仍作三卷，但有删节处。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江沈楙悳将其刻入所辑《昭代丛书癸集》中，题作一卷。此外，三卷本还有民国十三年(1924)金钺辑刻的《屏庐丛书》本和《丛书集成》本(采自《龙威秘书》)。一卷本还有顾沅辑抄的《赐砚堂丛书未刻稿》本和民国十六年(1927)丁福保辑印的《清诗话》本。而流传最广的通行本，则是《清诗话》本，该书于1963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两次重印。然而《清诗话》本中的《莲坡诗话》删去杭序，于查自序也颇有删节，其中如“厘为三卷”一语就不存了，用以符合辑者“一卷本”之意。究其内容，则基本保存三卷本，即一至六二条为原著卷上，六三至一二六条为原著卷中，一二七至一八一条为原著卷下。其与原刻本不仅有语句、内容之删节(如一四条仅存原著的十分之一)，而且任意分并原条目(如一二三与一二四条、一六七与一六八条原著分别合为一则；八八条“客有夏日诗”与“又有祝寿诗”原著则分别为两则，且次第不同)，最为严重的是某些谬误，令人几不可读。如九六条，“(陈元龙)康熙癸丑秋，予告归里，过水西庄”，原刻本作“雍正癸丑”。按前者为康熙十二年(1673)，后者为雍正十一年(1733)，二者相差正是一个周甲子，而陈元龙生于顺治九年(1652)，康熙二十四年(1685)中一甲二名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十二年功名未就，何以“告归里”?水西庄始建于雍正元年(1723)，陈元龙所撰《水西庄记》末署为“雍正癸丑九月之朔，时年八十有二”。类似这种情况，只要溯流探源，便可迎刃而解。

当然，在我国古籍版本流传中，也有流胜于源的，主要是初刻时，或由于搜罗资料所限，或疏于校勘订正，或编刻者功力不及，仓促成书等造成的，而后之重刻本，克服上述疵漏，使之达到一个新

的高度。清侯方域的《壮悔堂集》，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和乾隆二十三年(1758)刻本，均为十卷，而同治间裔孙重刻本则附《诗集》六卷《遗稿》一卷。《文选李善注》六十卷，南北宋均有刻本，后之刻者更伙而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重刻南宋淳熙本，附《考异》十卷，系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所撰，此本为最精。至于《汉书》，历代刻本不知凡几，而今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中的《汉书》，却舍宋元旧刻而取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虚受堂所刻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本。类似这种情况，也仍需要我们溯流探源，从比较、鉴别中择善而从。

综上所述，版本学的功用归结到一点，就是让人们了解和掌握书籍的版本源流，审定真伪，辨别全缺精劣，刊误纠谬，以利读书治学和文物鉴别。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7年第一期，
收入本集时由作者作了修订。）

古籍版本浅说

宋效先

版本的区分，主要取决于出版时间、出版地、出版者以及出版方式等四个项目。换言之，即刻于何时、何地、何人负责、以何种方法成书。这四者如果考证得准确，则图书的不同版本也就完全可以区分得清楚。比如《史记》的版本有：宋庆元建安黄善夫刻本，明正德十二年廖铠陕西刻本，明嘉靖四年金台汪谅刻本，明嘉靖六年震泽王延喆刻本，明嘉靖十三年秦藩刻本等，从而把《史记》的五种版本区分得明白无误。其中的宋庆元、明嘉靖，就是反映出版时间的；建安、金台，指的是出版地点；黄善夫、秦藩，是表述出版者的；

至于刻本，是说明出版方式的。所以这四项是考证版本异同的基本项目，也是区分版本的主要依据。

区分版本的优劣，还不能表达出版本的特征。如版式宽窄，字体大小，纸张特色，装帧形式等。这些反映版本外部形式基本特征的名词也很多，例如巾箱本，两节板（版式）；大字本，小字本（字体）；竹纸本、白纸本（纸张），卷子本，线装本（装帧）等。

综上所述，尽管版本复杂，名目繁多，但若加以分析概括，不外是（一）出版时间；（二）出版地；（三）出版者；（四）出版方式；五）版本优劣；（六）版本特征等六个方面。

下面仅就这六个方面，做些分析例举。并对若干版本名词，稍加解释。

出版时间

出版时间由于确凿程度不同，呈现三种情况。

（一）某朝某代某年：此属根据可靠，时间具体者。如宋绍兴四年本，元大德元年本，明嘉靖十五年本，清康熙三十年本等。

（二）某朝某代：有一定根据，但不如前者确切。如南宋初年本，元至正间本，明初（黑口）本，清嘉庆道光间本等。

（三）某朝：依据虽不充分，但仍可推知断代的，如宋本，元本，明本，清本等。

出版地

（一）国内：古往今来，刻书事业遍及全国各地，刻书地点之多，不胜枚举。今仅举宋朝常见刻书地名，以见一斑。

1.浙本：杭州本，衢州本（衢县），明州本（宁波），婺州本（金华），严州本（建德），湖州本（吴兴），越州本（绍兴），温州本等。

2.闽本：福州本，泉州本，建安本（建阳），麻沙本（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的书称麻沙本，麻沙书坊与镇东北之崇化坊并

称"图书之府"，南宋最盛，刻书很多，销行全国，故麻沙本遂成建本之代名词)等。

3.蜀本：成都本，眉山本等。

4.其它：平水本(山西临汾金代刻书中心)，苏州本，徽州本(安徽歙县)，池州本(安徽贵池)，吉州本(江西吉安)等。

(二) 国外：朝鲜本，日本本，越南本等。

出版者

即主持刻书之单位或个人，也是出版责任者和版权所有者。历代出版者成千上万，但大体有下列三种类型。

(一)官刻本：指官府刻书。有中央、地方之分。

1.监本：历代国子监刻本之简称。明代又分南监和北监，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名。

2.兴文署本：元代中央刻书机构，负责刻印经史书籍。如兴文署本《资治通鉴》即是。

3.经厂本：明代内府司礼监所设的刻书机构名经厂，它所刻的书称经厂本。

4.殿本：清朝内府武英殿所刻的书，简称殿本。

以上是历代中央一级的刻书校著者。

5.公使库本：宋朝设在各地专门接待过路官员的机构称公使库。它所刻之书称公使库本。

6.茶盐司本：宋时各地掌管茶盐专卖机构，有经济实力，出书不少，名为茶盐司本。此外如漕司、计台、仓台、转运司、安抚司、提刑司等均有刻书记录。

7.各路儒学本：元代各路儒学曾合刻《十史》。据知有太平路，宁国路，池州路，信州路，瑞州路，建康路等儒学本。

8.藩府本：明朝分封皇家子孙去各地当藩王，他们刻书称藩府本。如蜀府、宁藩、唐府、吉府、晋府、益府、秦府、周藩、赵府、德藩

等，均刻书若干，时有佳本。

9.局本：清朝同、光年间在各省成立的官书局所刻之书称局本。如金陵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淮南书局，崇文书局等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便称五局本《二十四史》。

10.本衙本：常见古书内封面镌有“本衙藏版”字样者，多属地方各级官署所刻本。

以上是历代地方官刻本之例。

（二）家刻本：是指私人出资校刻的书。由于他们刻书是业余性质而不是谋利为生，因而家刻之书与书坊有很大不同。一般校对精审，刻印精良，质量较高。刻书者常以署名、室名、某宅、家塾、祠堂等名目出现。寺观刻本因与家刻本性质相近，故亦属之。

1.署名本：如宋陆子遹刻其父稿《渭南文集》，魏克愚刻其父魏了翁《仪礼要义》，周必大刻《文苑英华》，元丁思敬刻《元丰类稿》，茶陵陈仁子刻《六臣注文选》，明涂桢刻《盐铁论》，廖铠刻《史记》，清冯舒自刻《怀旧集》，李骥自刻《虬峰文集》等。

2.某宅本：如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周礼注》，平阳府张宅刻《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等。

3.家塾本：如宋廖莹中刻梓家塾的《韩、柳集》，析城郑氏家塾刻《三礼图集注》，元相台岳氏刻梓荆谿家塾的《九经》等。

4.室名本：如明苏献可通津草堂，袁褧嘉趣堂，沈与文野竹斋，汪廷讷环翠室，清张士俊泽存堂，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卢文弨抱经堂，孙星衍平津馆，阮元文选楼等。

5.祠堂本：历代宗谱多为祠堂刻本。如静远堂金宗祠石印的《昌安金氏家谱》。祠堂本有的署名宗祠、贤祠，更多的是用思敬堂、思孝堂、忠孝堂、慎远堂、报本堂、永锡堂等祠名。

6.寺观本：

（1）佛寺：如元至正大明禅寺刻《颂古集》，明万历晋安开元寺刻《改并五音类聚四声海篇》，民国间宝光寺经楼刻《贤首五教仪科

注》等。

（2）道观：民国间二仙庵刻《老君历世应化图说》。

（3）清真寺：清光绪七年京都清真寺刻《清真释疑补辑》。

（4）教堂：清咸丰二年上海慈母堂刻《圣教理证》。

（三）坊刻本：专以印售图书为业的书店。旧称书坊、书肆、书林、书堂、书铺等，他们所刻之书称坊刻本。坊本都有自己的铺名堂号和牌记，以广招徕。

1.杭州棚本：南宋临安陈起父子的陈宅书籍铺刊行的书，世称棚本。因开设在棚北大街，故名。

2.建阳名肆：如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元余志安勤有堂、明余文台双峰堂等均属建安余氏一脉，是历史悠久的建阳名肆。他如刘氏日新堂，郑氏宗文堂，叶氏广勤书堂，虞氏务本堂，刘氏翠岩精舍，明书林刘氏安正堂，书户刘洪慎独斋，杨氏归仁斋等均属建阳著名书坊，刻书多，销路广。

3.金陵坊本：金陵即南京。明代书坊林立，著名的有唐氏富春堂、世德堂，陈氏继志斋等，均以刻印戏曲小说为主，是为金陵坊本的一大特色。

4.金台书铺：如金台汪谅书铺，北京铁匠胡同叶铺等，均属明代北京著名书铺。

出版方式

出版方式亦称出版类别，即指成书方法而言。其方式不外印本和写本两个系统。

印本又可分为刻印本，活字印本，彩印本，石印本，影印本，拓印本，钤印本，油印本等。

（一）刻印本：简称刻本。指整版雕印之本。旧称椠、梓、锓、镂、雕、刊、剞劂等。

1.原刻本：一书的初次刻本，称原刻本。

2.翻刻本：凡据旧本影摹上版，行款字体悉依原式者，称翻刻本或复刻本。

3.重刻本：凡据旧本重新刻印，而字体行款与原本不尽相同的，名为重刻本。

4.影刻本：凡据原书照相雕版的，称影刻本。如黎庶昌影刻的《古逸丛书》即用此法。

5.重修本：凡因旧版漫漶残损，经后世修版再印的，称重修本。

6.递修本：一书的版片经过两次以上不同时期重修补版而印行的本子，称为递修本。

7.写刻本：经作者或请名书手书写上版所印之书，曰写刻本。由于写刻讲究故多为精刻本。

8.附刻本：附刻于某书之后，其著者又非一人者。如《雕菰楼集》附刻《密梅花馆集》一卷，《仰萧楼文集》附刻《儒学名儒记》一卷，皆属附刻本。

（二）活字印本：又名摆印或排印本。

1.泥活字本。

2.木活字本。

3.铜活字本。

4.锡活字本。

5.铅活字本。

6.聚珍本：即活字本。清乾隆帝为刻印《四库全书》中的善本，因命镌木单字二十五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用它排印的善本，即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三）彩印本。

1.朱印本。

2.蓝印本：一书初印时，有以蓝色试印若干部，以作为校样，之后再用墨印之。故蓝印每为初印本。

3.套印本：有朱墨印本，三色套印本，五色套印本等。明万历、

天启间，吴兴闵齐伋、凌濛初两家专印套版书，世称闵刻与凌刻。

4.饾版：是在套印基础上发展成为多色套印图画的方法。先根据画稿设色深浅浓淡、阴阳向背的不同，进行分色，刻成多块印版，然后依色调套印或叠印。明人因其堆砌拼凑，有如饾饤，故称饾版。明末胡正言刊印的《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是当时饾版印刷的代表作。今北京荣宝斋有所继承和发展。

（四）石印本：利用水油相距原理，以石作版，用脂肪性的转写墨直接把图文描绘在石面上，或通过转写纸印于石面。印刷时，先用水湿润版面，只有图文部分能附着油墨。用此法印成的书，称石印本。

（五）影印本：利用现代技术，如照相、静电、扫描、胶印等方法复制的书籍，称为影印本。

1.珂罗版印本：亦称玻璃版印本。其法将阴文底片与感光性质胶玻璃版密合晒印。感光处能吸收油墨，其余则吸收水性。用纸刷印，即得印样。

2.照相石印本。

3.金属版印本：如铜版、锌版等。

4.胶印本。

5.静电复印本。

6.扫描复印本。

7.晒蓝本。

（六）拓印本：金石文字采用棰拓方法印制成本的称拓印本。拓本有初拓、墨拓、朱拓之分。初拓又有“金拓乌”和“蝉翼拓”之别。

（七）钤印本：钤印即盖印。如印谱，其中如用若干印章逐个钤盖而成书的，即称钤印本。

（八）油印本。

以上八种属印本系统。下面是写本系统。

（一）稿本：凡著者手写稿曰手稿本。他人清写后经著者手自改定之本曰定稿本。他人清写者曰清稿本。

（二）写本：书法名家所写者以及唐卷子本等，习惯称写本，如唐写本。用金箔和胶水制成的金色颜料所书写的本子，称泥金写本。

（三）抄本：凡稿本、写本以外的传抄之本称抄本。抄本中有乌丝栏或朱丝栏者，称之为乌丝栏本或朱丝栏本。

（四）明蓝格抄本：明代抄本特点之一是蓝格者多，故名之。

（五）毛抄：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人称毛抄是抄本中的珍品。

（六）劳抄：清劳权、劳格兄弟所抄之本称劳抄。是清代抄本之白眉。

（七）批校题跋本：指在刻本或写本上带有批校或题跋者。

（八）过录本：把一个本子上的文字抄写在另一个本子上，称过录本。过录前人批校题跋者曰过录某某批校、题跋本。

版本优劣

（一）孤本：国内藏书，只此一部，不见各家收藏、著录者。

（二）珍本：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

（三）善本：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四）禁书本：明令禁止流通和收藏之书。如清高宗借修《四库全书》之机，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强命各省督抚，查抄所谓“违碍”统治的书，均令解京销毁。所以，被禁之书能流传下来的，自然值得珍惜。

（五）进呈本：民间向朝廷敬献之本。清修《四库全书》时，奉命进献的本子，称四库进呈本。

（六）底本：指著作的稿本，亦指抄本或刊印时所据之原本。清修《四库全书》时，经馆臣涂改校订之本，称四库底本。

（七）书帕本：明代官场中兴起的作为馈送当道而刻的一种本子名书帕本。其书率多讹误不精。

（八）初印本：一书初印，版面清晰，人以为贵。

（九）通行本：指坊间流行甚多，而刻印平常的本子。

（十）足本：一曰全本。

（十一）节本：对原书经删节后面印行的本子。旧小说中删去原书中神怪迷信、色情渲染部分，故有“洁本”之称。如洁本《水浒》四十八回本。

（十二）选本：因原本浩繁，选其精萃而成本者，曰选本。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

（十三）残本。

（十四）配本：因本残缺，用同种本的其他版本配成全本者曰配本。以抄写补残者曰抄配本。

（十五）百衲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形容用各种不同版本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的书本。如商务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十六）丛书本：专指丛书中之零种，称某某丛书本。

（十七）单行本：从丛书、全集中，或一书中能独立成篇的抽出付印别行的本子，称单行本。

（十八）三朝本：南宋官刻的各书书版，元时人西湖书院，明又转南京国子监，历经三朝，故称三朝本。

（十九）邋遢本：宋刊九行本《七史》，版经三朝，累次修补印刷，所以版印模糊不清，时称邋遢本。

（二十）赝本：书贾作伪假冒之本。采取挖改、染古、伪造等手法，以假充真。但赝本并不等于劣本。

以上所举二十种，不难看出版本的优劣。下面再举版本体例繁简的例子。

（一）白文本：指有注解的书省去注解，只印正文的本子。如

《十三经白文》、《白文史记》等。

（二）注本：对于一书，除正文外另加注释的，称为注本。一书注文，古代多用"夹注"，新印古籍多用"篇末注"或"脚注"。

（三）单疏本：对古注所做的解释叫"疏"或"正义"，只刻疏不带经注的本子，称单疏本。如《周易正义》、《尔雅疏》等。

（四）注疏本：经注疏合刻的本子称注疏本。如《十三经注疏》。

（五）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宋坊刻经子书有此体例。所谓纂图，即书有附图。如《老子》卷首有老氏圣记图，下附三图。互注：即互相引证，老子互注引庄子，反之亦是。重言：即凡遇有重复之词句，说明何章何节有此句。重意：即指出两书词句相类之处。

（六）附释音本。

（七）集注本：有时称集解本。

（八）校注本。

（九）批点本：亦曰评点本。

（十）三会本：即会校、会注、会评三者之合称。张友鹤辑印《聊斋志异》即属三会本。用十余种版本进行校勘曰会校，把清吕湛恩、何垠两家注加以汇集称会注，汇总王士祯、但明伦等十一家评曰会评。

（十一）增订本。

（十二）章回本：旧小说分回，如《红楼梦》有八十回、一百二十回本。《水浒》有七十一回、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等。回数不同，内容有异。

（十三）插图本：旧名"绣像"，"出相"，"全相"等。

版本特征

（一） 版式：

巾箱本、夹带本、袖珍本。二节版、三节版。白口本，黑口本。

九行本,十行本。

（二）字体：

大字本,小字本。软体字本(书写体),硬体字本(匠体)。篆字本,满文本,满汉合璧本等。

（三）纸张：

麻纸本,皮纸本,竹纸本,公文纸本,白棉纸本,开化纸本,太史连纸本,罗纹纸本,毛边纸本,连史纸本,机器纸本(有光纸)等。

（四）装帧：

卷子本,经折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等。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4期）

论版本和善本

崔富章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比埃及和西南亚更早一些。跟人类社会一样,图书也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字体、载体、制作方式屡经变迁。它是文明的伴生物,又不容分辩地受到文明的检验,一批又一批被无情的历史所淘汰,留存的只是少数。但是,人们仍然以"浩如渊海"来形容。正确地识别它们,确认其制作的时间,进而阐明书籍变迁的一般线索,乃是书史学家、版本学家们殚精竭虑、孜孜以求的目标。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版本问题阐述看法。

本、版本和版本学

"书籍由竹木而帛而纸,由简篇而卷而册,由手抄而刻版而活字,其经过不知其若干岁,缮校不知其几何人。有出于通儒者,有出于俗士者。于是有断烂而部不完,有删削而篇不完,有节抄而文

不完，有脱误而字不同，有增补而书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使不载明为何本，则著者与读者所见迥异。惟有载明其为何本，则虽所论不确，读者犹得据以考其致误之由，学者忠实之态度，固应如此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印本）“明载其为何本”，即注明版本的意思。

版本之学由来久矣。西汉中叶发生的经今古文之争，绵延2000年，固然有其政治、学术根源，但究其初始，未尝不与版本有关：两种写本系统，时间、字体不同，内容亦有纷歧。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相继主持整理国家藏书，雠校定本，撰写《叙录》。公元前14年，刘向在《列子书录》中说到有“中书”、“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参书”等《列子》传本，篇目有异同，文字有出入，实际上就是不同的版本，只不过当时还没有“版本”之名，但有称“本”者。

《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曰：“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曰雠。”又《文选·张景阳杂诗》李善注引《风俗通》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也。”又《太平御览》卷六百六亦引《风俗通》曰：“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辑《别录》佚文八篇，每篇记述校勘经过后云“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或“皆定杀，书可缮写”，其《孙卿书录》则称：“皆已定以杀青简，书可缮书”。由此可证，诸书所引东汉末年应劭《风俗通义》载述可信，即刘向校书，皆先书之竹简，取其易于改治，逮校雠既竟，遂为定本（杀青简），然后以缣帛缮写（上素）。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者，“持本”谓持校雠定本（简册），“读书”谓读缮写之卷（帛书）。“所谓本者，谓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称曰本。其后竹简既废，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

遂由竹移之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矣。镂板既兴，一书刻成，相率摹印，与杀青上素之义，尤相符合，故又有版本之称。”（余嘉锡《目录学发微》）《颜氏家训·书证篇》列举到许多本：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旧本、江南古本、江南书本等，大抵为写在纸上的书籍。从六朝到隋唐近七百年间，我国盛行纸写本书，概称为本。唐以后，出现了雕版印刷的书，称“版”、“版印”、“印本”、“印子”、“印纸”，逐渐约定俗成，称之为“版本”。这虽与杀青上素之义相符合，但它的实际意义是跟当时尚占优势的手写本相区别。应该说，雕版印刷的书本，方是“版本”一词的本义。文献记载颇多：

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卷十八：“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

朱熹（1130—1200《上蔡语录跋》：“熹初到括苍，得吴任臣写本一篇，后得吴中版本一篇。”

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卷八：“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版本”与“写本”（藏本）对举，其义自明。

南宋末期，廖群玉（莹中）世彩堂刊《九经》。当时居杭城癸辛街的周密撰《癸辛杂识》，写到“廖群玉诸书，《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较，百余人校正而后成。”廖氏撰《总例》一卷，说明校勘经过（原本已佚）。元初，荆溪（义兴，今称宜兴）岳氏增补改题《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其中说：“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本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绍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这个“二十三本”，多数是雕版印本（今北京图书馆藏原刊本四种）。耐人寻味的是，这

些名副其实的“版本”一概被简称为“本”(或旧本)，另外的制作形式才一一注明(如“石刻本”、“铜版本”等)。这一现象，决不是向“杀青”的回归，更不是与写本混同，而是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和普及，“版本”遍天下，传统的写本(藏本)日渐减少，已经失去了与“版本”并称的地位。“二十三本”的提法，蕴含着“版本”词义延伸的信息。南宋迄今700余年，“版本”含义逐步扩大，不仅包括了各种制版印刷形式(刻版、活版、石印、影印、油印、复印、胶印等)，而且包罗了各种传写形式(手稿、清稿、传抄、批校题跋等)，也囊括了各种载体的书籍(简册、帛书、纸书、胶片等)。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制作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本子统称版本。具体地说，指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载体、形式、年代、地点、出版者、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流传中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是为实用版本学。

我国杰出的版本学家顾起潜(廷龙)先生说：“什么叫做版本之学？有人把它看得很狭，好象仅仅限于讲究宋元旧刻。讲究宋元旧刻固然是版本学的一项内容。但是在雕版以前的简策、缣素一写再写，不也就是不同的版本吗？现代铅印和影印的出版物，一版再版，不也是不同版本吗？依我看来，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经过不断的刻印，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本子。有了许多不同的本子，就出现了文字、印刷、装帧等等各方面的许多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其规律，这就形成了版本之学。”(《版本学与图书馆》)半个世纪以前，顾老是对明代版刻作系统研究的第一人。现在，他贯通古今，上推帛书、简册，下及铅印、影印，开阔了版本研究者的视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说近代鼎鼎大名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訄书》，有近十个版本：1899年苏州木刻本50篇(梁启超题书

名)；1904年日本东京翔鸾社铅字排印本63篇(邹容题书名)，1905年翔鸾社再版本，1958年上海古典学出版社重排本，1975年北京排印大字本等。63篇本第2篇《订孔》，开头引用日本远腾隆吉《支那哲学史》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中国"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亡于孔氏"等语，1905、1958、1975年三次重排，"亡"字皆误为"在"字，文意遂大相径庭。70年代前期，有人抓住"咎在于孔氏"大作文章。70年代后期，又有位学者抓住"咎亡于孔氏"写论文，说是章太炎曾有中国"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咎在于孔氏"的名言，表现了他的进取精神；但是后来他改成"咎亡于孔氏"，自应以后来的版本为据，这正是章太炎倒退堕落的明证。真是瞎说一气！学者知道寻找版本依据，自是高出一筹，遗憾的是他对《訄书》的版本实无研究，只不过拉着黄牛当马骑，故尔闹出如上的笑话，足以跟宋朝那位"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的命题官相比美。事实告诫我们，跟古籍图书一样，近现代出版物的版本问题，亦不可掉以轻心。

我国丰富的文化典籍中，绝大多数为雕版印刷品，有人统计在七八万种，其实不止。研治中国学术，免不了要跟这些古书打交道，那就必须确认它的版本，这正是传统版本学研究的重点。浩如渊海的古籍图书，版本情况错综复杂，如何辨别，目前主要还是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捕捉、识别、研究各种各样的标记，据以作出判断。具体说来，标记有两类，其一是书籍制作时的原标记，其二是流传过程中附加的标记。

先说书籍制作过程中形成的标记：

(一)牌记。刻本书多在叙目后或卷尾书末刊刻牌记(书牌子)，也叫墨围，记刻书者籍贯、姓氏、堂名、刻书年月等。图案不拘一格，或作悬挂木牌式，或鼎式，或钟式，或长方形黑框，或无框，或双行，或三行以上，皆游离于正文之外，独处一隅，不难寻觅。

(二)封面(内封面，多称扉页)。明清两代有些书刻有封面，一般三行，中间大字书名，右题著者名，左署出版者(或藏版处)，栏上

横题刻版年月。

（三）序跋。刻书序跋说好话的多，但写到刊刻经过，如何时开工，何时完成，出钱的是谁，督工者何人等，这些是可信的。

（四）刻工。书籍制作，刻字工人的劳动至关重要，他们的名姓常常刻在版心下端。有人统计，宋代可考的刻工达 3000 以上。刻工有地区性，其流动带有群体性。一名刻工的有效刻书时间一般不超过 50 年。由此着眼，辅以横向联系，可以判断许多刻本的年代和地点。

（五）讳字。宋代刻本，避讳甚严。凡遇皇帝及其祖宗的名字（含同音字）皆须缺末笔，以示避皇帝讳。若是“今上”、“太上”，则改刻“御名”二小字，或“今上御名”、“太上御名”四小字。个别有改字的。元、明不避讳，明末三帝始避讳。清初不避讳，康熙七年后始避讳。根据讳字多寡，可判断刻版于何朝。

（六）字体。一般说来：宋版书中浙本近欧，建本近柳、蜀本近颜。元版书多赵体，掺用简体字。明初仿元，间有写刻软体字；中叶以后仿宋，方正平稳，略失神韵；万历以后渐变为横轻直重的“长宋体”，又称肤廓体。清初承明末风气，康熙重书法，六巡江南，选能书生员，形成非颜非欧非柳非赵的“馆阁体”，圆匀规矩，秀丽美妙；道光以后，一般是呆板的方块字（称仿宋）。以上仅就大体趋势约略言之，刻书家千差万别，尤其名家写刻本，不在此列。

（七）行款。即每版行数、每行字数。宋刻本有一定特点，如早期每行字数不同，是仿古卷子本体式，后来出现每版行数与每行字数相等。元以后很难寻出特征。一般遇到同一种书的不同刻本，无确切出版年出版者可考时，运用行款著录，以增强目录的区分能力。

（八）墨色。宋本用墨精良，墨色香淡，虽着潮水湿而无漂迹，甚有纸朽蚀而着字处完好者。刀法工致，不失原来书写手笔神韵。明万历以后，坊贾逐利，有用墨煤和之以面粉，以代替墨汁者。

(九)纸色。浙本、蜀本多白麻纸,建本多黄麻纸。元本黄麻纸,兼有白麻纸、竹纸等。明本多棉纸,万历以后多竹纸。清代印书用纸,种类繁多,开化纸(称又桃花纸)最好,殿本多采用之。此外有连史纸,粉连纸、竹纸、毛边纸等。

(十)版式。宋刻初期多白口单边,南宋后则渐有左右双边、细黑口。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刻工,单鱼尾 尾下镌书名。书之大名在下方,小名(篇题)在上方,如黄善夫刻《史记》中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五十五"是也,这一形式实源自简册。版内文字,横看不成行,不整齐。元版多四周双边,粗黑口。明版初期承元版风气,双边黑口;中叶以后仿宋,白口较多。清版一般为左右双边,多白口。

(十一)装帧。我国纸书在手写时期,采用卷轴装(无轴的简装,亦称卷子),装订工人称装潢手。唐代出现了旋风装,亦称旋风叶子,这是由卷轴装向册叶装的过渡形式;经折装,亦称梵策装,完全改变了卷轴装形式,接近正式的册叶装;蝴蝶装,亦称蝶装,则是早期的册叶装形式了。雕版印书通行之后,一版就是一叶,数十叶装订起来就是一册,册叶就是积叶成册,册叶装取代了卷轴装,成为我国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北宋早期刻本还有卷轴形式;如公元983年刻的《开宝藏》5000余卷。至1112年刻的《崇宁万寿藏》始改为折装。藏经之外的书籍,多采用蝴蝶装,即每版印叶以版心为中线,字面朝里对折(明人称之为"倒折"),集数叶为一叠,戳齐,不用线或纸捻穿孔订,而只用药糊粘连印张背面的版心,粘住后,外用书衣包裹裱褙(称装背、表背,不叫装订),版心在内,四边空白在外,翻阅时书叶向两边张开,如蝴蝶之双翼,恰是一版。宋人说读了一版书,就是一叶的意思。(今日出版地图册仍沿用此法以便阅读)元代佛经仍用经折装,其他书有蝶装,更多的是包背装:书叶以版心为中线,字面朝外折,书口(版心)朝左向外,以板框下栏为准戳齐,在右边余幅处打眼,用纸捻订起砸平,再用一张厚纸对折后

粘于书脊，把书背全部包起，一册包背装书就制作出来了。明初仍用包背装，中叶以后采用线装。线装书的装订方法与包背装基本相同，不再用整幅厚纸包背，而用两张半叶软纸分置书身前后作为封面，然后打孔穿线成册。清代几乎全是线装，《四库全书》仍用包背装。现在的影印书、木版刷印书及仿古的铅印本，还采用线装（少数用蝶装、包背装），在人们的印象中，"线装书"几乎成了古籍的代名词。

以上是书籍制作时形成的一些标记，书籍流传过程中附加标记也很多，略举一部分如下：

（十二）修版、补版。书版经数十年、数百年，往往字迹漫漶，虫蚀断烂，重印时便须修版、补版，最典型的是三朝版《二十一史》，原刻于宋，补刻修版于元，再补于明。凡明代补版，皆在版心鱼尾之上标"正德××年刊"等字样。传世宋本司马光《传家集》，无补刊标记，但从版式、字体、刀法，一望而知多元代补版。其补版书叶，则不能与宋版同等视之，校勘家当慎之。

（十三）抄配、批校。书籍在流传中失落卷叶，收藏者据别本抄写配足，是为抄配本。读书人在天头、地脚、行间加注批语，是为批校本。书经名家批校，身价倍增。

（十四）题记、题识。藏家得一好书，高兴之余，或自己动手，或请品赏者提笔，撰写题记、题识，载明何种版本、何处得来、价银几何等事项。

（十五）藏印。书籍流传愈久，经手的藏家愈多，一般皆有藏章印记钤于卷端。识别这些藏印，搞清藏家面貌，便理清了此书的流传过程，成为确定版本的重要依据。

以上为出版者、读者、藏家所附加之标记。更有书贾附加标记，必须提高警惕：

（十六）挖改牌记。挖去影刻、复刻、翻刻牌记，保留旧牌记，以翻刻本冒充原刻本，多发生于元翻宋本，明、清翻宋、元本诸书。

（十七）撤改序跋。影、复、重刻诸书，保留原序跋，增加新序跋，叙述翻刻动机经过。撤去新序跋，或挖掉紧要段落，则可冒充原刻本。

（十八）铲去末笔，制造讳字，以冒充宋本。

（十九）抽去目录，挖改卷次，以残充全。

（二十）伪造藏章印记、名人题识，把纸染成黄褐色，诱人上当。

20种标记，前11种为出版者原标记，可据以判断版本，故意制造骗局的出版家，可说是没有的。12至15出于读者、藏家、出版者之手，大致可信，惟藏家有抬高版本的倾向。末五种系书贾所为，旨在设骗局、牟高利，全然不可信。书商们往往在刻得极好、“几可乱真”的明翻宋本上做手脚，鉴别难度较大，受骗上当者代不乏人。试举几例：

（一）楚辞章句十七卷　　明隆庆五年豫章朱多煃夫容馆翻刻宋本

是书原刻的印本，有牌记：“隆庆辛未岁豫章夫容馆宋版重雕”，有书刻人姓名，宋讳不再缺笔。未几，再次刷印，将宋讳末笔及书刻人姓名全部铲去，牌记依旧，且增王世贞序“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辞》善本，梓而见属为序”云云，可见出版家增讳字以求近宋版原貌，非以骗人。后世射利之徒，则乘机钻谋：有挖掉牌记、精工重装并以永乐元年分析另爨册、永乐五年夏税秋粮册（骑缝官印为“义乌县印”）为衬纸以充宋本者，今存重庆图书馆；有改换“清河万卷堂咸淳四年刊牌”记者，今存太原图书馆；有将纸染成灰黄色，钤“毛子晋”、“述古堂”、“士礼居”诸假印者，今存中山大学。

（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　　明嘉靖四年汪谅仿宋刻本

此书正文前有嘉靖四年铅山费懋中《新刻史记序》，目录后有“嘉靖四年乙酉金台汪谅刊本”木记，《三皇本纪》下题“莆田柯维熊

校正"七字。然浙江图书馆收藏的一部,正文前的《新刻史记序》被全文抽去,牌记挖掉,卷端"莆田柯维熊校正"七字挖掉后,用旧纸弥补,并钤伪藏印掩盖,以冒充宋本。

(三)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　　明嘉靖六年震泽王延喆仿宋黄善夫刻本。

此本刻印俱佳。王士禛《池北偶谈》载其逸事云:"一日,有持宋椠《史记》求鬻者,索价三百金。王延喆绐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后可来取值。'乃鸠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毕工。其人如期至,索值。故绐之曰:'以书还汝'。其人不辨真赝,持去。既而复来曰:'此亦宋椠,而纸差不如吾书,岂误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数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获三百金耳,今如数予君,且为君书幻千万亿化身矣!'其人大喜过望。今所传有震泽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显然,王延喆仿得很象,当时就有人误为"宋椠",过数百年,纸色旧了,再经技术处理,挖掉"震泽王氏刻梓"牌记,冒充宋版,辨别难度就很大了,直到前几年,还有的藏家著录为"宋本"。

(四)北京图书馆藏《魏鹤山先生渠阳诗》一卷,宋王德文注,明翻宋刻本。

此书曾为乾嘉时期的版本名家吴县黄丕烈收得,跋称"余一见既定为宋刻"、"此种书非老眼竟不辨其为宋板"。黄氏身后,其书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收得,印人《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中。清光绪间,贵池刘世珩亦收得一部,跋称"瞿氏所藏为明翻宋刻者,直此本为宋刻真本矣。"遂刻人《玉海堂影宋丛书》中。其实,刘氏本纸经染色,帘纹极窄,亦是明翻宋刻本,今皮藏于上海图书馆。1979年初,上海馆查出伪宋本四种、伪元本二种,浙江馆亦清出数种。

善书、善本和善本书目

西汉前期,汉景帝的儿子刘德封河间王,治乐城(今河北献县

东南），罗致山东儒生修学好古，搜集古文先秦典籍，以重金得《周礼》、《礼记》等写本传于世。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河间献王传》，写到刘德"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班固是古文经学家，他称赞刘德的"善书"，一是儒家经典（或跟儒家有关之书），二是用汉隶以前的文字所写（战国时期东方诸国流行的字体，汉人称之为"古文"）。则"善书"云者，包含有内容观点正确、文本可靠两层意思。

"善本"一词，渊源于"善书"，远早于"版本"。唐以前文献未及细检，至宋初已屡见不鲜：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石林燕语》，叶梦得〔1077—1148〕）

宋次道〔1019—1079〕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曲洧旧闻》，朱弁〔？—1144〕）

赵与篡以为严陵字小且讹，于是精加雠校，易为大字，成为天下之善本。（元延祐六年〔1319〕陈良弼《通鉴纪事本末序》）

"予少时得此书而读之，爱其词调铿锵，气格高古。徐察其忧愁郁邑缱绻恻怛之意，则又怅然兴悲，三复其辞，不能自已。顾书坊旧本，刓缺不可读，尝欲重刊以惠学者，而未能也。及承乏泒台，公暇，与佥宪吴君原明论朱子著述，偶及此书，因道予所欲为者。吴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讹，补其缺，命工锓梓以传。"（明成化十一年〔1475〕何乔新刻《楚辞注序》。）

"今人但贵宋椠本，顾宋椠亦多讹舛，但从善本可耳。"（王士祯《居易录》）

从刘德的"善书"，到宋、元、明、清的"善本"，其含义大致如下：原著非同凡响，注释亦佳；文字准确（或传本可靠，或校勘无讹），无论写本、版本；篇卷完好（相对而言，刘德《周礼》缺《冬官司空》，仍属"善书"之列）。《四库全书》所收洪兴祖《楚辞补注》，乃据康熙元

年毛氏汲古阁刊本缮录，而《提要》以"善本"标举。这说明，传统的"善本"观念，着眼于内容之优劣，而非以古董视之。

章太炎先生尝云，明人知今而不知古，清人知古而不知今。意思是说，明代读书人于传统学术多无根柢、未贯通，但是会当官理事。这样的文化背景反映在刻书上，则删节本，白文无注本层出不穷，四库馆臣讥为"妄改古书，恣情损益"。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间，复古风起，崇尚宋刻，仿宋刊本陆续出现，有些人甚至好宋版成癖。据说苏南一带两个朱姓人物，为得宋刊《汉书》和《后汉记》，分别以爱妾和亲生女去交换。汲古阁主人毛晋则张榜于门曰："有以宋刻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入清，版本大家黄丕烈、顾广圻等人，酷嗜宋版，以"佞宋"自居，甚至说宋版书"无字处亦好"。他们的议论和实践活动，无疑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推动了考据学、校勘学、版本学的发展，同时也把"古董"味引入"善本"之中。至清末，"旧本"被明文列为"善本"标准：

一曰旧刻：宋元遗刊，日远日尠，幸传至今，固宜球图视之。二曰精本：朱氏一朝，自万历后，剞劂固属草草；然追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宋椠，正统、成文，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遗帙，择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万历以后，间附数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始行入录。三曰旧抄：前明姑苏从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半系抄本；至国朝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笔墨精妙，远过明抄。寒家所藏，将及万卷，择其尤异，始著于编。四曰旧校：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渊如之手者，尤雠校精审。他如冯已苍、钱保赤、段茂堂、阮文达诸家手校之书，朱墨烂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正误字，有功于后学不浅，荟萃珍藏，如与诸君子面相质也。（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自识》）

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曰旧本，一旧刻，一旧抄。（张之洞《论读书宜求善本》载《輶轩语·语学》）

两家于传统之"善本"含义，并无异议，惟引入一"时间"观念，即所谓旧刻、旧抄、旧校是也。何谓"旧"？张之洞未明言。丁丙把"旧刻"定在元代以前，实质上是明嘉靖以前，"旧抄"为明抄和清影抄宋元本；旧校则特指乾嘉间名家批校本。书籍经数百年、上千年流传，日渐稀少，如凤毛麟角，虽不是古董，确也染上了文物色彩，丁、张二位既坚持传统标准，又从"旧"字着手，借时间断代辅助确定善本，其用意是可取的。

书籍经传写刊刻，脱文讹字总难免，前人有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之喻。一般说来，传刻次数愈多，增加讹误的机会也多。如王充《论衡·累害》篇，元刊本不缺，而明刊本皆脱去一叶。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宋刊本不缺，而元，明刊本皆无。又如《辨骚》篇中"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诸语，宋以后传刻本间读音或形体相近之故，"宪"讹为"慢"，"杂"讹为"雅"，遂使文意不衔接，后世注家大伤脑筋。宋刊本亦有脱误，浙江图书馆藏《名臣碑传琬琰之集》脱文时见可证。所谓"精校细勘，不讹不缺"，只能是相对而言，善与不善乃从比较而来，实际工作中不易掌握，辅以年资，无异辟一捷径，然亦不可绝对化。稿本，特别是有学术价值的手稿本，则不能跟明版一样论资排辈，必须破格。且时间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现在距丁丙的时代又过了一个世纪，是否还定在明代，甚至是嘉靖以前？北京图书馆就是这样。去年有朋友从柏林寺借归万历刊本，惊呼"借出了善本书"。浙江馆定在明末，清代多采抄稿本。有的图书馆则定在清乾嘉间，甚至更晚。1978年3月，国家文物局召集全国善本总目编辑工作会议，讨论善本范围，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零页）；明代刻印、排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

零页）；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的活字排印本及流传较少的刻印本、抄写本（初刻初印本、稿本、抄本，明以前著述原刻罕传，至清初第一次翻刻本等）；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印行的图书；辛亥革命前流传很少的刻印本、活字排印本、抄本及名人学者的稿本、批校本等。

如前所述，一般而论，传本愈早，讹误愈少，经千百年淘汰而流传于今者，大抵有存在的价值。《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断代为纲，辅以内容价值的考核，确定收录范围，应该说是合理的、可行的。它吸收了传统"善本"观念的某些因素，但骨子里还是黄丕烈、丁丙这一流派的继承和发展。"粤匪"太平天国印书被尊为善本，则是丁丙们始料不及的。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采用《四库全书总目》分类法，略加变通，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增设丛书部，共著录28个省市自治区783家收藏的善本图书6万种（依版本计），著录项目为：书名、卷数、著者、版本、藏家等。每书传本，皆按出版先后顺次排列。版本项著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和版本类别，一般十几字、二十几字，得之却十分不易。先由藏书单位拟定制卡，再由省级鉴定小组巡视复审，最后报北京编委会审定。遇有疑义者，或目验原书，或调阅书影，搜集证据，推勘事实，必权衡审慎，而后写定。版本考订精审，可说是本书目最突出的特征。我国书目著录版本，始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一书多至数本；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乾隆间《天禄琳琅书目》，版本记述尤详，兼及藏书源流，牌记、藏印、题跋皆一一载明。然诸家书目规模不大，著录数百种而已。《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依托，动员全国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参加，其版本著录的质量和数量，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图书10254种，是我国传统目录学集大成之作，举世公认。但它有明显的不足，就是忽略版本，《提要》记

明版刻的极少，一般只载某处采进本，某人家藏本，乃著其书之所从得，与版本无关。这一缺陷，严重影响了《四库全书》的使用价值，因为人们不知道它是根据什么版本抄写的。考定《四库全书》中3000余种抄本各自依据的版本，实为今日《四库全书》研究者面临的首要课题。《总目》的价值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四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总序、小序、提要，案语融为一体，即是《总目》，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张之洞《輶轩语》）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五部皆无总序，各类无小序，各书亦无提要，是个简目，其缺点在不叙学术源流，其优势在精审版本，传世6万余种善本一一载明，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考订传刻源流，示学者以求书之门径。《四库全书总目》条目逾万，其失在不明版本，然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示学者以读书之门径。今日之中国学术研讨者，倘能并得两书而读之，取长补短，得其门而入，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论清刻古籍善本

朱 泽 吉

以往谈善本，惟宋元旧椠、明人精刻，以及各个时代具有学术价值的原稿本、旧抄本和名家批校本为世所重。至于清代雕印的书籍，由于时代切近，流传尚多，向难跻身于善本的行列。这种观念，是在清代开始形成的。晚清著名藏书家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辑条例中，把他所收罗的善本区为四类：一曰旧刻，二曰精本，三曰旧抄，四曰旧校。他所说的"旧刻"，专指宋元遗帙；"精本"则仅限于明人佳椠，特别是嘉靖以前的版刻。这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主张，所标四类也正体现了清人对善本范围的理解。其后虽有不少学者开始重视清代的精刊和稀见刻本，但对它们迄未做全面分析，没有集中探讨过清刻古籍在版本学上的地位。普遍说来，人们对善本书的观念，并未完全脱出清人的窠臼。因此，今天提出研究和确定清刻善本，实际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

古籍能否列为善本，原从比较而来。善本书的含义和范围，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传世久远，本来只是构成善本的一个条件，如果囿于成说，惟古为重，甚至把"清刻"和"善本"当成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显然是不恰当的。明末藏书家祁承㸁说："书籍与代俱增，而亦与代俱亡之物也。"（《澹生堂藏书约·鉴书》）我们不仅应当看到近三百年来图籍的日益浩繁，同时也要看到一些旧刻新雕的日益阙佚。就清刻古籍来说，以往难得的，今则尤甚；而前之易得者，现在也往往难于觅求。至于以刊印精良而著称的版本则更趋稀见。叶德辉诗云："当时视寻常，后世殊珍异。"（《书林清

话》九）这是符合古书流传的客观规律的。

我们应当改变历来那些收藏家、鉴赏家们一贯轻视和忽视清代刻本的狭隘观点。不能等这些古籍日就湮没之后再来摩挲品题，叹赏它们的"稀如星凤"。当然，从整体情况来看，现存清刻古籍的数量仍旧是惊人的，而且触手可得的又都是一些习闻惯见的刊本。从这样浩如烟海的图籍中确定善本，必须在防止庸滥的前提下精心抉择，取所当取，才能归于至当。正因如此，要真正做到宽严得体、去取合宜，是比较难掌握的，也是容易有分歧意见的。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浅见。

鉴定清刻善本的标准

鉴定善本必须有谨严的态度，要从多方面审慎地考虑问题。但是，研究不同时代刊印的古籍，着眼点也有所不同，所持的标准和所需的知识是有很大差别的。

能够保存下来的宋元旧椠，大抵是四部要籍。即使有的书学术价值并不高，但由于它们时代已远，镌印精工，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既能幸传至今，也应当看做艺林至宝。因此，我们考察宋元刻本，主要任务是通过分析比较来确定版刻年代与印刷先后，要能根据它们的版式、行款、字体、纸墨、刻工、牌记、序跋、题识，以及书中避讳和藏家印章来鉴别真赝，区分原刻与后人翻刻、仿刻的不同。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有专门的版本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即使具有这样的知识和经验，也很难说必然可以做出绝对准确的判断。

就清刻古籍来说，固然也需要分清某些原刻与复刻、初印与后印之间的差异，可是此外则很少有判别时限、区分真伪的问题。从浩瀚的清代刊本特别是清人著述中确定善本，主要须根据书籍的性质、内容、学术价值、版本源流以及传世多寡来辨识。有些镂印甚精的名著，如果传布尚广，并不一定纳入善本的范围；相反，另外

一些有用而罕见的撰述，即使在雕印艺术上远非上乘，却更值得珍视。总之，在学术方面有较为重要的参考意义而又传世极罕，当是清刻善本的基本条件和首要标准。

如果我们说，鉴定清刻善本似易而实难，难就难在首先需要熟悉大量古籍的实际内容而不仅是雕印形式，要能充分了解它们的科学价值、掌握它们的传布情况，从而做出比较恰当的判别。

确定清刻善本，多数意见认为应当有一个时间断限，主张断自乾隆以前。这体现了重视清初原刊旧刻的精神，原则上没有不当。但是，如果过分拘守这样的标准，机械地排除清中叶以后的版刻，也会造成弃所当取，使某些可遇而不可求的稀见精刊被摈出善本的大门。因为在清刻古籍中实际还存在着下列一些特定情况：

譬如，前代有些著述，到清朝后期始精校付梓，而不久又由于某种意外原因成为十分罕见的版本，这就很值得宝重。象宋卢宪所撰的《嘉定镇江志》三十卷，是著名的古地志之一。但原书久佚，乾隆中始由《永乐大典》录出二十三卷，以钞本形式流传。在阮元支持下出现的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校刊本，实际是本书的第一个刻本。这个刻本的校勘工作出于刘文淇父子之手，比较完善（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十二）。可是因为它"传布无多，经咸丰之后，墨印益少，版片久失"（陈庆年《嘉定镇江志重刊本跋》），所以六十年后才又出现了丹徒陈氏重刊本。可见道光原刻虽然距今甚近，但却以其精审和罕传而弥足珍贵。这类情况在清代刻本中是常有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清初或乾嘉时代一些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可能迟至清末始得梓行，倘或版片亡失，又未重刻，传本自然日稀。如清人为《三国志》作补注工作的有十数家，其中唯赵一清《三国志注补》最称详赡。这部书直到光绪时始刊于广雅书局，而历时未久，版即遭毁。后来汇集《广雅丛书》、《史学丛书》时亦未得收入，目前行世者唯抗战前影印本而已。这样，赵著尽管是光绪刊本，但

现在已成为难见的旧籍。

再有，清中期以前的撰述，自当以原刊初印为贵。但晚出的新刻本如果搜罗更加完备，校勘更加精审，而又流传较少，其价值往往可以更高于原刻。如《纳兰词》以康熙三十年《通志堂集》本为最早，后来始有单行别本。至道光十二年汪元治刻本出，于各本字句异同，汇校并存，其详备乃凌驾于一切旧刻之上。这部词集后来曾收入《榆园丛刻》及《粤雅堂丛书》，得到推广，但汪刻原本却殊不易得。同样情况，宣统时董康精刊的《梅村家藏稿》，在内容和雕印方面都远胜于康熙原刻本《梅村集》，学者并未以其晚出而忽视。

另外，许多有用而罕传的书籍，本身就是清代后期的撰述，当然不可能有更早的刊本。因而也就不能以乾隆为限定去取。如许瀚是嘉道期间卓有成就的训诂学家和校勘学家，他的《攀古小庐杂著》到光绪时才得镘版，可是久已成为许多学者难获一见的作品。又如道光时邓传安所著《蠡测汇钞》，为研究台湾风土提供了有益的史料，其书虽为道光十年所刻，但因传本甚少而颇难觅求。这类事实，不可缕数。总之都说明，对清代后期刻本一概采取摈弃的态度，是不利于发掘和保存善本的。

清人著述的稀见刻本

在清刻古籍中，绝大多数是清人自己的著作。其中有许多稀见版刻是值得宝重的。大略言之，可分数类：

一是学术专著。清人撰述繁富，有裨学林，但有很多要籍佳椠，已极为罕觏。举例而言，属于金石图象方面的如阮元摹刻并考释的宋王厚之《钟鼎款识》、刘喜海所辑的《金石苑》等，地理方面如白潢、查慎行纂修的《西江志》等，书画艺术方面如卞永誉集录的《式古堂书画汇考》等，科技研究方面如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等，镌印既精，又鲜流传，在清刻中甚为名贵。至于某些卷帙很少而富有资料价值的专著，如果丛书未收，仅仅是单种零刻，往往

极难保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版刻平常，也同样值得珍护。

清代有很多学术著作，目前仅有重刊本行世，原刻已甚不易得。如薛传均《说文答问疏证》，看来是极普通的书，但目前见到的最早刻本却只是道光十六年黔西史氏重刊本和道光十八年扬州刘氏重刊本。其后自姚氏咫进斋以下，又有多种刻本出现，皆源出于刘本。实际上，福建原刊本较后来传刻诸本在文字上颇有异同，足资参证，而现在殊为罕见。又吴玉搢《别雅》，不仅康熙原刻已少，即乾隆七年程氏督经堂刊本也因版片被洪水漂没而传布甚稀。因此，根据不同情况，对清代某些学术专著的初刻本以及早出的重刻本加以珍视，是完全必要的。

二是文集。清代文集不可胜数，有的名似杂著，实亦文编。这些别集的性质是很复杂的，在今天的价值、作用也很不一致。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一些稀见的考证家的文集，因为它们保存了大量诂经、证史、考文、审音的论著。这些书虽然很负盛名，为学者所熟知，但一一搜求起来，却又并非易事。甚至乾嘉时代一部分大家的文集如《西庄始存稿》、《柚堂文存》、《果堂集》、《东潜文稿》、《幼学堂集》、《研六室文钞》、《简庄缀文》等等，不下数十种，由于初印既少，多未重刊，也都逐渐成为十分难得的著述。

至于未经抽毁或虽遭禁毁而幸存的清初别集，如冠有钱谦益序文的二十卷本《梅村集》、康熙时刻印的《虬峰文集》、雍正初刊行的《吕晚村先生文集》等，在学术上亦各有其特殊意义。此外，还有很多稀见的诗文集，在文学上虽不占地位，又未收什么学术论著，但它们当中的许多碑传、书札、序跋、题记以至唱和赠答的诗篇，却常为研究各种重要的历史事件或人物提供了可贵的线索或依据。因此，从史料价值出发，对一些刻本甚少的冷僻别集，也应加以重视。多年以来，有些学者或藏书家曾用很大精力专务罗致清集，主要是为了以上的种种原因。

第三，在清代的笔记稗说中也不乏值得珍重的版刻。清人笔

记基本上是两种类型：一种属于读书札记，以考订为主，大都能列入著作之林，因而传本甚多。另一种则属于野史稗乘，以记叙掌故史实为主，当时人不过借以增广见闻，甚或聊资谈助，并未给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这类笔记往往保存了多方面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有关某些政治事件的记载，更足以补史籍的缺失。不过它们也常因此而触犯禁忌，以致影响传播，造成湮没。我们所珍视的清人笔记，正是以这类稗乘的稀见刻本为主。象董含的《三冈识略》，仅有康熙初光复堂刊本；刘靖的《片刻余闲集》，仅有乾隆十九年刊本；法式善的《陶庐杂录》，仅有嘉庆二十二年大兴陈氏刊本，等等。这些书颇具文献价值，可是一向少见。《陶庐杂录》在法式善所著的笔记中是最难得的一种，近年虽已有了校点排印本，而原刊仍自可贵。还有些传本甚少的笔记，不但在内容上足供采摭，而且在刻印方面也很考究。例如释大汕的《海外纪事》，有康熙三十五年刻本；袁栋的《书隐丛说》，有乾隆初刻本，都是雕印工雅，富有特色的版刻。在研究清代版本时，不当以稗说野史而忽之。

第四，稀见的方志刻本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清代是方志产量最多的时代。据《中国地方志综录》所收，清人所修的志书，占宋以来方志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这说明古方志亡佚者甚多，同时也足以看出清代志书的繁富。从纂修情况看，清代方志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由著名学者独撰、主修或参与商订而编成的。它们向以体例谨严、整饬有法为世所重，但目前有的已很难寻觅，初印尤不易得。这些出于专家学者之手的名志，亟待我们认真访求和保护。另一类是以各级地方官吏名义主修的志书。他们开局修志，不过是为了奉行政令、博取声誉、位置冗员，纂修时大抵皆钞撮档案、堆砌材料，内容极为芜杂。但正因如此，它们也往往汇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成为供批判使用的丰富的史料宝藏。这些官修志书，一般印数较少，过去又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已十分罕见。特别是一些纂修时代较早而又比较偏远的府州县志，更为难

得。从大批方志中鉴别选汰，确定善本，是一项非常重要和艰巨的工作。

第五，考察清人撰著中的善本还须注意到小说、戏曲及其它通俗文学作品。清代小说，戏曲虽称繁荣，而一些名著的原刊旧刻却多已失传。如《儒林外史》初为乾隆刻本，但始终未见；传世者惟嘉庆时卧闲草堂刊本及艺古堂复印本最早，也都成为稀见的珍品。《桃花扇》、《长生殿》虽各有康熙原刻，而藏者甚罕。象李渔《十二楼》这样较为次要的作品，不仅原刊久佚，精闲居附图精刻本已成孤本秘笈，即使嘉庆时会成堂重刊本以至坊刻巾箱本，亦皆难遇。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凡例》中有云："小说之书，明清旧本原刻，因夙昔之鄙弃而日少，与四部宋元旧本因代远而日少者，其原因虽不同，而至于今日其因稀而见珍于世也则同。"事实上，一切通俗文学刊本的传布情况，莫不如此。这多年来，经过收藏家和研究者的搜求，许多小说、戏曲、弹词以及民歌俗曲的旧本原刻，盖已罗致殆尽。可是尽管如此，清代二百数十年中坊肆间所刊的通俗作品，散在全国，其堪称善本，见于著录或未经著录者，均尚有之。这些还都需要我们认真去识辨。近人所撰小说、戏曲书目，或附考版本，或兼注藏家，都可以供鉴定斟别工作中参考。

前代著作的初刻本和首次重刻本

清刻古籍中有不少是前人著作的首刻本或第一次重刊本，其精审稀见者，应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归属于清代善本的范围。

明人及其以前的撰述，有一些是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到清代才首次付刊的。如白朴《天籁集》，元明两代，向未梓行。清初杨希洛始据抄本厘为二卷，并掇拾他书所收小令、套数附于编末，于康熙四十九年由环溪王皓写版付刻。又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旧有明初陶宗仪写本，至乾隆十四年，方由松江张氏松桂读书堂刻版以传。明代沈啓所撰《南船记》，记载翔实，图文并茂，为了解古代船

舶制造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书成于嘉靖年间，但到光绪六年始有刊本，象这类前代著作的首刻本，镂印既精，日稀日贵，所以深为讲求版刻者所珍重。

晚明撰著在清初始行付梓，更是很自然和较普遍的情况。例如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是继张华《博物志》、释赞宁《物类相感志》等书之后进一步推阐物性的一部科学著作，对研究古代科技史很有参考价值。作者的名著《通雅》，已于崇祯时刊行；而此书则以康熙三年于藻刻本为最早。不过目前传世者主要是光绪十年重刊本，于氏首刻已甚为罕见。另外有些归属晚明的著述，实则写于清初，如张岱的《西湖梦寻》，就是他在明亡后追忆西湖繁华、寄托感慨而作。其书有康熙五十六年原刊本，刻印甚工，传世亦少，一向被目为珍贵的版本。

晚明史籍和诗文别集，很多是在清初始刊而后又遭到清廷禁毁或抽毁的，《清代禁书知见录》记载甚详。这些书有的到后来还照常传刻，有的则由于禁毁而罕见或散亡。凡幸存的晚明史乘，近百年中根据历史形势发展的需要，都曾单付排印，或则汇为丛刊，其所据底本，多为清初所刻。至于一些经过禁毁的晚明别集，如方以智《浮山文集》（清初刻本）、邝露《峤雅》（顺治间精刊本）、董说《宝云诗集》（康熙二十八年刻本）等等，有的传世至罕，有的则已成孤本，濒于湮灭，因而均有认真护惜的必要。

有很多古籍，在宋元时虽曾付雕，惟以年代久远，版毁书绝，或者偶存孤本，但无可寻踪。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首次重刻本就成为目前传世最早的刻本，具有和原刊同等重要的意义。

譬如北宋时朱长文《乐圃余稿》，据四库著录，其全集本为百卷，刻成后版毁于兵，南宋时其从孙朱思辑得部分佚作，编为《余稿》十卷付梓。但现在南宋刊本又不可见，传世者惟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寿重刻最早，而且亦甚不易得。此外如康熙三十七年震泽徐惇复校刊的《苏学士文集》，康熙五十五年石键据渔洋书库藏本重

刻的《徂徕石先生全集》，康熙六十年锡山王邦采复宋刊《徐节孝集》等，都是各书现存最早最佳的刊本。象苏集已为《四部丛刊》采为底本；徐集传印亦甚精工，论者以为"虽非宋刻，亦可谓下真一等"（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四）。在宋刻久已失传的条件下，对清代这类稀见重刊本的价值是不应忽略的。

还有些古籍，据前人著录或尚有旧刻传世，但目前存佚未卜，也当以清代首次重刊本为贵。特别是校印精良而比较稀见的版刻，更应引起重视。如陆龟蒙《笠泽丛书》，据清人所见，尚有宋蜀刻本、宋樊开本、元陆德原本、明李如桢本等多种旧刻存在，但因踪迹无闻，存亡难定。当前行世者实以雍正九年江都陆钟辉碧筠草堂仿宋本为最早，其书原出于元代至元六年刊本，后来比较多见的姚氏大叠山房本、东山草堂本，都是据碧筠本复刊的。又有于封面题"水云渔屋刊本"者，实即陆本。此后又有乾隆间顾楗复元刊本、嘉庆二十四年许梿古均阁校刊本。许刻以宋樊开七卷本为底本，另外又参考了元明以来各种刊本和钞校本，竭十余年功力勘定，然后手写付梓。由于印数甚少，所以丰城熊氏、海昌陈氏皆曾影印。总之，在今天所能见到的《笠泽丛书》中，陆、许两刻最称精审，无疑应归于清代善本之列。

明人著作有很多是经清代重新校刊的，大都胜于明本原刻。因此，无论有无明刊传世，一些稀见的清人重刻本往往更为可贵。如归有光《震川文集》，现存的万历原刻即远逊于康熙间归庄家刻本。又弘治间都穆所辑的《金薤琳琅》，原刊本未见，目前行世者惟乾隆四十三年杭州汪氏重刻大字本最早。其书校印并精，于原刊疏失多所订正，故学者咸推为善本。光绪间葛氏学古斋汇刻《金石丛书》，即以汪本为据。近人潘景郑谓曾见《金薤琳琅》原刻本，出于独山莫氏，后亦杳无下落（《著砚楼书跋》一六九）。其实原刊无论存佚，乾隆首次重刻本也是本书赖以传布的最完善的版刻，因而有更值得珍视的一面。

代表清代雕印艺术的精刊本

清刻善本应以学术价值较高而罕传稀见为基本条件，这不等于说，清代的雕印艺术无足取，更不是说清代没有刻印精工、为版本家推重叹赏的佳椠。前文的论述中，事实上已经涉及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清人精刻。下面专就足以反映清代雕印艺术水平的刊本，略加论述。

清代殿本及内府所刊诸书，在形式上是十分考究的。这类刻本，书品宽大，装帧堂皇，加以镌刻工致，墨色纯良，又多用开化纸或榜纸精印，其名贵无须赘言。康熙四五十年间，曹寅主持扬州诗局时为内府刊印的各种书籍，以及他本人辑刻的丛书，均经手写镂版，字体端秀，纸墨莹洁，颇有宋椠遗韵。人们常把这些书做为康熙刻本的代表，称之为"康版"，足见宝重。

从私家刻书来说，清初秦镤摹宋刊巾箱本《九经》，以及稍晚一些张士俊摹宋刻《泽存堂五种》，都是极负盛誉的精刻。此后由于考证学的逐步发达，许多学者在重新校理刊行大量古籍的同时，也竞以影刻或仿刻宋元善本为尚。以经史而论，著名的如黄丕烈影宋严州本《仪礼郑注》和影宋刊《国语》、《国策》，张敦仁影宋淳熙抚州公库本《礼记郑注》，汪士钟影宋景德本《仪礼单疏》和元泰定本《孝经疏》，臧庸仿元雪窗书院本《尔雅注疏》，以及胡克家复元刊本《资治通鉴》等，均为书林所称道。在清代官刻的古籍中，复宋元版本的经史要籍很少，而且也没有完全忠实于原刻的精神面貌。有的版本学家曾认为这是清代刻书的一种缺陷。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一些私家精刻就更能显示出它们的重要代表意义。

清代的复宋或仿宋刻本，还包括了其它各类古籍。象吴鼒影刻宋乾道本《韩非子》，胡克家复宋淳熙本《文选注》，聊城杨氏仿宋本《蔡中郎集》，缪曰芑仿宋本《李太白集》，项絪翻宋本《韦苏州集》以及前文所举的陆氏碧筠草堂复元刊《笠泽丛书》等，也都是清代

著名的版刻。缪、陆诸刻特别是胡刻《文选》，均经后人多次复刊或影印，吴刻《韩非子》且经日本仿刊，足见原本的精审。

清代有很多专门辑刊宋元明善本的丛书，被称为清代丛书中的"版本派"。开辟这一风气的是黄丕烈。他曾在鉴藏的基础上，斟选自己所得的宋元佳椠，由著名校勘学家顾广圻为之勘定后次第刊行，于嘉庆二十三年汇成《士礼居丛书》。这部丛书经过兵火之后，流传日稀，初印尤为名贵。同时秦恩复石研室所刻的多种古籍，虽无丛书之名，实际也属于黄氏一派。他刊行的书，从文字校勘到雕印形式都非常考究，当时号为"秦版"。其后如聊城杨氏、常熟瞿氏影刻的古籍，直到清末黎庶昌访求日本所藏中国古书善本而影刊的《古逸丛书》，都是"版本派"的著名代表。黎书刻成之后，曾印刷百部，"以赠当时显者，皆叹为精绝"（杨守敬《邻苏老人自订年谱》）。这部丛书的版片后归江苏官书局，摹印已远不如前，惟在东京初印的美浓纸本，收藏者认为是足以与宋椠元刊争光比烈的。

在清刻古籍中，受到重视的主要是一些精美的软体写刻本。清初刻版，一般都用长形仿宋字体，风格与明末刊本甚为相似。后来逐渐发展为方形硬体，粗拙板滞，以致毫无艺术性可言。但是，也有许多精校、精刊本一直保持了宋人刻书的优良传统，请擅长书法的人手写上版，并由名工精心雕印。上面所说曹寅在扬州诗局刊行的书，就都是软体写刻。此外还有很多著名写刻本，这里无须胪举。前人所谓"康雍缮写工，乾嘉校勘细"（《书林清话》九），就包含了这清代写刻本的赞美。不过用软体缮写的佳刻，实际上并不限于康雍时代而已。

清代有很多以善于写版著称的专家。如林佶、黄仪、余集、许翰屏等，均为研究古籍版刻者所熟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常为他人写版的名手，本身大抵是"清贵"的官吏、知名的学者，并不以佣书为业。这一事实，说明了当时对写版的高度重视。象林佶就是东南有名的藏书家，康熙进士，曾官内阁中书，著有《朴学斋集》

等。出于他手写的《渔洋山人精华录》、《古夫于亭稿》、《钝翁文钞》和《午亭文编》，论版刻者称之为"林佶四写"，极负盛名。黄仪则是很精博的舆地学家，尝与阎若璩、顾祖禹等同修《清一统志》。王士祯《渔洋续集》付梓时，拟仿宋椠，曾专门请他写版，《香祖笔记》卷二记其事甚详。为周密《志雅堂杂钞》等书写版的余集，曾以与修《四库全书》膺聘入翰林，累迁侍读学士。他兼擅书法绘画，所绘美人山水都很有名，著有《秋室学古录》。由这些名家书写上版的刻本，字体端丽，镌法工整，是很足以为清椠生色的。

在清代写刻本中，还有一部分是手写个人撰述或所辑作品的。这也是宋人刻书所树立的传统，在清代得到了发扬。乾隆时著名的画家、诗人金农曾自书其《冬心先生集》，汪士慎曾自书其《巢林集》，郑燮曾自书其《板桥全集》，皆为艺林所重。稍后则许梿也以善于写版著称，他除为李文仲《字鉴》、吴玉搢《金石存》以及自编的《六朝文絜》写版外，并曾写刻自己辑录的《古均阁宝剑录》。其书钩摹工细，纸润墨香，一向被认为是当时吴中版刻的杰作。另外如江声以篆体自书所撰的《尚书集注音疏》和《释名疏证》、张敦仁以草体自书所撰《通鉴刊本识误》，则在版刻中别树一帜。这类自己书刻的古籍，都是既有历史文物价值，又富于艺术代表性的善本。

足以反映清代雕印艺术水平的，还有一些特殊版刻。一是版画集。名作如清初肖云从《离骚图》，有顺治二年刊本，所绘人物的衣冠履杖，古朴典重，很有六朝人画意。又所绘《太平山水图画》四十三幅，为顺治五年怀古堂所刊，每幅都具有深远的意趣，鉴藏家以为"诸家山水画作风，无不毕于斯，可谓集大成之作已"(郑振铎《劫中得书记》七十四)。此外如康熙时所刻吴逸的《古歙山川图》、焦秉贞的《耕织图》等，均以精细生动见称。还有一些出自徽籍著名刻工之手的戏曲小说的插图，神态栩栩，极为工致，在构图和镌刻方面都显示出高度的艺术造诣和独特风格。

二是套印本。现在传世的套印本板，绝大多数是明代万历启

祯年间吴兴闵、凌两家刊行的。不过明人刻印的套版，一般都是两色，三色很少，四色者仅见，五色唯笺谱、画谱或花卉谱有之。清代则不但有精刊的四色印本，如内府所刊《古文渊鉴》之类；而且还出现了绚丽悦目、印工复杂的五色套印书籍。如道光十四年涿县卢坤刻印的《杜工部集》，所辑明清两代五家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五色，如果加上正文墨印，应当说是六色印本。除此之外，清人刻书还有一些在版框栏线上力求变化美观的，亦为前代所未见。这些特殊版刻，有的虽纯属形式，无关宏旨，但都标志着清代的刻书工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从雕印艺术的角度来考察清代刻本，对它们也是应当加以注意的。

（原载《文献》1981年第9期）

新书版本研究浅见

徐孝宓　卫扬春

过去，研究版本只拘束在古籍善本方面，没有把新书版本纳入研究的范围。今天，我们要扩大善本书的范围，增加善本书的内容，及时对新书善本进行积累、保藏和利用。不要等到几十上百年后再去考证、鉴别，使极宝贵的图书文献资料失之于眉睫。新书版本的研究、新书善本的鉴别与保藏，其意义、作用与价值不亚于对古籍善本的研究。从阶级的功利观念出发，对新书版本的研究，可以使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献、珍贵的图书资料得到保藏。

新书中的不同版本，对于研究工作者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凭藉。研究工作者从事学科上某一问题的研究，讲求所用图书文献的版本问题，实质上是研究人员力求占有的材料是全面的、真实的、可靠的，从而使在这样的材料上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

是正确的。过去有的研究工作者有关图书文献的版本问题而得不到正确的结论，给后人遗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公案"。今天及时地着手进行对新书版本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为今后的各学科研究工作者减少因版本问题而遗留"公案"，贻误后人。

过去对版本的研究，大都忽略了从版本的角度，对于当时著作物的史实的考查。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新书版本不可取的。研究新书版本要充分注意研究版本的装帧形式，说明图书内容反映的时代，看到时代的世事、时代的精神。研究图书内容反映的时代，通过图书版本的形式得到印证，交相辉映，构成历史的见证。研究新版本，鉴别新善本，重视对它的收藏和利用的重要意义，正在这里。

新书版本问世时间不长，如果以"鸦片战争"作为它的起点，至今只有一百多年。（当然，新书的历史起点如何划分，不是武断的一家之言。对于这个问题，图书馆界的同行们可以进行更深入一步的研究。）在这一百多年间，由于思想斗争的错综复杂，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的生死搏斗，表现在图书版本问题上的历史事实的考查，要下的功夫，并不比考证古籍善本显得轻松。在这一百多年间，从图书版本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斗争，文网之祸，为害之烈，其功过是非，在进行新书版本研究过程中，不是又可以看到历史的见证吗？

据文献记载，刀刻版片出现，引出了研究版本的问题，当代人研究当代书籍版本，比后代人研究前代书籍版本的优越条件要多得多。（请同志们注意，这里仅指条件优越，不是说研究时下的功夫少，显得轻松。）历史事实如此，宋代就有人研究宋刻。我们现在研究古籍版本，最短的历史也在百年以外。这就要明当时的书籍制度，不明则不知简、册形式，不知脱文、错简的原因；要明当时的雕版印刷，不明则不知各代书籍及各自沿袭的底本；要明书籍传播，不明则不知流传情况；要明聚散，不明则不知存佚；要知鉴别，不知则不明善本的功用、孤本的价值；要知整理与保藏，不知则不

能有助于研究使用者的实用。我们现在研究新书版本，最长的历史只在一百多年以内。较短时期内发生的事，有关的人和物俱在，记忆犹新，一目了然。譬如，唐弢的《晦庵书话》，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研究新书版本的专著。它"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因为，这是作者的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总之，今天在研究古籍版本的同时，要认真研究新书版本，在版本学的领域里开拓新的田地。所谈浅见，仅仅是提出了问题，愿与图书馆界的同仁共同研讨。

研究新书版本有何作用呢？现就这个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文中引用具体的图书文献材料进行论证，以期说明新书版本研究的作用与价值。

一、从版本的角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

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翻译出版为例。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这部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性文献，于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在英国伦敦出版。五十八年后，这部伟大的文献被介绍到中国。最早是1906年由蛰伸（即朱执信）摘译了其中的十大纲领，刊载于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民报》第二号上。1908年民鸣（译者）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连载于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天义报》半月刊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期上。

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国内首次问世。3月，陈望道将其全文译出；5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21年广州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发行，译者名改用陈佛突。1923年上海书店重排出版时，译者名又改用陈晓凤。1924年广州平民书社，1925年广州国光书店各自重排印行。1933年上海春江书店重印一次，译者名又改用仁子。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店重印一次。书名亦有改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宣言》和

《宣言》的。

1930年，《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中文全译本问世。它是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书名用《一八四七年国际工人同盟宣言》，这是因为它是根据187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在德国莱比锡刊行时的题名。1938年，武汉天马书局翻印了这个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的这两种中文全译本，虽然译文陈旧，但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则属于重要的版本凭藉。今天，图书馆把它作为新善本，认真加以保藏是无可非议的。

二、从版本的角度，研究保存革命文献，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先驱者的足迹。

以鲁迅先生编印瞿秋白同志的遗文——《海上述林》为例。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壮烈牺牲了。当时，鲁迅先生正在大病之中，得到这一噩耗，万分悲恸。他是革命的硬骨头，没有被悲哀击倒，勇敢地站起来，愤怒地说："人被杀了，文章是杀不掉的！"决定编印《海上述林》，扩大瞿秋白同志的影响，回击敌人。

鲁迅先生编印《海上述林》，从选材编辑、校对清样到写发行广告，都亲自动手。他把书印得很讲究。初版有甲乙两种版本，被当时的中国出版界认为是从未有过的极漂亮的版本。

《海上述林》所收的是瞿秋白同志遗著中的文艺理论译著，经鲁迅先生编校后于1936年用诸夏怀霜社名义印行。该书在上海美成印刷所排版打好纸型后，将其寄日本印刷、装订，然后寄回国内发行。

鲁迅先生为《海上述林》的发行，亲撰广告文字。广告是这样写的：

海上述林　上卷出版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

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全书六百七十余页，玻璃版插画九幅。仅印五百部，内一百部皮脊麻布面、金顶，每本实价三元五角，四百部全绒面，蓝顶，每本实价二元五角。函购邮费二角三分。佳书易尽，欲购从速。下卷亦已付印，准于本年内出书。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代售。

鲁迅先生编印《海上述林》是向国民党反动派表示抗议和示威，是表达他对革命者的感情。我们从此可以看到：革命者之间的感情是何等的深厚！

三、从版本的角度，研究一个作家对一部作品的惨淡经营的苦心。

以巴金同志的《雪》为例。

《巴金文集》第二卷中的《雪》，作者对这一书名作自注说："小说原名《萌芽》，一九三三年八月在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收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内。初版两千册，未售尽，即被禁止发行。一九三四年八月，我忽然'心血来潮'，替小说中几个重要人物改名换姓，并重写结尾，又将书名改作《煤》，交给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说已经排竣，打好纸型，并已在报刊中刊出广告，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看到了小说的校样，马上通知开明书店停印这书。我不服气，自费印了一版（书名改成了《雪》），委托生活书店秘密发行。后来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度取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我便将《雪》的纸型送给该社。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雪》在上海公开出版，但这所谓'初版'已经是第三版了。——一九五七年六月注"。

巴金同志自费印行的《雪》，"版权页上印的发行者为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注有英文地址。……这自然是假话。因为书并不是在旧金山出版的。只是给'检查老爷'出个难题，让他们扮演捉

迷藏，抓不到发行人而已。”（见《晦庵书话》第129页）1939年3月，《雪》又以《朝阳》的书名发行。

解放后出版《巴金文集》，所收人的《雪》虽然是改定本，不过初版《萌芽》的结尾也有特点，所以在《雪》后又附录了《萌芽》的结尾，从一部以煤矿生活为背景的作品——《雪》的出版，足以说明当时斗争的尖锐，累次改换书名，可以看到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作品惨淡经营的苦心。从这里还可以说明，版本学对于一个作家的作品的版本研究，与文学史对于一个作家的作品研究，有时可起相辅相成的作用。

四、从版本的角度，研究中国文网史，提供鉴证的历史材料。

以瞿秋白同志翻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马南邨的《燕山夜话》为例。

中国文网史的研究，应该受到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等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里，录存了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一次查禁文艺书籍的目录，共计149种，至今还受到研究现代文学者的重视。张静庐先生辑注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也收录了部分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的书刊目录。禁书目录不等于文网史。但禁书目录是被禁书刊的缩影，确系重要的历史文献。被禁书刊更是白纸黑字，文献俱在，其历史价值就不用说了。

《高尔基创作选集》是瞿秋白同志用肖参的笔名翻译的，于1933年10月由生活书店出版。“瞿秋白用肖参这个笔名写了一篇《后记》，十分精辟地介绍了高尔基的思想和本书的内容。其中在谈到《不平常的故事》的时候，加了一个这样的注解：最后，天崩地陷终于来到了，《不平常的故事》——译文是史铁儿的遗稿，听说国内已经出版过的……。《后记》是瞿秋白写的，《不平常的故事》也是瞿秋白译的。为什么竟把自己的译作称做‘遗稿’呢？原来合众版《不平常的故事》被禁，据说原因是反动派知道了史铁儿就是瞿秋白。现在这一篇既然和别的译文收在一起，为了避免牵涉，史铁

儿就有必要和肖参分开。当时社会上盛传瞿秋白已经因肺病逝世，他就将计就计，把第一个化身史铁儿送入地下，把第二个化身肖参放在国外(语气里可以看出)，来一个五光十色，使'检查老爷'眼花缭乱。古往今来，斗争的方式多矣，在突破文网的历史上，这又的确可以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斗争。"(《晦庵书话》第121—122页)

《三家村札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9年9月出版了单行本。林默涵同志为此书写了序言。序言中说："从围剿《海瑞罢官》到'三家村'开始，黑暗就笼罩了整个文坛，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文字狱遍于国中，正直的作家和进步的作品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进了他们张设的罗网。"廖沫沙同志在该书后记中说：《三家村札记》"是'毒草'还是'香花'？这都有文为证，用不到我在这里多作申辩。为了保存历史真象，现在出版的这本《三家村札记》除改正一些错字和标点以外，基本上没有改动。"这两段文字告诉我们：文网之祸，为害之烈。

《燕山夜话》由北京出版社于1979年4月重印了。该书这次印刷出版，增加了1963年8月的版本中来收入的三篇文章。

五、从版本的角度，研究一个作家治学的严谨态度。

以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为例。

作家治学的严谨态度，往往在图书版本中体现出来。古往今来，莫不如此。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始撰于1940年，1941年在延安出版。范老治学严谨，自认为"旧本《中国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在1951年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这篇文章刊在1952年的版本上。1954年范老又写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把"检查中所得到的对本书缺点的初步认识"归纳在这篇文章之中。1955年，《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曾作为"绪言"刊入《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三版上。1963年，范老又对该文作了较多的修改，刊入1964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第四版上。解放后几次出版发行的修订

本《中国通史简编》,虽书名相同,而内容文字仍存在差异。范老治学的严谨精神,正如他自己在该书"绪言"的末尾所说,"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占有确实可信的资料,坚守晋董狐、齐太史直笔而书的传统史德"。我们从《中国通史简编》的各种版本中看到了范老的这种精神。

六、从版本的角度,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发展和变化。

以叶圣陶的《倪焕之》、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例。

叶圣陶的代表作品——《倪焕之》,茅盾曾誉之为"扛鼎"之作。解放后再版的《倪焕之》,经作者稍有修改。全书不是以解放前的版本中的主人公——倪焕之的痛苦死去结束,而是以他投身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告终。但是在编辑《叶圣陶文集》时,所收入的是1929年的版本。作者在《叶圣陶文集》第三卷前记中说:"《倪焕之》原有三十章,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它重印,有几位朋友向我建议,原来的第二十章和二十四章到末了儿的七章不妨删去。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因此,1953年的版本只有二十二章。现在编文集,又有好几位朋友向我劝告,说还是保存原来面目的好,人家要看的是你那时候写的东西什么样儿。我想这也有道理,就把删去的八章补上了。"《倪焕之》版本的一删一补,都有道理。人的思想适应形势的发展,删的得当。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知人论事,非读编年文集不可。编辑出版《叶圣陶文集》,补也应当。我们搞图书馆借阅工作的同志,针对不同的读者,提供不同的版本,是有赖于对版本的研究的。

另外,《倪焕之》单行本的初版年月是1929年8月。然而,刘绶松、丁易、复旦大学中文系等编写的几部新文学史都误为是1930年印成单行本。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刊有《倪焕之》初版年月订正"一文,作了详细介绍。

有的作家的作品向相反方向转化。例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几经修改,被公认为是一部比较

好的书。但是，在七十年代的初期，作者顶不住极左路线的思想影响，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按照所谓"评法批儒"的调子，重新作了修改。今天，作者倘若重读他那七十年代的修改版，必兴"再回头已百年身"之叹。这对于作家们是多么严肃的鉴戒！

七、从版本的角度，研究历史事件，提供真实的历史文献材料。

以《鲁迅全集》为例。

《鲁迅全集》已有四个时期的版本。一是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上海复社初印本(1947年作家书屋重印)，及1948～1949年哈尔滨光华书店影印本。一是1956～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注释本。一是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1938年版重排本。一是最近出版的新注释本。

1956～1958年的版本在分卷上与1938年的版本不完全相同，在内容上有注释，1973年的版本系据1938年的无注释本重新排版印行。从1958～1973年的十几年，《鲁迅全集》为什么从有注释的版本而变为无注释的版本？这事关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问题。"文化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一条"资产阶级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结合的黑线专政"的理论，借1956～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第六卷中的一条注释，进一步对文艺界进行围剿，三十年代正直的作家无一幸免，注释本的注释中，涉及到人物和作品较多，删无从删。这就是无注释本在"文化革命"中出版的历史背景。现在关于"两个口号"问题的一些事实经过，已经比较清楚了，文艺界也进行了拨乱反正，《鲁迅全集》新的注释本已经出版。然而，前三个时期的不同版本，却成为史实研究者的实物见证。

八、从版本的角度，研究西学东渐，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介绍。

以亚当·斯密(Adam Sm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的中译本为例。

戊戌变法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传入我国。最早的中文译本是1902年由南洋公学出版，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的。译名题为《原富》。在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空气中，严复认定中国要强盛，在于学术思想。《原富》翻译出版，使西学东渐，对资产阶级思想作了介绍，在当时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1年，郭大力、王亚南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重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改题名为《国富论》。这个译本，文字通俗，术语准确，传播的范围比第一个译本广泛，享有更多的读者。

解放后，《国富论》这个中译本经译者重新校订，于1979～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重新排印出版，译名题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几种译本，反映了不同的时代需要，反映了历史的进步。

九、从版本的角度，研究国外友好人士的著作，介绍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

以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为例。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斯诺，1936年访问我国陕北革命根据地，写了《西行漫记》一书。该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用英文出版了初版本。它的出版，直接向西方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工农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

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译本在上海用复社名义出版。胡愈之先生说，它是"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为适应当时的环境，没有用《红星照耀中国》原书名，用的是《西行漫记》这个现在流行的书名。

1979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了《西行漫记》中译本的新一版。这个版本，补全了解放前上海复社版当时未译出的第十一篇中的

《那个外国智囊》一节。

十、从版本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中某一学科的发展概况。

以华罗庚同志的《数论导引》为例。

《数论导引》是1957年7月出第一版的。1975年4月第四次印刷出版时，对第一版中所论及的著名数论问题的进展情况作了评述。内容主要反映在附录上。附录说，由于这些年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将其用于数论，获得不少重要成就。反之，将数论方法用于应用数学，特别是计算方法，也获得不少重要成就。这是数论方面的一斑，足见全豹。自然科学书籍是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记录。自然科学书籍的新版本，反映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概况。图书馆收藏自然科学书籍要注意反映学科新成果的新版本。要做好这项工作，离不开对新版本的研究。

十一、从版本的角度，研究一种书由于体例的变更，新旧版本同时存在着的作用与价值。

以《辞海》为例。

《辞海》现有两种形式的七个版本。一种是综合形式的四个版本，即：一由舒新城等主编，1936～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上下两册，精装大三十二开本；二由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辑，1965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出版，分上下两册，特精装大十六开，内部发行的未定稿本；三由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辑，1979年10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上中下三册，特精装大十六开1979年版；四是1979年版缩印本，一册，特精装大十六开。另一种是分册形式的三个版本，即：一是1962年初出版的、十六分册、平精大十六开的《辞海·试行本》，二是1975～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二十个分册、平精兼装大三十二开、内部发行的修订稿本，三是在修订稿本修订后于1978年起，由上海辞书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的、题名为《辞海·修订本》的版本。

解放后出版的《辞海·未定稿》本和《辞海·1979年版》及其缩

印本，基本上保持了解放前版本中的汉字"按部首编排，以字带词，而词又是以字数、笔画为序"的特色。但体例不同了，各有它们的功用。例如"目的"一词，1936年版是这样注释的："意之所趋向，其豫定欲得之结果，犹射者之视的，故云目的。"然而，解放后出版的各种版本均无"目的"这个词目，这跟"百科全书性的综合性质辞书"是相矛盾的。

解放后出版的《辞海·试用本》、《辞海·修订稿》和《辞海·修订本》，它们的特点是按学科分册出版，比合订本更适合于专门学者使用。另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版本，在内容上有些词目的注释不准确，某些词目带有林彪、"四人帮"的政治色彩，是比较差的版本。

新书版本的作用远不止这些，本文不一一例举了。新书版本研究的课题是广泛的。比如：新书版本的普通目录和专科目录；新书版本的保藏与利用；新书善本的收录标准和范围；新书版本和新书善本的著录问题；等等方面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年第2期）

古籍版本及其鉴别

韩锡铎

我国的古籍十分丰富，向有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之称。自殷周至于近现代，在这数千年中，为了使用和流传，一部书往往经过多次抄写刻印，甚至经过多次编辑注释，这样就形成了众多的版本，例如唐代诗人杜甫的诗集，到现在为止，不同版本有二百多种。关于古籍版本的科学，就是版本学。

版本源流

要做到准确地选择好的版本，就应了解有关版本的知识。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籍，唐以前的写本已经很少很少了，几乎都是宋代以后的，而绝大部分是明清两代的。综合这些古籍，就其产生的方式来说，有三种类型：一是用手抄写的；二是雕版印刷的，也包括各种活字印刷的；三是石印、铅印、影印等近现代技术印刷的。近现代技术印刷的书籍，大家都熟悉，也容易识别，无须多说，这里只简介一些用手抄写的和雕版印刷的古籍的知识。

用手抄写，是唐代以前书籍的产生和流传的主要方式。唐代以后，虽然雕版印刷盛兴，清末以来又有了现代的印刷方法，但抄写仍然是书籍产生和流传的方式之一。同是抄写的图书，为了便于区别，又有稿本、写本、影抄本、抄本之分。

稿本，顾名思义即是作者的原稿。稿本一定是一部，又分手稿本和清稿本。手稿本是作者亲笔所书。清稿本是据手稿本誊清的本子，有的是作者亲自誊写，有的是门生或他人代为誊写，但一般都经作者审阅。

写本，唐宋以前凡是用手抄写的书，皆称写本。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甘肃敦煌发现的大量古籍，除少数刻本外，皆称写本。雕版印刷盛行之后，也称那些并非从他书抄录，产生时即是手写的书为写本，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及私人给皇帝的进呈本等。

抄本，是据他书抄录的本子。那种把纸铺在原书上，描录下来的抄本则称影抄本，如是据宋本影抄，称影宋抄本，据元本影抄称影元抄本。影抄本可以保证在文字上与原书一致，所以被人们重视。

无论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是我国首先发明，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社会做出伟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是从宋至清我国书籍的产生和流传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产生的古籍，因其量大，名称也多，最为复杂。

如果从刻书时间来分，则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

现代本等。

如果从刻书系统来分，则有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即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机关刻印的书，因其机关名称的不同，又有不同名称。各朝国子监刻印的书，皆称监本。明清两代宫廷内刻印的书，称内府本。明代宫廷刻书由司礼监掌管，其地点在经厂，所以又称司礼监本或经厂本。清代康熙时在宫内武英殿设修书处，所以武英殿刻印的书又称殿本。明代分封各地的藩王也刻书，称藩府本。清代同治年间，在金陵、江西、福建、浙江、两湖、两广、四川等地设立官办的书局，所刻印的书称为局本。等等。

私刻本，即私人刻印的书，因主要不是为了牟利，所以校勘精审，从宋至清，私刻本精品很多。

坊刻本，即专门以刻书为业的书铺刻印的书，因为是为了营利，一般来说，从文字到书品都要次些。

如果从版次来分，有初刻本、原刻本、翻刻本、重刻本、递修本之别。初刻本，即第一次刻本。原刻本，即翻刻、重刻的底本。翻刻本，也称复刻本或影刻本，即按着底本的样式模仿刻印的本子。重刻本，即根据底本重新刻印的本子，其版式行款不一定与底本相同。重修本，是原书的部分版片已经损坏，后印时将损坏的版片修补好再进行印刷的本子。如果经过两次以上修补，则称递修本。如元代灭宋后，将南宋官刻的一些版片集中到西湖书院，进行修补印刷，明代洪武时又把这些版片运到南京国子监，又多次进行修补印刷，人们称用这部分版本印的书为三朝本，因越到后来印出的书越不清楚，版面不洁，也称为大花脸本或邋遢本。

雕版印刷的版本名称还有许多，如初印本、后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大字本、小字本、精刻本、写刻本等等，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不再赘述。

活字印刷，宋代已有，大家熟知北宋庆历年间毕升用泥活字印书，可惜没有实物传下来。元代王桢造木活字印书。也没有实物

传下来。明代又出现了铜活字，如无锡的华氏、安氏两家铜活字印书最为有名。清代活字印书更为盛行，宫廷内也用来印书。如雍正时用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时用木活字印《聚珍版丛书》，清高宗弘历嫌活字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后来中华书局印《四部备要》也沿用此名。

版本鉴别

根据图书本身的条件来鉴别版本。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制成书时即有的条件，二是后来附加上去的条件。

1.制成书时即有的条件

(1)内容。鉴别版本的其他条件一般都容易造伪，只有书的内容不能造伪。虽然著者时代较早的书，不能用内容来考察版本，但著者年代较晚的书，用内容来考察版本，则是最可靠的依据。我们在考察版本时，应该仔细审查书的内容，看其所记的事件、人物、地名、书名、制度及各种事物的时代特征。如辽宁省图书馆藏有一部《续附经验奇方》，书前有"大定壬辰"墨地白文牌记，前人据此定为金大定十二年刻本。然而仔细检查该书内容，有"鸦片"一词。考鸦片我国古代称为"阿芙蓉"，到明代始称鸦片。那末该书定为金刻本就站不住了，又根据其他条件，改定明刻本。至于"大定壬辰"的牌记，系后人伪造。

(2)书名叶和牌记。现代印书，有书名页和版权页，用以标明书名、著者、出版时间、出版地点、版次、印数及开本、价格等情况。古人印书也有约定俗成的程式。一开始有牌记，即在书的序跋、凡例、目录之后或卷末等空白处刻有标明出版时间、出版者的木记，到明清时才有书名页(也称内封面)。有时可以利用牌记和书名页提供的内容来判定版本。如宋荣六郎刻本《抱朴子内篇》卷末有五行七十五字的牌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

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根据这个牌记，可定此书为宋绍兴二十二年荣六郎刻本。

（3）序跋。一般序在书的前面，跋在书的后面。序有著者自序，亲友的序，刻书人的序；跋多数和刻书有关。序跋是鉴别版本时必须审阅的，有相当数量的古籍可以通过序跋来判定版本。既使不能解决版本问题，有时也可以提供该书的版本源流、著者及该书价值等情况。利用序跋来鉴别版本应该注意两个问题：首先，要根据年代最晚的序跋，因为在翻刻、重刻时往往把底本原有的序跋都刻上，这样一部书的序跋就会很多，只有年代最晚的序跋才是刻印该书的序跋。其次，只有内容中谈到刻书事宜的序跋年代，才能做为该书的版本年代，那些没有谈刻书的序跋年代，一般不能作为该书的版本年代。

（4）字体纸张。字体纸张是可以反映时代特征的，因为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其写字的习尚、生产水平也往往不同，必然要反映到书籍的字体和纸张上。例如，把解放前、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现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出版物摆在面前，让我们识别其年代，只要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同志都会根据字体、纸张及其他方面的特征把它们准确地识别出来。古籍亦可以用这个方法识别，只不过由于不熟悉困难罢了。前人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可资借鉴。宋代浙江地区早期刻书多用欧字，后期多用颜字。四川刻书北宋时字体近似颜字，南宋时则出现一种撇捺较长的字体。南宋时福建刻书，其字体近于宋徽宗的瘦金体。元代因盛行书法家赵孟頫的字，故很多书籍字体近于赵字。明初刻书字体多用楷体字，嘉靖时随着复古风的盛行，出现了方整的近于印刷体的字体。万历时出现了笔画较粗的匠体字。天启、崇祯时又出现了笔画较细长方形的匠体字。清初多用方整的楷体字刻书，乾嘉以后多用方形的匠体字。宋代浙江、四川印书多用白麻纸，福建则多用竹纸。明代印书好一点的

用白棉纸，一般多用毛边纸、毛太纸。清代印书讲究的用开化纸，一般则用连史纸和竹纸。这些就一般情况而言，事物是复杂的，什么时代刻印的书籍用什么字体，什么纸张，不能一刀切一概而论，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要准确地识别字体纸张，不接触实物，也是困难的。

(5)刻工。古代的一些刻字工人在刻书时常把名字刻在版心下方或其他角落。一个刻工的工作时间有限，如果知道他刻的某一部书的具体时间，那末就可以推断他所刻的其他书的时间了。如清代宫内天禄琳琅藏有一部宋淳熙三年刻本《大易粹言》，刻工有胡珏、胡刚、徐亮等人。解放后在南京发现一部宋赵明诚的《金石录》，亦有上面三人等刻工姓名，再证以其他资料，就可定此书为宋淳熙刻本了。

(6)讳字。避讳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定的制度，即书写时遇到当代帝王及所尊者的名字时，要回避。有时甚至同音字皆要避。其方法是少写末一笔或改换其他的字。避讳制度使古籍在文字上造成很多的讹错，但我们只要掌握了它，可根据书中所讳的字，来判断该书的版刻年代，尤其是避讳制度较严的时期所刻印的书籍，用讳字来鉴别其版本年代是一条重要的根据。但是也不能一刀切，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或者不被重视的书籍，也有的不避或不严。陈垣先生的《史讳举例》一书，介绍历代避讳制度很详。

(7)行款版式。行款，指的是一叶多少行，每行多少字；版式，指的是一版四周的边栏是单是双，及版心是黑口白口，鱼尾有无和数目等。同一版本的书，其行款版式必然相同。但行款版式变化不多，而我国古籍却有千千万，因此不同版本的书行款版式相同者亦多。行款版式只能做为验证版本的条件，不能作为判别版本的主要依据。

(8)其他。古籍在编书凡例中，常有关于刻书的内容，在卷端刻署著者姓名的地方，在版心及其他地方，有时也刻印有刻书者的

姓名或其室名堂号，同样可以做为鉴别版本的依据。如明嘉靖十五年玉几山人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端刻有“大明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一行。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刻印之书，版心多有“汲古阁”字样。

2.流传过程中附加上去的条件

(1)批校。古人读书时，常用不同版本之书相校，将文字的不同注明于天头地脚或字里行间。如果我们遇到一部书，无其他条件可判断版本，但上面有前人校语，指出某字某某本做某字，那么就说明该书不是校语中所列举的版本，如果所列举的版本较多，就缩小了我们判断的范围。

(2)题跋。古时一些藏书家，常把得书经过、版本鉴定意见及对该书的评价写于书的前后或其他地方的空白处。这些题跋，可供我们考订版本时参考。而一些见广识博的藏书家，他们在题跋中所发表的意见，一般都是很精当的，经常可作为依据。如黄丕烈、顾千里、陆心源、缪荃孙、傅增湘等人的题跋就很被人们重视。

(3)藏印。藏书印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书的递藏源流，也可以给我们鉴别版本提供启示。如果书上有清初著名藏书家季振宜的藏书印，就告诉我们该书版本的年代不能晚于康熙。

鉴别版本需知目录学

鉴别古籍版本，需要了解有关的工具书，尤其是有关古籍的书目。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始，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古籍的书目。我国古代的目录学有一传统的优点，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纵观这些书目，可以了解古籍的流传情况和学术的发展情况。书目的类型很多，有的属于社会存书目录性质，有的属于某一朝代的著作目录性质，有的属于藏书目录性质，有的属于知见目录性质，有的属于推荐目录性质；有的只著录书名，有的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有的还著录版本，有的还有详略不同的提要，有的还带有

书影。类型不同，著录内容不同，它们的功能也就不同。我们要使用它们，必须对它们的性质和特点有所了解，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如果在书目中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书名及其版本，一定要仔细审定其特征是否与所鉴定之书符合。既使完全相符，也切勿盲目照抄。因有些书目的质量不高，如清代莫友之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和邵懿辰编著邵章续录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书目，虽然所收版本较多，但错误也较多。既使质量高的书目，如《四部丛刊书录》、《中国版刻图录》等经过张元济、赵万里等高手鉴定过的书目，也难免有错。如果抄录了错误的著录，我们的鉴定也就错了。

鉴别古籍版本，要有较为广博的学识

古籍的内容无外乎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人类社会是有时代特征的，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紧密联系着，也有时代特征。这些时代特征有时会成为鉴别版本的根据。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掌握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及各种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的知识。略举几例：

明陈仁锡编纂的《丘琼山先生大学衍义补赞英华》六卷，书名叶刻"陈太史订大学衍义英华"。有人根据刻书风格鉴定为万历刻本。但明清两代只有考中进士又进了翰林院的人才能称太史，陈仁锡天启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定万历刻本显然错了，此书当刻于天启或崇祯，应定为明末刻本。

明李盘撰的《诗纪》二十五卷，有人定为明刻本，其根据是刻书风格和书前有张明弼、陈际泰等人的序。此书风貌确实象明末苏州刻本，张、陈等人也确是明末有名之人。但看其内容，《归金陵》诗下注云："乱后尚未人石城一步，二十四日驱江南……"，《登燕子矶》诗下注云："姚永言至，执手相哭失声，读申酉年事，欷歔欲绝，因共商避地之策。"查考历史，明代中后期，南京并无大乱。乱当是于清兵进入南京。申是崇祯甲申，酉是弘光乙酉。实际上此书应是清顺治刻本。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总之，鉴别古籍版本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它的学术性是很强的。为了确保所用资料的准确性，以古籍为主要资料的工作者应该了解和掌握它。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

古籍版本谈

方　原

古籍版本

张之洞《书目答问》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古人读书十分讲究版本，是由于古书的版本很多，往往同一本书，有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版本，不论批校、注解或刻印质量，都有高低不同之分。因此，选择校勘认真、注释精审的版本，就成为读好书的一个重要条件。

古籍版本的种类很多，大体上说来，是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的：一、根据刻书时代的不同而分，如唐卷子本、宋本、元本、明本等；二、根据刻书地方的不同而分，如蜀本、建本（福建旧建宁府）、浙本等；三、根据刻书单位性质的不同而分，如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其中官刻本又可分为监本（国子监刻印的）、经厂本（明司礼监所属经厂刻印的）、殿本（清武英殿刻印的）等，私刻本和坊刻本也分为若干种；四、根据雕刻时间的先后而分，如原刊本、重刊本等；五、根据印刷的颜色而分，如朱印本、蓝印本等；六、根据雕印的质量而分，如精刻本、写刻本、翻刻本、百衲本等；七、根据字体大小和形状而分，如大字本、小字本、仿宋本、聚珍仿宋本等；八、根据装订的情况而分，如巾箱本、袖珍本等；九、根据增减和批注情况而

分，如校本、批点本、节本、残本等；十、根据非雕刻印刷也可分为抄本、手稿本、进呈本、拓本、影印本等；十一、此外，根据流传情况还可分为孤本、秘本等。古籍版本的名目是繁多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孤本、珍本、善本

读古书要讲究版本，要找错误最少，刊行较早，更近于原来面目的书读。但是，过去却有一些人对书的内容倒不大讲究，而一味地追求"古"和"孤"，不惜重金搜购一些刊行虽古，而内容参考价值并不十分大，或内容和今本并无重大差别的书。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好古者重宋版书，不惜以千金、数百金购得一部，则珍藏之，不特不轻示人，即自己亦不忍数翻阅也。余每窃笑其痴。王鼎臣观察定安酷有是癖，宰昆山时，尝买得宋椠《孟子》，举以夸余。余请一观，则先令人负一椟出，椟启，中藏一楠木匣，开匣，乃见书。书之纸墨亦古，所刊笔画，亦无异于今之监本。余问之曰：'读此可增长智慧乎？'曰：'不能。''可较别本多记数行乎！'曰：'亦不能。'余笑曰：'然则不如仍读今监本之为愈耳！奚必费百倍之钱以购此耶？'王恚曰：'君非解人，不可共君赏鉴。'急收之，余大笑去。"

象王鼎臣这样的人，把书当做古董，并不是为读书而藏书，可以算是一个标准的"书橱"。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雕刻刊行的书籍一般质量较高。从今天保存下来的不多的宋版书来看，大多是书写端正，楷法隽秀，刻画准确，纸墨精良的珍本。由于宋版书留存不多，北宋刊本尤为稀少，因而历来都被视作珍本。但是宋版书也并不是完全可靠，特别是一些坊刻的书。当时陆游就曾经指出："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板，而略不校雠。错本书散满天下，更误学者；不如不刻之为愈也。"（《跋历代陵备》）

历代藏书家和古旧书行业对孤本、珍本、善本书的标准虽也有所不同，但大多只是注重在时间的界线上，而对书的内容却不大在意。过去所谓珍本、善本，一般都是指的宋元旧版书，后来缪筱珊定了划分善本非善本的四条界线：一、凡刻于明末以前的为善本，明以后的则不算善本；二、抄本不论新旧都称善本；三、批校本和有名字题跋的都列善本；四、日本及朝鲜重刻中国的古籍不论新旧都为善本。自这四项条规制订以后，一时奉为"金科玉律"。（《蠹鱼篇》）

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今天对于孤本、珍本、善本的理解，当然不应该再象过去那样，把时间的界线作为划定标准的唯一条件。我们首先要从书籍本身对学术研究使用价值的大小来衡量。只要对科学研究有重要价值、校勘正确的就可称作善本，不能一提宋元就价值千金，而不问它的内容是否有用。明末以前的古本，凡是刻印精工和内容好、而且少见的本子，应该称为珍本、善本，而明以后的清代及民国刻印本，只要是内容有价值而又罕见的，也应该视作珍本、善本，例如太平天国时代和近代的一些革命文献，就是极为珍贵的珍本。至于抄本、批校本是否应列作珍本或善本，也应看它的内容是否有一定价值，而不能一概而论。

同书异名与同名异书

在古籍中有不少书的内容相同而书名不同，也有一些书的名称相同而内容不同。例如《南华经》就是《庄子》，《吕览》就是《吕氏春秋》，《左氏春秋》就是《左传》，它们书名不同而内容完全一样。有不少的个人诗文集往往有好几种书名，内容却是完全相同或仅有小部分差别。如李白的诗集名《李太白集》，有的版本又叫《李翰林集》；柳宗元的诗文集，多数版本称《柳河东集》，有些版本称《柳柳州集》或《柳文惠公集》，而明代新会莫如士的校刻本则仅称《柳文》（其中也包括诗）；文天祥的集子称《文山集》，有的版本又称

《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或《文山先生集》等。

以上说的是同书异名，再说同名异书。例如南宋赵闻礼与元代杨朝英编选的词曲集书名都叫《阳春白雪》，而内容却完全不同。赵闻礼编选的是宋人词集，编录《草堂诗余》（南宋何士信编的词总集，以宋词为主，间有唐、五代作品）所遗，以及同时代人之作，并保存了不少宋词作家资料。杨朝英选辑的《阳春白雪》则是选录元人散曲六十余家，共十卷。第一卷收有燕南芝庵《唱论》一篇，和宋、金人所作词（大乐）十段。内容搜罗丰富，是研究元人散曲的重要资料。（杨本另有九卷本一种，所选曲数较多。）又如同名《诗品》的诗论集有两种，一为南朝梁钟嵘所作，另一为唐代司空图所作。钟著专论五言诗，将自汉至梁较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分为上中下三品，故称《诗品》又因品第之外，再就作品论其优劣，故又有《诗评》之称。除品第评论之外，更指出前后作家间的继承关系，建立了历史的批评方法。司空图的《诗品》中，则将古代诗歌所创造的各种风格，区别为雄浑、冲淡、纤秾、沉著等二十四类（故本书一名《二十四诗品》），再就每种风格的特征，各用形象化的四言韵语十二句加以描摹，作为对诗歌的品评。

在个人的集子中，也有这种情况，例如唐代柳宗元的诗文集称《柳河东集》，而北宋散文家柳开的文集也叫《柳河东集》，书名完全相同，作者却是两人。又如同名《昌谷集》的有两种，一为唐代李贺所作，一为宋代曹彦约作；同名《华阳集》的有三种：一为唐代顾况作，一为宋代王珪作，另一种为宋代张纲作，等等。如果不了解书的内容，光看书名，就无法辨别。

造成同书异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古时刻印的书籍版本很多，刻书的人常常将前人刻印的书名稍加改动或索性另立名目，以便与其他版本有所区别；也有的是经过后人校勘、评阅、笺注等加工后而重新起的名字。

但不论取什么名字，都有所根据，大都是从作者的别号、籍贯、

官衔、封号、谥法等而来的。我们如果注意一下古籍中古人的著作集名，就可以发现，古人著作集名的由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用作者本名作为集名。如唐代诗人杜审言的诗集称《杜审言集》；王昌龄的诗集名《王昌龄集》。但比较起来，用作者本名作集名的情况是较少的。

二、用作者的字和别号作为集名。如曹植，字子建，集名即为《曹子建集》；李白字太白，集名《李太白集》。

三、用作者的籍贯作为集名。如唐代张九龄为曲江（今属广东）人，集名《曲江集》；韩愈为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一作昌黎人，集名《韩昌黎集》。

四、用作者曾经居住过的地名作集名。如杜牧有别墅在樊川，集名即为《樊川文集》；陆龟蒙曾在松江甫里住过，集名《甫里集》。

五、用作者的官衔作集名。有的是以作者曾任官职中最高的官衔为集名，有的则以作者诗文创作较多或成名时的官衔为集名，不一定是最高的；也有一些是以作者做官时所在地名为集名的。如东汉蔡邕曾官左中郎将，故集名《蔡中郎集》；唐代韦应物曾任江州及苏州刺史，集名《韦刺史诗集》，又名《韦江州集》《韦苏州集》等。

六、用作者的封号、谥法作集名。如南北朝谢灵运袭封康乐公，集名即为《谢康乐集》；司马光封温国公，谥文正，集名《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等。

七、用成书年代作集名。如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的诗文集编于穆宗长庆年间，集名《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

八、用作者的堂名室名作集名。古代的士大夫除了住宅之外，还有读书、藏书的场所，多以堂、室、斋、居、轩、亭、庵、馆为名，范围大一点的称楼称阁，朴实一点的称草堂、精舍等。如明代汤显祖家有玉茗堂，集名《玉茗堂全集》，清代袁枚家中筑有随园，集名《随园诗话》。

除了以上所举的以外，还有一些作者自编的集子，名称亦有一定的含义。例如唐代著名文学家皮日休自编的《皮子文薮》，以文稿繁如薮泽，故名；北宋著名文学家王禹偁自编的《小畜集》，是用《易》小畜卦作为集名。

（原载《随笔》1979年1期）

古籍版本鉴定我见

叶　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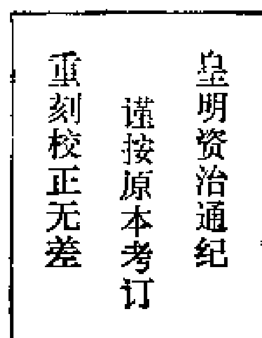
版本学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凡写本、稿本、木刻本、活字排印本、批校本、传录本，以及雕版源流、传抄源流、原刻、翻刻、善本、劣本之分，以至字体刀法、纸张墨色、版式行款、藏书印章、装潢样式等等，都是版本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可谓丰富之至，且彼此又皆互相关联，缺一不可。

以下分别探讨古籍鉴定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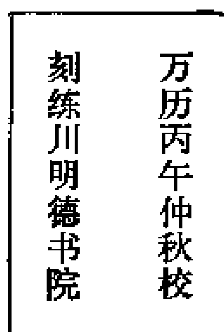
依据牌记、封面和序跋来判别

比较好的刻本，往往有名家在封面题写书签，这对版本鉴定很有利。如清华馆藏元刻本《注陆宣公奏议》，封面有周永年亲手题"陆宣公奏议至正甲午重锓本借书园藏"书签，有"借书园本"朱文印章（借书园系清历城周永年室名），经考证该书确为元至正十四年翠岩精舍刻本，周永年题签无误。

许多刻书，多在序目后边或卷尾书末刊刻牌记。例如，明刻本《重刻校正增补皇明资治通纪》前有嘉靖乙卯东莞清澜居士陈建序，刻有长方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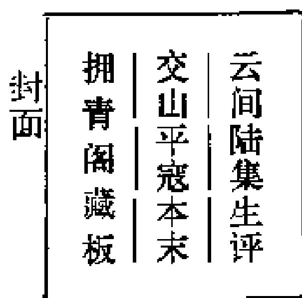

皇明资治通纪
谨按原本考订
重刻校正无差

又如，明万历刻本《重订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前有万历庚戌（三十八年）吴中立序，后有长方牌记。


万历丙午仲秋校
刻练川明德书院

如果封面所反映的刻书年代、作者及藏书家都与书的内容一致，那么封面则是最可靠的判断依据。如清康熙刻本《交山平寇本末》前有陆庆臻（集生）和潘耒的序。

梓年子壬熙康


封面
云间陆集生评
交山平寇本末
拥青阁藏板

古籍书多在正文前面刻有序文，有的在正文后面刻有跋文、序跋，内容多是叙述书中内容、编著意图或刊刻经过。文末署撰写序跋姓名、朝代、年月。一般序跋的撰写时间和刻印时间相差不远，

因此，参照所署年月、结合字体纸张，判定其刻版时代是比较可靠的。如清乾隆刻本《竹书纪年统笺》前有卢文弨序，有乾隆十五年马阳序，崔万恒序。但也有后人翻刻时将原序原样刻入，甚至将序年挖改作伪，故切忌单纯地凭序断年。例如，元泰定元年梅溪书院刻本《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总目后有“时景定甲子春刊于梅溪书院”长方形图记，经查明“景”字系挖补，根据《书林清话》记元泰定甲子梅溪书院曾刊行此书，而元泰定甲子与宋景定甲子相距六十年。

依据后代名人题跋、识语和名家藏章印记来判别

不少学者或藏书家得到书籍后，往往在卷首或卷尾或前后扉页上书写其题跋、识语，叙述该书内容正误、版刻时代、收藏源流、流传情况以及个人获得经过并钤印图章。例如：

（1）明抄本《皇极经世通变》的扉页上注“是书在宋板行久矣，无爆于兵，间有藏之者，遂秘而不传，故为经世之学者，惟知有祝氏钤，而不知祝钤皆本于此。是编原本，藏于内府，士夫罕见，鹅湖先生录得一部，未尝以示学者，正德甲戌秋，先生寓阳羡，予往候之，承以全帙借钞，计十册，凡四十卷云，是岁十月云崖识。”祝钤指宋祝泌撰之，皇极经世钤也。鹅湖先生即费宏之别号也。说明该书以费宏抄本为本。

（2）明末刻本《蜀中著作记》，扉页题“此蜀中著作记乃曹能始广《蜀中广记》之一也，全书一百二卷，世不经见，余生平所睹记者惟《名胜记》三十卷，《方物记》十二卷。此著作记故宫有之，第所存祗七卷。余方纂辑全蜀两宋文钞，乃于清华书库幸得此编，爰假归属写官别录副存之。能始留心志乘，多见古籍，其中文学颇足补余所未逮。第时有脱篇错简，若无它本可以是正，为足憾耳。庚午岁大寒节傅增湘书于藏园之长春室”。根据傅增湘的题跋，我们得知明刻本《蜀中著作记》世不多传，除清华书库，仅故宫有一残本。书

中所记巴蜀历代著作，有些至今已经失传。

但在通过名人跋语鉴别版本年代时，特别要注意跋语本身的真伪问题。清华馆藏有一部清抄本《巴西文集》，卷后有乾隆四十年鲍廷博题志，并钤有鲍氏“已文”、“知不足斋”、“遗稾而留”等印章。据此，我们曾将此抄本定为乾隆鲍氏抄本。但经过与他馆藏书校对，发现同书同题跋者共十几部，均系书商假鲍氏抄本抄写而作伪，因之均给以否定，而定为清抄本。

另外，通过名家收藏的钤印，诸如：楼、斋、堂、阁、姓名、别号、收藏、审定、鉴赏、珍秘……等印，可以帮助我们识别版刻时代，且可看出书籍流传情况，因此，藏章是判别版本的“帮手”。例如：

明弘治刻本《群书集事渊海》，除了封面有罗振常题识并钤印外，卷首钤有朱彝尊、王锡元等印章。

清刻藻堂抄本《周易阐理》，除了有清末名人冯桂芬题识外，扉页上还钤有长方朱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吴玉墀家藏《周易阐理》一部，诗书三本”。还有“璜川吴氏藏书印”。说明这部书是在乾隆时期准备修四库全书时，由浙江地区藏书家吴玉墀进献的。

明万历刻本《南华真经副墨》扉页有刘宜甫题识并钤印，陈习斋题识并钤印。

清墨拓原稿经折本《古砖本砚文》，封面有乾隆时期的学者张廷济的题识，每一拓片均有马起凤(傅岩)亲笔题释一至二或三则及他人题识，册末有道光年间杨宗濂等二十一人题识、题跋，钤印之多亦属少见。从中可以看出该书曾受众多学者的重视和赏识，墨拓时间当在乾隆或乾隆以前。

题识、题跋和藏章对判别版本真伪是一项比较可靠的依据。

依据书名冠词来判别

有的刻本，在书名上常冠以“国朝”、“皇朝”、“圣宋”、“皇元”、

"皇明"、"昭代"、"大明"、"皇清"等字样，以示对当代的尊重，有此字样者，一般指本朝所刻，对"皇明"、"大明"、"皇清"字样者，其刊刻时代就很明确。对同一书，若后一朝代再版，就改为"某朝"。例如：清彭廷梅辑《国朝诗选》，清允禄编《皇朝礼器图式》，从冠词看应该是清刻本。《宋诗钞初集》、《明史杂咏》、《明纪全载》，从书名看，知非宋、明当代所刻。明李贤等纂《大明一统志》、明顾其言辑《新刻皇明百将列传评林》则明刻是无疑了；《皇清开国方略》则无疑是清刻本了。

依据讳字来判别

周秦以来，对神、最高掌权者和尊长的名字，常用"避讳"。进入封建社会人民对帝王名字，不许呼唤，即临文书写，亦须谨避。"避讳"的办法表现在文字书写上，凡是遇到当代君主和尊长的名字时，要用缺末笔、改字、空字等方法避开。这种习惯，从秦汉开始，承于魏晋，盛于隋唐，严于赵宋，因此在宋版书中避讳而改字缺笔的痕迹，触目皆是。由于元刻本在当时用蒙古文，即使译成汉字，也仅取其音读，所以避讳的禁例不甚多见。明继元起，除了复影宋版外，避讳不甚严格，但从明天启、崇祯之后，其法渐严，清入关后，初未注意，康熙时其风又炽。这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性质，而且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也为人们阅读古籍著作增添了不少障碍。但事物总是利弊互见，由于各朝代讳字不同，我们可以利用其讳字来考察区分古籍版刻的时代和真伪情况，以及刊刻演变。例如：

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中避宋讳，如"徵"、"貞"、"構"、"勗"等。

清牟钦元的康熙刻本《燕赵吟》中避"玄"字为"玄"字。

乾隆刻本《司马文正公传家集》避"弘"字为"弘"字。

依据刻工姓名来判别

有些刻本的版心下镌有刊工姓名，这可作为鉴定刻本年代的重要依据。如：甲书刻有刊写人姓名某某，从序跋、牌记、年月等方面确其为宋本，而乙书无序跋、牌记、年月，但其版心下刻有与甲书相同的刊工姓名，且其字体纸张又和甲书类似，则一般可以断定它是与甲书同一时期的刻本。例如，南宋杭州刻本《广韵》一书的刻工姓名与《乐府诗集》的刻工一致，因此，虽然《乐府诗集》无序跋，牌记和年月，但从刻工、纸张、字体判定此书也是南宋杭州地区刻的。

《筹海图编》，北京图书馆的明嘉靖本与清华馆的明隆庆本，刻印的时间接近，字体，纸张相似。但嘉靖本版心刻有"杭州府吏陈言写"，刻工多是徽州黄氏，从而清华馆所藏无写工，刻工亦皆非黄氏，与北京图书馆所藏有别。

依据行款字数来判别

同一古书在流传过程中，常常会有先后不同的多种刻本出现。比如《史记》、《楚辞》、《汉书》、《杜工部诗》、《韩柳文集》、《陶渊明集》等名家著作，其刻本种类繁多，各家刻本的版式规格往往大小不一，行款字数多少不等，这些均可作为鉴定版本的参照。例如，清华馆藏《南丰先生元丰类稿》是明成化邵廉校刻本，为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而明崇祯曾懋爵刻本，为半页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无鱼尾。

依据各家著录来判别

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是版刻图籍的创始国家，各种古籍收藏十分丰富。历代学者和藏书家们对古籍的各个方面都予以考证和著录，流传至今的各种目录著述

丰富，这也是我们识别版本的重要参证。例如我们可以根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千顷堂书目》、《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贩书偶记》、《四库全书总目录》等著录来判别版本时代。

有不少古籍，没有序跋，或是虽有序跋而未署年代，也无刻工姓名，亦不见藏书家著录，因此仍须从各朝代各地区的版刻特点等方面来判别。由于贩刻时代和地区不同而形成其字体、刀法、纸张、墨色、版式、装帧等不同的风格特征，这些特征是从事古籍版本鉴定的基础。现按朝代分别将其特征叙述如下：

1．宋刻本

(1)字体：从时期来说，北宋早期刻书多用欧体字，欧字瘦劲，字画挺拔秀丽，字形稍长，左右较短，转折笔画清细有角。后期流行颜体，颜字肥劲朴厚，字形肥胖，架势雄伟壮丽，有骨有肉。自南宋之后，柳体字增多，柳字比颜字略瘦些，其笔画挺拔有劲，起落顿笔结构方正，过笔略细，横轻竖重。从地区来说，浙江刻书多用欧体字，四川刻书多用颜字，福建刻书多用柳体字，江西刻书欧、柳字兼而有之。例：福建刻本《六臣注文选》是柳体字。

(2)墨色刀法：宋本用墨精良、浓厚似漆，着潮水湿也无漂迹；其刻工要求严格，笔法认真细致，字画丝毫不苟。

(3)纸张：北宋汴梁和南宋的浙本、蜀本，主要用白麻纸，南宋的闽本用黄麻纸、佛经用黄纸印刷。

(4)版式：宋代早期刻书，多半是四周单边，后期演变为左右双边，左右栏线外粗里细，行字疏朗，白口，单鱼尾，版心多有刻工姓名和字数，每行字数相同，横排字不整齐。

(5)装帧：唐朝为卷轴装，宋代以蝴蝶装为主，也有少数是佛经多折装，南宋时出现了包背装。

2．元刻本

(1)字体：元时字体多是赵体（赵孟頫）字，其字圆润俊美，柔软

活泼，无板滞之感，横排字不齐。元本小说、民间读物还有掺用一些简体字。版心所刻的字数、页码多用草书。元代后期刻书字画起笔落笔多带回锋，其墨色稍浊，刀法显得软弱无力。

（2）纸张：元代刻书用纸，早期多为白麻纸和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之后则多用黄麻纸，也有竹纸和少数蚕茧纸。例《新编方舆胜览》为黄麻纸。

（3）版式：大多是四周双边，坊间刻本行窄字密，早期为白口，后变为细黑口，晚期多为粗黑口；花鱼尾，目录和文内小题上也常刻有鱼尾，版心上刻字数，下刻页码和刻工姓名。例《玉海》为四周双边，白口，版心上有刻书年月及字数，下有刻工姓名；《山堂先生群书考索》为细黑口，四周双边；《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为粗黑口、四周双边。

（4）装帧：以包背装为主，蝴蝶装少量，佛经大多用经折装。

3．明刻本

（1）字体：明代刻书分为三个时期，明初（洪武至正德）多为软体字，且有颜、柳、欧、赵余味。例《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禅宗永嘉集》、《容春堂集》皆为此风格。

明中叶（嘉靖隆庆）的字体模仿宋人字体，且大量翻刻宋本，其风格是字画横平竖直、撇捺直挺、字形方正，即方块字，整齐严谨。例《南丰先生元丰类稿》、《百家类纂》、《正杨》皆是此风度。

晚明（万历至崇祯）从万历起，字形变长，笔画横细竖粗，略显拙笨，即长宋体。例《道乡先生邹忠公文集》、《心史》皆属此体。

（2）纸张：明初印书用纸主要是棉纸和竹纸，但还有少量麻纸。正德、嘉靖、隆庆时期多用白棉纸，例《新刊唐贤绝句三体诗注》为白棉纸。自万历之后，白棉纸变少，竹纸变多，同时也用毛边纸、毛太纸等。一般说来，官刻本、家刻本多用棉纸，坊刻多用竹纸。例《御制大诰》为官刻，《会稽三赋》、《镜川吴公配赠淑人蔡氏行状墓铭》为棉纸，《水经注笺》、《字汇》为竹纸。

(3)版式:洪武至弘治,一般多是四周双边、粗黑口,比如《中州集》即是。也有少数细黑口。从正德开始,改变为以宋本为模范,黑口变为白口,版心刻字数,下刻刊工姓名。如《南丰先生元丰类稿》为白口、四周单边,刻工姓名多人,版心下有字数。此时古籍卷末书尾或序目后边刻有牌记。比如《文献通考》序有"皇明己卯岁春独斋刊行"牌记。自万历之后,白口为多,黑口较少,单边双边兼而有之。例《刻汉唐宋名臣录》为白口,左右双边;《潜确居类书》为白口,四周单边。

(4)装帧:嘉靖以前多为包背装,比如《御制大诰》为包背装。自万历起逐渐变为线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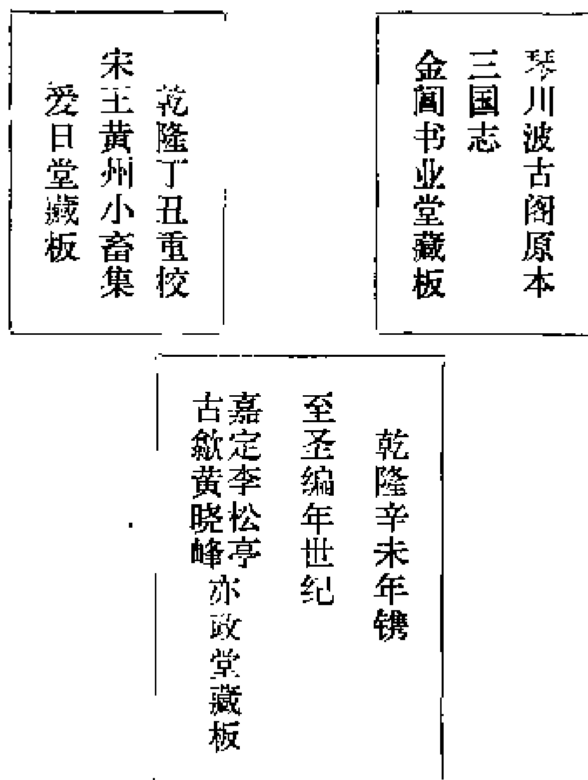
4.清刻本

(1)字体:清初版书字体仍是明末风韵,例《鼎锲蔡魁吾先生重校鹅湖书院讲略》、《桴庵诗》、《江乡集》等即如此,字呈长形,横细竖粗。若不以其序跋所记年月及文字内容来识别,而单凭字体或纸张是很难区分的。康熙至道光期间盛兴硬体字,即仿宋体,其字体秀丽美观,笔画横轻竖重,撇长而尖,捺拙而肥,右折横笔粗肥,横排字齐。比如《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宋孙仲益内简尺牍》即具此风度。道光之后,字体变得呆板,称之为"匠体",且行字特密,阅读起来使人有一片黑糊糊之感。如《楚珍自记年谱》、《字鉴》、《清尊集》、《纫斋书牍》即如此。

(2)纸张:清代印书用纸种类繁多,最好的是康、雍、乾时有些官刻本用的开化纸,洁白细薄,柔软耐久,无帘纹而有韧性且贵,是印书最优纸料。比如雍正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和扬州诗局印本多用开化纸。其它还有开化榜纸、太史连纸、棉连纸、连史纸、粉连纸、料半纸、竹纸、宣纸、毛边纸、毛太纸。还用各省土产棉纸印地方志书。清代印书用纸,种类是最多的了。

(3)版式:一般为左右双边,也有四周双边或单边,大部分为白口,也有黑口。如《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历代诗家》、《云逗

楼集》等为左右双边，白口。清代刻书横排字齐，书前刻封面的多，封面一般刻三行字：中间一行为书名，字个大，右行刻编著者，左行刻藏版或雕梓者，有的将雕镌年月横刻在上栏线外。例：



（4）装帧：清代装订基本上是采用线装。

总而言之，古籍版本的鉴定是一门比较复杂的学问。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只有按照以上八个方面的依据作全面分析、反复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在此作者感谢版本学家魏隐儒先生的耐心指教。

（原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6年第4期）

抄本及其价值与鉴定

沈 津

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文字的传播，有赖于竹简、木简和帛书。当东汉时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和造纸原料后，就使我国的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这个时期文章、书籍的流传，全仗读书人的手抄。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云："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抄录。"这是指印刷术未发明前的两汉、魏晋、南北朝。这些手写的本子称为写本，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可见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作品都是靠传抄而流传于世。因此，探讨这种手写的本子在版本学上的重要性是很有意义的。

一

中国文字起源于象形，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文明的促进起极大的作用。经过历代的变迁，中国文字先后经历了籀、篆、隶、行、草和楷书的阶段，而以楷书为最普遍，直至今天仍为通用字体，从现今传世的手写本子来看，多为楷书。

晋陈寿的《三国志》抄本残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用纸抄写的书。残卷仅存吴志的部分，于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共八十行，一千余字。至1956年1月，又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一座佛塔的遗址中发现了另一部分《三国志》的残卷，计四十行，五百余字，皆为字体工整的楷书，亦即当时的书写体，我们今天称之为"写经体"。

中国雕版印刷在唐代已逐渐盛行，但唐代书籍的流传还是要

靠一些书生手抄，这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甘肃敦煌莫高窟遗书的发见可以证明。敦煌遗书为我国学术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些起自晋末至宋初的三万余卷写本图书，都是写在质细而厚的藏经纸上，包括了经史子集的许多内容，对于今天进行校勘、训诂、辑佚均有极大贡献。

敦煌遗书的价值已有一些专书叙述，笔者仅从遗书中极其丰富的古典文学资料略举一二，以窥其大概。敦煌遗书中重要的有诗歌、曲子词、变文和俗曲。1928年东方学会影印的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十八种，中有"唐人选唐诗"残卷，存者为王昌龄、邱为、陶翰、李白、高适、李昂六家。其中全者七十一篇，残者二篇。罗振玉曾以六家之传世刻本校过，发现李昂诗，《全唐诗》载一篇而佚其二；王昌龄诗，卷中十七篇见于集本者仅三篇；邱为诗六篇、陶翰诗三篇，载于《全唐诗》者文一篇；高适诗二篇，今本一存一佚，可见残卷中唐代诗人之作品可补《全唐诗》等唐人集之不足。"残卷中各诗今集本虽存而异同至多，篇题亦有异同，殆每篇中有数字。其尤甚者为李昂、李白与高适三家。如《全唐诗》载李昂'戚夫人楚舞歌'，以残卷校之中间少四句。李白'胡无人篇'残卷无末三句，'瀑布水篇'（今本题作'望庐山瀑布'）则卷集全异者四句"。① 由此可见残卷不仅在文物价值上，而且在学术研究上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当然敦煌卷子只是唐代文化的一小部分，而大量的史料却未能传世。

敦煌卷子之所以集中，是由于当时唐代道士所专门收集。宋景祐二年（1035）西夏占据了敦煌，莫高窟的和尚在逃难前，就把这些经卷和有益文书、绣画等都藏在一个洞窟的复室里，外面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装点得看不出痕迹。后来战乱平息，和尚再没有回来，这个秘室一封就是九百余年，直至1900年5月，藏经洞才被道士王圆箓等人所发现，后来这批经卷中有许多被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劫走了。

唐代和唐以前的抄本主要就是靠敦煌莫高窟遗书，或许有人认为敦煌卷子中的史料确是研究我国中古时代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对明清抄本的重要性往往估价不足。在抄本中，宋元抄本传世稀如星凤，旧时藏书家偶得一种，即视若枕秘、轻易不肯示人。而明清抄本则是传世抄本的大部分，而尤以清代所抄居大多数。这些抄本包括了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学者悉心研究历史科学的各种著述，保存了我们祖先在科学史、医学史等等学科的许多文明，因此抄本得到了历代藏书家和学者的重视。

藏书家和学者重视抄本是因为他们通过实践认识到旧抄本接近原本，较之流行的刻本来说价值要高。宋佚名撰《枫窗小牍》："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两纸，比从藏书家借对，缺纸皆然，即馆阁订本亦复如此。后从相国寺资圣门买得抄本，两纸俱全，此时欢喜，如得重宝。"又如《愧郯录》一书，清代藏书家黄丕烈谓原书及以后刻本皆缺去十页，但是近人周越然购得清初抄本半部，其中就有所缺的十页。张元济先生在辑印的《四部丛刊》续编中将此《愧郯录》得以配全，弥补了向来的缺憾。被郑振铎高度评价的"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出世的"明赵清常道人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是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极其重要的文献，其中刻本六十九种，抄本一百七十五种，多为世人所不易得见的秘籍，从郑振铎写的《跋脉望馆钞本古今杂剧》一文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批杂剧填补了中国戏曲史上部分空白，使人们得知在元明时代尚有许多戏剧家的杰作。

缪荃孙辑清黄丕烈的《荛圃藏书题识》和近人王大隆辑《荛圃藏书题识续编》和《再续编》中对抄本多有叙述，现摘录二条，略见一斑。黄跋《李群玉诗集》："大凡书籍安得尽有宋刻而读之，无宋刻，则旧抄本贵矣。"又说："《渑水燕谈录》首册及中册上半，下册末一页，俱柳大中抄，即此可断为残本，然残本已胜《稗海》本，知旧抄书最为可宝也。"按柳大中名佥，明正德时云间人。《稗海》为明万历

间商浚辑，所收多为唐宋人野史、笔记、掌故、琐言之作。黄丕烈还说："勿以世有刻本，而薄抄本。"这是很有见地的话。明人刻书，每喜凭主观判断改易古书，有时原本不误，经过改易，反致错误。清初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明版坊本、新抄本，错误遗漏最多，须觅宋元版、旧抄本、校正过底本或收藏家秘本，细细雠勘，反复校对，连行款俱要照式改正，方为善本。"可见旧抄本对于坊间刻本、新抄本来说，是可纠正书中之谬误的。

明清以来的藏书家除了重视宋元刻本外，对于抄本的位置有的也是放在明刻本的前面的。黄丕烈曾想辑他数十年来所见古书录，将所藏者为正编，所见而未藏者作为附录，按宋椠、元刻、毛抄、旧抄、杂旧刻本的次序排列。这是按照版本的类别来分的。有的藏书家在图书的分类上，甚至将抄本单列，另行分类，如清汪宪（字千陂，号鱼亭）。他的藏书凡三千三百余种，计放四十三橱，其中第七至十三橱皆置抄本。② 常熟张月霄（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中收录近千部书，而抄本竟有四百八十余种。

明清两代刊刻的丛书中，纂辑者出于"史志所载与夫藏书家所著录名存而书亡者又何可偻指数。惟荟萃一编，俾有统摄，则诸子百家之撰述常聚也"③ 的意愿，所以汲汲为丛书之刻。《知不足斋丛书》，清鲍廷博辑刻，"全书三十集，都二百余种，搜罗之富，实罕其比，所辑各种或旧刻脱讹，而此独完好，或中土久佚，而传自海外，无陈陈相因之弊，且皆学者必需之书，采辑之善，允推独步。"④ 鲍氏所辑丛书中收录了历来藏书家仅有抄本而无刻本的图书约六十种。《丛书》中第一种《御题唐阙史》二卷，即明抄本。至于象厉樊榭手抄元郭畀《客杭日记》、叶石君手抄并跋的宋王铚《默记》一卷、何义门抄元白珽《湛渊静语》二卷、柳大中影宋抄宋桑世昌《兰亭考》十二卷、元俞松《兰亭续考》二卷、吴枚庵手抄元朱肱《北山酒经》三卷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善本。此外如钱氏述古堂、毛氏汲古阁、秦氏雁里草堂、谢氏小草斋的抄本也为历来著名的抄本。除了

鲍氏所辑刻的丛书外，其它诸如清乾隆间金忠淳辑《砚云》甲乙两编，计十六种，都是明人所著笔记小说，对明代文学艺术、生活习俗等方面提供了不少有用资料，此丛书中即大部分为抄本。和金氏同时的卢见曾，也是名藏书家，他辑刻的《雅雨堂丛书》十三种，所收汉魏经说和唐宋笔记，多据名家抄校本。可见在许多丛书中，辑者都选用了较为罕见的抄本加以辑刻，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图书和文献。

明代以来，藏书家每得秘册，即互为借抄，因此得以保存旧籍，有利阐发祖国文化，其中有的抄本还是藏书家本人手自抄录。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是时吴中藏书家多以秘册相尚，若朱性甫、吴原博、阎秀卿、都玄敬辈皆手自抄录。匏庵遗书流传者悉心手录、以私印记之，前辈风流，不可及也。"⑤ 朱氏所记还有一段，是写金俊明的："先生平日好录异书，靡间寒暑，仲子侃亦陶继之，娄屋数椽，藏书满椟，皆父子手抄书也。"⑤ 古人抄写图书，有的甚于饥渴饮食，长洲人顾苹："或力有所不能得，则手自抄写，写日夜可尽百十纸，夜尝不寐，寐亦只尽数刻，而张灯披衣，往往达旦。手不释卷，不停抄，自以为愉快极，虽老至不知也。"⑦ 这些例子只是对明清藏书家抄书史实作了一些摘录，显然这是挂一漏万的，然而从中也可窥见藏书家对保存祖国文化典籍，发展文化，确实是有功于世的。

近代现代的一些藏书家也为保存地方文献，多方采集，设法借抄乡邦文人的诗文稿，这些有意识地收集本乡本土的文献，对于后人进行研究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象著名的南社创始人之一柳亚子先生，他所收集的多为吴江地方文献，自明至清凡数百种。许多诗文集和地方史料都是从友人顾悼秋、金剑平、陈文浚、陈巢南等人处借抄，现在有些原本早已不存，而仅靠柳氏传抄本作续命汤。这些传抄本有柳亚子自己亲笔所抄，也有属子无垢、无忌所抄。柳亚子先生在许多书跋中叙述了他收集吴江文献的经过，为

保存这些乡邦文献，柳亚子先生功不可没。

除柳亚子先生外，还有如常熟周左季鸽峰草堂也专抄他认为流传罕见的史料。丁祖荫则致力于常熟地方文献的收集，抄有不少今已不存的诗文集。

在各种抄本中，当以有校为好，又以名人学者所校为最。抄本在誊录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舛误，或漏字，或改窜，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如能以较好的本子为之校勘，则可使后来的读者少走弯路，便于弄清史实。清孙从添《藏书纪要》云："叶石君抄本，校对精严，可称尽美。"和黄丕烈同时的顾广圻（千里）是著名的校勘学家，他曾协助黄氏校勘了不少重要典籍，傅增湘说："至于涧宾先生者，受业于江艮庭，传惠氏遗学，当时名贤大师皆得奉辞承教，故于经学训故咸所通晓，其校勘之精严，考订之翔实，一时推为宗匠，即荛圃亦自愧弗如，如士礼居所刻诸书，泰半经其正定。"③

二

抄本的情况较为复杂，要区别它和了解它的价值，就必须认真查对，如不加以区分，笼统对待，就会使珍本当作习见之本，把有用当作无用。下面试将抄本的几种不同情况作一叙述。

1.依据作者的稿本所抄，而稿本又未付之剞劂，这种抄本的价值就很高。一书之成，往往是作者数年或数十年的研究结晶，浸润着作者的一片甘苦。清代著名学者焦循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就是经过了十数年的努力，一改再改，数易其稿而成的。其书序云："辛丑、壬寅间始读《尔雅》，又见陆佃、罗愿之书，心不满之，思有所著述以补两家之不足，创稿就而复易者三。丁未馆于寿氏之鹤立堂，复改订之，至辛亥改订讫为三十卷。壬子至乙卯又改一次，未惬意也，戊午春更芟弃繁冗，合为十一卷，以考证陆玑疏一卷附于末，凡十二卷，盖自辛丑至己未共十有九年，稿易六次。"这样的稿本从内容上来说，无疑是十分有用的。如果稿本一旦佚亡，那抄本就起到了延其一脉的作用。

比如经部图书中的《诗本音》三卷，作者杨峒，山东益阳人，乾隆三十九年举人。此书向无刻本，仅靠抄本流传，如清吟梅书屋抄本，清程以恬抄本等等。又比如象明丰坊的《鲁诗世学》三十二卷首四卷，天一阁有明抄本，上海图书馆，天津人民图书馆藏有清初抄本。此书就是到后来也未被刊刻，连收有许多四明人著作的《四明丛书》也未收。深于毛诗，精究数十年的汪龙，于乾隆时写成《毛诗申成》十六卷、《毛诗异义》四卷，现稿本不传，均抄本代之，作者对于汉许慎之说文熟谙，就连当时的朴学大师段玉裁注说文，也多录龙说，《毛诗申成》抄本仅北京大学图书馆人藏。这些对于阐述毛诗的专著都是后人据以研究的重要著作。

明代万历年间的严衍是一位史学家，他有感于《资治通鉴》之不足，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治通鉴补》这一巨著，直到清光绪年间方才由盛宣怀思补楼排印流传，但严衍的另一著作《资治通鉴续编》一百五十七卷，仅有一二抄本流传，清代研究史学者，包括盛宣怀在内，鲜有人知。这部著作是作者查阅了许多前人研究史学的资料，考证精详，去芜存精，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脍炙人口的作为形象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杰出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原作，曹雪芹生前十年中，《红楼梦》稿本曾在他的极少数至亲好友中抄阅评论。而他身后的三十年间，这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有些好事者也争相传抄，在庙市中高价出卖，虽然每部售价高达数十金，还是不胫而走。直到清乾隆五十六年(1701)和五十七年(1792)才由程伟元两次排印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萃文书屋活字本。然而在历来的红学专家们的版本研究中，旧抄本的资料价值最高，因为它比较接近于曹雪芹原著的面貌，比较能充分反映出曹雪芹的进步思想和卓越艺术成就。这些旧抄本的本名《石头记》，因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全称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些脂本系统的抄本大约有十二种，其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有七、八种，如北京大学藏本(脂京本)、清怡

亲王府抄本(脂怡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本(脂稿本)、大兴刘铨福藏本(脂铨本)、戚蓼生序本(脂戚本)、清蒙古王府藏抄本(脂蒙本)等。这些抄本中的脂评,尽管出于辗转过录,错乱较多,但它们的祖本都是真正的脂评本,保存了大量的曹雪芹的原文和脂砚斋的批语,这对于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原著是最重要的资料。因此《红楼梦》的旧抄本,一直为红学家们所重视。

徐弘祖是我国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游记》就是他从事旅行及地理考察事业的宝贵结晶,既是一部科学著作,又是一部优秀的山水游记,而更重要的是它对山川源流的考察,以及石灰岩岩溶地貌等进行了记述。这部书自乾隆时就有刻本,以后不断翻印,有好几个版本。然而与乾隆刻本差不多同时又有好几个抄本。现在查明《徐霞客游记》的最早抄本是季会明抄本和徐建极抄本。新出版的《徐霞客游记》的校订者曾作了许多努力,证明抄本的价值远在刻本之上。在徐霞客的行程中,抄本都有详细的记述,而作为最早刻本的乾隆刻本则多删削合并。如"崇祯十年七月初九日霞客自融县返柳州",记江行所见,描述雨势、水势,共二百余字。乾隆本归纳为"……共六十里,泊沙弓",不足五十字;又,崇祯十一年正月十七日,霞客记述自草塘至庆远府南门,一路行程达三百余字,乾隆本只"北三十里,抵庆远府之南门"一句,在季抄本和乾隆刻本的比较中,"总计自崇祯九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季抄本共存游记五百另七天,比乾隆本多一百五十六天,字数多三分之二以上。"③从现存的季抄本来看,源出徐霞客的稿本无疑,因此,乾隆初期的传抄本的内容对我们研究徐霞客和他的《游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材料。

当我们遇到了像《红楼梦》、《徐霞客游记》一类的抄本,就不能盲目地认为:这类书名头熟,又有刻本,没什么价值。而要认真地加以研究、查对,不要轻易地作出结论。

2. 在抄本中,有些抄本和传世之刻本相比在时间上要早,在

内容上要多，像这种抄本就要引起特别注意，因为这类抄本在某些方面可以纠正刻本之误，补充刻本之不足。

《北堂书钞》是唐虞世南仕隋为秘书郎时，抄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的一部大类书，计一百六十卷。《书钞》在宋代时得本已难，“明代偶存胥抄本，讹谬脱落，篇鲜完章，章鲜完句，然而甚误之中往往有绝佳处。”[10] 由于明抄本的流传，遂不致断种。明万历间陈禹谟曾据某抄本刻之，但是经过陈氏任意取舍，并加以窜改，致使刻本面目全非：如卷百三十九，车总载类，原本二百四十条，陈刻仅用十七条；卷百五十八穴类，原本二百三十条，陈刻仅用四十二条；卷百六十石类，原本百三十九条，陈刻仅用三十三条，相去甚远。清代学者严可均曾花费了许多精力对《书钞》进行了校勘，认为“世间难校之书，此为第一”。他批评陈禹谟刻本，说：“陈乃何人！臆改之，臆删之，以他书易之，甚且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国之书补之，是惑易之疾，亟当沐以兰汤者也。”[11] 朱彝尊也说：“自常熟陈禹谟锡元氏取而删补之，至以贞观后事及五代十国之书杂入其中，尽失其旧，镂板盛行，而原书流传日罕矣。”[12] 现存的明抄本尚不足十部，其中著名的为明正德十三年竹东书舍抄本，明范大澈卧云山房抄本等。除了陈刻外，清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堂也据孙星衍藏明抄本翻刻，但是孔本也还存在不少错误，范氏卧云山房抄本即可正孔刻之失。

元代戏曲家钟嗣成的《录鬼簿》是一部元、明文学史重要史料。此书明代有抄本流传，清代又有曹氏刻《楝亭丛书》本。但是明抄本与清刻本无论是在类列上、多寡上、还是在剧名上皆有不同。拿剧名的不同来说，两本著录各作家的剧名顺序不一样，多寡也不同。而最大的区别，则在于明抄本的剧目下都填注了题目正名，曹刻本较之明抄舛讹特甚。1946年郑振铎、马廉、赵万里曾在宁波孙蜗庐处见其所藏《录鬼簿》的明抄本，叹为“我辈见之，惊心动魄，瞠目无言，再四翻读，不忍释手。”[13] 可见《录鬼簿》的明抄本较

之刻本来说价值要高。

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陶宗仪的《说郛》，明代只有抄本传世，然而明抄也不多见。据笔者所知，而今明抄本全者仅二部，一上海图书馆所藏，一香港中文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沈瀚抄本，其余如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玉海楼所藏皆有残缺。《说郛》体例仿宋曾慥《类苑》，所收杂糅之至，然古佚书往往赖之而存，因此这部书的资料价值是很高的。昔清周亮工云："余幼时在金陵，闻旧曲中老寇四家，有《说郛》全部，以四大橱贮之。近见虎林刻本，才十六套，每一种为数少者尚全镌，多者咸为逸去，甚至每一集有存不四、五叶者。陶氏当时即有去取，未必如是之简。此刻未出时，博古之士多有就寇氏钞录者，及此刻出，不知者以为《说郛》尽于此，更不知求其全。余常言，自刻本《说郛》出，而《说郛》亡矣。"[14] 按虎林刻本即清顺治十四年陶珽委宛山堂刻本。周亮工对陶珽刻本中的错误指不胜屈，揉杂窜乱，尽失原本之貌是极不满意的，而且在陶珽刻本中杜撰书名，伪标作者之事，更使乾嘉学者认为"《说郛》之亡，亡于剞劂"。二十年代，张宗祥先生有感于此，多方收集，借到六种《说郛》的明抄本，详加校阅，并择其善者而从之，费六年之力，始成完璧，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陶刻和商务本相比，是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再如清赵佑撰《草木疏校正》二卷，清乾隆四十八年桂馥家抄本，有桂馥校并跋，此书的刻本为乾隆五十六年仁和赵氏刻赵鹿泉全集本，晚于桂抄本八年。又如清李光地撰《诗所》八卷，有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和雍正六年教忠堂刻本传世，流布也多。但是有一部清抄本就值得注意，在抄本中有"叔琳私印"、"昆圃"两印。叔琳为黄叔琳，康熙进士，被推为当时巨儒，著作颇多。既是黄氏的藏书，那此抄最晚也在黄叔琳时或再早些时所抄，所以不能一查有抄本，就轻率地作出决定，而要考诸其它因素。

清陈启源撰《毛诗稽古编》三十卷，启源，康熙时诸生，吴江人。

此书虽有嘉庆十八年刻本，但在刻本之前尚有康熙四十年赵嘉稷抄本。按启源康熙二十八年卒，则此抄疑即据稿本而抄。后来的清抄本，如有钱坫校、张敦仁校的本子也是要引起注意的，这些抄本如和嘉庆刻本相较，定有一番不同。

3.明清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的还有一种影抄本。什么叫影抄本？凡将质薄而坚韧的纸覆在刻本上照其点画行款，一笔不苟地摹写，这种摹写的本子酷似原本，称为影抄本。以宋刻本为底本的影抄本则称影宋抄本，以元刻本为底本的影抄本则称之为影元抄本，其中以影宋抄本为最可贵。

由于有的刻本年代久远，如凤毛麟角，有的还是仅见的孤本，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影印技术的发明，藏书家为了延续罕见版本的生命线，千方百计为保存和流传，在刻版中仿宋刻本的出现就是一个方面。此外就是将自己收藏的珍贵善本或借他人所藏的善本为之影抄录副。这种影抄本的价值就在于当原本不幸湮没，还是能够从影抄本窥见原本的庐山真面。

由于宋刻本在传世的刻本书籍中时间早，版刻精美，且较接近于上代而显得珍贵，所以清代的藏书家和校勘名家们，如黄丕烈、顾广圻、严可均、鲍廷博、卢文弨等人便把他们看成稀世之宝。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二《书吴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后》曰："书所以贵旧本者，非谓其概无一伪也。近世本有经校雠者，颇贤于旧本；然专辄妄改者，亦复不少。即如《九经》小字本，吾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者，更不及焉。以斯知旧本之为可贵也。"这段话说明了宋代刻本由于刻印较早，所以错误比较少，在校勘上有着它本所不能比拟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宋抄本实际上起到了宋本的作用。

清乾隆间编成的《天禄琳琅书目》里，除了宋、金、元、明版外，对明影宋抄之精者，亦皆选入，且位于宋本之后，元版之前，在装帧上也函以锦，同宋、金版。这也可以看出清宫对于影宋抄本是很重

视的。

《四部丛刊》是张元济先生所辑的三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大型丛书，是供研究者们考订、整理古籍参考的必要图书。它收书三百二十三部(二十四史不在内)，所选皆各类善本，遇到访求不到的宋元版本，往往以影宋元抄本代替。其中经部《说文系传》初用祁氏刻本，今用影宋抄本；子部《韩非子》初用明本，今用黄丕烈校影宋抄本；集部《皎然白莲禅月三集》，初用明毛氏汲古阁刻本，今用明影宋抄本；《范德机诗集》初用明刻本，今用影元抄本；《丁卯诗集》原用元大德刊有注本，但印本漫漶，摄影之后竟同没字，故易以影宋抄本。这三百二十三部善本图书中，影宋抄本者十三，影元抄本者四、元抄本一、明抄本六。张元济先生为了搜求这些版本，以供学者们利用，尽了最大努力。这些重要的影抄本无论从版本的角度，或是文字的校勘，乃至艺术价值上，都充分显示出它的重要价值。

那么有的书已有宋本和明清刻本流传，那影宋抄本还重要不重要呢？笔者认为仍然不能轻视。比如宋代丁度等撰的《集韵》，这是一部在研究语言(比如宋代音)、词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工具书，但是书编成后，流传并不广，尤其是在元、明两代，根本不为人所重视，直到清代，才被翻刻，比较著名的有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扬州诗局刻本，和清康熙四十五年曹寅扬州诗局刻嘉庆十九年重修本，当然这两种本子流传较多，而以名家校跋者为善。如今宋刻本仅存一部，现存北京图书馆。但其卷一第二页、卷八第四十二页、卷十第四十四页俱佚去，而以清刻补入，卷八第三十九至四十一页配以清抄。而上海图书馆藏的清初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和宁波天一阁藏的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就可以从文字上或别的地方来补宋本之不足。

明末清初的毛晋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他的藏书处为“汲古阁”。毛晋用重金从各处购买了不少宋元刻本入藏，凡是世所罕见而藏于别人家者，则设法借来，请善于影抄者选用上好的纸张影

抄之，与原本没有什么两样，如今一些宋本不见传世，仅赖毛氏影宋抄本以延续。毛氏影抄的书即使是一点一画之微，亦不肯轻率从事，《藏书纪要》云："汲古阁影宋精抄，古今绝作，字划、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刻，为近世无有。"在毛氏影宋抄本的上面往往钤有"宋本"、"甲"印，以示同宋版珍视。由于毛氏抄本的精善，影写得维妙维肖，使得后世藏书家争相宝藏，誉为"毛抄"。近人王文进《明毛氏写本书目》里著录了毛晋、毛扆父子二代抄书二百四十种。上海图书馆珍贵藏书中的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南宋六十家小集》、五十二册，纸墨精洁，字划整严，影抄的都是罕传的宋人集子。

除了毛晋汲古阁影宋抄极为著名外，还有如清初钱曾述古堂、徐乾学传是楼，汪士钟艺芸书舍所影抄的宋元本都是受到人们重视的。

在影宋抄本中，以工整清劲，能得原本其神者为佳本。清代藏书家和学者往往引为底本，设法为之翻刻而化身千百，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里就翻刻了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博物志》。清末石印之法传入我国，这使得印刷术大大前进了一步，影印善本较之过去更为方便了，象上面所举的《南宋六十家小集》就由陈立炎"古书流通处"为之石印流通。1932年故宫博物院影印的《天禄琳琅丛书》中也收有好几部影宋抄本的古算经。

抄本中大量的均为私家抄本，至于公家抄本则不是很多，公家抄书多是大部头的，非私家所能担当。公家抄书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这说明当时公家让下属小吏将有价值的图书依照重写，储作副本。

公家抄本中最为著名的要数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命姚广孝、解缙等人纂修的《《永乐大典》，和清乾隆年间清高宗弘历命纪昀、陆锡熊等人编纂的《四库全书》。这两大部头的类书和丛书在十五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世界文化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公家编纂动员的人力、收集的图书在数量上都是私家难以办到的。象《永乐大

典》，“儒臣文士参加编校、录写、圈点工作的人凡三千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其中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上自先秦，下迄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⑮这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在永乐六年写成正本，嘉靖四十一年重抄成一部副本，因为卷帙过多，工费浩繁，始终没有刻版印行。如今永乐年间抄成的正本早已不存，而嘉靖抄本也残存无多，1960年中华书局据北京图书馆等单位以及国外所藏《大典》残本影印，计二〇二册，离原本册数相去甚远。《永乐大典》中所辑入的图书，许多早已不见，学者们就利用《大典》辑出许多极为有用的材料。

《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计七万九千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自设四库全书馆至第一部《四库全书》写成，历任馆职者共三百六十人，这部全书为我国最大典籍，也是存世数量最大的一部抄本。此书“萃典籍之精华，为文化之渊薮”。⑯当时收集到的各书原本，大小不一，全刻又费时耗款，因此全用抄本，这样可以使书本长短阔狭，统归划一，且分签插架，也完整美观。

此外如明清各朝的实录，是在史料上有着很大参考价值的文献，这些实录皆为抄本，从未刻过。

那么哪些抄本是没有什么价值或价值不高的呢？笔者认为大致上有以下几种：

1.摘抄本。凡是从流传较多的刻本中摘抄某些段落章节，拼凑成本，这种抄本就没有什么保存价值。例如在唐柳宗元、韩愈的集子里摘录诗文，或是从十三经的通行本中抄录一些注疏，或摘录历代古典以便獭祭的抄本，或是唐宋笔记的摘录等。

2.据通行刻本所抄的本子。一些刻本流传较多，但穷乡僻壤不易得见，私塾训蒙作为读本传抄，这类抄本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3.传抄四库全书本。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编纂的《四库全书》，

所收书籍均经过四库全书纂修官的删改，在内容上都和原本有着一定的距离，清代道光间顾湘艺海楼、清末孔广陶岳雪楼都据四库本传抄一部分，这些抄本不甚为藏家所重视。

4.既无内容、资料价值又乏，且抄手的字劣者也属此类。字体的拙劣，令人一见生厌，更不要说是内容泛泛了。

书画作伪由来已久。宋代书法家米芾的《书史》中就对前代的书法伪作感到不知所措。而对于书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书贾和别有用心的人作伪技巧也更加诡计多端，心机用尽，为的是将伪作的图书求得善价。在版本学中，我们不仅要研究同一书的各种不同本子，以及内容的增删，行款的字数，印刷的精粗，装订的形式，而且还要鉴定不同的版本。抄本和刻本、校本、稿本一样，都有以假乱真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将经过作伪的图书认真鉴定，以便正确著录。下面仅将抄本的一些作伪方法作一简要的介绍：

1.为了获取更大的暴利，在名家抄本上作伪。如《窦氏联珠集》一卷。清袁氏贞节堂抄本，书中有朱笔校语，题清黄丕烈跋。黄跋云：“朱笔校勘乃义门手笔，……。”有了黄跋，且又认为朱笔所校乃何焯所为，那此书的价值不问而知。然而文字牵强，笔墨呆滞，虽貌似而神离，此其一也，何焯生于清顺治十八年，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661—1722)。贞节堂即袁廷梼，其抄本所抄时代当在乾、嘉间，廷梼生于乾隆二十九年，卒于嘉庆十五年（1764—1810），岂有何氏卒后尚存批语之理！此其二也。黄丕烈(1763—1825)为版本目录之大家，况时代与袁氏同时，一生都是和书打交道，自称为“老眼”，岂能写出如此跋语？书贾原想在袁氏贞节堂抄本上伪造黄跋，又通过黄跋来说明书中所校为何焯之笔，这种“一箭双雕”的伎俩却为“聪明”所误。

2.移花接木的手法，是将真的一部分配上伪作的本子，以达到弄假成真的目的。笔者曾见到一部原题为明毛氏汲古阁抄本的《樵隐诗馀》一卷的书(与《西樵语业》、《近体乐府》合册)，梵夹装，

书口下有手写“汲古阁”三字。书中所抄字体虽然工整，但欠精神。扉页上有“顾嗣立印”、“侠君氏”二方图章。顾嗣立是《元诗选》的辑者，乃为清初著名学者。一般来说，书中有顾氏之印，那书必然就是明末或清初时的抄本，然而扉页却比后面的正文页高出一点，似为人有意拼凑粘合。顾氏印章确真无疑，而抄本的字体墨色不旧，显然非明末清初人所抄，这是后人有意伪作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且移来其它册页上拆下的有顾嗣立印章的一页，作为扉页，使人产生顾印真，那汲古阁抄本也不会假的感觉。

3．钤盖假印，以伪充真。在抄本上钤上名藏书家和学者的伪印，是作伪者经常使用的故伎。曾有《周易守》一卷，佚名撰，书中各本首叶均钤有“王守仁印”方形图记，末页钤有“彝尊私印”。按守仁，明嘉靖大名士。彝尊为朱彝尊，清康熙间著名收藏家。此抄本中“弘”字缺笔，当避弘历讳，因此为乾隆抄本，而书中出现明人和清初人的印记岂不怪哉；这说明书贾得一抄本后，出于牟利的目的，随意钤上王、朱印记，以充明抄，实在可笑。

4．传抄罕见的本子，化身数十，这种做法对古书的传布确有好处，但书贾得到一个好本子，就雇人大抄特抄，伪造名家抄本，这种例子较典型的是一部元代邓文原的《巴西文集》，此书为清鲍廷博知不足斋抄本，有鲍氏手校，书贾得到后即专门印制黑格白棉纸，雇人依样照抄，并钤上鲍氏的“知不足斋钞书”、“遗稿天留”等印章，伪充鲍抄。笔者曾在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四川、云南、广东等地见到这种抄本，多著录为鲍氏知不足斋抄本，拿来一看，一模一样，有的甚至还钤上“卢文弨藏书”的藏书印和[illegible]熙的题款。可见这种作伪后的本子流传之广，也说明书贾确实欺骗了不少人。

书贾作伪的例子实在太多，限于篇幅关系不再举例。一般来说，作伪的人技巧并不高，这和他们本身的文化水平是有关系的。

对于抄本的鉴定，和其它版本一样，只要多看、多听、多比、多问、多查，只要多加实践，看的东西越多，自然而然就会积累起自己

的经验。所谓多看，不仅要看名家抄本，而且要看作伪的抄本。多听，即多多听取老同志谈他们的心得体会，老同志过去几十年来在采购、编目鉴定中，有许多经验，这在关于版本概述一类的书中是找不到的。多问，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应提出疑问，请教老同志，往往经指点，茅塞顿开。多查，对于工具书、参考书的利用是不可缺少的，有了疑问要查书，千万不能自以为是。

大凡明清两代的名家抄本，抄书用纸多为自家专门印制，版心下或版心上多印有自己的藏书室、斋、阁、楼等等，如明无锡姚咨的"茶梦斋"，版心下刻"茶梦斋抄"，清南昌彭元瑞的"知圣道斋"，抄书用纸版心下有"知圣道斋钞校"数字。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明以来抄本"一节所列甚详，恕不赘述。当然也有在纸上写上自己斋名的，如《九灵山房集》三十卷，清初御儿吕氏抄本，书口下就写有"讲习堂抄"。只要我们多读有关明清藏书家的有关史实，就会了解他们的室名别号，当遇到不熟悉的室名别号时，就可查阅有关工具书，如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陈德芸《古今人名别名索引》等。

抄本与刻本一样，都有规律，作伪者尽管想把自己所作伪的书尽量做得逼真，但假的总是假的，其破绽在纸、墨，印章，字体或其它方面总会暴露出来的。

就目前所见到的明抄本来说，纸质多白皮纸，时间大约在明正德、嘉靖间。在有的地区盛产竹纸，如福建的藏书家徐𤊹红雨楼抄书就是竹纸。明末抄本也多是竹纸。明抄本有黑格、红格、蓝格、无格之分。一般来说，黑格、红格较之蓝格在时间上要早。而清抄本纸质多竹纸、毛泰纸，曾见一些旧抄本，如吴骞、吴寿旸父子拜经楼抄书多用毛泰纸。

抄本的字体很讲究，明抄本字体既不似明嘉靖刻本的扁方，也不似万历刻本的方正，而是飘逸自然，不受拘束的书体，也是别具一格的。清初抄本的字体也不受拘束，挥洒自如，乾隆以降，抄本多馆阁体，字体力求工整，较好辨认。抄书的人，过去称之为"抄

胥”。“胥”是旧时衙署中办理一般事务的小吏,“抄胥”,即是专做抄写工作的人,这里泛指代人抄书的写生。这种写生有的是书生,求功名不得,佣于士大夫家,以抄书为业,藉得温饱,象明抄本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三朝北盟会编》等均为写生所抄。鉴定刻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是要看书中字体是否避讳,对于抄本来说,明抄不避讳,清抄则要看是否避讳,如“玄”字不避,则为清初抄本或更早。如“玄”字、“弘”字等字避,则应为清康熙、乾隆后抄本。

中医诊病,非常重视观风望气,这是很有道理的。鉴定版本也是这样。明抄本和清抄本无论在字体上、纸张上就是那么地不同,而清初抄本和嘉庆道光间的抄本也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当然,在鉴定抄本中,不光要看字体、纸张,还要看其它辅助条件,如藏书印。藏印真,则抄本的时代就距藏家时代不远,或同时,或再早些。如清抄本中有揆叙“谦牧堂”印,那抄本的时代则应在清初,因为揆叙为康熙宗室。

在鉴定抄本中,应该多看真的,对真的要有较深刻的印象,因为不知道真的,就不能辨伪。真的看得多了,见到假的就能够识别。

有些人只注重名人手抄本,而对作伪的抄本不予重视,固然名家学者手抄本对于研究者来说可以提供许多资料,同时名家的书法本身也是别具风格的。但是笔者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有意识地收集些伪抄。作伪的抄本作为一种形态出现,也必定有它另一方面的价值,因为它不光可以作为“标本”,可以使后来学习版本鉴定的同志得以目验、对比,以提高鉴定水平。从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在版本学的发展过程中,也曾经有过曲折。对于这一类的抄本来说,只要本身的内容能够使人们有所利用,就有保存价值。举个例子来说,元邓文原的《巴西文集》,北京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的传抄本就是北京书贾作伪的本子,但是此本作为元人文集,而为研究者所利用,陆峻岭同志编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

索引》中就收了此本，所以说不能把作伪的本子一概打入“冷宫”。

近代以来一些关于版本学的书籍对于抄本的价值偏重于名家抄本，而很少或不写抄本的实际史料价值。自叶德辉《书林清话》后，一些学者皆沿袭叶说，有的甚至全部照搬，如查猛济的《中国书史》关于“抄本”的章节。当然我们不否认名家抄本的珍贵和价值，名家抄本流传不多，不易得见，就是在一些较大的公共图书馆里也不定很多。清朱筠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初期，曾给乾隆帝送了一个“遵旨覆奏访求遗书”的折子，里面有一句话：“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在乾隆时，朱筠就感到抄本之重要，而今天，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抄本是传布一切图书的主要产物，没有抄本，就无从继承文化遗产。因此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对抄本的整理、核查，去进一步弄清抄本的使用价值，而不要畏难，或有不屑一顾的看法。本文的写作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探索的。

（原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年第3～4期）

注：

①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唐人选唐诗”跋。

② 汪宪《振绮堂藏书总目》。

③ 《知不足斋丛书》序。

④ 《知不足斋丛书》“古书流通处启”。

⑤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P.1　41　中华书局本。

⑥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P.280　中华书局本。

⑦ 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P.229　中华书局本。

⑧ 顾广圻《思适斋书跋》傅增湘序。

⑨ 此段凡有引号者均引自《徐霞客游记》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言。

⑩⑪ 清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刻《北堂书钞》序。

⑫ 清劳格《劳氏碎金》卷下P.5。

⑬ 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录鬼簿》郑振铎跋。

⑭ 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周亮工《书影》P.69。

⑮ 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永乐大典》郭沫若序。

⑯ 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记略”。

谈古籍翻刻本的鉴别

宋 平 生

从雕版印书盛行到影印技术普及之间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古籍的不断翻刻，无疑是使我国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籍赖以广布流传的有效的手段之一。翻刻之精者，大都先据原刻影摹，然后上版开雕。因此，能够比较忠实地反映原刻的内容和版刻特征。但也有些翻刻本，粗制滥造，校勘不精，并妄加删略，质量比较低劣。

古籍历代都有翻刻，而质量较高，影响也较大的，当推翻宋刻本。此风始于明正德，盛于嘉靖，中兴于清乾嘉间，至清末民初，高潮再起，然后便被日臻完善的影印技术所取代。一些精善的翻宋刻本，如明正德陆大元刻《花间集》、嘉靖袁氏刻《六家文选》、王延喆刻《史记三家注》等，常被后人作伪，冒充宋本。好在原刻与翻刻在时间上，相距久远，无论是字体、刀法，还是墨色、纸张等，都有相异之处，只要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再参考前人的著录、题识、书影等，便能辨其真伪。关于翻刻宋、元本，前人多有论述，这里便不详谈了。

不易鉴别的，是翻刻明本，其次是翻刻清本，尤其是与原刻时间相近，而又完全照翻或是撤去翻刻标记的本子，最易失误。如明弘治本《盐铁论·错币篇》有一句"水衡三官作"，明正、嘉间翻刻本误作"水衡二官作"，叶德辉不察，竟将后者误认为弘治刻本。下面就结合具体实例，谈谈我们在鉴别工作中的一些体会。

（一）细心是发现疑点的前提。有一部《六子书》，极似明嘉靖世德堂本。（但版心上端无"世德堂刊"四字）过去曾按世德堂刻本或明刻本著录。后来发现版心下端有剜而未尽的痕迹，经过逐页

翻阅，终于在《文中子》卷一第二页版心下端发现漏刻的“桐荫书屋校”五个字，这才搞清楚此本即非世德堂本，也非初刻意义的明刻本，而是明桐荫书屋翻刻世德堂本。从字体、纸张来看，估计与原刻时间相距不远。

（二）字体粗劣的刻本要格外注意。明万历十八年周氏万卷楼刻《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有翻刻本，版刻特征相同，只是字体缺少万历前期的古朴气，第一卷刻得稍好些，以后各卷，越刻越粗率，与原刻相较，立见分晓。第四卷五十九页“假王之予”翻刻本误作“攸王之予”，违背原意。象这种校勘不精的翻刻本，尤其需要考辨清楚。在明万历至崇祯间的坊间翻刻本中，上述之例，是颇具代表性的。

（三）综合考察，扩大疑点。乾隆十七年卢见曾刻《感旧集》，翻刻本与原刻的版刻特征相同，但字体稍显生涩，而卢见曾所刻书，向以精工著称，此是疑点一。再读凡例“是集自虞山（即指钱谦益）而下，凡三百三十三人诗。”一查正文，并无钱谦益的诗。这就证明此书不是乾隆十七年原刻，而可能是乾隆三十八年修四库全书以后的翻刻本，因为钱谦益的著述正是在此期间遭到禁毁。所以，此书翻刻时将钱诗删去。与原刻相校，翻刻本不仅删去了钱谦益的三十三首诗，还将程嘉遂小传的夹注删去二百余字，至于小的删略，更是不少。象这样的翻刻本，是绝不能让其混入善本之列的。

（四）利用避讳字。鉴别清代的翻刻本，这个方法有一定的作用。例如清末翻刻乾隆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尽管也在版心刻上“玉勾草堂”四个字，但一查讳字，一直避到同治朝，即使不与原刻相校，也能解决问题。

（五）注意序跋、封面、木记等是否完全。清雍正陆钟辉水云渔屋刻《笠泽丛书》，大叠山房翻刻时，将陆氏旧跋也刻上了，封面镌：“大叠山房”。清末藏书家崇雅堂主人甘鹏云收进一部没有封面的大叠山房本，便据陆氏旧跋误定为雍正原刻本。陆刻《笠泽丛书》

不仅有大叠山房翻刻本，还有东山草堂翻刻本，翻得都很精美，同属善本之列，这在清代的翻刻本中不多见。

（六）利用清内府刻本的特点鉴别翻刻本。清康乾间内府刻书，非常考究，初印本多用开化纸或开化榜纸印刷，写刻精工，纸莹墨鲜，装帧堂皇。各省多有翻刻，如康熙《历代赋汇》、《古文渊鉴》，雍正刻《朱批谕旨》，乾隆刻《唐宋文醇》、《唐宋诗醇》等，都有翻刻本。有的本子，竟有好几种翻刻本。但无论哪一种翻刻本，在写刻、印刷、纸张、装帧等方面都比原刻大为逊色。只要事先认真看过几部内府刻本，鉴别起来，就比较容易了。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翻刻内府本的序文都是依照原序翻刻的，不能做为鉴别版刻时间的依据。

（七）利用雕版和活字版的不同特征鉴别翻刻活字本。这类情况不多见，较早的有翻刻明兰雪堂活字印本《蔡中郎集》，明崇古书院翻刻明华氏会通馆铜活字印本《锦绣万花谷》等。最常见的是福建、广东等省翻刻乾隆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由于是雕版翻刻，便无木活字印本常有的墨色不匀，字体排列不甚整齐等缺点，而且版面上有断裂痕迹。另外，武英殿聚珍版原印本多用开化纸或太史连纸印刷，也不难鉴别。

总之，鉴别翻刻本，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还需要我们不断总结提高，以期使善本著录工作和版本学研究更加深入扎实。

（原载《北京高校图书馆》1985年1期）

古籍避讳与版本鉴定

陈 培 荣

避讳是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特有的制度和习俗。山

于避讳改易文字，对我们理解某些古籍内容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了避讳学的知识，也会给某些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方便。借助避讳学以鉴定古籍板本，就是其中之一。

避讳始末

所谓避讳，就是在说话和文字上不能直接提到君主和尊长之名；如遇此类名字时，应用一定的方式、方法来回避。

避讳始于何时？有人说避讳是封建帝王统治时期的习俗。这种提法与事实不完全符合；但它主要盛行于我国封建社会，却是事实。

《书·金縢》曰："惟尔元孙某。"孔传："元孙武王，某名，臣讳君故曰某。"古代臣称君用称"某"来表示，这是避讳的一种方式。

《左传》鲁桓公六年，有一段鲁桓公问名于申繻的记载。申繻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下面对这段话稍作解释：

晋僖侯（前840—前823年在位），名司徒，因避讳废除了当时的司徒官职，到晋文公时改称中军。宋武公（前765—前748年在位），名司空，因避讳改司空为司城。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鲁人避讳，把具、敖二山（均在现山东境内）的名称也改了。

以上记载说明，避讳始于奴隶制时代，实际上也就是从周朝开始的。是我国古代阶级划分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

秦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之父庄襄王，名子楚，秦讳楚为荆。秦始皇名政，改"正"为"端"，如"正月"作"端月"，"正平"作"端平"，"正直"作"端直"等等。汉承秦制，避讳之制已形成。此后直至清，虽各代讳制、讳法有所不同，个别朝代（如元）不避讳外，这个制度和习俗沿袭了近三千年。

辛亥革命结束了我国的封建帝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铲除了避讳之制赖以存在的基础。避讳作为一种规定的制度已告终

结，但避讳现象并未随之而立即消失。例如，清末遗老罗振玉直至1928年影印的《鸣沙石室佚书》，凡清代各帝讳字皆缺笔。这些现象，在鉴定版本时也是必须注意的。

避讳范围

避讳范围大致有四个方面，即为君王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兹就其与鉴定古籍板本关系较密者分述如下。

一、庙讳　　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其生前之名称庙讳。庙讳是必须避的。但是否某一代中的各朝庙讳都要避，比如到唐晚期时，是否在此以前的所有唐帝之讳都必须避？据记载，通行的做法是避七世庙讳，已祧者则不讳。

何谓祧？《礼记·祭法》云："远庙为祧"。即关系已远的远祖，迁其主于祧。已迁入祧庙的远祖之名就可以不避讳。这称之谓"已祧不讳"。

宋代大抵本已祧不讳之制，但也能遇到已祧仍讳的例子。

元代帝王名皆译音，故元不避讳。明初、中期讳制甚疏，万历后渐密。讳制基本上沿袭唐以来传统。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全国，避太祖、成祖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

清代顺治一朝，其帝名福临系译音，不避讳。康熙开始恢复讳制。雍正而后，避讳甚严。但清代总计才九世十朝，晚清讳制渐疏，故所谓七世庙讳，已祧不讳的制度，并未实行。

以上只是概述，实际执行情况远较此复杂，故不能拘泥于七世庙讳说来判断板本年代。

二、御名　　御名就是当朝皇帝的名。《曲礼》有"卒哭而讳"的记载。郑氏《曲礼》注曰："生者不相辟名。"就是说活着的人，名可以不避。实际情况是，凡实行讳制的各代，御名没有不避讳的。举例说，明崇祯时就明文规定"今上御名亦须回避"，但"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与亲王所同则不讳"。

三、陵讳　　帝王死后所葬之墓曰陵。各墓都有一个名称，叫陵号。如康熙帝之景陵，乾隆帝之裕陵等。这种陵讳，往往无人注意，只若限于"玄"，"烨"等字缺笔与否，其陵号的避讳则易忽略。今湖北省天门县，清康熙以前叫景陵县，雍正四年以避圣祖陵讳改名天门。康熙时修并刻的《景陵县志》，其后印本有把景陵二字改作天门者，故知此为康熙时刻而雍正后重印本。此外，世宗之泰陵，高宗之裕陵等等，以此类推，均避陵讳。

四、圣讳（孔子讳）　　避孔子讳，由来已久，宋、金皆有明文规定。宋徽宗大观四年，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

清代亦颇重避孔子讳。《东华录》记载："雍正三年八月癸酉，谕内阁九卿等：古有讳名之礼，所以昭诚敬，致尊崇也，……凡直省地名有同圣讳者，或改读某音，或另易他字。"又云："十二月庚寅，礼部等衙门尊旨议复，先师孔子圣讳，理应回避。惟祭天于圜丘，'丘'字不用回避外，凡系姓氏，俱加偏旁为'邱'字，如系地名，则更易他名。"最后规定为"除四书五经外，凡遇此字，并用'邱'字，地名亦不必改易，但加偏旁读作'期'音"。

了解上述情况，对鉴定清板古籍颇为重要。有的书应该用"丘"字，雍正后刻本改易为"邱"。有的书由于印在雍正后，在原板上将"丘"字剜补作"邱"、或加刻"阝"旁作"邱"。所以，"丘"、"邱"二字成为区分雍正前后板本的依据之一。

五、家讳　　家讳亦叫私讳，与国讳，即公讳相对而言。自周迄清均有避家讳之俗。《曲礼》有"卒哭而讳"、"入门问讳"之记载。

古书中避家讳的例子很多。如司马迁父名谈，《史记》改张孟谈为张孟同，改赵谈为赵同。苏轼祖名序，其父苏洵，文中改"序"为"引"，苏轼为人作序，改"序"为"叙"。陆游之子子遹，宋嘉定十三年宦建康府溧阳县时，将其父文稿《渭南文集》交杭州工人刻板，其书各卷作者署名处均刻作"山阴陆游务观"。因避家讳，将"游"字缺笔。我们在查阅某些古书时，有时遇到某个字缺笔不知为何；

但如细考作者生平世系，不难找出答案。

此外，某些朝代尚有避外戚讳，老子讳等的规定，因与鉴定板本关系不大，仅在此提一下，此文就不详述了。

六、避嫌　　嫌名，就是与讳字音声相同、相近的字。凡避这类字的，就叫避嫌。避嫌之俗始于何时，其说不一。有说始于秦的，其论据是秦始皇名政，正月改名端月等等。有人认为“政”与“正”本是通用字，避正仍属避讳，而非避嫌。

清王鸣盛认为，隋文帝父名忠，当时官名有“中”字者皆改为“内”；故嫌名之讳始于隋。

但《晋书·羊祜传》已提到：“祜卒，荆州人为祜讳名，室户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辞曹。”这是明文记载避嫌的实例。

避嫌之风一兴，作诗撰文便处处受到限制，正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

《颜氏家训》曰：“凡文与正讳相犯，当自可避，其有同音异字，不可悉然。”所以，连同音字也不能用，就是避不胜避了。

宋代避嫌之风极盛。《容斋三笔》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举尤甚，此风殆不可革。”

洪迈乃宋代人，其三笔成书于南宋宁宗庆元二年，上距高宗南迁不过七十年，宋代讳制，或系近闻，或为亲睹，其有关宋代避讳的记载，当是可信的。现存宋板，仿宋、影宋刻本，也能反映出当时避嫌的实况。

明代不讳嫌名。清代各朝，情况不一，避与不避均有。

避讳方法

古籍中比较常见的有下列几种避讳方法。

一、缺笔法　　据陈垣先生考证，其法始于唐高宗之世。《册

府元龟·帝王部·名讳门》载显庆五年正月诏："比见钞写古典，至于朕名，或缺其点画，或随便改换，恐六籍雅言，会意多爽；九流通义，指事全违，诚非立书之本意。自今以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可见当时写本已用缺笔避讳法。稍后的乾封元年《赠泰师孔宣公碑》，文中"泯"作"汦"；《于志宁碑》，"世"作"卅"。此外，唐写本中"虎"作"虍"、"民"作"巳"、治作"治"等缺笔避讳法已用得相当普遍了。

唐宋以来，缺笔是最通行的避讳方法之一。从缺笔与否来分析古书板刻年代，这种鉴定板本的方法，是最简便、最易于掌握的。但须注意，并非所有的避讳字都是缺末笔。如"玄"作"玄"这是缺末笔；有的是缺一笔半，如"玄"作"亠"；有的缺最后一部分，如"曆"作"厤"、"琰"作"王"；甚至有缺开头部分的，如"琰"作"炎"等，形式多样。有些并非皆有明文规定，但这些缺笔形式在古书中都能遇到，均应视为一种避讳现象。如明康海撰《武功县志》中，孟琰、王琰二人名，到道光八年党金衡刻本，因避清仁宗庙讳，刻作孟炎、王炎。同治十二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作孟琰、王琰。嘉庆十九年刻，光绪十三年补刻本作王王、孟王。清代前期屡兴文字狱，搞得人心惶惶。科场应试，文人作文，书坊刻书，在避讳方法上有时不知所措，往往各行其是，愈严愈保险。

二、易字法　　易字避讳法起源最早，始于周。其后，秦改正为端；汉改邦为国，改恒为常，改彻为通；唐改昞、丙为景，改世为代、系，改民为人；宋改"匡"为"正"、"辅"、"规"；明改"校"为"较"，改"检"为"简"；清改"玄"为"元"，改"弘"为"宏"等等，其例举不胜举。

易字比缺笔较难辨别。比如柳宗元《捕蛇者说》"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一句，因避唐太宗讳，改"民风"为"人风"。因柳文系名篇，知此处为避讳改字者甚众。如遇一篇较生疏的文章，要弄清文中的避讳改易处，就颇费思考。

明崇祯间刻何乔远《名山藏》，正文前有"较刻名山藏姓氏""全

较”等字样，一序落款为“翰林院简讨太原门生王邵沐手书”。此两处“较”、“简”二字，在鉴定板本时就不应疏忽，前者避明熹宗庙讳，后者避明崇祯御名。这两个易字避讳字，是《名山藏》一书板本断年的依据之一。

改字法中最普遍的是改名，包括改地名、人名、职官名、年号名等。前面提到的晋改司徒为中军，宋改司空为司城，是现存古籍记载中避讳改名最早的例子。其后直至清代，几乎各代都有不少避讳改名者。兹仅举清代几个例子：雍正元年，因避胤祯御名，真定府改名正定府，真定县改名正定县。雍正四年，因避圣祖陵讳，景陵县改名天门县。道光后，地名如肃寧、寧晋、寧河、寧津等，均改“寧”为“甯”。康熙时曹寅扬州诗局刻《全唐诗》，其乾隆以后印本将弘文馆剜改作宏文馆。康熙时刻《保定府志》，主修者纪弘谟，乾隆后印本剜改作纪宏谟。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因避唐玄宗嫌名，以字(子玄)行，至清又因避“玄”字，只好又恢复原名。明崇祯年号，至清雍正后，有改作崇正者。弘治年号，至乾隆时改作宏治。

此外，尚有因避讳改书名、物名等，不一一列举。

这些名称的前后变化，对判断古书的写作、刻板、印刷时代，颇为有用，应予注意。

三、空字法　　见于古书中的空字避讳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刻书时遇到须避讳的字不刻出来，而空出与讳字字数相等的位置。如诗“烨烨震电”刻作“□□震电”，三国刘备字玄德，清刻本有刻作“□德”者。一种是刻书时某字并未触讳，到后印时已犯讳，就将该字剜去。比如康熙前刻本，至雍正、乾隆时，这些字就犯讳了，故只得改易或剜去。这类现象，尤以清本为甚。我们经常遇到“万”、“崇”二字后，分别空一字的位置，作“万　”、“崇　”的情况，实际即“万历”“崇祯”剜字而成。这种情况，颇便于我们对一书刻板、印刷时代的鉴定。

四、分析法　　分析法就是将一个完整的字，分成两个组成

部分而叙述之。如玄字写作"从亠从幺",胤字写作"从肩从乚",弘曆二字写作"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厤从日"。清代大兴文字狱,文人于文字方面稍一不慎,便触犯忌讳,致遭灾祸。故为避一、二个字,必须分析为一串不伦不类的文字,烦琐至极。

乾隆四十二年,有一个叫王锡侯的江西举人,即因在凡例中列出康熙、雍正庙讳和乾隆御名,并且已经用了缺笔避讳,只是没有用分析法,被认为"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可见,分析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讳制加严的产物。

五、说明法　说明法就是将须避讳的字,加以某种说明,而避免直接写出来。此法在许慎《说文》中已普遍采用,其遇汉代国讳字均不直书,而代之以"上讳"二字。宋板书中更为常见。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后汉书》,"桓"字代以"渊圣御名","构"字代以"今上御名",故知其为南宋高宗时刻本。

清代用说明法避讳的例子更多。以康熙和同治二次所刻康熙《临海县志》为例:康熙刻本的曆、弘、禎、寧等字,同治刻本分别代之以"高宗庙讳""世宗庙讳""宣宗庙讳"等;而康熙刻本的淳字,同治刻本以"今上御名"四字说明之。上述情况表明,前者为康熙刻本,后者为同治刻本,这是一目了然的。

六、墨围法　墨围法就是将避讳字用墨线围起来。此法比缺笔法更醒目,比较易于识别。

古籍的避讳造成内容的混乱,连封建文人也慨叹说:"避讳兴而经籍淆"。它给阅读古籍带来一定困难,也给校勘工作造成不少麻烦。墨围法既起到避讳作用,又不致因避讳而造成书中内容的混乱。清代中期盛行此法。道光十四年刻《日知录集释》,遇清庙讳皆用此法。如"玄"作"园","胤"作"囗","弘"作"囗",曆作"囗","琰"作"囗","顒"作"囗",而御名"寧"只改字作"甯",不围。道光七年所刻唐人三家集之一《吕衡州文集》,元、允、曆、寧等字均为避讳改字后用圆圈围之。唯庙讳嫌名字用缺笔而不用墨围。

另有一种墨围的情况是，原讳字不改易，仅将其四周围之。这种情况较少见。嘉庆二十一年刻四川省《华阳县志》，在光绪十八年补板时"寧"刻作"㝉"，避宣宗庙讳；"淳"刻作"𣿅"，避穆宗庙讳。

古书辨讳

在分析、辨识古书中的避讳现象时，下列几点是必须要注意的。

一、异代同讳　　两个以上朝代都同属应避讳的字，称异代同讳。如宋太祖之父名弘殷，宋板书多避"弘"字。清高宗名弘历，清亦避"弘"字；宋始祖名玄朗，清圣祖名玄烨，宋、清皆避"玄"字。以"贞"作偏旁的一些同音字，宋、清亦同避之。在鉴定板本时，要结合书中提供的其他条件，分清何为宋讳，何为清讳。

二、字性辨别　　古书中常会遇到一个字有多种写法，某个字的写法有时刚巧跟避讳字的写法相同，这种巧合，容易使人误为是避讳现象。如清宣宗讳旻宁，因避讳缺笔作"寍"，或改易为"寕"，而明清二代古书中常能见到宁写作"寍"或寕。明刻《石仓十二代诗选·元诗》卷一："愿作鲤与鲂，寍当怨赪尾。""渊明不可作，此士寍复有"。明刻《汉书评林》万历辛巳刻书叙，署名为"撄寍居士"。明嘉靖十七年刻《宝应县志略》，寧波刻作寕波。类似情况，绝非仅见。究属异体字还是避讳字，在鉴定板本时，首先要把字性辨清。

三、刻印形式　　要弄清一书是原刻还是仿刻、影刻、影印。

元、明、清至今，有些书为了保持其内容，乃至形式与某一较早刻本相同，有仿照其所采用的母本的板式、字体原样刻印者。其影刻精者几可乱真。近代影印术兴，采用摄影上板复制，复制品与母本分毫不差。凡采用上法刻影之书，原书中的避讳字照样反映在新刻影的书中。如宋娄机撰《班马字类》，经钼堂仿刻宋淳熙本，其宋避讳字慎贞殷懿竟玄等均照宋本原式缺笔，不能据此定为宋本。

四、刻、抄本的区别　　一般来说，刻本避讳较严。原因之

一，盖因刻书目的在流传推广，供多人阅读，故刻书者对避讳都很注意，不敢稍有疏忽，讳制较严的各朝尤其如此。抄本则不然，除书贾抄卖者外，一般自抄自用者居多，抄写之间，往往有不注意避讳之处。尤其是一些随手摘抄的资料，更是如此。且抄本是否避讳，因人因时而有不同。故常见有虽为清抄而不避清讳，或在同一书中时避时不避的现象。某些抄本的抄写时间较难断定精确，其避讳不严，缺乏避讳字作依据，也是原因之一。

以上只是就刻本与抄本相比较而言。抄本书严格避讳的例子也是不少的。故据避讳与否来鉴定某一种书的板本，尚须视具体情况而定。

五、官、私刻本的区别　　避讳制度较严的朝代，无论官刻、坊刻、家刻皆须避讳，这是共性。但它们之间也有区别，即在通常情况下，官刻本严于私、坊刻本。各级官府对避讳的规定，是不敢疏忽的。以清代为例，殿板和官府刻本，清讳当避而不避者极少；同一时期的私、坊刻本，尤其象所刻小说、戏曲之类，相对而言，不避讳者要多。

除上述五点外，刻本书因地区不同，讳制执行也有宽严之别。最后，还要注意某些字是刻书时就避讳了，还是后印时剜改的。比如清顺治刻本不避"玄"字，康熙刻本不避"弘"字。前者在康熙时重印，后者在乾隆时重印，在原板上把末一点剜去是很容易的，故要认真区别。

（原载《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年3期）

刻工与版本初探

何槐昌

确定一部书的版本时代，本来是不难的，因为刻印书时，书前

有序，书尾有跋，清楚说明刻印此书宗旨和时代。有的书，还在雕版时镌有牌子。那么，为什么现在鉴定一书的刊刻时代，不但不易，而且是感到很难确定呢？这是因为书与其他文物不同，它是最容易损坏的。我国的雕版印刷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了。历代刻印的书，经历战争洗劫，天灾人祸的变迁，幸存下来的已经不多。且这些保存下来的书籍，由于各种原因，有的残缺不全，有的破损不堪，有的还被书贾作伪，抽去新的序跋，只留旧序；甚至伪作牌子，以充宋元刻本，挖补年号、挖补作者，以充孤本。这样，要鉴定一书的刊刻时代，就不易了。

对于这类书，要作出确切的鉴定，一般只能从各代刻书的特点来判断了，如版式、字体、字形、行格、墨色、纸张、装订等。但是，根据版刻特点来识别，并非易事，不是具有丰富版本鉴定经验的老手，是难以掌握的，就是老手，也不容易定得正确，更不易定出确切的时代来。如果能根据各代刻书的特点，结合刻工这一线索，那对我们顺利地解决一书的刊刻时代和出版地点，就有把握得多了。前人由于没有很好结合刻工这个线索来鉴定版本，发生差错的例子不少。为了便于说清楚这个问题，分几种类型，并举例说明之。

一书以版刻的风格与特点来鉴定是不可靠的。容易将翻刻误为原刻。文革前，北图根据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从香港买回一批珍贵的古籍，其中有一部二十卷本的《荀子》，宋刻宋印，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双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字大如钱，墨如点漆，刻印精美。卷二十后有北宋熙宁间校勘官衔名，藏书家据此书的版刻特点（八行十六字的款式是北宋国子监的规格），和校勘官的时代，定为北宋熙宁间国子监刻本。因此，这位香港的藏书家，藏有此书，十分珍视，曾给他的藏书楼取名《荀斋》。但此书书口下方的刻工，为何泽、何升、何澄、詹世荣、陈彬、吕信、马松、杨荣、杨润、吴祐、丁松年、傅上、余秀、阮仁等二十余人，皆为南宋时杭州地区良工。其中如何升、何泽、何澄、吴祐、丁松年、陈彬、

詹世荣等，南宋中叶在杭州曾刻过《说文解字》、《国语解》、《扬子法言注》等书。由于卷末有北宋熙宁间校勘官衔名，行格字数与北宋监本相同，把南宋杭州地区翻刻本，误为北宋国子监本。

同样原因，我馆庋藏的《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附释音周礼注疏》四十二卷，《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三书从入浙馆后，历来认为是宋刻元明递修本，其根据是，《附释音周礼注疏》卷端有章太炎的跋，跋云："周礼四十二卷得自潮州丁日昌家，署田耕堂者其家印也。此书雕于南宋，元明递修，为阮元刻十三经所据，与所得左传、礼记注疏皆同……"。其次是，此三书都有二、三次的补版，从旧版雕版风格看，有似宋刻，且漫漶较多，补版最晚年限为明正德年间。但经全面分析，并查找刻工核对，此书的版刻时代就比较清楚了。

《周礼》半叶十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记字数，下镌刻工，有书耳。刻工为英玉、天锡、弥高、伯寿、文仲、安卿、国祐、子明、应祥、寿甫、茂绍、天易、以清、君美等。第一次补版，黑口、左右双边，版心上不记字数，下无刻工，页码为草体，有书耳。第二次补版，白口，四周单边，版心上刻"正德十二年刊"，下有刻工。

《礼记》半叶十行，行十七字，白口，注双行，二十三字，左右双边，版心上记字数，下镌刻工。伯善、仲明、以善、子明、国祐等。第一次补版，细黑口，左右双边，书名、页码为草体。第二次补版，黑口，左右双边。第三、四次补版，白口，四周双边，版心上刻正德六年或正德十二年。

《左传》半叶十行，行十七字，注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上记字数，下镌刻工，清远、朱文、美玉、以清、君美、安卿、善庆、寿甫、德成、余中等。第一次补版为白口，版心上刻正德十二年刊，下镌刻工。第二次补版为黑口，版心上刻正德十六年刊，下无刻工。从三书补版情况看，最迟补版年限为明正德六年、十二年、十六年，乃明南监补刊，版心下端有监生姓名。第一次补版，估

计为明初，字体圆滑俊俏，大黑口，书口篇名页码为草体。旧版书口下端刻工，有些虽已模糊难辨，但大多数还是清楚的，皆为元时刻工。其中如伯寿、君美、以清、仁甫、善庆、天易、余中、寿甫、安卿、清远等，在元代中叶刻过《监本附释音春秋公羊传注疏》。天锡、君美等在元代刻过《胡注资治通鉴》。子明、君美等在元代刻过《唐书》、《金史》。经版心下端刻工的核对，此三种书实为元刻明递修本。因雕版风格相似，和刻工大多相同，且为同一地区先后刻成。

运用有明确版刻年代的古书刻工，来鉴定版本，这是古书版本鉴定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接触过以下几种难确定版本的书，书名如下：

《五朝名臣言行录》前集十卷、后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七集，前有宋宝祐戊午庐陵李居安叙，次有新安朱熹序。续集首有景定辛酉八月浚仪赵崇硂序，序后有"平野"二字木记。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细黑口，左右双边，版心下端有刻工。原定为宋景定麻沙刻本。

《慈溪黄氏日钞分类》残本，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下端有刻工，原定为元刻本。

《北史》残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黑口，版心下方有刻工，原定为元刻本，也有的馆定为元大德信州路儒学刻本。

《文粹》残本，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五字，白口，细黑口不等，版心下端有刻工，原定为元刻本。

《洪武正韵》十六卷，首有洪武八年宋濂序，半叶八行，小字双行，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下方有刻工，原定为明洪武八年刻本。

《欧阳文忠公集》五十卷，首有明洪武十八年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黑口，左右双边，版心下方有刻工，原定为明洪武十八年刻本。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双

边，版心下方有刻工，原定为明初刻本。

《古史》十六卷，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注双行，字数同，白口。原定为明洪武刻本。

这八种刻本，原定版本年代各异，但从版心下方的刻工核对，有较多相同，因二书的序有明确的刊刻年代，为明洪武八年与十八年。这样其他六部书的版刻年代也就顺利解决了。为使读者一目了然，现将八部书的刻工列表说明，顺序按排列先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子　中		+	+	+	+			
子　高	+	+		+		+		
(陈)士通	+	+		+	+	+	+	
六　彦	+	+	+	+		+	+	
六　娄	+	+	+	+		+	+	+
付名仲	+	+		+		+		
付彦成	+	+				+		
付　资	+	+		+		+		
丘　老	+	+						+
(熊)汝敬	+	+		+	+	+	+	
江　同	+	+	+			+	+	
江　后	+	+	+	+				
江子名	+	+	+	+	+	+	+	+
志　道	+	+	+	+		+	+	
余长寿		+	+					
吴厚礼	+			+		+	+	+
吴　福	+	+	+	+		+	+	
吴　中		+	+	+		+	+	+
妮　名	+	+	+	+	+	+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周　寿	+	+	+	+		+	+	
孟　淳		+		+				
孟　龙	+			+		+	+	
林　安	+	+		+				+
宗　文	+	+		+				+
官永茂	+		+	+		+	+	
范彦从	+	+	+	+		+	+	+
彦　正	+	+		+				+
原　良	+	+		+				+
张名远	+			+	+	+	+	
陈　亶		+	+	+		+		
阵　鲁	+	+		+				
连彦博		+			+		+	
黄　保	+	+	+	+		+	+	
黄子高				+		+	+	
贯　全	+			+			+	+
景　舟	+	+		+				+
虞子得	+	+	+	+		+		
虞子证		+	+	+				
虞　亮	+	+	+	+		+		+
詹　现	+			+		+		
叶　松	+		+			+	+	
叶　寿		+		+			+	
刘　本	+	+	+	+		+	+	
刘伯安	+	+	+	+	+	+	+	+
刘　贯	+	+	+	+		+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刘　宣	+	+	+	+	+	+		+
刘　八	+		+			+		
刘　伏	+	+		+		+		
刘　保	+			+		+		+
刘　宗	+	+		+		+		
刘侍者	+	+		+		+		
潘　晋	+	+				+		+
蒋　佛	+		+	+			+	
薛和尚			+	+		+	+	+
肖　富	+	+		+		+		
罗　六	+	+	+	+				

从上表刻工们参加刻书的情况看，有的刻工，如江子名、刘伯安等，八部书都参加了雕版，有的刻工参加了七部、六部、五部书的雕版。一部书要与另一部内容不同书的刻工完全相同不可能，即使是某一种同时刊印的合刻本也不完全相同，不要说这八部书是不同时代、不同出版者刊印的了。八种书的刻工有相同的姓名，它给我们确定版刻时代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据查对，这些刻工大半在元代雕版过，日本著名版本学家长泽规矩也编排的元代刻工表中可见到。但同时，又在明洪武十八年刻过《欧阳文忠公集》，以一位刻工的毕生工作时间大约可以延续三十年至四十年计算，这八种书的刊印时间，大致上限在元至正年间，下限至明洪武年间。定为宋刻欠妥。从这八部书的雕版风格看，很可能刻于同一地区。

利用掌握的刻工，还可查配某些丛书或丛刻，《天一阁奇书》，《丛书综录》著录为二十一种。现未见全书，我馆与天一阁合起来大约已有十多种，卷端书名下有明范钦订字样。此书的各零种行格字数不完全一样，大多数是九行十八字，如《竹书纪年》，个别的有

八行十六字，如《元包经传》，有的卷端书名下有明范钦订字样，有的没有明范钦订。因此，要确定一书为天一阁奇书本，并不易。但如果根据天一阁刊本的特点，结合查对刻工，问题就会立即顺利解决。因为天一阁奇书本的刻工，也包括天一阁的其他刻本，刻工姓名基本相同。为黄瑞、姜培、郭英、余堂、熊诗五、戴锐、徐升、郭拱、翟良才、邹国相、范正祥、周聪八、胡十二、王宾四、郭完、黄文九、秦三、王以南、胡秀纹、王以才、王以成、元恩、文六等刊。我们掌握了这些刻工姓名后，并结合天一阁刊本特点，对鉴别这类书就容易得多了。同时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刻工的工作区域性，是比较稳定的。有的写工和刻工，可能一生就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出版者家里工作。

运用刻工虽是鉴别版本时代和出版地点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决不能单凭这一点来判断。特别是宋元刻本，重刻与仿刻的很多，有的仿宋刻本，不仅行格字数、字体相似，版心上记字数、下镌原刻工姓名，如果不从版刻的其他因素去考虑，单凭刻工姓名去断定，那就会把翻刻本当作原刻本，闹成笑话。版刻地点，更应慎重，因为雕版刻本的生产工具是较简单的，当时交通工具虽不发达，但在相邻地区间的随时迁徙还是常有的。如写工黄瑞、刊工姜培、余堂、翟良才等，明嘉靖三十四年在江西刻过《欧阳文忠公全集》。这些刻工，根据分析，很可能是江西籍贯的。天一阁刻书的刻工，据有关材料分析，很可能有浙江刻工与江西刻工合作的。刻书的地点，是否全部在宁波，尚待有关材料的整理后，再作进一步考订。

（原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年1期）

宋代刻工说略

李国庆

引言

刻工是人们对历代从事雕刻图书印版文字工作的“工匠”的一种称谓，是古籍版本学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历代刊书序跋及官私书目中除习称刻工、手民以外，刻工自己在镌版后题署时往往在姓名之前冠上一些别称，据统计有如下几种：曰雕匠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刻本《班左诲蒙》卷中署“南剑州雕匠叶昌”，曰匠　明嘉靖二十五年刻本《苑诗类选》书口下署“匠李荣”，曰刊匠　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杨大年先生武夷新集》卷首杨序第一页下口题“刊匠张君选”，曰刊字匠　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大学衍义节略》卷尾题“刊字匠郭邦宁等五十名”十字，曰刻匠　明崇祯八年刻本《阳明集要》书口下署“刻匠叶泗”等，曰刻字匠　明嘉靖六年刻本《重校唐文粹》书口下署“刻字匠余昭”，曰铁笔匠　明刻本《上乘藏经节要宗镜录》卷十三末题“铁笔匠胥大绍、胥大聪”，曰匠氏　明嘉靖十四年刻本《张氏统宗世谱》于“会修职名”后列衔廿一行题“镌刻祁邑城西匠氏徐广”等，曰剞劂氏　明万历间刻本《程氏墨苑》于程氏“人文爵里序”后署“剞劂氏黄鏻”，曰劂氏　清光绪元年刻本《摭古堂正音》卷尾署“劂氏越州朱龄”，曰刊者　清嘉庆二十三年精刻本《金石萃》封面题“刊者金陵镏贡”，曰刻者　清咸丰二年刻本《竹里秦汉瓦当文存》目录前题“刻者嘉兴王铁珊”等，曰刊生　元至顺元年江南行省官刻本《四书集义精要》卷首第一页下书口署“刊生谢文炳”，曰刊字生　元刻明修本《玉海》目录后署“刊字生张周士等

三十人"十字，曰刊手　明万历间刻本《经绎》卷首自序末题"庐陵刘岱刊手谨书"，曰梓工　明天启六年刻本《司马温公家范》卷十末题"夏县梓工卫守刊刻"，曰刊工　明嘉靖间刻小字本《淮海集》卷六末署"刊工李容"等，曰梓人　清咸丰六年刻本《兵法集鉴》卷尾署"梓人江宁苏德义刊印"，曰刻字匠人　清顺治八年刻本《楞严经》卷末题"刻字匠人韩永禄"等，曰匠人　明天顺间刻本《顺成文集》卷末题"匠人沈诚、沈诠刊"，曰工人　民国十四年刻本《新订四书补注备旨》卷末署"山东东昌府堂邑县城西三奶奶庙刻工人徐凤池"，曰刊刻工人　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外科心法实验指导》卷尾署"刊刻工人竹轩孙家麟"，曰刻书人　明嘉靖间刻本《医学纲目》目录首页题"刻书人柯仁意"，曰刻字人　清嘉庆五年刻本《平津馆丛书》卷中题"刻字人刘文楷"，曰褩人　民国十四年刻本《文微》卷末署"褩人黄冈陶子麟刊板"。

从以上胪列的刻工称谓用词不难看出，在自宋至民国年间长达千年的时间里，雕版刻工称谓的基本内容未变，大都含有"刀"、"木"、"匠"之意，这就是图书雕版业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赖以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尤以"匠"为第一要素，这就是执刀雕木的刻工。

笔者近年来专意从事雕版刻工资料的裒辑工作，对知见的历代雕版印本中所载的刻工资料进行钩稽索引，爬罗抉剔，复经排比统计，得雕版刻工人数如次：宋代六千人，元代八百人，明代五千人，清代一千二百人，其它朝代二百人，总数约计一万三千人。这些雕版刻工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活动，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产品——古籍图书。因此对历代刻工进行深层次的研讨，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为了拓展版本学研究领域，深化古籍版本学研究，宜把雕版刻工列为一个重要课题加以研究。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尚未出现一部系统论述历代或断代刻工事迹的专著。目前虽陆续问世一些专著或专论，然大都停留在对刻工资料

的搜集或对特定版本鉴别上，对刻工的研究尚有一片处女地需要开垦。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固陋，仅据掌握的资料对宋代雕版刻工进行较为系统的阐述，抛砖引玉，以俟来者，同时就一些拙见向同好方家求教。

书苑环璧——宋版书

文化传播，端赖图籍。隋唐以前，书必手写，事既繁重，功难广远。到了唐代雕版印刷术肇始以后，图书一经镂版，顷可化身千百，广传后世。我国版刻，虽初兴于李唐，奠基于五代，然唐、五代刻书有限，又去今久远，兵燹水火，屡遭厄难，传本几绝。故言古刻旧椠，世率以宋版为尊。

两宋刻书，臻于极盛，规模空前。以刊地论，西起巴蜀，东达浙闽，各路地方，无不刻书；以董刻者言，举凡官府、家塾、坊肆莫不各竟所能，献其群力，从传本看，当以两浙路所刻书为最，次江南东路、荆湖南路和福建路，而成都府路则再次之。以上诸路，尤以两浙路之临安府、绍兴府和明州，江南东路之建康府，成都府路之成都府和眉山，福建路之福州、建安和建阳为雕版印书中心；从版刻言，所刻之书每多版式弘朗，字体遒劲，楮墨精良，雠校精审；以品质谈，当"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1]已成公允之定评。故官私庋藏宋版者，莫不视为琼宝。

两宋以降，印版遂漫漶亡毁，印本传世已寥若晨星。据有关专家调查统计，中日两国所存宋元印本计：中国二千三百四十部，一千五百版种（含台湾八百四十部，五百版种）；日本八百九十部，六百二十版种。[2]若将居其大部分的元版书除外，那么宋版存世者"总共不过六、七百种"。[3]至于这个统计数字精确程度如何，这里姑且不论，单就这个数字本身就告诉了我们宋版书珍贵的一个原因。幸而，传世的宋版印本今大都入藏公库，并逐部被著录在陆续刊行的《中国善本书总目》中，这使我们对传世宋版书在国内的数量、藏

家，以及刻时刻地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尤其是这些传世的宋版书几乎都有了自身的影本——影印本、影刻本及影抄本，这就从一定程度上为开展宋版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宋版刻工题名资料之来源

宋版刻工题名资料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获得：

1.从宋版书及其影印、影刻、影抄本中直接摘录获得　由于宋版书日趋稀少，藏家倍加珍视，多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所以一般读者实难见到。为了满足学人看宋版书的要求，藏家便采取了先进的影印技术、传统的摹刻技术，甚至聘用缮书家以墨笔临摹对原刻本进行再加工，于是便得到酷似原本的影印、影刻及影抄本。那些附在原刻本不同部位的刻工题名内容也被保存了下来，这样即使我们见不到宋刻原本，但只要得到它的影本，就可以获得是本所载的刻工题名资料。宋版影印本今主要有：上海涵芬楼影印的《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续古逸丛书》，中华书局影印的《古逸丛书三编》，故宫博物院影印的《天禄琳琅丛书第一集》，以及宋版影印单行本。影刻本主要有遵义黎氏的《古逸丛书》，吴兴张氏的《择是居丛书初集》，以乌程蒋氏的《密韵楼丛刻》，另外，尚有一些影刻单行本。影抄本尚无丛书之举，多以单种形式出现。

2.从前人书目题跋中间接获得　清代以前编印的官私书目题跋于刻工题名资料均略而不录。民国以来版本学研究始注意到刻工题名于版本考订有补，于是就把一书所载的刻工题名资料著录了下来。这类书目主要有：潘宗周的《宝礼堂宋本书录》、王文进的《文禄堂访书记》、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张元济的《涵芬楼烬余书录》、袁克文的《寒云手写宋本提要廿九种》、北京图书馆的《中国版刻图录》及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宋版书特展目录》等。

3.从研究成果中获得　主要有：日本长泽规矩也、日本阿部隆

一、何槐昌、冯惠民、王肇文及李国庆等所编《刻工表》和《刻工索引》，以及利用刻工题名考定版本的单篇论文，如李致忠的《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文献》1990年第4期始连载）及沈津的《美国所藏宋元刻佛经经眼录》（载《文献》1989年第1期）等。

笔者曾对上述传本、书目及各家编成的《刻工表》（阿部氏表未见）进行了一次综合统计，去其相互重复部分，共得载有刻工的宋版书537种，获刻工6000余人。

宋版刻工题名用意及款式

在传世的大多数宋版印本中，展卷可见书口下面有刻工姓名。那么这些刻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姓名也刻在书上呢？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原因：

大凡一书印版，多由众匠合力雕成，临时受雇诸匠，因雕版技艺高低有别，故刊字多寡有异，题署姓名，以作雇主付资，匠户取酬之凭据，此其一。例如"眉山七史"本《宋志》卷十七，十页，书口上署"大三百十八"，书口下题"俞信"；《南齐书》卷四十，三页，书口上署"大二百二十三"，书口下题"朱六"。这就是通常所表述的"上记字数，下署刻工姓名"的例证。在书口上面记载本版（页）大字刻了多少，小字刻了多少，一般以"大几小几"形式出现。如果把全书每位刻工所刻的印版统计一下，就可以知道有人刻的多，有人刻的少，再把每人刻字多少统计一下，也就搞清了每位刻工实际工作量，最后就可以依工发金，按劳取酬了。

雕版技艺日臻纯熟，刻工人数不断增大，书必高手，雕择良匠，各显其功，各署其名，以征信于后世，此其二。例如，平江府陈湖碛砂延圣院雕造的《碛砂藏经》，始刊于南宋绍定四年（1231），告竣于元代至治二年（1321），前后共历九十一年。在此期间雇用的刻工及书工人数多达四百数十位。刻工中的大部分都是今有其它传本可考的雕版良匠，书工大部是本院及附近诸名刹缮书学僧。

为了竞争，有的同一族姓经营，其成员各有分工，题名作标，以示尽责，此其三。例如，宋代刻工高安道、高安富、高安国、高安礼及高安宁是高姓"安"字兄弟辈刻工，曾合刻《吕氏家塾读诗记》，安道、安国与安富，以及安道、安国又曾多次合作刻书。明代徽州黄姓刻工举族合作刻书的例子甚至可以列出几百个。

因竞争所致，演成独体经营，署款时每加籍里、店名及称号，以揽生意，此其四。例如，宋本《文选五臣注》卷末刊记"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牋纸马铺钟家印行"，高丽复刻宋本《寒山子诗》卷末记"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以及著名的"陈宅经籍铺"、"尹氏书籍铺"等。这些书籍铺大概主要依靠铺主或家内劳动力从事雕版工作，自己开店承雕印版，自行发售，复在印版书口下题名已失去意义，故在世传的坊刻本中，一般是见不到题名的，书口下偶有题名，人数也极为有限，如陈宅经籍铺雕印的《岑嘉州集》，刊工只有"子文"一人，《杜审言诗》只有"范仙村"一人。可见坊主无力雇佣大量刻工，这反映出了小商品生产的一般情况。在明清坊刻本中也同样是这样。

雕版刻工的题名款式，宋代以前印本中虽已有之，但不成规式。最早的刻工题名署款要算五代开运四年(947)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倩工雕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于"菩萨像"下面一段文字之后所署"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匠人雷延美"这个例子了。④然而这毕竟是个特例。雕版刻工题名形成一种基本款式，并为以后刊本所袭用，且有所发展，当自宋版印本始。宋版刻工题名款式，归而纳之，有如下诸式：

1.称名式　以题署姓名为主要特征的款式。题名部位在书口(版心)下方。题名一般规律是：先署姓名全称，在以后的印页上便简写一姓或一名。这种款式以宋版书最常见，宋版刻工题名几乎全用此式，例不备举。在明清印本中由众匠合刻一书者多用此式。这是雕版印本刻工题名最常见的一种款式。

2. 称籍式　以题署籍里为主要特征的款式。释家经卷多见卷末大题下方或卷端大题下方。一般印本题名部位多在书口下面。例如：长沙陈禾、长沙陈升及星城陈庚等，并见宋刻本《集韵》（今有《古逸丛书三编》本）书口下；姚邑茅梦龙、奉川王闳及奉川章临等，并见宋咸淳五年刻本《佛祖统纪》（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著录）书口下。属于这种款式的题名在宋版书中是不常见的，有的往往与称名式杂处书口下。在明清印本中比较常见与称名式杂处书口下，也可见题名于卷末或首序及目录后。

3. 并题式　以并列题署书工与刻工姓名为主要特征的款式。题名部位多见卷末大题下。由众匠合作刻书时多用此式，但仅限于部帙繁富的佛经中，其它四部印本几乎没有此式。现从宋元间雕造的《碛砂藏经》中择录三例如下：时宗源书・叶元、沈茂敞书・李奇、当院比丘志探书・建安范仁刊。⑤　一般题名规律是书工在前，刻工在后。随着镌版工具的改进，雕版技艺的提高，以及社会对图书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明清时刻工雕刻一书印版的速度比宋代大大地加快了，常常见到一个书工与一个刻工合作写刻一书的例子。他们每写刻完一书，便在书后或序跋、目录后空白处把两人的姓名刻上，这或许就是并联题名署款在明清印本中较为常见的一个原因。

4. 称职式　以题署带有职业意义的字词为主要特征的款式。诸如刊工某某、梓人某某及铁笔匠某某等在前《引言》中胪列者即属此类。这种款式在宋版书中极为罕觏，明清印本中较为常见。这是随着雕版印刷业的进一步发展，已形成一支人数庞大的专业或兼职刻工队伍而出现的，它是刻工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标志。

宋版刻工题名资料之价值

宋版刻工题名资料之价值，持平而论，至少有以下三端。

印刷术为我国四大发展之一。雕版刻工当然是雕版印刷业的

参加者，他们曾对我国雕版印刷业做出过不朽贡献，将其题署的姓名资料作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集而录之，籍以研讨雕版印刷术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以彰雕版刻工之功绩。此其一。

宋代刻工作为社会一个弱小阶层，属于当时手工业者一个部分，其行业组织情况我们从印版题名中尚可窥视一斑，诸如：由众匠合作刊刻者多而一人承雕者少；兄弟、父子、叔侄等同族合作刊刻一书印版；未曾相识的异姓临时组合承雕一书印版；一组良工曾多次合作刊刻一书印版；本邑刻工合作刊刻一书印版；异地刻工合作刊刻一书印版；一名刻工曾涉足各地参加刻书，等等，例不悉举，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这种雕版手工业生产组织情况，仅此已构成"宋代雕版手工业"这一专门史料，可补宋代匠户资料史籍缺载这个空白。此其二。

宋椠传本多残帙断简，考定其版刻年代及地区，鉴别其真伪和异同，刻工乃足证之一。此其三。

据刻工题名资料鉴别宋椠版本

雕版刻工资料的实用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宋椠版本的鉴别上，在这方面刻工的作用最为显著。在鉴定宋椠版本时，尤其是在原刻本序跋牌记俱佚的情况下，倘若仅以纸墨、字体、刀法、讳字及官私书目等材料为据，而忽视鉴别版本的重要佐证资料——刻工题名，那么对某书版本的鉴定有可能不大精确，甚至会误入歧途，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或者是错误的。这类实例俯拾即得，兹试举二例。

1. 诸名家在两浙东路茶盐司雕印五经问题上所持谬论例

宋季，两浙东路茶盐司曾先后雕印五部儒家经典。其中在《礼记》书后有一篇主持刻印此书的三山黄唐跋文，述及诸经的校刻缘起和过程，兹抄录如下：

《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

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缺。绍熙辛亥仲冬，唐备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遗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

这篇跋文在述及雕印五经原委时告诉我们：

①本司旧刊《易》、《书》、《周礼》三经；

②官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的黄唐在绍熙辛亥仲冬至绍熙壬子秋八月间曾董刊《毛诗》、《礼记》二经；

③《春秋》一经，本司未刊。

据黄跋载，《易》、《书》、《周礼》为"本司旧刊"。本司指两浙东路茶盐司，"旧刊"即在黄唐董刊《毛诗》、《礼记》二经以前，其确切时间黄跋未交待。

三经原刊本及其所载刻工题名在现存的几家官私书目中均有著录，笔者考辨后知，三经印版中的刻工除原版刻工外，尚有部分补版刻工。原版刻工中大部分人参加过其中二经或一经的刊刻工作，有几位刻工曾参加过三经印版的刊刻，其中以陈锡、梁文、毛昌、徐茂和朱明等为代表。他们当中有的人还曾刻过其他书，而其他书的版刻年代正可以印证这三经的付梓年代。例如，陈锡、徐茂曾刻宋刊本《广韵》，傅增湘云："此书刊工与家藏景祐本《史记》补版及《乐府诗集》多同，或是南、北宋之交浙杭所刊。"[⑥] 陈锡、毛昌、徐茂及朱明并见南宋绍兴刻本《新雕重校战国策》。此书有绍兴十六年郯川姚宏序，避讳至高宗"构"字止。黄丕烈、钱大昕定此帙为"绍兴刊本"。[⑦] 陈锡和朱明等刻工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为两浙东路茶盐司雕刻《唐书》印版。[⑧] 三经刻工所刻他书，今尚有传本。仅据上举例证推知，三经所载原版刻工皆为南宋初叶杭州地区良工，他们从事刻书活动主要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复检三经讳字，均缺笔至"构"字止。这样我们据三经刻工题名资料和讳字就可以作

出断言：三经版刻年代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刊地在浙杭，董刻者为两浙东路茶盐司。

弄清以上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诸名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日本山井鼎撰《七经孟子考文》，后经日本物观增补成《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二百卷。此书今有清嘉庆二年仪征阮氏小琅环仙馆刻本。是书《左传》条引黄唐跋文，题年作"绍兴辛亥"。"绍兴"当为"绍熙"之误。

日本森立之撰《经籍访古志》六卷，今有清光绪十一年六合徐承祖铅印本。该书卷一"尚书注疏二十卷　宋椠本　足利学校藏"条引黄唐跋文，题年作"绍兴壬子"。"绍兴"亦为"绍熙"之误。

叶德辉撰《书林清话》十卷，其中卷六"宋刻经注疏分合之别"及《郎园读书志》卷一"尚书正义"条均肯定山井鼎和森立之上举错误观点，即"黄跋作于绍兴，而非绍熙"。

傅增湘撰《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周易注疏十三卷"条云："宋刊本，半叶八行……。此与袁抱存克文藏《礼记》、张香涛之洞藏《书经》、李木斋盛铎藏《周礼》同，皆绍熙黄唐刻本也。"黄唐仅董刊其中的《礼记》，而傅氏将诸经一并视为黄唐所刻，当误。

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一著录《易》、《书》、《周礼》三经，俱著录为"宋绍熙浙东庾司刻本"。"绍熙"当为"绍兴"之误。

冯贞群《伏跗室藏书题跋选辑》（载《文献》1988年第2期）"尚书注疏"条云："宋绍熙间三山黄唐所刻《六经》"，更是无稽之谈，误甚。

王承略《杨守敬与日本访书志》（载《文献》1989年第1期）云："南宋绍熙刊本《尚书注疏》、'绍熙'当为'绍兴'之误。"

2.厉鄂误定明版为宋版例

明刻本《史记》，残存卷九十二至一百十六，凡二十五卷。于《西南夷列传》五十八有清代学者厉鄂墨笔写的题识二行，兹录下：

南宋罗纹纸《史记》残本，得于扬州故家中，可宝也，乾隆二年四月望后一日。樊榭山民厉鹗识。（文后钤“厉鹗私印”白文方印）

此残本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双边。佚首尾及序跋刊记，仅于书口下载有刻工题名，计有：李潮、陆先、六（陆）宗华、张敖及周永日，尚有单姓或单名刻工数人。

从这个残本本身具备的可供借鉴的几个条件看，刻工题名当是鉴别此书版本的最具说服力的一个条件。我们利用这个条件，逐一考出这几个刻工刊刻过的书版及活动年代，也就不难确定这部残本的版本。

刻工李潮，在明嘉靖年间曾刻书八种；张敖在嘉靖间刻书五种；陆宗华和周永日在嘉靖间均刻书四种，陆先仅刻此一书。这几个刻工又曾多次合作刻书，如李潮和张敖于嘉靖三年为徐氏合刻《唐文粹》印版；[9] 李潮、陆宗华和周永日于嘉靖九年为南京国子监合刻《史记》印版。[10]据此推知，这些刻工主要活动在明代嘉靖年间。

据笔者查检，明嘉靖六年震泽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曾翻刻过一部宋本《史记》，这部王氏刻《史记》与此残本《史记》比较的结果是：二本行款、刻工题名具同，且字体、版式、栏边高广也合，又王氏本《史记》雕版“工始嘉靖乙酉（四年）腊月，迄工于丁亥（六年）之三月”。其刊年与残本《史记》所载刻工的活动年代正合。那么此残本与震泽王氏本《史记》当为同版印本无疑。

据以上考辨，可知厉鹗见此佚去序跋刊记的残本，并未细辨此书所载诸刻工的刊书活动年代，而仅仅凭着自己的“见识”，遂臆断此明刊残本为“南宋罗纹纸”印本，同时又说明震泽王氏翻刻宋版《史记》之精工，几达乱真程度。

宋版刻工研究之状况

雕版刻工与其他社会下层人民一样，从来不被统治者重视，因

此，有关他们的事迹史书不载。在一些笔记类书中，有时虽偶然见到一二例谈及刻工的资料，但都是一些茶余谈资之文，并未论及刻工在雕版技艺上取得的成就。

在雕版印刷术产生、发展与普及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只对雕版印刷的产品——图书感兴趣，而对雕版刻工多采取不屑一顾的偏见。对刻工进行专题研究始于雕版印刷术完成自己历史使命之后的民国年间。当时治古籍版本、目录学的先哲傅增湘、张元济、潘宗周、王文进、袁克文等都曾在刻工资料的收集上下过一番功夫，他们对刻工进行研究的成果汇集在自己编的《书目》中。解放后版本学研究日趋深入，利用刻工鉴别版本逐成风气，并取得一些成绩。最早下功夫对宋版刻工进行系统研究，并有意识地将两宋刻工资料编辑成表供学人查检，当首推日本人长泽规矩也博士。

半个世纪以前，日本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根据日本静嘉堂文库、金泽文库、宫内省图书寮、崇蘭馆、成篑堂、足利学校、帝国图书馆、安田文库等几家官私文库所藏宋元版书，把书中所载刻工题名资料摘录下来，编成《宋元刊本刻工名表初稿》，连载于《书志学》第二卷第二、四期。1934 年邓衍林翻译转载于《图书馆学季刊》第八卷第三期。《初稿》的宋刊部分收书 130 种（实为 125 种），共录刻工题名 1500 个左右，其中题名两字或两字以上的刻工约计一千余人。《初稿》从功用上看也只能算是刻工人名索引，读者只能从中检到某个刻工刻过某书，至于所收宋本各含哪些刻工并无专表谱列，这是一个不足；其次，《初表》所收宋本均为日本所藏，我国学者使用起来略感不便，再有收书目录中漏掉了五种书的书名、藏家和版本，致使刻工人名索引中的盛元吉、褚君淑、叶琇、应显等无所附着，这也是个缺憾。不过，《初表》毕竟为读者提供了方便，其筚路蓝缕之功难能可贵。

后来长泽氏在《初表》的基础上进行增订，编成《宋刊本刻工名表》。此表增入了日本天理图书馆、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宫

内厅书陵部等处所藏部分宋刊本中的刻工，并根据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袁克文《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以及从《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影印影刻宋本中补充了部分刻工资料。由《初稿》时的125种，增至187种。由于长泽氏改易体例，只按每书所含刻工胪列其名，没有编制人名索引，只能知道一书含有哪些刻工，而对所收刻工的具体人数，以及某刻工曾刻过哪些书，我们难知其详。不过，可以肯定，这个《名表》同《初表》相比大大前进了一步，成为国内外最早正式出版的名符其实的一部宋版刻工专著。

雕版刻工题名是鉴别古籍版本的重要参考资料，实践证明，利用刻工题名来考定版本既科学，又实用。基于这个认识，半个世纪以来治古籍版本学的学者曾先后编出了几种宋版刻工表，取得了显著成绩。这对于系统整理传世宋版印本，纠正前人在古籍版本鉴定上的错误观点，较准确地考证出那些佚去序跋刊记的宋版书的版刻年代及地区，还旧本之本来面貌提供了几种检索工具。

然而，客观上讲目前问世的这几种专著或专文仅仅是初步性成果，均不够丰满。笔者以为在适当时期应组织人力编成一部体例尽善的、资料丰富的、引文可靠的宋版刻工题名专著。为了拓展古籍版本学研究领域，宜把刻工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现在宋椠印本几乎尽归公库，宋版书几乎都有影本，全国各大图书馆都有业务联系诸多有利条件，利用改革开放、各国文化交流异常活跃这个有利条件，在《中国善本书总目》的基础上把全国各大图书馆庋藏的宋版书及其影本，和散落在域外的宋版书及其影本进行一次普查，然后组织人力，分工编写。这部专著的问世，无疑对宋版书的研究，对雕版印刷术的研究，对中国古代书史的研究，以及对宋代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研究都有裨益。

继长泽氏之后，相继出现了与长泽表体例相近的作品。兹作“宋版刻工研究成果表解”如下：

成果名称	著　者	版　　本	收书数	得刻工数	备　　注
宋刊本刻工名表初稿	（日）长泽规矩也	《书志学》第二卷第二、四期，《图书馆学季刊》第八卷第三期	125	1500	最早编成的刻工表
宋刊本刻工名表	（日）长泽规矩也	《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三集收录本	187	0	最早正式出版的刻工专著，是《集》北京图书馆收藏
宋元版刻工名表	（日）阿部隆一	《阿部隆一遗稿集》卷一收录本	0	0	《集》全四卷，计：卷一宋元版篇，卷二、三解题篇，卷四人物篇。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编。
宋刊本刻工表	何槐昌	《古汉语成语典故词典》（余清逸主编）书后附录本，1985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173	1800	我国学者编写的最早的宋版刻工表
宋本刻工知见录	冯惠民	1986年誊清稿本	567	6000	我国学者编写的最早的一部专著，未出版。①
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	王肇文	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370（宋316、元54）	4500（宋0、元0）	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刻工专著。
宋版刻工表	李国庆	《四川图书馆学报》[illegible]年第6期	444	5000	文凡八万字，一次刊出。

（原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0年
第2期，收入本集时作者作了修订。）

注：

①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② 日本汉学家阿部隆一教授统计，见《朝日新闻》1977年6月28日。

③ 张秀民：《南宋刻书地域考》，载《图书馆》1961年第3期。

④ 见王伯敏：《中国版画史》15页及书后附图7，196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⑤ 三例分见宋嘉熙三年刻《实相般若波罗密经》72册“翔”字函，宋淳祐三年刻《楞伽经》147册“身”字函，宋嘉熙二年刻《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入一切佛境界经》156册“养”字函。以上均见1936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影印本。

⑥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143页。

⑦ 见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潘宗周《宝礼堂宋本书录》史部，28页，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11页及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二，19页。今有《士礼居丛书》本。

⑧ 见《中国版刻图录》20页及《百衲廿四史》影印本。

⑨ 此刊本今藏北京图书馆。

⑩ 此刊本今藏天津图书馆。

⑪ 冯惠民先生于1991年夏季慷慨地将尊稿全部赔赠笔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藏书印与版本鉴定概说

王 竞

（一）

玺印和符节一样，最早是用作取信的标识。从何时起，把玺印钤盖在书籍上，作为收藏、校读、鉴赏等等的印记，不可确知。唐王

建《宫词百首》中有："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出锁在玉函中。"王建是大历十年进士、初为渭南尉，历秘书丞、侍御史，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其《宫词》最晚当成于元和长庆年间。① 可见在书籍上用印，早在雕版印书之前。

在书籍上钤盖印章的习尚，以明清两代为最盛。当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藏书家，差不多都有几方，甚至几十方，各种形制，不同印文的印章。

这些藏书家，很多人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他们学有专长，精于鉴别。因此，他们的印章被后人认为是认定、鉴别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很受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过去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都把印章作比较详细的著录。

印章和版式、字体、纸张、墨色、讳字、刻工、序跋、牌记等等一样，都是鉴定版本的根据，但是又有不同。版式、字体等等条件，是先天的，是在成书过程中产生的，是鉴定版本的主要根据。印章则是后天的，是在图书流传过程中钤盖上去的，对于鉴定版本，只能起辅助作用。但是印章却有一个独到之处，即凭藉它可以考查出一本书的递藏源流。这一点，对于确定一本书的版本，也是很重要的。书商射利，伪造版本，也往往是在这一点上露出马脚。

其次，就印章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印文作为史料，可用以考查一个人的异名别号，生年行第，氏族乡里籍贯，以及家世门第，仕途经历，学行师承，癖好志趣等，也可以用来考查一个时代的职官、玺印制度和人事关系。关于这一方面，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图书用印，源远流长，但以明清两代为盛，大概和宋元以降，文人喜欢治印，明代文（三桥）何（雪渔）而后，文人治印技巧逐渐走向高峰，有很大的关系。明清两代的藏书印，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很多是篆刻俱佳的艺术精品。特别是清人印，从风格上看，有凝重的浙派印，有秀逸的皖派印，也有莆田派和其它游离于各派之间，而独

树一帜的名家作品，可以说是集一代篆刻艺术之大成，是研究我国篆刻艺术的重要资料。印章的形制和印文的内容，明清两代也都有新的发展。

一本雕印精美的善本书，钤盖上几方朱白得宜的藏书印，朱墨灿然，古色古香，还会进一步提高书的身价，使它成为艺术珍品。这大概是历代藏书家，喜欢在藏书上用印的又一个原因。

（二）

藏书印，就印文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二十类：

一、名号印：这种印又可区分为名号印与别号印。名号印是印文直刻藏书人的姓名字号。或直文，或横文，或回文；文或白，或朱，或朱白间用。如“季振宜印”“沧苇”；“钱曾之印”“遵王”；“乾学之印”“健庵”等。②

这种名号印，明代以前多用单印，或刻姓名，或刻字号。清以后多用双印，一棵印刻姓名，一棵印刻字号。两棵印大小一致，文或俱白，或俱朱，或一白一朱，名上号下，钤盖在一本书上。

这种印也有单刻一个姓的，如赵孟𫖯有“赵”字方圆二印，缪荃孙有八分书朱方“缪”字印。或者把姓名字号全部刻入一印，如“刘承干字贞一号翰怡”“王禹声遵考甫一名卓字昭回”“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等。

象“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余”“杨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号冬樵行一”二印，或冠以籍贯，或缀以行第，但以姓名字号为主，仍属名号印。

名号印中，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联珠印，是把姓名拆开，每个字自成一方，几棵印连缀钤盖，姓名方才完整。顾蒙、孔继涵等，都有这种印。

我国古代文人，往往喜欢在正式名号之外，起上一个别号，表述个人的志趣情操或某一方面的特点，并用以入印，这种印叫别号

印。如赵孟頫的印“水晶宫道人”，文彭的印“渔洋子”，唐寅的印“六如居士”，阮元的印“研经老人”，黄丕烈的印“佞宋主人”等。

二、堂号印：我国古代文人，还习尚于把个人起居、游憩、读书、藏书等处所，据其特点，题上一个堂号，并用以入印，这种印叫堂号印，也有人叫作斋馆印。如文征明的印“停云馆”“辛夷馆”“悟言室”“玉兰堂”“翠竹斋”“梅华屋”“梅溪精舍”；项元汴的印“天籁阁”“退密斋”“世美堂”；毛晋的印“汲古阁”“目耕楼”“弦歌草堂”；丁丙的印“善本书室”“八千卷楼”；“杨以增的印“海源阁”“宋存室”“四经四史之斋”；瞿镛的印“铁琴铜剑楼”；张金吾的印“爱日精庐”；黄丕烈的印“百宋一廛”“士礼居”“陶陶室”“读未见书斋”“学耕堂”等等。

由于藏书人的境况不同，堂号印多少不一。如文征明有不同称号的堂号印十棵，项元汴六棵，毛晋、黄丕烈各七棵，上面提到的几棵，是善本书上常见的。

堂号印和前面提到的名号印，是藏书印中使用最多，最常见的一种。

以上举例，是印文比较简单的。有一些名号印或堂号印，或者在名号前冠以籍贯、乡里、氏族、官职，或者在名号下缀以“珍藏”“秘籍”“收藏印”“书画印”等尾词，如“浙右项笃寿子长藏书”、“长白敷槎氏堇斋昌令图书”、“汪士钟字春霆号朗园书画印”、“当湖小重山馆胡氏遾江珍藏”、“苏州常熟虞山精舍至乐楼主人河南道御史陈察元习之记”、“古檇李江山风月主人子渊项元淙氏世济美堂收集书籍印”，以及“八千卷楼珍藏善本”、“桐风庼所收清儒著注选战校刻书印”、“曾在南云蔡氏犹半轩群签之内”等，文字虽然多所变化，但以藏书人的姓名字号或堂号为主体，仍属名号印或堂号印。

三、鉴别印：这种印多见于宋元刻本书，用者多数是精于鉴别的名家，印文用语，简单肯定的居多。如“沅叔审定”(傅增湘)、“艺风审定”(缪荃孙)、“芙川鉴定”(张蓉镜)、“杨绍和鉴定”“叶名琛名

澧兄弟同鉴定”“苏斋真鉴”(翁方纲)、“宽彦景贤精鉴”,以及“高氏鉴定宋刻版本”(高濂)、“贵阳陈氏审定宋本”(陈渠),“毛晋秘箧审定真迹”“张之洞审定旧椠精钞书籍印”“长白马佳氏宝康审定宋元旧椠并元明旧抄旧校之记”等。当然,印文也有含蓄一些的,如“谭元庆学看元本书籍印”。

有些名藏书家,如项元汴、毛晋、季振宜,席鉴、杨守敬等人,更在所藏善本书上,加钤“宋本”“元本”“赵宋本”“甲”“乙”或“神品”“希世之珍”“天下无双”“人间孤本”等圆方小印,以为版本品位高低的标识,这种品评性质的印章,也属于鉴别印的范围。

四、校读印:这是对善本书上常见的校勘印与阅读印的通称。校勘印如“益之手校”(杨以增)、“喜孙校本”(汪喜荀)、“惠定宇手定本”(惠栋)、“又玄斋校阅过”(秦四麟)、“曾经燕庭勘读”(刘喜海),以及“张海鹏校正图书记”“南陵徐海昌勘误鉴真记”“颍川陈氏校定典籍之章”(陈子龙)等。

阅读印如“彭兆荪读”“深柳读书”(金元功)、“赵凡夫读残书”(赵宧光)、“曾经�川读”(刘筠川)、“吴岫尘外轩读一过”,以及查岐昌的印“巢经阁读古记”、吴翌凤的印“枚庵流览所及”、“丁福保三十以后读书记”等。

从上面的印文看,校勘印和阅读印似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印章,但实际上校读相因,二者往往不能截然分开。

钱谷的印“白发抄书”和“钱谷手抄”,沈与文的印“吴郡沈辨之野竹斋校雕记”等,也可归入校读印一类。钞书与刻书,也不能和校完全分开。明清两代很多的藏书家,也是钞校名家和刻书家。

校勘印和钞书印,多用于钞本和批校本,在刻本书中也往往见到。

五、观赏印:这种印的印文,多种多样。有的称“观”,如“方若蘅曾观”“正闇借观”;有的称“赏”,如“朗园真赏”(汪士钟)、“橘里清赏”(何良俊)、“翰怡玩赏”(刘承干)、“梅花庵鉴赏”(王时敏)、

“芙川张蓉镜心赏”“克文与××夫人同赏”，以及“莫云卿赏识”“桂坡安国赏鉴”“茅斋赏玩”(冯文昌)等。有的称“经眼”，如“受珊经眼”“陈彰经眼”“白堤钱听默经眼”；有的称“过眼”，如“三松过眼”“惕甫过眼”；有的称“过目”，如“云孙过目”“仲鱼过目”“古本过目记”(王晋卿)；有的称“阅目”“目击”，如“锡庚阅目”“柱尊目击”；有的称“眼福”，如“瞿安眼福”“良士眼福”等。还有的称“缘”，如“结缘”(沈岩)、“苏斋墨缘”(翁方纲)；称“玩”，如“刚主秘玩”“培芝秘玩”(戴植)等。观赏印的印文样式，实际上不止这些。

我国古代藏书家，对待善本书，大体上持两种态度。一种是秘不示人，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甚至在书页钤上“鬻及借人为不孝”的印章，告诫子孙。多数人是持开放态度，同好之间可以传观，观者可以在书页上题识，也可以钤盖印章，因此，在善本书上，观赏印比较多见。

六、记事印：定名为记事印，是从印文内容的性质来说的，印文的字数并不一定很多。所记内容，多数和书籍有关系。如“甲子丙寅韩德钧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是记同治三年和五年，太平天国战争中，夫妇两度携书避难出走。鲍廷博的印“老屋三间赐书万卷”，是记乾隆年间开四库馆时，他因献书七百种，被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辟堂三楹贮之，并颜其堂曰“赐书之阁”。吴骞的印“临安志百卷人家”，是记他先后得到宋咸淳本《临安志》九十一卷，乾道本《临安志》三卷，淳佑本《临安志》六卷，合为百卷，欣喜之余，治印留念。韩泰华的印“金石录十卷人家”，是记他得到阮元旧藏宋椠《金石录》十卷。再如杨守敬的印“星吾日本访书之记”、郁松年的印“郁泰峰己酉年所收书印”、王受珊的印“受珊六十以后所得书画”、马思赞的印“衎斋师友遗传之物”、朱锡庚的印“笥河府君遗藏图书”，以及“两江总督端方为江南图书馆购进”“光绪戊子湖州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之书匮藏南学”“前分巡广东高廉道归安陆心源捐送国子监书籍”等印，记一家一地一书之得失的，都可归诸

记事印。

有徐𤊟一印，"文溪方伯陈公×，精于谶纬多奇篇，厥后散失如云烟，末学徐𤊟收得焉，重加装饰师前贤，是为崇祯甲午年。"③ 在记事印中，别具一格。

记事印，也有的是记际遇、生辰等，和书籍并无关系，如阮元的印"臣元奉敕审释内府金石文字"，朱彝尊的印"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壮十日癸酉时"等。

七、仕履印：这种印是在印文中记个人的官职和仕途经历。明以前已有，如宋江正有"越州观察使者"印。明以后，这种印大为增多。如明都穆有"乙卯举人己未进士"印，王鏊有"大宗伯印"，郑晓有"大司寇章"，文震孟有"两月平章"印，陆琛有"国史经筵讲官"印，唐寅有"南京解元"印，范钦有"古司马氏"，吴宽有"古太史氏"，孙克弘有"汉阳太守"印，范大澈有"典属国印"及"典客侍从印"，袁忠彻有"尚宝少卿袁氏忠彻印"等。

入清之后，这种印更有发展，一个人甚至有几棵内容不同的印，记载仕途经历和际遇。如翁方纲有印三棵，一棵是"秘阁校理"一棵是"内阁学士内阁侍读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一棵是"恩加二品重燕琼林"。宋筠也有三棵，印文是"己丑进士""太史图书""三晋提刑"。朱彝尊两棵，"南书官旧讲官""七品官耳"。孙星衍两棵，"东方廉使""东鲁观察使者"，等等。一棵者更多。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到，仕履印的印文有两种，一种是以当代的职官名入印，一种是以古代的职官名入印。如明王鏊曾任户部尚书，故印文曰"大宗伯"；范钦曾任兵部侍郎，所以印文称"古司马氏"；孙克弘的印文称"太守"，因为他曾任汉阳知府；宋筠的印文称"三晋提刑"，因为他曾任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

明人更有以官署印或关防作个人藏书印的，如王世贞藏书上钤"太仆寺印"，或"抚治郧阳等处关防"；叶盛藏书上钤"镇抚燕云关防"，或"巡抚宣府关防"；顾仁效的藏书钤"南京兵马指挥司副指

挥关防”等。

入清以后，以官署印或关防作个人藏书印的，比较少见。曾见河南馆藏道光抄本《聊斋文集》，钤有“沈项分驻新兴×县丞之关防”“陈留县典史钤记”及“×县巡检司印”等，似乎是一个人署理不同职务时，钤盖在个人藏书上面的。

八、门第印：这种印的印文，有的是炫耀高贵，如朱大韶（？）的印“唐室分封肇姓皇明科甲世家”，袁忠彻的印“袁氏父子列卿”；有的是自诩书香，如沈与文的印“吴门世儒家”，鲍廷博的印“世守陈编之家”，文掞的印“东吴文献衡山世家”等。也有从另一个角度讲门第的，如董其昌（？）的印“积善世家”，周锡章的印“光风霁月人家”等。④

有一些记身世的印，按印文性质也可入门第印一类。如明李孝元的印“太保尚书之嗣”（孝元父廷相，字梦弼，弘治进士，历官南京户部尚书，谥文敏）；秦汴的印“太保秦端敏公仲子”（汴父金仲，字国声，弘治进士，官刑部尚书，谥端敏）；叶国华的印“文庄七世孙（叶盛，字与中，正统进士，历官礼部左侍郎，谥文庄），以及顾千里的印“陈黄门侍郎三十五代孙”（顾野王，吴人，字希冯，初为梁宣城王宾客，梁亡入陈，仕终黄门侍郎），阮元继妻经楼夫人印“孔子七十三代长孙女”等。

吴宽的印“延州来季子后”，陆叔度的印“象山之裔”，毛表的印“叔郑后裔”等，也是记身世源出的，只是世代上不能具体。

九、里居印：这种印是在印文中记载籍贯或族氏里居。如文征明的“江左”印，顾从德、顾夏珍的“武陵”印，以及赵孟頫的印“天水赵氏”，王宠的印“古吴王氏”，卢文弨的印“范阳卢氏”等。大族同姓，聚居一地，印文更有以街巷分的，如吴县顾至的印刻“骑龙巷顾氏”顾应昌的印刻“混堂巷顾氏”“碧凤坊顾氏”等。

明人藏书印中，多见一种“世家”印，如王鏊的“震泽世家”，秦四麟的“雍门世家”，顾从礼的“武陵世家”，项笃寿的“浙西世家”，

杨仪的"华阴世家"等，也属于里居印，"世家"一词，是累世作官，门第高贵的泛称。清人的印文中，少用"世家"字样。

里居印中，还有一种以所居地址的历史或风物特点为文入印的，如毛晋的印"仲雍故国人家"，项笃寿的印"桃花村里人家"，项元汴的印"桃花源里人家"，唐寅的印"桃花坞人家"，孙育的印"开皇山下人家"，金檀的印"家在黄山白岗之间"，戴大章的印"绿柳桥西戴大章"，阮元的印"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等。

曾见辽宁大学馆藏旧抄本《壮观禄》，钤钱保寿一印，"荷花池畔红渠舍，便是吟莲馆之家"，朱方小篆，篆刻俱佳，在里居印中另具一格。

十、行第印：以行第相称的习惯，盛行于唐代，唐人诗文集中，多见这种例子。明清以降，以行第相称者亦有，如"李十九"(良年)、"包十二"(铭)、"朱十八"(振嘉)等(见朱彝尊《曝书亭集》)，余绪而已。以之入印的，如"东郡杨二"(杨绍和)、"吴下汪三"(汪振勋)、"汪大喜孙"(汪喜荀)、"钱四"(钱鼆)、"李二"(李鹿山)、"汪十"(汪洋度)等。

上面名号印中提到的杨绍增一印，和平遥张氏的印"张氏国伟字杰生行三"，把姓名字号和行第刻入一印，是比较少见的例子。

十一、箴言印：这种印是以格言、成语、警句等入印，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治学态度，或是对书籍的感情。这种印宋元已有，如宋人有"贤者而后乐此"印。明清以来，这种印大为增多。如毛晋的印"开卷一乐"、项元汴的印"神游心赏"、邢祖恪的印"温故知新"、席鉴的印"学然后知不足"、劳格的印"实事求是多闻阙疑"，徐乾学的印"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以及鲍廷博的印"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等等。

也有的印文是表述个人修养和处世态度，如文淑的印"端操有从幽闲有容"，邢祖恪的印"中庸不可能也"、历文晖的印"温柔敦厚"、朱大韶的印"心同太虚"、江以周的印"乐天知命"等。

这种印更多的是谆嘱子孙后人，要他们继承先人遗志，保存好藏书。印文有很少的，只有几个字，如“永保”、“子孙保之”、“子孙永宝”等，毛晋、陈昂、祁承㸁等许多藏书名家，都有这种印章。有的则字数很多，如杨继振的一棵印，竟有二百五十二字。文曰：“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失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言，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谓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予藏书数十万卷，率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未敢轻事丹黄，造劫楮素，至简首卷尾，钤朱累累，则独至之癖，不减墨林，窃用自喜，究之于书，不为无补。”可谓煌煌巨制。王昶的印：“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述庵传诫。”六十四字。毛晋的印：“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勿宁舍旃。”五十六字。祁承㸁的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四十二字。其次，钱谷的印：“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随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真其愚”，张晓渔的印：“清俸买来，勤加雠校，鬻及抛残，谓之不孝，唯张氏子孙，手泽是好”等，均在二、三十字以上。

从这些印文中，可以看到藏书人对子孙的期望多么殷切。可惜的是后人不肖者多，藏书鲜有传及二世、三世的。因此，印文也有作退一步想的，如钱侗的印，“积书万卷无不有，子孙读之惟所取，

文章道德期不朽，才或未逮贵能守，万不得已求主售，读书养亲赡戚友，得钱他用天不佑，鬼神殛罚安其疚，嘉定钱季子藏书记”。但是，比较起来，终不如孙从添的印“得者宝之”，卢文弨的印“精校善本得者珍之”，崇恩的印“语龄所藏初印精本，得者宝之，庶传久远”，以及浙东汤氏的印“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更令人觉得亲切一些。

这种印的印文，也有的是要求借书人珍惜爱护书籍的，如姚咨的印“颜氏家训，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损，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一也，皇山人述”。

十二、吉语印，这种印起源很早，汉代就已经有用吉语入印的。吉语用于藏书印，如毛晋的印“子孙世昌”，冯文昌的印“文字之祥君家其昌”，沈岩的印“好学为福”，马思赞的印“永以为好”，刘世珩的印“葱石贵寿吉利”，邓邦述的印“邦述长寿”，以及“博明长乐”“祖培印信长寿”（叶蕃）等。

张蓉镜的印“在处有神物护持”，毛晋的印“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是说善本流传人间，全赖神物呵护，是吉语印的变种。

十三、诗文印：这种印文，有的是刻一首完整的诗，如王鏊印“御书：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相与细论文”；丁芮朴的印“手抄集万卷，数世之苦心。流落不知处，壁出丝竹音”。但多数是自制或摘取前人的诗文成句入印，借以记事、述怀或抒情。

如文征明的印“惟庚寅吾以降”，钱陆灿的印“儒师马文肃，佛嗣熊辟庵”，是记事。“惟庚寅”句出自《离骚》。文征明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干支正当庚寅。

季振宜的印：“吾道在沧洲”，毛晋的印“汲古得修绠”，徐恕的印“有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是述志。“沧洲”古人用来称喻隐居。杜牧诗“六爻贞遁世，三辰光少微，颖阳让逾远，沧洲去不归”；谢朓《出新林浦》诗“鲁连功未报，且莫蹈沧洲”，都是用的这个意思。“汲古”一句，出自韩愈诗《秋怀》“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

猛。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表达的是做官人厌倦官场生活，希求退隐汲古的心理。毛晋虽然没有作官，但他是求士落第才转向刻书的，因此，《秋怀诗》能引起他感情上的共鸣。

毛晋的另一印“月明千里故人来”，莫云卿的印“清味少人知”，范大彻的印“对此展玩啁嚼自谓葛天之民”，肖梦松的印“名山草堂，肖然独居，门无车马，坐有图书，沉酣枕籍，不知其余，俯仰今昔，乐且宴如”，是抒情。从不同角度，抒发读书的情趣。“月明”一句，出自唐寅诗《题草堂话旧图》：“新扣柴扉惊鹤梦，月明千里故人来”，用作藏书印，可能是隐喻观旧书如逢故人。

这种印，还有把两句诗文，作为上下句各成一方入印的。如北京中国书店藏年羹尧刻本《陆宣公集》，上钤二印，一方是“旧学商量加邃密”（句出朱熹诗），一方是“始终臣节霜雪寒”。

诗文印中，以抒情之作为多，有抒发健康感情的，当然也有抒发颓废感情或闲情逸致的，如金券的印“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书”，宋兰挥的印“风月无边庭竹交翠”，马思赞的印“空山无人水流花开”，项笃寿（？）的印“美酒饮到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以及“痛饮读离骚”，“人生行乐尔”等等。

这种诗文印，有的人叫它是“闲章”，认为是骚人墨客无聊之作，不值一顾。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完全。把一个人的诗文印和他的人生观、经历联系起来看，往往可以看到，正是所谓“闲章”的印文内容，很多倒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不应一概否定。况且，从鉴定版本的角度说，它和其他印章同样，可以起到识别的标识作用。

十四、典故印：这种印不很多，如何良俊的印“陆沈金马门”、项笃寿的印“马生角”、陆时化的印“蕉鹿梦”，以及“种五色瓜”、“太史公牛马走”、“女娲氏博浪石外山”等。

这种印有典故本身的意思，又有用作藏书印的隐喻含义。如“陆沈金马门”是把两个典故联结起来刻入一印。“陆沈”即“陆沉”，

沈沉古通。比喻隐于市朝，不为人知。语出《庄子·则阳》。黄庭坚《答张沙河》诗："丈夫身在要勉历，岂有吾子终陆沉"，用的就是这个意思。"金马门"又称"金门"、汉代宫门名。语出《史记·滑稽列传》。汉代征辟士人，一般都要待诏公车，才能卓异的，则得待诏金马门。登上金马门，就是登上了飞黄腾达的阶梯。所以《汉书·扬雄传下》有"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谢惠连诗有"登金马而名扬"等句子。藏书人以此二典联结入印，可能是表达希求做官扬名的心理。

"马生角"，语见《史记·荆轲传赞·注》："燕丹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以此用作藏书印文，大概是隐喻版本罕见。《天禄琳琅书目》说，"马生角，笃字离合体也"，意思说"马生角"，是藏书人项笃寿的"笃"字的离合体，把典故印解成谜语，不完全确切。

"蕉鹿梦"，语出《列子·周穆王》："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打死一只鹿，藏了起来，待到去取，忘了藏处，遂以为是做了一场梦。藏书人用这一典故入印，可能是表达他个人把世事看做梦幻的消极态度。

"种五色瓜"一印，据《天禄琳琅书目》说，是英人布衣瓜畴的印。"五色瓜"用召平故事，见《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东陵瓜即五色瓜。见李乔诗："欲识东陵味，青门五色瓜"，骆宾王诗："一顷南山豆，五色东陵瓜"。以"种五色瓜"入印，可能有两个意思，一是隐喻藏者的布衣身分，一是隐喻书的版本珍贵。

十五、肖形印：肖形印有两种，一种是上刻肖己像，并缀以诗文，如朱彝尊的印，一面刻朱文戴笠小像，一面镌白文十二字："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陈仲鱼的一棵，上刻肖己像，题"仲鱼图象"，并缀以十二字："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

另一种肖形印，是在印文的上下，左右，或四边，刻龙凤虎云雷等图案花纹，或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图形，印面鲜明悦目，装饰趣味浓厚，具有典型的东方艺术特色。这种印起源也很早，汉印中已多见。清代藏书家杨继振，钱谦益和清帝雍正、乾隆等，都有这种印章。齐齐哈尔市馆藏嘉庆二年刻本《薛氏钟鼎款识》，上钤杨继振不同形制的肖形印数棵，有几棵印面造型极其美观精致。

十六、纪年印：如毛晋的印"戊戌毛晋"阮元的印"癸巳""戊戌"，和钱陆灿的印"壬子癸丑"等。

这种印有的是纪年龄。如毛晋，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生，清顺治十五年（戊戌）正六十岁。阮元，清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生，道光十三年（癸巳），正七十岁，十八年（戊戌），七十五岁。有的是兼记生年和年龄，如钱陆灿，明万历四十年（壬子）生，清康熙十三年（癸丑），周岁六十又一。他把"壬子""癸丑"合为一印，可能有几个意思，一、他是壬子年生，二、治印时六十一岁，三、进入了第二个花甲。

另有一种纪年印，如周星诒的"癸巳人"，冯舒的"癸巳人"和"癸巳老人"，王献臣的"己丑父"等，纯属纪个人生年的。冯舒，明万历二十一年生，周星诒，清道光十三年生，生年干支并当癸巳。

纪年龄的印，和单纯纪生年的印不同，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年龄的标记，同时也是活动时间的标记。如阮元把"戊戌"一印用在宋刊本《金石录》的题识下面，既是记他个人的年龄，同时也是记他题识的时间。⑤

这种印也有并非表示纪年的，如南京馆藏杨氏海源阁咸丰四年刻本《应潜斋先生集》，上钤"彊圉君滩""彊圉柔兆"二印，与八千卷楼的藏印合用。多见于丁氏旧藏善本书上，它们是丁申丁丙兄弟的姓名印，其义见《尔雅·释天》。

十七、宫廷印：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宫廷藏书印，是宋高宗的"德寿殿书籍印"，⑥以及时间稍晚一些的"内殿文玺"、"御府图书"、

"缉熙殿书籍印"等。(缉熙殿建成于南宋理宗绍定六年六月甲午)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宫廷藏书印在文字内容和形制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清代的宫廷藏书印,除了常见的"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二印之外,很多皇帝有专用玺印,如雍正的"雍正御览之宝""雍正宸翰""朝乾夕惕""为君难""圆明主人",乾隆的"乾隆御览之宝""古稀天子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和"几暇怡情""犹日孜孜""含味经籍""庄敬日强"等等。

清代皇帝专用印章,数量很多,如乾隆就有一百九十多方。⑦从《天禄琳琅书目》看,书籍上常用的不过三十方左右,数量倒并不很多。

十八、藩府印:明代藩府藏书刻书的风气都很盛。藏书著名的有周府(朱橚),常见印章有"周府御书楼宝";晋府(朱钟铉),常见印章有"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书画印""子子孙孙永宝用"等;庐江王府(朱见楠),常见的印章有"庐江王文房记""宗藩清暇"。他如楚府、衡府、秦府等,也都有藏书。

清代王府藏书,著名的有果亲王弘瞻,怡亲王弘晓、成亲王永瑆等。常见藏书印有"果亲王点定""果亲王府图籍""果亲王府图书记";"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藏书记""怡亲王宝";"皇子永瑆之印""永瑆私印""皇十一子"等。

十九、官书印:官书藏印,多用官署印、关防权代。也有专为藏书篆刻的。如南宋的印"绍兴府镇越堂官书",元代的印"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失,典掌者不许收受",明代的印"翰林国史院官书"等。又,明永乐四年,命礼部尚书郑赐访购遗书,所采之书钤以"礼部官书",这棵"礼部官书"印,传世善本书中多见。

《藏书纪事诗》载:《春松公羊经传解诂》书中,每间数纸,则有真书木印"鄂州州学官书""鄂州官书带去准盗",这和元代国子监崇文阁的印,以及明代另一印"安抚提刑汪郎中置到绍兴府学官

书，许生员借看，不许带出学门"，内容很是相近。因为要向读书人开放出借，难免损坏缺失，藏借双方都要告诫一下。这种印，多数是真书木印。印文也可能有代表性。

历代的书院和清代官书局的藏书，也钤有印章，因为没有什么特点，不再一一举例。

二十、杂记印：如钱谦益的印"如来真子天子门生"，钱陆灿的印"明经别驾，书经解元，临济三十四，彭祖九十七世"，马思赞的印"前身是罗浮头陀"等，属杂记印。

还有一些印，如周良金的"毗陵周廷相氏装潢印识"，杨继振的"云蕉馆骑缝印"以及"金坛蒋宅平安家报印"等，各自代表一种类型，因为数量不多，也都归入杂记印。

"金坛蒋宅平安家报印"，是以平安家报印代藏书印的仅有一例。对研究印章制度，有很大参考价值。《天禄琳琅书目》说它是"坊贾所为"，非是。

（三）

古籍善本上的藏书印，数量既多，文字内容也很繁杂。上面就所见印文内容，大体归纳为二十类，为的是能对它有个比较全面的条理性认识，便于从版本鉴别、艺术价值及史料内容等各个方面，对它进行研究、应用。

一方完整的印，是由形制不同的纽与体两者构成的。其质料有金、银、铜、角、木、石、竹、玉、玛瑙等等。文字有印面文字与边款文字。我们在善本书看到的藏书印，并不是一棵印章的整体，而只是由文字、形制、印色三者组成的一个印面。以这个印面为对象，除了研究它的文字内容之外，还要研究文字的形体、印的形制和印泥的颜色等。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不辨字的形体，也就无从了解字义。藏书印的印文，主要是用秦篆，也就是所谓的小篆。用六国文字、

钟鼎文字、缪篆、汉隶、八分书、真书和叠文入印的，也很有一些，但是和秦篆相比，数量上就少得多。叠文主要用于官印，私人藏印用者很少，见到的有项元汴的"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叶氏进学斋藏书记"和"献县张氏藏书之印"等有数几方。甲骨文字，因为出现的时间较晚，只在清末以后的藏书印中才能见到。

玺印文字是比较难以辨认的，特别是缪篆和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印很少。六国文字和秦篆，本出自甲文金文一系，比较难认，是因为六国当时文字异形，后来见到的这种文字数量比较少，很少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整理，缺少适用的字书。秦篆的规律性比较强，一般地说，掌握了《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个部首，和懂得六书规律，大体上可以解决识字问题。但有时在个别字的辨识上也会有困难。因为治印者，由于印面章法美观的需要，常常变易字形结构的体位，或者增减笔画。这种变易有些有规律可寻，也有些是治印人以意为之，辨认时，令人很费揣度。

关于解决识字问题，前人已为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许慎的《说文解字》，桂馥的《缪篆分韵》、袁日省的《汉印分韵》初、二集、孟昭鸿的《汉印分韵》三集和《印字类纂》、罗福颐的《古玺文字征》和《汉印文字征》、孙海波的《甲骨文编》、容庚的《金文编》、徐文镜的《古籀汇编》以及顾廷龙的《陶文香录》等，为我们提供了查考古代文字的极大方便条件。但是要充分利用这些工具书，仍然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古文字学基础知识。

印章也有用少数民族文字入印的，特别是清代官印，多满汉合文，满文居左，汉文居右，字用叠文。⑧ 私人藏书印，满汉合文的特少。曾见徐松有"大兴徐氏藏图籍印"，朱文方印，右半汉文两行用秦篆，左半满文三行，用篆文叠书，篆刻都很精致，是少有的一例。

还应该特别提一下花押印。花押，实质上并不是一种文字或书体，而是个人专用的一个符号。花押印，实际上是姓名印的一种。这种印盛行于元代。因为当时的蒙古、色目官吏多不识字，各人图

画一个符号，介乎字画之间，刻到印上，作为代替姓名的标记。明清两代藏书印，仍然有人沿用这种形式。如杨继振、樊荫荪都有这种印章，上半刻名或姓，下半刻花押。这种花押印，明代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有些花押，图型奇异，印面美观，可以作艺术品欣赏。

印面的形制，主要是方形（正方、长方、扁方）、圆形（正圆、椭圆）和条记。名号印、堂号印、鉴别印和校读印，多数是用这几种形状。印面的大小，相差悬殊，大者盈掌，小者如豆。在形制大小问题上，私印似乎并不受什么限制。钟形印，鼎形印、葫芦形印、琵琶形印、瓶形印、瓦当形印，钱形印、亚字形印、八角形印、不规则形印等，多用于诗文印、箴言印或杂记印。

印的颜色，主要用朱色，也有用墨色、蓝色、[9]青绿色的。朱色印从其调拌质料上，可区别为水印、蜜印、油印；油印在色泽上又有紫朱、黄朱、红朱的差异。水印色淡，不能持久；蜜印色艳，可以经久不变。

印色，一般地说，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墨印属早期印章。朱象贤撰《印典》中说，唐集贤院藏书用墨印。[10]但这种早期的墨印，在传世善本书中不能见到。现在看到的墨印，多是明清两代人，在居丧期间用的。朱印中的水印和蜜印，早于油印，明以前的印章多用。康熙以前朱印多紫，民元以后朱印多红，清晚期朱印多黄。但这些都是一个大概的说法，并非一概如此。印泥作为一种文房用品，有制作上的时代趋向，又有使用上的个人爱好，两者都在起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色泽又不断地在起变化，因此，对于鉴定图书版本来说，印章颜色差别所显示的含义，及其参考价项，还要在长期实践中，去观察、体会和研究。

（四）

查考书籍流传源流，藏书印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并非唯一的条

件，还要参考书目、题识，以及其他文献上的有关记载。

用藏书印作版本鉴定的根据，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假印章问题。藏书家的印章，多数出自名家之手，篆法、章法、刀法，一般都很精到。假印则多数篆刻比较拙劣。多看多记，多作比较，细心体会，可以区别出来。但是也有少数假印，篆刻俱佳，可以乱真。

第二，藏书家的印章，往往在身后流失到书贾手中，他们为了图利，在一般书籍上乱用这些印章。

因此，用印章作版本鉴定根据时，最好和藏者的收藏目录互相对照。有些书随聚随散，书上钤有印章，目录上却不一定反映，这种书多数是无关重要的版本。

其次，印章的真确，并不就是藏者版本鉴定的准确。任何名藏书家，受时代条件的种种限制，都不免要有错误。因此，判定版本的主要根据，还要从书籍本身具有的先天条件上去查找。

打开一册善本书，经常会看到上面有许多的藏书印。如北京图书馆藏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一页之上钤有印章四十多方。有些书上的诗文印，辨别其归属，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先从辨识名号印、堂号印、鉴别印、校读印入手。藏书家的印章虽然多，但在选用藏书印时，鲜有不以名号印或堂号印为主体的。

（原载《哈尔滨图书馆》1979 年第 1—2 期）

注：

① 王建《宫词》写成时间，系据《唐诗纪事》中有关记载，和《新唐书》中王守澄传推测。

② 本文引用的印章，系出自所见国内一些馆的藏书，以及书目、书影、影印本书，避免繁琐，不一一注明出处。

③ 印文无标点，为阅读方便，本文所引印文的标点，均笔者所加。

④ 本文引用的印章，有几枚在归属人名之后注有（？）号，尚须进一步考定。

⑤ 阮元题识的宋本《金石录》，藏上海馆，此据书影所见。

⑥ "德寿殿书籍印"见《明清画家印鉴》，王季铨、孔达合编，一九四〇年商务版。

⑦ 据《明清画家印鉴》，清帝乾隆有不同形制和印文的印一百九十五方。

⑧ 罗福颐、王人聪撰《印章概述》谓："清官印，乾隆初年以前，印上满文全用楷书，乾隆十三年制定满文篆体，用以入印。"一九六三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⑨ 《印章概述》谓："明清时代，遇国丧，百日之内，官印必须改用蓝色。"

⑩ 朱象贤此说，不知何所据。也可以作为藏书印早于雕版印书的佐证。

古书牌记

廖延唐

我国古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官刻、私刻书籍大量印行，各刻书者为了说明自己所刻书籍和别人所刻书在质量上有所区别，或表示刻书时间、地点、刊刻者以志识别，或表示版权，于是古籍中就有牌记的产生。古书的牌记，相当于现在书里的版权页，但所记载的内容，不如版权页的完整而系统。

牌记又称墨围或碑牌，这种取名是从牌记所表示的形式来定名的。牌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较常见的是碑形和方形，也还有钟形、鼎形、亚字形、香炉形等等不同形式。宋代所刻书中的牌记，形式已十分多样，这也说明雕版书大量印行时在刻印形式上生动活泼的一个侧面。

牌记所处的位置，有的在卷首、有的在卷末、有的在序言后面、有的在目录后面，这些部位一般都还是比较好找的，有的牌记刻在书中某一卷的后面，这就造成寻找的困难。

牌记中文字所表示的内容，有记载详细的，也有记载简略的，虽有详简之别，但对了解一书的具体情况都是有作用的，当然，文字较多的牌记反映一书的情况要多一些。

下面就牌记文字内容的详略，说明牌记的类型：

一、只有刻书时间的牌记 明重刻宋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在卷末有“弘治甲子年重新刊行”牌记一行。

二、有刻书地点及刊刻者的牌记 宋刻《王建诗集》，在目录后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印”牌记一行。

三、有刻书时间及刻书斋室名的牌记 明刻《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书中有“正统戊辰善敬堂刊”牌记一行。

四、有刻书时间、斋室名、刻者姓名及字体的牌记 明活字本《春秋繁露》，在卷末有“正德丙子季夏锡山兰雪堂华坚允刚活字铜板校正印行”三行。

五、有刊刻者籍贯、刊刻者及斋室名的牌记 宋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在卷首集解序后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记二行；明刻《史记》，在集解序后有“震泽王氏刻于恩褒四世之堂”牌记二行。

六、有说明刊刻质量及斋室名的牌记 宋刻《挥麈录》，在目录后有“此书浙间所刊止前录四卷，学士大夫恨不得见全书，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条章无遗，诚冠世之异书也。敬三复校正锓木，以衍其传，览者幸鉴。龙山书堂谨启”牌记五行。

七、广告性质的牌记 元刻《新刊王氏脉经》，序后有“天地以生物为心，故古之圣贤，著书立论，教人以智而济人之生也，得其书而自秘者，岂天地圣贤之心乎。夫治病莫重于明脉，脉法无出于王氏脉经之为精密。本堂所藏，不欲自秘，先以针灸资生经梓行矣，今复刻脉经与众共之，庶以传当世济人之道，且无负古人著书之意云。时天历庚午仲夏建安叶日增志于广勤书堂”牌记七行。

就所见部分牌记分析，大致可分为上述各种类型。还有一些刻

书跋文和咨文，同样具有牌记的作用，从跋文和咨文中，有时能了解到某一书刊刻的种种情况。如宋刻《古三坟书》卷末有沈斐跋文四行，跋文说“余家藏此古三坟书，而时人罕有识者，恐遂湮没不传于世，乃命刻于婺州学中，以与天下共之。绍兴十七年岁次丁卯五月重五日三衢沈斐书”。从跋文中可以了解到刻书意图及时间。宋吴炎刻《新校正老泉先生文集》，目后有绍熙四年吴炎刻书咨文十行，咨文说：“先生父子，文体不同，世多混乱无别，书肆久亡善本，前后编节刊行，非繁简失宜，则取舍不当，鱼鲁亥豕，无所是正，观者病焉。顷在上庠，得吕东莱手抄，凡五百余篇，皆可诵习为矜式者，因与同舍校勘讹谬，刻为三集，逐篇指摘关键，标题以发明主意，其有事迹隐晦，又从而注释之，诚使一见本末，不遗义理昭晰，岂曰小补之哉。鼎新作大字锓木，与天下共之。收书贤士，伏幸垂鉴。绍熙癸丑八月既望，从事郎桂阳军军学教授吴炎济之咨。”从这篇咨文中，可以了解到刻书经过、意图、校刊工作及刻书时间。

牌记的产生，有说明版权所有，不准翻印的性质。但古来刻书，版权并无十分严格的规定。重视版权所有，主要还是坊刻书籍，因书坊主人刻书，要考虑书籍的出售和盈利的问题，因而他们刻了书，有的就申报上司，提出不准覆板的要求，这在某些书的牌记中有明确记载。如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东都事略》，目录后有长方牌记，牌记中的文字是“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说明坊刻主人十分重视“版权”问题，而官刻书就不十分重视此事。

由于牌记内容并无统一的规定，因而就出现了牌记内容的种种不同。上述几种类型的牌记，繁简不一：第一种仅有刻书时间，而无刻书地点及刊刻者；第二种有刻书地点及刊刻者而无刻书时间；第三种有刻书时间及刻者而无刻书地点；第四种有刻书时间、地点及刊刻者，这是记载最完善的一种；第五种有刊刻者而无刊刻时间，第六种只有刊刻者而无刻书时间及地点。

牌记以坊刻书为最多，其本意原为强调"版权"。但到了今天，牌记却成为我们鉴定版本重要依据之一。当然，我们决不能单纯凭牌记确定古书的版本，因古书流传多年、有些书的牌记经过伪造，不能反映一书的真实情况，这是在使用牌记鉴定版本时应该注意的。

（原载《图书情报知识》1980年2期）

古籍中伪书的辨识

杜凯　佟镇铭

辨伪学是研究史料真伪和年代之学，属考据学或文献学。文献资料的运用，首先要求史实可靠年代准确。如研究古代哲学所参考的《周易》，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参考的《诗经》，虽然过去对其训诂、注释、音韵、名物考证的人很多，但对这两种书的年代、史实的真伪考证不一，作者更是众说纷纭。其他古籍中类似情况亦多。即使是近在唐宋，有的专集之中也羼杂了许多伪作。如唐代诗人李白的《李翰林集》，苏轼认为其中的《悲歌行》、《笑矣乎》、《赠怀素草书》等不是李白的作品，乃"唐末五代间齐己辈诗也"。宋代词人李清照，处于北宋南宋之间，作品散佚真伪难辨，历来研究《漱玉词》的人不论其毁与誉，其根据并不充分。直至解放后对李清照的研究仍不能定论。最近《李清照集校注》的出版，也还是有存疑的作品。研究李清照所援引的《琅嬛记》署名元伊世珍撰。《四库提要》称"其语皆荒诞猥琐……，为明桑怿所伪托"。

古籍中伪书的产生和辨伪学史

每个民族在史前时期，总有许多神话传说。如我国的三皇五

帝、伏羲、神农、唐尧、虞舜等都是传说中的人物。由于考古工作重大发现，确定我国早在夏代已建立了国家，早商陶文的出土也证明了商初文字并不是文字的最原始阶段。清光绪年间安阳小屯发现的殷墟甲骨就是商代卜筮的记录。其后有了用竹帛金石为载体的书籍。西汉发明了造纸，唐五代有了雕版印刷术。我国古籍逐渐地大量发展起来。虽经历代刀兵水火，至今古籍仍存有七八万种之多，但其中有一部分需要考辨真伪，从而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准确史料。

（一）伪书产生的情况

甲、借古人古事伪造古籍

伪书产生有其不同的历史情况，春秋时期所谓乐崩礼坏，孔子开私人讲学风气，以《诗》《书》《易》《礼》《春秋》为教材，《中庸》称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所以《论语》有："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惟尧则之。"孟子言必称尧舜，墨子想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推行王天下的主张。当时百家争鸣学术空气浓郁。各家为了推行其学说，都假借古圣先贤以自重，以古圣先贤为撰者的书籍大量出现。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公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乙、借献书伪造古籍

由于秦始皇焚书，项羽火烧咸阳，历代征战，使典籍散佚。每个朝代迭兴，必下诏求书，以充实内府中秘。如汉武帝下诏广求秘籍，成帝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搜访异本，唐太宗贞观年间魏徵及令狐德棻请购求亡逸之书，代宗肃宗在安史之乱以后皆相继求书。于是就有人借此机会假造伪书去邀官请赏。如汉成帝时东莱张霸献伪尚书百二篇，后经中书校之，其所献《尚书》乃是割裂《尚书》篇目，并加以《左传书序》作首尾，成帝因

奇其才赦其辜，不灭其书。又隋文帝时刘炫献其伪造《连山易》和《鲁史记》，后有人讼其书为伪造，后亦赦免其死罪。东晋梅颐上《孔传古文尚书》，当时学者皆信其说，并将其书立于学官。直至清初始定其书为伪书。

丙、借古籍出土而造伪书

历代古建筑倒塌，拆建，古墓的挖掘，常有古籍随之出现。如近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有《孙武兵法》与《孙膑兵法》，解决了孙子兵法著者问题。历代出土的竹简书籍，也给伪书出现制造了机会。如据《孔安国传》称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得先人虞夏商书传及《论语》《孝经》。又《晋书·束皙传》：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魏襄王墓或官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又河内女子发老屋得《泰誓》三篇，后经考证皆为伪作。至清光绪年间殷墟甲骨文字发现后，北京琉璃厂书商伪造假甲骨文字的也很多。

丁、有关作者的依托

上古书籍藏于内府宫中，史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战国时期诸侯亦藏书于盟府或故府。并无私人著作，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如《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孔子言行非孔子自著。西汉司马迁为太史令著《史记》一百三十篇，当时称《太史公书》。后世书籍有的经历代增添，作者不可稽考，有的并无作者而托名古人，如托名神农所撰的《本草》，其地名多为汉置郡县，托名秦越人（扁鹊）的《难经》，廖平断其为六朝人所依托。《四库提要》中收苏轼著作十一种，有些并非苏轼所撰。如《物类相感志》按四库称："旧题为苏东坡先生撰，闻苏轼不曾有此书。又题为僧赞宁编次，苏为熙宁，元祐间人，赞宁为宋初人，岂有苏轼著赞宁编之理。"

戊、经私人长期收藏以伪乱真

东汉以后私人藏书家渐多，每有新书辗转传抄，并不轻易示

人。如唐杜暹题其藏书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范氏天一阁自明末以来为海内名藏书家,至今岿然独存,范钦晚年,为防书籍散佚,阁门及书橱锁钥,均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登楼。藏书家缪荃孙曾随太守登楼一次。1942年郑振铎、赵万里、马隅卿等先生南下访书,谋一登天一阁,并未如愿。因而有些伪书为名家收藏,偶一出世,遂充真书。如《慎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载四十二篇,《唐志》为十卷,《崇文总目》为三十七篇,宋王应麟称只存五篇。《百子全书》中《慎子》为宋以来残本,但在《四部丛刊》中收有足本《慎子》计内篇三十六,外篇五十,此书乃藏书家缪荃孙所收藏,(《四部丛刊》影印缪写本。)据说为明慎懋赏所传。后经考证实为伪作。

(二)古籍中辨伪情况

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人怀疑古圣先贤的事迹,如子贡在《论语》中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孟子也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传》、班固《汉书·艺文志》都提出辨伪问题。后汉马融对于《尚书·泰誓》提出质疑,王充《论衡》中的《书虚篇》、《儒增篇》等指出古书中失实之处很多。唐代柳宗元怀疑《鬼谷子》、《晏子春秋》等为伪书。至宋欧阳修怀疑《易经》的《十翼》。王安石怀疑《春秋》。司马光怀疑《孟子》。到明代宋濂著《诸子辩》。胡应麟著《四部正伪》。清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辨伪学遂成为一门专门的学术了。

甲、有关经书的辨伪

自西汉末年刘歆欲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反对,称刘歆"颠倒五经令学士疑惑"。东汉马融郑玄合古今文经注《三礼》、《尚书》。郑玄弟子临孝存就不信《周礼》,称其为"末世谇乱之书",作《十论》《七难》来指斥。何休称《周礼》是"六国阴谋书",赵岐注《孟子》认为外篇文

字不能弘深，就删去不注。唐代啖助、赵匡在《春秋》研究上并不墨守师法。刘知几指出《尚书》、《春秋》、《论语》对于古史真伪不分。明代胡应麟著《四部正伪》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孝经》《易经》等质疑尤多。清代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把晚出的《古文尚书》的出处一一考证出来。邵懿辰作《礼经通论》指出《逸礼》是一部伪书。康有为通过对《史记》《汉书》的研究指出秦焚书六经未尝缺亡，从而证实了刘歆所献的古文经书，是迎合王莽篡汉的需要。至此古文经为伪书始成定论。至于今文经通过诸家辨伪，指出其中一部分是儒家托古改制，只可作为儒家思想史来研究。

乙、有关史书的辨伪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但是《史记》也有羼入的部分。《汉书·艺文志》录有《太史公》百三十篇。注云十篇有录无书。刘知几曰："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元成之间褚先生更补其缺。"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叶大庆在《考古质疑》中谓《司马相如赞》乃班固所作，而在《史记》则称太史公作，其文全与汉书相同。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刘歆窜改《史记》是为伪古文经制造依据。又如《四库提要》中称《晋史乘》《楚梼杌》："乘凡四十二篇，梼杌二十七篇皆摭拾《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汇而次之，其伪不待考。"

丙、有关子书辨伪

《汉书·艺文志》载《孔子家语》二十七篇，唐颜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隋书·经籍志》录王肃注《家语》二十一卷，唐宋以后所著录为王肃《家语》十卷。王柏说，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载记割裂织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也。（见《经义考》）崔述亦说《家语》一书，本后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于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见《洙泗考信录》）。又《亢仓子》一书称周庚桑楚撰，唐天宝年间天子崇尚道家，尊老子，表彰庄子、列子。又称《亢仓子》为《洞灵真经》。当时并无此书，于是襄阳处

士王褒伪《亢仓子》。而其书实为王褒所伪作。又《汉书·艺文志》载《鹖冠子》一篇而唐韩愈曾见过十六篇，《四库提要》载三卷，可见为后人所羼入。柳宗元读贾谊《鹏鸟赋》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鹖冠子》，后至长沙，始见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乃好事者伪为其书，用《鹏鸟赋》文以饰之，实为伪作。

丁、有关集部的辨伪

《楚辞》是最早的赋，《书录题解》称"《楚辞》刘向所集，王逸所注，而《九叹》、《九思》亦列其中盖后人所益也欤"。《楚辞》虽称屈原作，其中有增益，如《九叹》为刘向作，《九思》为王逸作。又《四库全书》收《东坡集》一百一十五卷，其中有《苏辙墓志》。世称东坡七集与《宋志》所载不同。《扪虱新语》称其邑人陈元规著，《和贺方回青玉案》为华亭姚晋作，苏集中如《睡乡》、《醉乡记》鄙里浅近决非东坡所作。又宋朱淑贞《断肠词》一卷，《四库提要》称杨慎《介庵词》载其生查子一阕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语，毛晋跋遂称白璧微瑕，然此词今载欧阳修《庐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窜入淑贞集内。又明代《诗文原始》一卷称李攀龙撰。《四库提要》称："此书自明以来不闻为攀龙所作。其持论亦不类攀龙语。疑亦曹溶掇拾割裂之书。伪题攀龙名也"。

辨别伪书与考证年代的方法

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中提出辨识伪书的方法为："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概括了前人辨伪的方法。概括的说，一方面是研究书的本身作者在作品中反映的时代史实、思想与文章辞藻、章法、体裁、风格。另一方面是寻求旁证，查找书籍出现亡佚及其与他书籍之关系。现将辨伪的方法试分述如下：

（一）用目录学的方法

我国最早的目录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七略，但早已亡佚，东汉班固著《汉书》修《艺文志》，即用七略分类法，凡秦以前所存古籍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依据，隋代藏书则据《隋书·经籍志》以下则为《唐书·艺文志》。宋代公私藏书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尧臣《崇文总目》，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可以考证书籍出现与亡逸情况。如《易》见于《汉书·艺文志》而《隋书·经籍志》又出现了《归藏易》，《新唐书·艺文志》又著录有《连山易》，古称《连山易》为《夏易》，《归藏易》为《商易》，从出现的时间先后考证，《连山易》、《归藏易》都是伪书。马端临《文献通考》称曰："《连山》《归藏》及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归藏》汉志无之，《连山》隋志无之，盖二书至晋、隋间始出。而《连山》出于刘炫之伪作，北史明言之，度《归藏》之书，亦此类耳！"吴莱在《经义考引》中，"说《归藏》今杂见他书，颇类《易林》，非古《易》也。"《关尹子》见于《汉书·艺文志》后亡佚，至宋又再现。《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是唐五代间方士所为，宋濂疑为孙定伪造，梁启超认为是唐人翻译佛经的笔墨。《汉书·艺文志》载《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间，似依托也。"

（二）寻找各种旁证

辨别一书的真伪，可以通过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来分析，当时无人引用，后代又无人发挥，或有前人称引，但与现存文章不同，其可靠性就值得怀疑。如《尚书·泰誓》篇古称为河内女子所献，马融怀疑其为伪文，并引旁书中所载《泰誓》逸文作旁证。如《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之于疆，则取于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马融所引《泰誓》逸文，今文《泰誓》皆无此语，证明今存《泰誓》实为一篇伪作。

（三）从时代思想来分析

《老子》一书攻击仁与义。在孔孟以前古代思想史中，并不重仁义之说。孔子重仁学，以仁为道德最高标准。仁义并举始于《孟子》。如果《老子》一书成于孔孟之前，其攻击仁与义，则为无的放矢。《墨子》的口号是尚贤，而《老子》则称“不尚贤使民不争”。可见从社会思想发展中，《老子》一书应成于孔孟之后。又如《管子》并不是一人之笔，也不是一时之书，如《弟子职》篇全似《曲礼》，《心术》、《内业》等篇皆影附道家，他篇又似老庄，故宋濂称其书：“非管仲自著，后人附益者多于仲之本书。”

（四）从著作年代与流传年代矛盾中分析

张湛注《列子》在序中说：永嘉之乱，由其外祖父家得《列子》孤本，南渡中丢失仅存三卷，后又从刘正舆处得四卷，从赵季子家得六卷，去其重复实存八篇，列子既称与庄子同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列子》八篇，但后亡佚，至晋永嘉之乱以后，张湛始注《列子》。而《列子》一书十有三四与《庄子》相同。其中《周穆王篇》与《穆天子传》同，而《穆天子传》恰好出于晋太康二年汲冢中，张湛生于其时，剽窃《庄子》与《穆天子传》又加以注，并于《仲尼篇》有西方圣者之言，即指佛教。晋代佛教盛行，张湛伪造《列子》带有当代的色彩，可以证明非周列御寇所著。

（五）从书籍本身来分析

从书名上考证，《诗》、《书》、《易》、《礼》、《乐》、《春秋》古称六艺，并不称经，因汉儒有“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语，后人伪作《孝经》称孔子弟子曾参所撰，并列于十三经之末。《孝经》开始曰：“仲尼居，曾子侍”。从这种称谓上看，非曾子所著。如《论语》乃孔门弟子记孔子言行，如子曰“学而时习之”，子曰“学然后知不足”；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种称谓均为后人所记。

谥法是天子诸侯死后加上的尊称，管仲死于齐桓公之前，而《管子》一书处处称齐桓公。管仲不可能知齐桓公谥号，《管子》一

书亦非管仲所自著。商鞅死于魏襄王前四十二年，而其书屡称魏襄王。又司马相如《长门赋》开始称孝武皇帝陈后，司马相如早死，焉知武帝谥号，当是魏晋人的伪作。

避讳是不直接称君王之名，如遇到这些字，以改字，空字或缺笔等办法加以避讳，如汉武帝名恒，就改恒山为常山，庄子非汉代人，而《庄子》亦称陈恒为陈常。《元经》称隋王通著而避唐帝李渊李虎讳，称载渊为载若思，石虎为石季龙，则当为唐人伪作。

从书中的地名可考证书的年代。历代地名有所变化。如《本草》旧称神农所作，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山海经》旧称大禹著，而引长沙，成都等秦汉郡名，自非禹所作。

从假托预言来辨识伪书，如亢仓子是战国时庄周的朋友，《亢仓子》书中称"衰世以文章取士"，可见此书是科举制度开始之后假造的书。

从抄袭旧作来辨别其真伪，如伪《古文尚书》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宋以来理学家宗仰的。危微二语出于荀子，而荀子《解蔽篇》又转引子《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论语・尧日篇》述尧命舜之言曰"允执其中"。伪造者把二者连缀在一起，把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改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又加上惟精惟一，遂成十六字真言。在《古文尚书》中尚有许多取自诸《经》《论语》《孟子》等处，加以修饰成篇的。

（六）从文章风格来考证

从文章体裁来识别，梁萧统编《文选》中如李陵《答苏武书》开头是"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荣问休畅，幸甚幸甚。"这是魏晋以后信札客套，《文选》中所选的汉代书信，只有这篇才有。刘知儿称其词采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汉人。章学诚认为是南北朝时南人羁北而事类李陵拟此书以见志。

《玉台新咏》载枚乘五言诗九首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中，萧统也不认为是枚乘所作。在西汉一代没有五言诗，至魏曹植始以诗闻名。

词盛于宋，晚唐温庭筠开始作长短句，五代有《花间集》，陈振孙《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而《樽前集》却收有李白词《菩萨蛮》与《忆秦娥》等。梁启超称其神气高迈。不是盛唐的作品。

用作品语言来分析作品时代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人从语言角度分析《列子》，认为这部书中的词义语法与先秦不同，如"舞"作舞弄、戏舞讲，"都"用于动词前作副词，不是先秦语言，而是后人之作。

当前辨伪学的任务

（一）伪书的价值

伪书是古人依托，但在古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伪托神农著的《本草》，黄帝的《素问》，扁鹊的《难经》都是我国极为宝贵的医学史料。《列子》出于晋人之手，其中多集道家之言、佛家神话，作为晋代思想来研究，则是一部有价值的资料。又如《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同称周姬旦撰，是我国最早的算术书。《周髀算经》见于《隋书经籍志》，《九章算术》见于《后汉书·郑玄传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有著录称"魏刘徽唐李淳风尝为之注，则此术起于汉之前矣"。伪书称伪因其年代错乱，作者不真实，但其所写的内容必反应作者的时代，并保存当时的史料。如果是春秋战国时代伪造的书籍，必保存了秦以前的史料。汉代伪造的书虽托于上古，实则保存了汉代史料。晋人伪造的书则保存了晋史料。辨别古籍的目的在于求真，恢复其本来面目。应当排除过去的门户之见，实事求是。用历代书目来鉴别伪书，也并不是绝对可靠，如国家所录的书籍不一定将当代书籍包括无遗。私家书目只记一家藏书，如《昭明

文选》李善注引书一千余种，有的并不见于《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与《旧唐书·经籍志》。

(二)辨别伪书是一项艰巨任务

1955年再版的张心澂编著的《伪书通考》，所涉及的伪书计1105部。其中经部88种，史部98种，子部324种，集部145种，道藏33种，佛藏417种。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探讨这些伪书所需要查阅的史料当然更不仅此数。《伪书通考》本来是一部工具书，有的却嫌引证过多，结论较少，书名下仅题"疑伪"，"作者伪"，"非自著"，"非伪"等，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辨伪学的其他著作中，对于伪书的研究也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和结论。下仅引宋濂《诸子辨》、胡应麟的《四部正伪》，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家为例：

诸子辨		四部正伪		古今伪书考	
鹖冠子	真	鹖冠子	伪杂以真	鹖冠子	伪
鬼谷子	真	鬼谷子	伪	鬼谷子	伪
司马穰苴兵法	疑亦非伪	司马法	真杂以伪	司马法	伪
吴子	真	吴子	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	吴子	伪

其它各家均亦如此，因此辨伪工作既需集各家之说，更重要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判定其真伪作出定论。这是艰苦，细致，严肃，费时的工作，但是整理古籍不能分辨史料之真伪，则不能给研究工作提供正确的史料。因此我们提出上述问题，请同志指正。

(三)伪书著录与揭示问题

过去古籍图书的著录基本项目主要是：书名项、著者项、版本项(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出版类别，附批校题跋者)、稽核项(册数)、附注项(是有关书名、著者、版本、稽核等项的补充说明)，对于

书的真伪并不注录。如：

历代地理指掌图一卷 题宋苏轼撰 明刻本 三册	墨子十五卷 明嘉靖三十二年唐尧臣刻本 六册

以上两例都没有注明作者，如题宋苏轼撰也不能视作确切作者，《四库提要》已指明此书非苏轼撰。墨子没有注明作者，其作者尤为复杂，而图书著录是为了加强图书的科学管理。目前要求图书馆展开馆际互借，国际互借，要求图书著录标准化。因为只有著录标准化，图书馆藏书才能实现现代化。所以图书辨伪工作是一个新课题，是图书馆工作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在图书著录中要加强附注项，把书籍中的真伪分别著录出来，使古籍目录发挥其全面揭示馆藏、宣传图书，辅导阅读的作用。

另外也可以把伪书汇编成工具书，使其简明，扼要，准确，观点要鲜明，具有时代特征，使伪书通过辨伪著录，给它注入新生命，让它们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参考书：

①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　顾颉刚主编
②伪书通考　张心澄编著
③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
④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
⑤古今伪书考补证　黄云眉
⑥四库全书总目　清永溶等撰

书估作伪例析

王元才

古书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一切在市场上通常出现的现象也必然在书市上随之反映出来。书估利用古书作伪，这种恶习由来已久。他们为了牟利，利用刻印流传的古书造伪，或抽去重刊书序，或剜补改换，或伪钤藏书家印记，以巧取善价。这次编制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在对无锡市图书馆收藏的古籍普查过程中，碰到不少作伪的古书，给工作增加了难度。为了今后整理古书，向历史科学研究者正确提供文献资料，现就自己在工作中所知所见的伪书，举例谈谈作伪的类型和各种手段。

增刻牌记

古书中刻印牌记，通常在书页的背面，也有在序跋后或凡例目录后。牌记是有关古书版刻的题记，它记载一部书何时、何地、何者所刻等出版事项，相当于现代书籍的版权页。古书在翻刻时常会保留原刻的牌记，不避翻刻时代的讳，而保留原刻的讳字。书估利用牌记在记载古书版本方面的价值，制造版本假象，抬高古书版本的价值，以便对藏书家牟取高利，这是书估作伪常见的现象。如有一部明胡广等辑的《书传大全》，大黑口，明刻本，在序后有“至元己卯仲春泉州府儒学刻行”的牌记。看了后不免使人感到奇怪，明代人辑的书，怎么可能会在元代至元年间刻印。细看这块牌记，墨色与原书比较，显得浅淡，字体肥硕，相比之下，可见这块牌记系后人加印。同时还在序首伪钤“御史之章”“季振宜印”等三方朱印，以示这部书是经过名家鉴定收藏过的，企图借此说明版本的可靠。

还有一部《尚书注疏》二十卷，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书估从另一部书上剜下一块"至正辛卯孟夏德星书堂重刊"的牌记，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贴在这部书的卷一末尾，还在卷端题上钤了"乾隆御览之宝"的圆印。这部书的封面用鹅黄色的乾隆腊笺，墨书"元版书径"题签和"经筵日讲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臣嵇璜恭进"一行，好象这本书不仅是元刻本，而且还是进呈本。不过这块牌记加得很拙劣。牌记的墨围是书估用笔加上去的，用来掩盖其贴补的痕迹，只要稍微仔细辨认，还是不难识破的。还有将牌记剜割的，这种手段常用于翻刻本，因为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有一部宋罗泌撰的《路史》，四十七卷，清嘉庆十三年酉山堂根据明万历乔可传刻本翻刻。原书封面有"重校宋本镌，酉山堂藏板"的刻书牌记和"嘉庆十三年春月镌"的刻书年款，书估割去这块牌记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每卷卷首以及每页书口所题"路史"的"路"字的足旁，加印王旁，伪题"明梁溪浦瑾纂"。因为剜改的痕迹很微小，不易被人看破。有的藏书家也就误认为是明万历年间刻印的无锡浦瑾撰的"珞史"而收藏下来。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剜改序跋

古书序跋，有著者自序，以叙述家世、著书宗旨居多；也有著者好友写的序跋，一般是标榜吹捧性的文字；还有刻书者的序跋，以记刊刻经过和版本源流。序跋是了解古书的内容、作者生平、版刻源流的重要线索，从中可以得到有关版刻的年代、地点以及著者生平等材料。书估采用剜改撤换序跋的手段制伪。如明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估将书名挖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估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书

估为了证明这部伪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剜，一是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割去后，杜撰墨书“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百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还有一部《古今考》三十八卷，宋魏了翁纂，元方回续，明崇祯九年谢三宾刻本。每卷卷端书名下题：鹤山魏了翁华文增，紫阳方回万里续，四明谢三宾象三定，分三行并列。书估在“紫阳方回万里续”行上面空白处，加印“梁溪蒋重珍良贵撰”木记，蒋重珍成了《古今考》的原著者了。这个伪著者似乎加得毫无价值，不会给这部书带来多少光彩。其实不然，书估很善于捉摸藏书家的爱好和藏书特点，因为无锡藏书家很重视对乡贤著作的收集，书估便投其所好，加印了“梁溪蒋重珍良贵撰”的木记（梁溪是无锡的古称）。书估还对谢三宾刻书序文作了剜改，抽去序文首页的前半页，然后配上仿照原序文的字体伪书：“《古今考》一书，南京蒋良贵先生所撰，其门人紫阳方氏续成之”。这类剜改常常是为配合伪造书名、著者，制造假象而作的。

为了抬高古书版本的价值，有的书估使用撤换原书序跋的手段。有一部《东坡全集》明刻本，原书序跋已脱落，书估从明弘治年间刻的宋陈傅良的《止斋文集》，抽取弘治年间王瓒为《止斋文集》撰的序，将这与《东坡全集》风马牛不相及的序文，张冠李戴装订在《东坡全集》的前面，同时剜改明弘治的年款为元至治。在“弘”字剜补处并钤了“乾隆御览之宝”一印，这样就把明刻本升为元刻本。不过这个伪造太草率了，序中留下了“弘治乙丑”，“止斋陈文节公”等文字，使序的内容与撰序落款自相矛盾，为鉴定这部伪书提供了方便。

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

借以了解古书内容。同一种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估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

《唐诗正声》，明高棅辑，明种德堂刻本。全书二十二卷，我馆收藏一部残本，存卷一至五、八至十七，计十五卷。书估为了将一部残书冒充一部足本，首先割去十六至二十二卷的目录，从原书目录末尾剪下"唐诗正声目录终"，接补在目录卷十五"五言排律三"后面。接口接在栏线处，接痕不易察觉，造成假象，似乎全书目录到此终了，全书即为十五卷，诗选至五言排律。但书估没有注意到原书凡例说得很清楚："诗体之次第，为卷先五言古诗，次七言古诗，次五言律，次排律，次七言律，次五、七言绝句"。说明五言排律后，还有七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书估为伪作全书，将卷十六、十七的卷端和书口剜去"十"字，同时将小题"七言律诗一、二"，分别剜改为"五言古诗一"和"七言古诗一"。这样剜改后并没有使书和目录相符，原书目录卷六是"五言古诗六"，如果谁把卷十六的七言律诗当五言古诗来吟，一定是诘屈聱牙，无法理解。还有一部明周文采辑的《医方选要》，全书十卷，明刻本，残存二卷。书估先剜去原书序中有关记载卷数的文字，再将卷二剜改为卷上，卷一就势改为卷下，书口也进行了同样的剜改。为何把卷二改成卷上？这是为了图方便，卷二只要改动上面一横，卷一无须剜改在下添两笔就行了，这样一剜改，周文采辑的《医方选要》残本，就变成了上、下二卷本了。由于剜改的部分很少，再加上在卷端剜改处钤了"文渊阁宝"的方印，很容易造成错觉，以为全书无疑。

书估在剜改目录，篡改卷次方面的手段也不少。除了剜改外，还有伪加目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存五百六十五种。书估将这些书合在一起，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尤镗辑，还在书前

杜撰了一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百多种，书估还是不厌其烦的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希见丛书。

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这是书估出售残本的另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它版本或其它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缺卷四十八至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估为了将这部《史记》拼配成“足本”，从明嘉靖四至六年王延喆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靖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以充宋本，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台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刊者姓氏，把纸熏染成暗黄色，给人以古色古香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了“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喆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估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还有一部《韩忠定公集》四卷附二卷，明韩文撰，明万历八年乔因羽刻本，存卷一、卷二以及附卷一，书品很平常，如果以残本出售，大概是不会招徕藏书家的。书估就以乔因羽十代孙乔有庆，乔毓庆在康熙年间的重刻本抽取短缺的半部，拼成全书。

另外还有将几种书杂拼为一书。如高棅辑的《唐诗品汇》九十卷 拾遗十卷，仅存《唐诗品汇拾遗》八卷。书估为拼成《唐诗品汇拾遗》十卷，竟用了三种明刻本。卷一至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这三种书的板式行款

各不相同。前两种书同为《唐诗品汇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者辑本，书估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序[illegible]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刻本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丛书零种充单刻本

以丛书零种数种，凑合起来，伪加序目，另立书名，冒充别一刊本丛书。如《稗海》七十一种，四百四十六卷，明商浚编，明万历中会稽商氏半野堂刻本。无锡市图书馆藏有这部丛书的《独异志》、《述异志》、《小名录》、《东观奏记》等十种四十一卷。书估把这十种书汇集在一起，伪编目录，题一假书名为《稽古汇编》。编者由明商浚改为"明锡山吴学纂辑"，在前面加了一篇伪序："侍御吴公巡按河南诸郡，观风之暇，校刻《稽古汇编》，檄布学宫。"以惑人眼目。还有一部《说郛》，存一百种，书估用了同样的手段，把原丛书目录的顺序打乱，另编目录，目录改作《续百川学海》，著者为"无锡姚咨潜坤辑"。这样可以将一部丛书的多种零种，假名为一种完整的丛书。

还有将丛书零种剜去原书所题丛书的总名或刊刻者堂名，冒充单刻本。如元俞琰撰的《俞氏易说》十三卷，本是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经解》本中的零种。原书版心下有"通志堂"三字，书估把这堂名剜去，同时还剜去"康熙丙辰二月纳兰成德容若序"的字款。还有一部《东莱先生唐书详节》，是宋吕祖谦编的《十七史详节》丛书中的一种，明正德十五年刘弘毅慎独斋刻本。书估剜去卷一题下"建阳慎独斋新刊"和其它各卷卷端所题刊刻者姓氏斋名。还割去卷六十末尾的刻书牌记，在卷端题上钤"元本"一圆印，剜去斋名之处，补上从原书剪下的白皮纸，并满钤名家藏书印。由于割补处用原书纸，再加盖上那些印章，剜补的地方就不容易被察觉。

伪做罕见书

这类作伪在古籍伪书中较为常见。书估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多，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书估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邵宝国贤撰"木记，序文也作剜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挖改，成了罕见的奇书了。还有一部《历代名臣奏议》，明杨士奇辑。明崇祯刻本。书估用了上述同样的手段，将书名剜改为《历代大儒奏议》，伪题"无锡邵宝撰"，在书名剜改处钤了"南宋翰林院印"的方印。另外还有一部《藏书》六十八卷，明李贽撰，明天启陈仁锡刻本。书估剜去卷端书名《藏书》的"藏"字，加印"国"字，这样书名由《藏书》剜改成了《国书》。原书口所题书名均用墨钉涂去，卷端书名剜改处钤了"吴骞之印"、"拜经楼"等印。由于剜改处盖上了朱印，改动又很小，不仔细看，是不容易发现的。《藏书》书名被剜改，并不在于躲避清政府的查禁和免遭文字狱之祸，而是书估制造一奇书，以投藏书家所好。书估将卷端题下著者李贽剜改为"梁溪李应祥徵善辑著"，"李"和"辑著"都是保留原书的字样。

书估在伪造罕见书时，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剜改书名、著者、伪钤名家藏书印互相配合。但是，总不免留下作伪的痕迹。《藏书》书口的书名虽被用墨涂去，可是原书名字样仍透过墨痕依稀可辨。

抄本充稿本

利用抄本涂涂改改以充稿本，这种造伪并不罕见。如《(乾隆)

吴江县志》五十八卷，清陈纕修，沈彤纂，清抄本，残存十七卷。书估为了冒充作稿本，先将书名剜去，伪题《三吴采风志》，著者"句吴赵函纂"。同时伪造稿本假象，在文中进行圈改，好象是著者撰写修改的文字。但细看圈改之处，发现那些涂改的文字与内容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将原书文字的意思颠来倒去，书的内容没有增删。如"大清"改成"我朝"或"国朝"，也没有完全改过来，有些地方还是留着原抄的"大清"，留下作伪的弊端。《东华录》三十二卷，清蒋良骐撰，清抄本。书估割去这部书卷的前半页，加上伪抄的半页，题书名为《皇清肇基录》，著者为"无锡王会汾荪服父"。在正文前还伪加王会汾自序，记叙所谓《皇清肇基录》的撰述过程，以充稿本。

书估造伪也不是完全盲目的，在伪造奇僻之书时，也是依据著者的生平，以便增加伪书的欺骗性。如《虞阳说苑》为民国丁祖荫所编，民国抄本，存二十一种。书估将这二十一种书重新编写目录，伪题《海甸野史》、锡山顾祖禹纂著。顾祖禹是明末清初无锡人，地理学家，明代灭亡后，他深怀亡国悲痛，隐居著作，家住在无锡与常熟两县之交的宛溪。因《虞阳说苑》是记述常熟掌故以及有关明季史乘，书估就利用这一点造伪，在抄本中窜改，以冒充顾祖禹的稿本。还有《徐霞客游记》十二卷，明代徐弘祖撰，清抄本。书估将书名改为《游名山记》，题"锡山安希范"撰，同时钤"稿本"一长方印。安希范系无锡人，明万历进士。《(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九记载，安希范著有《名山记游》等书，可见书估是依据二志的记载作伪的，以便使藏书家相信，还在前面加了一篇序，记叙安希范撰《游名山记》的经过。由于这序是旧纸新抄，原抄本有蛀痕，为了达到这序和原抄本为同一时间抄写的效果，用剪刀在新抄的序上仿照原抄本伪造虫蛀的痕迹，不过蛀痕造得太拙劣了，到处是直角，而蛀虫是没有那样的本领的。

染　纸

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不是近代才有的，早在明代就已有人采用。当时是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而近代书估则是利用明清时的影宋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有一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唐王冰注，原是明嘉靖二十九年顾从德影宋刻本。书估剜去顾从德刻书年款，将纸熏染成陈旧颜色。目录、卷首均钤满“宋刊奇书”“徐氏传是楼藏书”等印，前面扉页上伪题乾隆二十九年无锡秦蕙田跋语：“此真宋刻佳本，人世存者少矣，吾家世有旧刻，久多散佚，此书得之玉峰徐氏吉光，为味经窝藏书珍本之一，子子孙孙其善守之。”秦蕙田是清代无锡著名藏书家。不过仔细研究，就能看出纸的色调很僵板，有些极不匀称的水渍，是后人熏染而成的。有一部嘉靖四年汪谅刻本《史记》，书估以其貌似宋刻，采用同样的手段，剜去嘉靖四年汪谅的刊刻年款，再将纸染黄，并钤了名家藏书印，以充宋刻。

伪作名人批校题跋

古书流传，无论抄本还是刻本总不免有讹误之处，但经过名手校雠，纠正讹误，使得古书正确可靠。有名家手校过的书，为藏书家所珍视。而书估临摹名人手笔，伪造名人批校题跋，并不鲜见。如我馆的《管子》二十四卷，唐房玄龄注，清刻本，书的天头有朱墨二色批校，不知出自谁的手笔，大概批校者没有名望，书估割去卷二十四末尾批校者的题款，而题“同治九年孟秋七月无锡薛福成校读一过”，将这题款与眉批比较，很明显薛福成的题款系后人所加，题款曰校读一过，而那些眉批实际上是对《管子》某些章节的评论，并没有校过一字。

还有一部《荀子》二十卷，明嘉靖十二年吴郡顾氏世德堂刻六子全书，有佚名用朱墨二色过录清惠栋的校跋。惠栋是校雠名家，

书估为了提高这部书的价值，就利用佚名过录惠栋的校跋，假冒惠栋手笔，在扉页上题"二惠先生校正荀子二十卷，惠学士士奇朱笔，惠徵君栋墨笔"，卷二末题："乙酉年取摹印宋刻本校毕，差落三十七字"，反面又题"乾隆癸酉十月，又取何氏校录定本校此二卷，松崖"，在题款下钤了"惠栋之印"一阴文方印，而在卷二十末尾惠栋题款下则用墨笔描了一方"惠栋"的印章。另外还在书的原文中进行毫无变动的涂改，如卷一"青取之于蓝"书估将"取"用墨笔圈去，却又在旁边加了一个"取"字。其它几处涂改也然，可谓欲盖弥彰。所谓惠士奇朱笔，惠栋墨笔，实际上朱墨两色批校均为一人手笔，书估加上惠士奇批校，是为了更吸引无锡的藏书家，因为惠士奇是清代无锡地方名贤。

上面所述古书作伪的几种类型，仅仅是肤浅地列举一般手段，反映了某些旧书肆作伪的特点。古书作伪无论怎样变化多端，手段怎样高超，总不免留下蛛丝马迹，只要在工作时仔细研究考察，大多数伪作还是不难识破的，剜改的书只要朝着光亮一照，伪饰之迹就显然毕露。因此在鉴定时，不要急于查找参考工具书，而应对原书先进行审慎研究，考察其来源、出处和保存、流传的过程。尤其遇到那些奇辟罕见的书，更需特别注意，多闻阙疑，进行多方考证再作结论，切忌主观臆断，牵强附会。

（原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4年2期）

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

谢国桢

明清时代的版本

明清时代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是社会经济繁盛的时期，从而

在上层建筑、学术文化上也超过了前代。研究版刻，一提到版本，总说是宋版、元刻。宋元版刻固然刻的精美，但罕有稀见，不容易寻求；可是到了明清时代所刊刻的或抄写的书籍，种类极为繁多，版刻书写和绘画式样亦由简单发展为细致，形式也各有不同；非叙述其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寻找出一个线索来，是难以得到一个概括的印象的。

明代初年所写刻的书籍，还沿着元代仿赵松雪（孟頫）精楷写刻的字体，象元朝刻的《十七史详节》那种的精美的体制；明初宋濂的儿子宋璲，年才二十岁，手写上版《吴渊颖集》十二卷，书写极为精美；再如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命宋濂等首先编纂了《元史》二百十卷。我曾见过初刻本的《元史》本纪的残页，天地头极为宽大，雕刻的大字也很精美。到了永乐——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命胡广、解缙等所编辑的《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册，目录六十卷，用红格大字本精抄缮写，极为雄伟精美（可惜在清咸丰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时，《永乐大典》也被焚毁，部分劫掠到英法各国的博物馆中，现存北京图书馆的仅二百一十六册）。从此以后就引起全国人民和缙绅士大夫刊刻书籍和精抄缮写书籍的风气。但是在明、清两代五六百年当中，也有兴衰起伏，主要的有两个最兴盛时期：一个是明嘉靖万历年间刻书和精抄本书种类繁多的时期；一个是清康熙、乾隆年间写刻书籍极为精美、校雠极为精善的时期。这都是与劳动人民的创造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分不开的。道光、咸丰以来所刻的书籍，由精写楷体字大部改为方整的软体字，校对的也不错，可是已经走了下坡路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的先进技术与文化传入中国；人们为了传播祖国的文化和翻译外国的书籍，于是就由木刻和木刻的活字本，改变而为铅字排印以及石版影印和珂罗版精印书籍，印制的维妙维肖。如今，我就依据这个轨迹分别条理，叙述如下。

自洪武初年建都南京以后，在南京设立了国子监，教育培养考试的生徒，取南宋留存下来的旧版刊行五经、四书以及二十一史等书，此叫做“南监本”；及至永乐十七年后迁都北京，同样地设立了国子监，取南监所刊印的经史等书，重为刊行叫做“北监本”。永乐时由宦官、太监成立了司礼监，专管皇室的出纳诏令文件等事，派东、西厂“特务”去监督刊印，此书叫做“经厂本”。现在还存留的永乐时所编的《历代名臣奏议》，俗名叫《大奏议》，就是“经厂本”。还有洪武和永乐时内库所印夹板式折叠装订的佛经，在南京印的叫做“南藏”，在北京印的叫做“北藏”。这部藏经一直到正统五年才印成，所以又叫做“正统藏”。它的封面是用五色花纹丝绸装裱成的，外观非常美丽，闻原刻版片现尚存于雍和宫。其余还有各省衙署所刻的书籍，以及各地书院所刻的书籍，如紫阳书院成化三年所刻的《瀛奎律髓》四十九卷，九峰书院嘉靖十五年所刻的元好问集《中州集》等，这就叫做“书院本”。

明朝为了要巩固其封建统治，大封其亲属子弟为藩王，给以万顷以上的田地，役使数以千计的家奴，拥有无数的财宝，使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这些藩王当中也有依附风雅，喜爱刊印书籍的。他们刊印的书就叫做“藩府本”，其中最重要的有周藩、晋藩、吉府、肃府等所刻的书籍和碑帖。周藩（周宪王朱由燉），喜欢文学词曲和书法，收集了古代的名法书，雕刻了《东书堂法帖》。他自己撰写的《诚斋乐府传奇》，成为音乐和戏剧上的名著。其它象晋藩刻的《唐文粹》、郑府朱载堉所编刻的《乐律全书》、吉府刻的《贾谊新书》以及书画范本（八大山人的画法就是由江西吉府的影响熏陶而成的），还有肃府所刻的《淳化阁帖》以及成化十五年刻的刘因《静修先生集》等书，都是闻名于世的。

从洪武到正德以前的明代初期，写刻精楷渐变为方整的软体字，刻书的形式主要是墨口本和黑鱼尾，所用印刷的纸张是较粗的白棉纸和黄色有麻性的纸张。如能掌握了这些特征，就可以一望

而知为明初的刻本了。从正德以后到嘉靖、万历时期，由于山西和江南苏州、松江一带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刊刻书籍的事业，普遍产生于各大城市。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说：

“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金陵也、燕市也、阊阖（苏州）也、临安（杭州）也。闽楚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大概非四方比矣。两都吴越皆余足迹所历，其贾人世业者，往往识其姓名”。

又说：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值）重，诸方所集者，每当吴中二（倍），道远故也。辇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倍）纸贵故也”。

这样，刻书的事业就发达起来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当时文人雅士以及乡宦仕绅家刻的书籍，如顾春世德堂所刻的《六子全书》，白棉纸精印，字大悦目；吴郡沈辨之野竹斋刻《韩诗外传》，刻画的极为精细；吴郡藏书家袁褧嘉趣堂仿宋刻《世说新语》，雕刻的笔笔工整，是标准的吴门刻本。还有松江何良俊清森阁所刻的《何氏语林》，吴郡顾起经奇字斋所刻《王摩诘集》，字体极为规矩，白棉纸印刷的极为精良，而且每卷之后都刊有各色各样的书牌子，象《何氏语林》所刻“清森阁”三个字长方形书牌子，特别隽秀有力，尤具有特色。凡上列举的这些明版白棉纸精刻本的书籍，或者也有用朱色和蓝色印的，都是明代中期刻书中的上乘。

（二）抄校本。在唐宋以前只有写本，因为唐代以前没有刊印的书，只有手写，因之只有写本。到了宋代刊刻书籍盛行，所以抄本和已刊的宋元旧本和认真校对的校本及批注本并存于世。要看什么时候的抄校本，须看他的笔迹，每个人所写的字与时代很有关

系，辨明其真伪是一件不易的事情，也是学习版本学重要的任务。在明代一般书手所抄写的书，都是用白棉纸或者用黄竹纸。印成蓝丝格或朱丝格的框框，字写的是长头矮脚，写的并不整齐，这都是书坊店里或某个藏书家延请职业的抄书人写的。明初曾有善于写刻上版的宋璲，可惜被罪不幸短命死了。及至宣德而后，藏书家日多，那些退居林下的士大夫们就喜欢刻书和抄藏善本，象叶盛就有箓竹堂抄本的书。宁波天一阁范氏不但藏古书和当时的地方志、登科录等书，而且有天一阁抄本。还有绍兴祁氏淡生堂抄本，和福建谢肇淛小草斋，黄虞稷千顷堂抄本，这都是有名的抄本。可见寒素之士也有以专心致力于抄校书籍、流传孤本作为终身事业的。

明代中叶苏州的柳大中名佥，他是一个寒士，终身从事于抄书事业。他用宋本抄校了《水经注》和《乐府古题要解》，成为后世艳称的柳大中抄本。在此期间苏州又出了一位朱存理。他遇到了古代的书画名迹，就把书画上的题跋抄下来，编成了一部《铁网珊瑚》，使古人的名迹，赖以保存下来。还有钱穀（字叔宝），工于书法和绘画，所手抄的书如《唐代名画记》等不下数十种之多，最为精美。到了明崇祯年间又出现一个寒士名周砚农（字荣起），重新整理编订《铁网珊瑚》为十四卷，在流传图书的事业上起了一定作用。

毛晋汲古阁的"毛抄"可以说精美无比，价值连城，就是由这位寒士周砚农，为之编刻书籍和精抄善本，而逐渐声著。毛家是常熟县的一个大财主，不拿钱去买地，而拿钱去购书和刻书。他为了刻书，派人到江西福建去定购纸张。就是到现在还沿用着毛家定制的纸张，有"毛太（胎）"、"毛边"这些名辞。他开设了印书业的作坊，分配人力，各干一行，已近于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他刊印了十三经，二十一史，编印大部头的丛书《津逮秘书》、《六十家词》等书。他的刻书，流传很普遍。

湖州吴兴闵齐伋，与小说家凌濛初合伙刊刻彩色套印的书籍，

用的是洁白的棉纸和宣纸，有用一色套版印的《楚辞》、三色套印的《古诗归》和五色套版印的《文心雕龙》等书，还印了带图的小说。当时冯梦龙编有《三言》，凌濛初编著有《二拍》（就是拍案惊奇初、二编），风行于一时。他们的套印书，流传下来不下有二三百种，非常美观，至今还有人保留着。这些书的刊印，已经是明末清初的事了。

（三）活字本。我国之有活字本始于宋代的毕升。他对于印刷术推进了一步，可是尚未能通用。到了元末明初，在朝鲜已有用朴木制的朴活字本，推广而到中国。明代中叶以来我国就有用铜、胶泥、木头和瓷烧的活字本，最有名的就是无锡华坚的兰雪堂和叶燧会通馆的木活字本。流传下来的有《蔡中郎集》、《容斋随笔》等书。无锡安国用铜活字印的有《吴郡水利书》等书。到了清初，山东泰安有瓷活字印的《蒿庵闲话》。同时木活字到清代仍继续使用。

（四）书坊刻本。由于明中叶以来江南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各地书坊刊刻的各类书籍。其中最著名的如建阳书户刘洪慎独斋，从明弘治起一直到嘉靖、万历所刻的书，名目繁多，如所刻的有《资治通鉴纲目》巾箱本（就是不到两三寸的小本）、《西汉文鉴》等书。书林刘宗器安正堂刻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和《针灸资生经》等项医书，泊如斋刻绘图的《宣和博古图》等书。燕台（北京）大月门内棋盘街汪谅刻了不少的书籍，并刻有书目作为广告，最著名的有翻元刻张伯颜本《六臣注文选》。还有小说戏曲传奇带绘画的刻本。在嘉靖以后，最有名的为金陵世德堂所刻的《拜月亭记》，富春堂所刻的《紫箫记》等书。从万历到明末崇祯，各书坊里所刻的传奇，据郑振铎先生所编的《古本戏曲丛刊》一共三集，收集插图本戏曲传奇共三百余种，插图不下万幅，其中包括明代社会风俗资料，极为丰富。富春堂所刻的《搜神记》，刻画的图象较为淳朴质实，景物线条较为粗放；万历以后的刻画就较为精细了。这种绘画刻图本还推广应用于社会风俗现状的各方面。明万历间刻

本的《三才图会》就好象当时的新闻画报。《海内奇观》就好象当时地理风俗图考。还有陈组绶所编刻的《皇明职方图》是我国一部明代地图。意大利人艾儒略所编刻的《职方外纪》是一部世界地图。王征编的《奇器图说》是一部科学仪器图说。徐光启编著的《农政全书》是一部耕织图说。徽州制墨店的主人程君房为了作卖墨的广告，把耶稣圣母图也刻到《程君房墨谱》中去了。至于雕刻图画的技术也精益求精，由粗笔道改变为细致的绘画。例如顾炳在万历三十一年所编刻的《顾氏画谱》，是一部仿制的历代名画图谱。崇祯年间金陵胡正言用饾版五色套印凸版的《十竹斋笺谱》，更是闻名于时。

这里我们要谈谈徽州的版刻和明末野史的刻本和抄本。徽州处于皖南山区之中，地狭人多，所生产的食粮不够食用，可是山上的矿产木材颇多，从商的较多。明朝徽商遍于全国，并销货海外南洋群岛、日本琉球各地。又因为商业的竞争就必须作广告式的宣传，好在山上有的是松杉等类良好的树木，他们就用松木熏成松烟来做全国有名的"徽墨"，又把木材用来刻书。徽州所刻的书籍，大约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①徽郡精镌绘图的传奇小说和话本。徽州虬村黄家和项氏为雕刻版画的能手，所雕刻带图的书籍最为出色。如上所说富春堂雕刻的版画较粗糙，徽州黄家等的刻工就精细多了。象黄一凤所刻的《牡丹亭》，项南洲等所刻的《吴骚合编》、《吴歈萃雅》，以及徐文长写作的《四声猿》，不但人物刻画的精细，而且刻画的风景也洒洒有致。

②徽郡书坊所刻小型的日用百科全书。如《鼎镌十二方家参订万事不求人博考全编》、《徽郡释义经书士民便用通考杂字》等书，大约不下二三十种，其内容包括天文、地理、社会风俗、公文书信、买卖房产与男女的契约等，凡是士农工商，出外在家日用事务必须检查的事情都有。《水陆路程宝货辨疑》，就是由徽州进京和

到各地方的路程单，至今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③蒙学普及教育的一类书籍。他们把我国历史地理的基本常识编为《历史揽要》和《全国地理歌诀概要》。他们为了教育儿童，刊刻了《童蒙训》、《千家诗》以及《名贤集》、《千字文》一类的读物。其中夹杂有许多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但不能忘记他们注意儿童普及教育的精神。

④徽州商人的著姓有程氏、方氏、黄氏诸家，在徽州就有些书铺为他们包修宗谱和家谱。还有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权"和"族权"而写下了家训，如《窦山公家仪》等书。自解放以来，在徽州发现了不少地主宗谱和家谱。这些资料，也包含着宗法社会的内容，可以作研究封建社会的反面教材。

清军南侵后，爱国的进步的学术思想家顾炎武写下了《圣安本纪》，黄宗羲写下了《行朝录》，王夫之编撰了《永历实录》。当时的爱国志士亲眼目睹或凭诸传闻，记载明末历史的"不下千家"。清初由于其统治尚未稳定，因之顺治时所刻的书数量较少。康熙初仍沿着明末的风气，以方整的软体字刻本为多。可是在这个时期，虽然有过庄廷鑨的史狱，但统治者的"文网"尚不严密，因之明末有志之士、学者和遗民们在荒江老屋之中写过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创造了不少奇伟的书画和艺术品。这些明末清初人的著述，有的怀着民主的思想，对于封建统治者有所不满。自从康熙初年发生庄氏史案以来，尤其到雍正年间大兴文字狱，经过清乾隆年间的毁禁（令各省开出该应焚毁的禁书目录，名叫《违碍焚毁禁书目》），焚毁了书籍约数十万册。所以在这个大动荡时期——明末清初学者、进步思想家的遗作和诗文集究竟有多少？尚摸不着底，是值得研究的重要事情。因之象顺治时刻本的徐世溥著《榆溪集选》、吴伟业《太仓十子诗选》、王士祯《倚声初集》、萧云从《太平山水图》以及康熙初年吴肃公著《街南文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首七卷本、彭孙贻《流寇志》等，这些书都极为罕见，刻的也很精工，都可以

说是罕见的善本。可是自从发生文字狱，钳制人民的思想，在文网日密之时，一般学者就再也不敢谈学术思想，而流入了考据之学一途。

到清康熙二十四年收复台湾，统一了全国，时局稳定，乃从事于文化事业，刊刻群书，举其最主要编制的书籍，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当康熙三十多年间，他的儿子胤祉、胤禛等，为了献媚皇帝，争做太子，就想各显才能以争取康熙帝的宠信，如胤祉命陈梦雷编辑了《古今图书汇编》，并没有印行。雍正帝即位，为了他们兄弟明争暗斗的关系，免了诚郡王胤祉的职，治了陈梦雷的罪，谪戍充军到奉天（沈阳）去；并命蒋廷锡重新编订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凡为编六，分为三十六典，每部共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铜活字本排印。编辑的方法较《永乐大典》推进了一步，实为我国一部大百科全书。

康熙帝为了拉拢明末遗民，使他们不致于反抗，就在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词科，凡是考取的，就叫他们参加编修《明史》，由王鸿绪主编，万斯同动手主稿，可是在康熙年间并没有修成。到了乾隆四年张廷玉等重新为之编订，《明史》才告完成，凡三百六十卷。这时古今正史为二十三史，尚阙宋薛居正修的《旧五代史》，原书久佚，就命彭元瑞、邵二云等由《永乐大典》中辑出《旧五代史》，加上《明史》成为《二十四史》，由武英殿殿版刊印，就是现在流传的《殿本二十四史》。

乾隆帝弘历好大喜功，他看见明朝有《永乐大典》，也要编修一部大书，于是在乾隆四十年间，诏求天下遗书，凡是捐献图书众多，合乎他意的，就赏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违碍清朝，触犯皇帝忌讳的，就把它烧掉，实寓修书于禁书之意。他命纪昀领衔编纂精抄本的《四库全书》，用红蓝白黑的绸子作为封面，作为分经史子集的标志，两万多册，共抄了七部，蓄藏于北京、热河、沈阳、扬州、镇江、杭州等处；并仿明代宁波范氏天一阁建筑的样式建立了文渊、

文津、文溯、文澜等七阁。在北方共有四阁，在江浙扬州、镇江、杭州等地共有三阁，所谓北四阁南三阁。自太平革命军兴之后，江浙的南三阁全被清军退出时焚烧了。江南仅存杭州文澜阁半部，现已抄全，如今流传下来的共有五部。

乾隆帝既编制了《四库全书》，又看见明朝的《永乐大典》是按诗韵的字头编，把一部书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实在是名存而实亡了，就命史臣们恢复本书的原来面目。如晋郦道元的《水经注》分散在大典中好几个地方，就把这部书收辑起来，成为《水经注》的定本。凡如此类的书，用"辑佚"的功夫，收辑起来，不下好几百种。他又命金简（朝鲜人）用朝鲜活字本方法，在武英殿设立排字房，编制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在乾隆时期殿版刊印的书籍，还有套印的《词谱》和《曲谱》、《唐宋诗淳》，殿版精印的《历代诗余》、巾箱本的《古香斋十种》。在制版绘图本的图书上，有乾隆时廿三排连印的大地图，绘画家王右谷精绘的康熙时《南巡图》，乾隆时焦秉桢绘画的《耕织图》等。凡以上所述康雍乾三朝编印的书籍和图画，对于保存祖国文化的遗产和当时社会景物风俗的资料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以上所说都是指着康雍乾三朝所刻殿版书而言的，但是还没有谈到所刻书籍字体的形式。大概在康熙初年，公私诸家所刻的书籍多半是用方体字（当时也叫宋体字）印的，就是象清初文学家朱彝尊所选的《词综》和他著的《文集》，都是用方体字刻的。在清初所刻各名家的诗文集都是方体字，一望而知为清康熙初年刻本。久而久之，千篇一律，过于一般化了，必然地要走向由方体字改进而为精楷写刻本的趋势，就是清朝政府殿版所刻的书籍，版刻的形式也是这样。所以到康熙四十五年以后，雕刻殿本书籍就由北京而移到扬州，命江南织造曹寅建立了扬州诗局，组织名手精楷写刻《全唐诗》。据金埴《不下带编》卷四说：

"今闽版书本久绝矣，惟白下、吴门、西泠三地书行于世；

然亦有优劣(之分)。吴门为上,西泠次之,白下为下。自康熙三四十年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海内好书,有力之家,不惜雕费,兢摹其本,谓之欧字,见刻宋字书(宋字相传为宋景文书本之字,在今日则书本之劣者)置不挂眼。盖今欧字之精,超轶前后之世,宝惜之,必称曰'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

金埴所说在宋版书之上,不免有些夸辞,可是清康熙以来所精楷写刻之书,实为清代康熙时刻书一大特点,未可以时代较近就忽视了它。康熙时扬州诗局所写的《全唐诗》等书全是由江南织造曹寅奉命承担这个责任的。曹寅在江南织造局任内,还刻了《楝亭五种》与《楝亭十二种》,写刻的都很精美。

自从康熙时写刻本风行一时之后,各方面的人士都起来仿效。有些书是经过名手书法家写刻而成的。我们先从林佶手写《渔阳山人精华录》来谈。林佶是王士祯的学生,写刻此书时,王士祯与他写信,彼此商量校勘缮写的方法,经过反复的考虑商订,才精写完毕,刊成了这部书。林佶还为汪琬手写镌刻《尧峰文钞》等书。这种写刻书的风气,迅速传遍于大江南北。最有名的象苏州文学家顾嗣立,为清康熙帝御选的《宋辽金元四朝诗》,而特别用力于搜辑元朝诗。他精楷写刻了《元诗选》,还注解了《韩昌黎诗注》、《温飞卿诗注》,写刻的非常优美,印刷的纸墨精良。在这个时间东洞庭山席氏扫叶山房写刻了《唐百家诗》,有用当时流行的开化纸和桃花色笺纸印刷的。稍后还有文瑞楼金氏写刻的《高青丘诗集》、《贝清江集》等书,写刻的极为精美。这种写刻书的方式,非常流行,有刻大部头的,如朱彝尊的《曝书亭集》,宋荦的《西陂类稿》;有刻小部头的精品,如徐树谷纂辑《庾开府哀江南赋注》,字大悦目,写刻精良。象这些书,都可以说是康雍乾时代的善本。

到了乾嘉以来,写刻书籍更往前发展了一步,这就是由精写进而为仿宋元刻原书的影宋元写刻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黄丕烈士礼居的仿刻宋元本的书籍,其次是汪阆源艺芸精舍仿宋刻的书籍,

以及孙星衍平津馆、秦恩复石研斋所刻的仿宋善本。这些仿宋刻的书籍，例如黄丕烈所刻的《战国策》和《国语》，小品的书籍如为云间（松江）沈氏所刻的《四妇人集》、艺芸精舍所刻的仿宋本《郡斋读书志》、孙星衍平津馆所刻的《续古文苑》、秦恩复石研斋所刻的《拳天录》，雕刻极为精美。

为什么这些书籍刊刻的这样的正确和精美呢？这是由于黄丕烈的精于收藏鉴别和校对原书。又由于顾广圻（别号千里）的精于训诂为之校订原书，不致发生文字上的错误。上版写刻时有苏州许翰屏为他们仿效原书书写校样，又由金陵雕刻书籍名手工匠刘永奎等为之雕刻上版，因之就成为“四美俱，二难并”的完善刻本了。

当时仍沿用方体字而校雠完美加工精印的就有杭州长塘鲍廷博所编刻的《知不足斋丛书》，有进呈给乾隆帝的大本，还有雕刻成丛书三十集的小本，所用的纸张和印刷的墨色无不精良，校对的尤为谨慎。后来还有杭州汪氏振绮堂的刻书。到了道光年间，杭州的郊区塘栖劳权、劳格等兄弟研究学问，专门考究唐宋以后的书籍，颇有厚今薄古的作风，编著有《月河精舍丛刊》。他们兄弟尤善于抄校群书。劳权兼工填词，校辑宋元人词集有好几十种。劳格手抄和手校的唐宋以来的文史诸书不下数十种之多。因之谈起清代的校刻书籍的名家来就是黄批、顾校、鲍刻，劳抄，这是研究清代的版本学应该知道的基本常识。

这是说的清乾嘉以前学术事业和刻书风气兴盛的一面；然自乾隆时期“文网日密”，弄得人民缩手缩脚，恐怕遭到文字狱，只有钻牛角尖里，治繁琐的考证之学，噤口而不敢言史，尤其是不敢谈明清近代史。至于敢写明末和清代的历史，乃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有心人士和爱国进步的思想家，如钱仪吉所编的《碑传集》，魏源编著的《圣武记》、《海国图志》，龚自珍所写的《明良论》以及谈时务和筹边巩固国防的文章，编定为《定盦文集》等书，这都是

在咸、同以后才敢于刊刻印行的。

至于刊刻书籍的风气和形式也有所转变，由康乾以来秀丽奔放各种各样的精楷写刻的书籍，逐渐改变为规规矩矩的方体字镂刻的版本，但也不失为有严谨整饬，循规矩步，方整清晰的风格。如黄汝成笺注《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经韵楼刻本《段氏说文注》，许瀚（字印林）《攀古小庐文》和《攀古小庐杂著》，沈涛著《交翠轩笔记》、雕刻的都极整齐可爱。可是到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的时期，残暴贪婪的清军，战败退出之际，大肆焚烧和掠夺良民，就使如上所说大江南北蓄存《四库全书》的三阁化为灰烬，使民间城市内所存留的版刻也遭到浩劫，当为柴烧。所以象苏州顾禄著的《桐倚桥櫂录》是一部讲工艺美术的书籍，版刻好后未及印刷就被烧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著《高邮王氏遗文》，也是道光间刻本，未及刊行，就遭到兵燹。其书流传很少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不要看清道光间刻本的书为时较近，而流传的较少；因之道光间的刻本书籍是应该重视的。

同时我们还要谈到清朝活字本的书籍，在清乾隆年间有武英殿《聚珍本丛书》，在民间也有活字本的印行，我曾见宋方岳著《秋崖小稿》二厚册，就是清康熙乾隆间坊间活字排印的书籍。张月霄《爱日精庐藏书志》也是活字排印的。到同治、光绪年间江苏常州无锡一带还有一个用木活字排字的书坊；用木活字排印的有《锡金识小录》，锡山拙翁《师竹庐随笔》等书，而且排印的书籍种类很多，流传很广，至今市面上还可以见到。

随着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帝国主义侵略者也带来了新式的印刷术和铅字排印和石印珂罗版影印的一些新式器俱。祖国人民有志之士，就提起笔杆子来，利用新式的印刷术，编成书籍和报刊来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清朝政府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统治，提倡旧民主主义。在清同治、光绪的初年，上海申报馆主笔蔡尔康、钱征等人搜辑了颇多明清时野史资料，开辟了申昌书画室，

就用铅字排印了《申报馆小丛书》。1877年即清光绪三年，在上海机器印书局排印了佚名编的《水窗春艺》。接着一些画家吴友如等人在城南一角小楼上孤灯一盏，提笔含毫为当时书局主人绘画，编成了《点石斋画报》和吴友如独绘的《吴友如画宝》，把当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杀戮残暴的情况，以及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上海市面上的情状和社会上的民情风俗都活生生地写照下来，可以作为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资料，也可以作反面的教材。鲁迅先生在广州和香港的讲演中就这样说：

> "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信。《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略论中国人民的脸》，见《鲁迅全集》第三卷)。

这就是画报上所画的正人君子也是洋场上的恶少、土豪、恶霸之流。同时清朝政府在上海创办了广学会和编译局，翻译了颇多的欧洲科学技术的书籍，还有后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其他哲学和经济学名著。新出的书籍，日见其多，有原印本，也有翻印本，这是新的版本学，不多为论述。

同志们要明了我国古代以及明清时代的著述、内容和板本的源流，可以参考商务印书馆所编的《四部丛刊正续三编叙录》和缪荃孙替张之洞所编的《书目答问》。

明清时代目录学及图书使用方法

到了明代，藏书的风气尤为繁盛，最有名的为宁波范钦在距今五百多年前的天一阁(就是私人所办的图书馆)。他收藏的都是当时明代的地方志、邸报、登科录和当时碑帖拓本，无异是研究明代历史资料的宝库。书籍是迭次遗失，但自解放以来，仍保存了不少的书籍。有好几种版本的《天一阁书目》，以近人冯贞群所编的《天一阁书目》比较好，记载了现存书籍数目。其它有若叶盛《箓竹堂

书目》、祁氏《淡生堂书目》、谢肇淛《小草斋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近人叶德辉编有《汲古堂汇刻书目》，可以参阅。尤为主要的，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是记载元、明两代以来名家著述书目的总汇，为研究元、明两代历史文学不可缺少的书籍。

清初有名的藏书，为徐乾学所编《传是楼书目》、季振宜编《季苍苇书目》、郑性编《二老阁书目》，其中藏了颇多的珍本。不看这些书目和这些藏书家的印章，就不知道这些书籍流传之所由来，和书籍版刻的真伪了。到了乾、嘉以后，藏宋、元版旧抄最有名的为士礼居黄丕烈，他刊有《士礼居丛书》，缪荃孙等人曾编有《士礼居藏书题识》。黄氏士礼居的藏书后来卖给汪阆源。汪氏的藏书室叫做艺芸精舍，刊有《郡斋读书志》。不久汪氏的藏书也陆续散出。于是在道光、咸丰年间在海内就形成为四大藏家：①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编有《铁琴铜剑楼书目》。后来上海涵芬楼所影印的《四部丛刊》初、二、三编，即多影印其藏书。其书多归于北京图书馆。②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编有《楹书偶录》。其书大部分亦归于北京图书馆。③湖州陆氏皕宋楼藏书，编有《十万卷楼丛书》。其书为日本人所购去，建有静嘉堂文库，编有《静嘉堂文库书目》。④为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编有《八千卷楼藏书目》，其书清末归于南京图书馆。这就是有清一代所藏图书和所编书目的大概情况。

可是这些书目，编纂的分类方法都是应用《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有些名目如经部就不合于现代的潮流，也不合于应用。还有自鸦片战争以后，有新来的哲学、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等书，旧的分类已不能容纳，对于《四库全书》的分类，势必要有改革。在嘉庆十五年(1810)，孙星衍编《孙氏祠堂》书目，把书分为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经注、词赋、书画、小说等十三类。

缪荃孙给张之洞编《书目答问》五卷。卷一经部，正经正注第

一，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小学第三。卷二史部，正史第一，编年第二，纪事本末第三，古史第四，别史第五，杂史第六，载记第七，传记第八，诏令奏议第九，地理第十，政书第十一，谱录第十二，金石第十三，史评第十四。卷三正部，周秦诸子第一，儒家第二，兵家第三，法家第四，农家第五，医家第六，天文算法第七，术数第八，艺术第九，杂家第十，小说家第十一，释道家第十二，类书第十三。卷四集部，楚辞第一，别集第二，总集第三，诗文评第四。卷五丛书目，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第一，清代一人著述合刻第二。对于《四库全书》的分类，颇有所更改。这种旧的分类法，不但十进法要有所更改，就是编旧式线装本书籍也当审查其内容酌情改编。如近来北京图书馆所编的《善本书目》，把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和小说家，分类混淆不清的地方，以类画一，使读者省目好查，就是一个例子。

这说的是整理古代典籍，综合排比的普通目录学。可是到后来学术事业发展了，门类增多了，从事其讨论研究，就产生了专科的目录学。在古代是以经、史为重，因之清初朱彝尊就编有《经义考》，清乾、嘉间章学诚编有《史籍考》。关于医学的，日本人编有《医籍考》。关于记载一个地方的，譬如我国首都北京，清初朱彝尊把关于记载北京的书籍，搜集约一千多种，编为《日下旧闻考》。关于补《后汉书》、《三国志》等书艺文志的，就有清姚振宗编的《补后汉书艺文志》等书。关于记载某个文史学家著述事迹的，上海图书馆就编有《司马迁史记版本考》，王国维编《周清真事辑》。关于古代地理书籍已经散佚的，清王谟搜集散佚编有《汉唐地理书钞》。至于自唐、宋以迄明清记载我国地方志的书籍日见其多，近人朱士嘉编有《中国地方志综录》，搜集古今地方志约六千种，现在续编搜辑的方志近九千余种。介绍地方志的目录和书籍的版本和内容，有近人张国淦《中国方志考》。关于近来发现明末清初的野史和故宫博物院等处所藏的明清时代的档案，我曾编《清开国史料考》和

《增订晚明史籍考》。目前发现的明清史料日渐增多，我所收集的还远远不够。尤其是自唐、宋以来学者的著述日渐增多，天文地理社会风俗以及各种科学，都写有专著，有的写成大部头的专书，有的是些散篇短帙很容易散佚，明清以来有心人士就把它编为丛书，这种丛书从明到清末民初编辑的也不下好几千种了。近来上海图书馆就编《中国丛书综录》。

明清以来的书籍种类极为繁多，都是属于研究目录学范围之内，是一种专门的科学，应编成专书。我这里仅从目录学中目前最重要的资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丛书、地方志、明清历史野史笔记、诗文集以及档案中的资料，作一个概括的叙述。

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这样繁多，而有些人士为了他需要的材料，各取所需，分类摘录下来，这就是类书。最早的类书，象唐初虞世南所编《北堂书钞》五十五卷，唐白居易、宋孔传编《白孔六帖》一百六卷，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一千卷，宋王应麟编《玉海》二百卷，明陈耀文编《天中记》五十卷。这些书保存了古代各种各样的资料，可以从中辑出已佚各书的原文；就是现存诸书也可以取此种书校对今本中文字之异同。这种存留的资料很可宝贵，遗憾的总是支离分散，未能够看见全书的原貌。

于是宋代就想把整个的书籍，或短篇零帙保存起来，因之有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宋左圭编《百川学海》以及元末陶宗仪编《说郛》。这些书可以说是搜辑古代仅留存下来的书籍，可是仅抄录其篇章，或节录某些章节，未能保存其书籍的原样，但可以说是编辑刊刻丛书的开始。

到了明代编刻丛书就发达起来了。成为包罗经史子集四部的巨编，如世德堂胡氏刻《六子》，程荣编《汉魏丛书》，胡文焕编《格致丛书》，陈继儒编《宝颜堂秘笈》。编成一类的书籍则有《子汇》，编制一个时代的书籍则有《唐宋丛书》，编制一部郡邑地方丛书，则有《盐邑志林》。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它的

目录是：

元杜思敬辑《济生拔粹方》	明周履靖辑《夷门广牍》
明高鸣凤辑《今献汇言》	明沈节甫辑《纪录汇编》
明李栻辑《历代小史》	明樊维城辑《盐邑志林》
明吴琯辑《古今逸史》	明王文禄辑《百陵学山》
明周子义等辑《子汇》	明胡维新辑《两京遗编》

由这个书目就可以看出明代刊刻丛书事业的繁盛。到了明末毛晋汲古阁所编刻的《津逮秘书》，清代曹溶编《学海类编》，张潮编《昭代丛书》，把罕见难得的书籍，保存其原来面貌，总辑合刻于一书之内，因之将刊刻丛书的事业推进了一步。到了清代中叶刊刻丛书的风气极为兴盛而达于高潮。可以分为以下的四大类：

①搜辑群书的目录派。如鲍廷博所编《知不足斋丛书》，顾修编《读画斋丛书》，伍崇曜编《粤雅堂丛书》等，便是包括古今经、史、子、集的图书综合刊刻汇辑于一部丛书之中的。

②版本派。鲍氏诸家所刻丛书以书籍的罕见的内容为主，而黄丕烈、汪阆源等人则以仿刻宋、元旧刊本为主、如黄丕烈所刻的《士礼居丛书》，秦恩复所刻《石研斋刻书七种》。黎庶昌所刻《古逸丛书》是专仿宋元刻和旧抄的佳本，书籍的内容反居于次要的地位。

③校雠派。黄氏刻书但依古本为善，甚至有错字也不去改它，所以有“佞守”之称。书籍本来贵乎有用，专重在版本那就有些轻重倒置了。因之就有卢文弨所编校的《抱经堂丛书》和毕沅编校的《经训堂丛书》。把古书经过校正，对于读书的人就有益了。

④辑刻专著的丛书。把每类应用的书籍辑刻于一部丛书之内，如纳兰成德编《通志堂解》，阮元刻《皇清经解》，广雅书局编刻的《史学丛书》。使已佚的古代书籍用辑佚的经法，而得到恢复原状的，则有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辑《汉学堂丛书》。对于地方人物遗事文集记载的则有伍崇曜《岭南遗书》。对于方舆地志

中西交通的则有《麓山精舍丛书》和《浙江图书馆丛书》。对于诗文词集文学家的著作辑为一书的，则有毛晋所辑的《汲古阁六十家词》，明臧晋叔辑《元人百种曲》，影宋本《唐宋群贤小集》，朱古微辑的《彊村丛书》。因之凡要研究某种学问，都可以于丛书求之，可说各样俱备了。

我把丛书刊刻的分类写在下面：

一、汇编杂纂类　宋、元、明代、清代前期、清代后期、民国

　辑佚类　　郡邑类　　氏族类　　自撰类

二、类编　经类

　史类　正史、诸史考订、编年、纪事本末、杂史、传记、舆地政书、目录、金石、史钞

　子类　诸子、儒、兵、法、农、医、天文、数学、术数、艺术、杂家、小说、道家

　集类　总集、通代、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民国

　郡邑　氏族　　诗文评　　词集　　戏曲

大要是丛书可分为汇编和类编两大类，而每类下面有这些子目，如果寻找某项资料，有这个子目就可以分别检查去了。

要检查各类资料，丛书而外，就是地方志书。自从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引起国人研究历史的兴趣，于是魏晋以来续汉书的共有七家，纂修晋书的共有十八家；同时还致力于地方志及社会风俗人情的，有晋王隐《晋书地道记》、阚骃《十三州志》、晋嵇含《南方草木状》、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等书，可是久经兵燹这些书大半都散佚了。到了唐代魏王泰纂《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始具地方志的雏形。到了南宋有范成大编《吴郡志》，宋人编《咸淳临安志》等书。在宋代编纂的地方志不下二三十种之多，有的已经散佚，有的还有刊本流传可以考查，这就是地方志形成的时期。

元、明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是沿袭着宋代而来的。如元代李

兰肦等纂修的《大元一统志》一千卷，尚有残抄本流传。明李贤纂修的《大明一统志》九十卷，彭时纂修《寰宇通志》一百一十八卷，有明刻本。曹学全撰《大明一统名胜志》二百零七卷，有明崇祯间刻本。这时从全国到各省区府州县都有地方志的编纂，但是还没有象清代编制的那样完备，在编纂的方法上也颇为粗略。当时人士已注意到记述边疆的志乘，如明魏焕编的《九边图考》，卢耕编的《两镇三关通志》，毕恭编《辽东志》，胡宗宪编《筹海图编》等书，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边疆舆地资料，到现代还有参考的价值。明代的志书以宁波范氏天一阁所藏的最为繁富，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二百余种之多，上海古旧书店已陆续影印，发行于世。明代所纂修的地方志存留到现在究竟有多少？我认为大约总有六七百种之多。但是明代所修的志书，不免内容过于芜杂，没有条理和系统。明中叶以后就有颇多文学家欲起来矫正这个弊病，想用简练的方法来编排，如康海修《武功志》仅三卷五万多字，韩邦靖修《朝邑县志》二卷仅五千七百多字，可以说是太简略了，已经失去了保存资料的意义。到了清初陆稼书所编《灵寿县志》，他拿修志书来作为统治者维护统治、提倡程朱理学的工具，那就更失去编志书的意义了。

到满洲贵族建立清朝政府统一中国之后，为进一步加强统治，于康熙十年（1671）诏各州县，分辑志书。到雍正七年（1729），因为纂修《大清统一志》，又谕各省府州县修地方志书，限期完成；令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有李伟监修《畿辅通志》，鄂尔泰监修《贵州通志》等凡十六种；并颁布各省府州县每隔六十年修志书一次的命令。大概清朝所修的通志，以清乾隆间谢启昆所修的《广西通志》的体裁较为完善，首著叙例二十三条，说明编书的因由原委，以便后人有所依据。把全书分为五大类：（一）训典；（二）四表：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三）九略：舆地、山川、关隘、建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胜迹；（四）二录：宦迹、谪官；（五）六列传：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释、其他。

从此以后各省区地方志多半是依据这个体裁。阮元修的《广东通志》仍在沿用而不废。可是清代中期以后编纂地方志，有的重视编纂的方法，有的主张也和治考据之学一样，争取征集史事资料的详实。可分为两派：

一派是重视编纂方法，主要的是章学诚。作为代表，他认为编修方志的体裁应该从三方面来谈，他曾著过《方志立三书议》。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为立三家之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那就把地方文献的记录无所不包了。他编纂的《湖北通志》因为不合当局的需要，而未能刊行，但他编纂的《永清县志》可以见到他编纂方志的意旨。除章学诚而外，还有李兆洛编的《凤台县志》，也主张编纂的方法和编排的次序。都属于讲求编制体例的一派。另一派是沿袭了清代考据学家征引详实、网罗事实完备之风，以洪亮吉所编纂的《泾县志》、孙星衍编的《邠州志》、武亿编的《偃师县志》、董沛编的《鄞县志》等书作为代表。

自明代嘉靖、万历以来，由于江南手工纺织业陶瓷业和商业的发达，社会经济非常繁荣，在太湖的三角洲上苏、松、杭、嘉、湖一带出现了颇多的小村镇，如在湖州的南浔、乌青，松江的七宝、龙华，苏州的木渎、光福以及平望、盛泽，都是盛产丝绸棉布之地，人口增多，商业也很兴旺。因之于县志以外就有请人编辑南浔、乌青、盛泽、光福各地的村镇志书，可以窥见各地乡土的出产和社会风俗。除村镇志而外还有山志和寺宇志，也可以从这些山志中追寻山中的矿产以及披着宗教外衣、农民群众借著秘密教门潜伏活动的情况，不可以因为是"乡曲之见"而忽视了它。

在1962年间，上海市文物保管会把明清以来，有关松江、上海的村镇志资料，编辑成为《上海史料丛编》铅印本，其中所收的如张宸编《龙华志》、汪永安编《紫隄村小志》、吴履震编《五茸志逸随笔》等书，这都是研究明末清初江南社会经济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第

一手资料。

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明清野史笔记、诗文集以及档案中的资料。明代宋濂修《元史》仅费了七个月的功夫，当然有当时政府所收藏的文件为凭。可是蒙古贵族征服西域欧洲和中亚各国，建立了钦察汗、伊尔汗、窝阔台等国，非有外来的记载，不能说明其事的，所以研究《元史》就成了专门的学问。至于《明史》虽修了六十多年，才告成功，编制的体例虽然谨严；但由于满清贵族本来是臣服于明代的，因之对于明朝史事颇多忌讳，如永乐时的版图之大超过了前代，《明史》中就语焉不详。民国初年赵尔巽领衔所修的《清史稿》，是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歌颂清朝的。当然在清开国时的记载中也保存了当时"清国史馆"中的档案的资料，至于对太平天国革命军的兴起，不但歪曲了事实，而且记载的非常马虎。如列传中的《曾国藩传》，对皇帝"赏穿黄马褂"等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于镇压太平革命军的情节，记载的极为疏略。由此类推，其他记载的情况就可知了。当然研究明清史还有《明实录》和《清实录》可以作为参考。可是《实录》记载多属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和上层建筑一些事情．至于对于当时人物传记，社会上的经济、风俗习惯，以及明清政府政治腐败，昏庸腐朽阴暗的一面，都记载的较少。这就赖于野史笔记和诗、文集中人物传记一类的材料为之证明和补充了。研究元明以来的历史须仰赖野史笔记和文集各家的传记，其来有自，上可以追溯到南宋的王应麟和黄东发；他们对于考证历史事实好作实事求是的工作；明代的王世贞和焦竑就大量用朝野的杂记，和国家文献的征存。到了明末清初进步学术思想家黄宗羲撰《明儒学案》，他的学生万斯同就用《明实录》及各家记载，编写了《明史稿》，就是清修《明史》的底本。至于明末农民军的兴起，南明的覆灭，全赖于戴笠编的《流寇始终录》、温睿临的《南疆逸史》和清雍正乾隆间鄞县全祖望所著的《鲒埼亭集》。南明唐王、鲁王的事迹和明末爱国志士的传记，全仗着全祖望把它记载下

来。总而言之，在我国的史学史上称之为"浙东学派"。

正如鲁迅先生正确指出的那样："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鲁迅先生说的这些话，可以为我们研究历史和史料目录学的指南针。大约明、清两代野史笔记的著作，以明代嘉、隆以来为最盛。到了清初，大兴文字狱，"文网"之禁甚严，士人在积压之下就不敢谈政治和时事而流入王士祯辈写《池北偶谈》，只可谈些吟风弄月闲情逸致的东西和钻研训诂考据家的札记。及至鸦片战争，由龚自珍、魏源等的提倡，学术上有了革新的情况，读书人士才觉醒过来，于是道、咸以后研究历史、国内外形势和边疆地理日盛，关于史乘考查和野史笔记等项的作品，才大量出现。因之明清两代史学发展的情况可成为一个蜂腰形的样子。到了清末民初书坊间编了些《清朝野史大观》、《清宫秘史》之流，有些是道听途说、附会之辞，就把从明代以来的"稗乘"一笔抹煞，那是不公允的。如今我把明清以来的野史笔记分别成八大类介绍在下面：

①元末明初的杂记，如陶宗仪的《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权衡《庚申外史》等书，都是记载元末红巾军起义及元朝政府腐败的情况重要的史乘。

②记载明朝以及清朝政治制度的书籍，则有高礼《皇明大政》、《大训记》，薛应旗《昭代典则》，王世贞《弇州山人别集》，余继登《典故纪闻》等书；至于记载明代政治施行的情况和民间纳赋税、打官司诉讼、一些成法惯例，则有某氏撰《仕学悬镜》。崇祯间刻本，尤不可不读。

记载清代政治制度的则有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余金《熙朝新语》以及近人孟森《八旗制度考实》。这都是研究清代政治初步入门

的书籍。

③记载明、清社会经济的书籍，最主要的笔记则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郎瑛《七修类稿》，朱国祯《涌幢小品》，王鏊《震泽长语》等书。谈及明末的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则有谢肇淛《五杂俎》，张瀚《松窗梦语》，范濂《云间据目钞》，佚名撰《云间杂识》等书。

记载明末清初苏松一带经济情况的有叶梦珠《阅世编》，褚华《木棉谱》，吴履震《五茸志余随笔》，柴桑《京师偶记》；记清乾隆以来扬州经济情况的有李斗《扬州画舫录》；记鸦片战争以后江南政治经济情况的有王韬《沪壖杂记》，佚名编《水窗呓语》等书。

④记明清两代地理社会风俗及一般政治弊端的则有田艺蘅《留青日札》，王士性《广志绎》，顾炎武《日知录》和《肇域志》，之江抱阳生《甲申朝野杂记》，清末民初人柴萼《梵天楼丛录》等书。

⑤记明清两代农民起义的有明谢蕡《后鉴录》，仅有稿本藏历史研究所。毛奇龄《后鉴录》，是记有明一代农民起义重要史乘。梁清标《雕丘杂录》，是记明末清初秘密教门的组织。清黄育楩《破邪详辨》，记载白莲教的组织和他们用以作为宣传的宝卷。记清初到清代后期农民起义的，如记川陕楚教军起义的有《戡靖教匪记略》，记李文成、林清起义的有《兰苔馆外史》。记台湾农民起义则有兰鼎元《平台记略》，秦瀛《东槎纪事》，沈如瀚《除氛录》，对自朱一贵、林爽文以来台湾人民不断的起义事迹都有记载。

⑥记载各兄弟民族的书籍，则有明田汝成《炎徼纪闻》，清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记》，清檀萃著《楚庭稗珍录》等书（由于这部书是记湖、广、云、贵地区少数民族的，近来香港中文大学已为印行）。

⑦记东西交通的书籍。记明代陆地交通的有明陈著《使西域记》，清七十一（召椿园）《西域纪略》，图里参《异域录》等书。记海上交通的随着郑和下西洋，有费信著《瀛崖胜览》、《星槎胜览》。讲对外贸易的有明黄衷的《海语》，明叶权《贤博编》，王临亨《粤剑

编》。清代则有印光任《澳门纪略》，谢清高《海录》。到清光绪年间王芝著《海客日谭》，是作者由云南出发，经过缅甸游历欧、亚各国的日记，其中谈及中缅友好关系。

③记载天象灾异、地震的书籍，有清初孙之騄著《二申野录》，是记1368年洪武元年戊申，到1644年崇祯十七年甲申，286年的天象灾异以及地震，共有二百九十多条之多，给目前研究天象和地震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还有记各地温泉的，有谭迁著《枣林杂俎》，概括扼要地记述我国各地的温泉。恐怕记载自然科学动植物矿产资料的杂籍，还不在少数，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所以不惮烦地把明清野史笔记中的资料分为八类写在这里，就是为着同志们按着这种性质寻找书籍，也可以沿着这个线索为科学研究者提供有关的资料，就不致于象大海里捞针无处可寻了。

底下我再谈一下档案问题。我们先从档案的"档"字的起源来谈。据杨宾《柳边纪略》说："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蓄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曰牌子、档子矣。"从此以后，凡是宫廷和衙署中所存留的公阅文件，都叫做档案。整理这种档案文件开始于民国初年，可以分为几方面：①最早的是存在故宫文渊内阁大库中的元明清以来的书籍和文件，后来移存于午门楼上。北洋军阀时期内务部没有经费，就把这些文件装成八千多个麻袋卖给南纸店当作废纸处理了。经罗振玉用款收回，让与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的《明清史料》甲、乙、丙、丁、戊编，就是用这些材料编辑，而其中内阁大库宋、元版书籍尚不在内。解放战争时期蒋帮把它劫运到台湾。②是老满文和加圈点的新满文写的《实录》和各项文件，贮存在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沈阳故宫所存的满文老档，因为代远年久，又曾糊屏风、或做扇子，后来把它揭下，叫做"屏风档"和"扇子档"。现在正

在整理这些满文老档，也可以说是在历史学界的重要任务。同时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档案馆）保存从清兵入关一直到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为止大量的文件档册。已经整理出版的，有《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等书，这是研究清史重要的资料。③是四川巴县所存档案资料，其中关于四川农民起义的资料甚多。④是山东曲阜孔府的档案资料，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已经为之整理一部分，已印行出版。⑤是徽州祁屯溪所发现的地主契约、家谱、文件，以及明清时代书坊店里所刻各种各样的书籍，对于研究封建社会明清时代农村经济，提供极好的资料。⑥是苏州文管会所藏的明末清初人的尺牍文集和手工业工人的叫歇（罢市）碑，江苏省博物馆曾经整理出版，然未经整理的还有。这都是研究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最直接的资料。

（原载《齐鲁学刊》1981年3、4期）

版本与目录之关系浅释

——中西目录学分类比较观

师 道 刚

版本不能离开目录而独立，正如骨之与肉、毛之与皮一样，相互依存。这种把版本分立为一门专门学问的设想，其实也并非新说。三十年代初，钱基博所著《版本通义》一书中，就认为从事校勘和目录的人，都必须讨论版本之学。版本"既以附庸蔚为大国，浸昌浸炽。逮于清代，版本之学，乃以名家"。版本之学既然可以名家了，当然也就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了。但他所列举的版本学家，如毛晋、钱曾、黄丕烈、顾广圻、丁丙、陆心源、莫友芝、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人，几乎清一色的都是目录学家。他们都是以"治目录者言版本"① 的身份来从事版本学的研究。钱基博之不同于当前有些人的

论断者，在于他仍局限于版本学是目录学的分支，不强调它完全脱离开目录学而独立，“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叶德辉（1864—1927）在其《书林清话》卷一《版本之名称》条中提到：“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版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旧钞，是为版本之学。然二者皆兼校雠，是又为校勘之学。本朝文治，超轶宋元，皆此三者为之根柢。”② 就这段话看，叶所说的“近人”，实际是指从宋代起至清末的目录学者。叶把目录、版本、校勘三种学问作为清代学术的根柢，全从目录学家的眼光立论，显然有些偏颇欠周，同时版本之学中只讲“私家之藏”，不谈官修的版本目录，如对《天禄琳琅书目》等存而不论，也有些失之眉睫，不够谨严。但我认为他对目录与版本间关系的理解，还是相当精确的。如试作图解，他的系统归属应是如此：（括号中者为今日习惯通称）

校雠之学（目录学）〈 目录之学（分类目录学）／版本之学（版本目录学）

叶德辉关于目录、版本、校勘相互关系的理解，并非其一人之卓识，实乃时代之产物。当时学者大多作如是观。这种认识渊源于我国古代在整理图书工作中的漫长的历史实践。当然，这种理解也是有清一代考据学繁荣兴旺下的产物。叶之后的学者如傅增湘、余嘉锡、吴则虞、张舜徽先生，在认识上基本都大体一致。如吴则虞《版本通论》中就明确地说：“版本，校雠、目录三者互为体用，互为依赖者也。……三者交互则体用备，三者裂而学术分。”③ 正可和叶说相印证。

版本的研究，远在宋代已蔚为风气，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就是一个版本目录专书。但宋代版本学与目录学之间的界限尚未十分明确。像叶德辉所说，分为两派的现象主要是明清间的情况。叶

在其《书林余话》中转录了他为《四部丛刊》所撰的《例言》，提到："古书记载行字，滥觞于明季。"④ 我想可能是指明周弘祖《古今书刻》、刘若愚《内版经书记略》、朱睦㮮《授经图》之类专讲行格版本的著作而言。若叶氏所言不误，则版本鉴定之学，有例可循，转入细密是从明末才开始的。再如明毛扆撰的《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和钱曾《读书敏求记》等书的问世，都反映了明清之际士大夫间矜贵版本的风习时尚。

到了顾广圻、黄丕烈生活的年代，讨论版本已成为专门之学。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自序》中述其治学门径说："金吾……稍长，读书照旷楼，与校《太平御览》诸书，为校雠之学者有年；其后，泛滥六籍，为考证之学者有年；又其后，究心经术，尊汉学、申古义、为声音训诂之学者有年；继而讲求古籍，考核源流，则杂以簿录之学；纂集经说，采辑金文（此金文指辽金时代之文献，张金吾曾辑有专书《金文最》），则杂以汇萃之学（意指辑佚学）。"他治学的过程，正是乾嘉以来大多数学者们都在其间徜徉漫步的康庄大道。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从校雠开始，经过考证、小学、进而讲求古籍、考核源流，最终又回到簿录之学（目录学）的老路上来。至于旁通汇萃之学（辑佚学），也仍是在目录学的分支小径上徘徊。通过他这个具体的例证，正好说明了版本之学与目录之学是难舍难分的一个整体。

版本与目录是研究图书本身时必须同时注意的两个方面。书籍一产生，就有了版本与目录的问题。从书籍外型的特征、版面的行格、文字的字样、避讳的分析、以及版本的源流演变上来著录图书是版本学；从内容综合考察上分类归属图书，以求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的是目录学。版本与目最在我国古典目录学中是有区别而又有联系的统一体。如果把我国传统称为校雠学的内涵理解为就是近代的目录学，则在这个目录学之下，还可以再分为系统分类目录学和版本鉴定目录学两大类。这种分类正可以和西方目录学的分类相印证，其间暗同默契，若合符节。我们若尝试着把

叶德辉提到的目录、版本两种学派的说法和西方目录学的分类作一番比较考察，是颇能给人一些启发的。

现在我想先就《美国百科全书》中《目录学》词条所述内容，摘录一段来看一看其间的关系。该词条说：

"目录学的目标，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去达到，然而主要的方法有两大类。从这两大类中又可分化为许多重要的小类。这两大类就是分析目录学(Analytic bibliography)和系统目录学(Systematic bibliography)。运用详细的调查、研究方法以求出有关著者、出版者、稿本出处的证据，是分析目录学的内容；相反地，依赖于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从而编制出系统的书籍目录，则是系统目录学的内容。"⑤

美国"目录学"概念，显然是渊源于英国的。英国197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目录学》的词条，也是把目录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另一类是评论目录学(Critical bibliography)。描述目录学相当于上述美国的系统目录学，是"按照一定体系排列图书目录"的学问。描述性书目的类型有：

一、国家书目，以全国出版物为编制对象的书目；

二、个人书目，即某一著者的著作简目；

三、专题书目，为特定参考目的而编制的书目；

四、书目指南，即专门介绍书目的书目。

评论目录学相当于上述美国的分析目录学，是侧重研究版本鉴定的学问，要帮助研究人员确定某一著者著作的出版处及其质量，辨别其版本之真伪及源流，又类似我们的书史学。

英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研究文学名著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才兴起了有关古版书籍的研究。英国的古版书是指印刷术在西方流行后印刷的图书。在这项研究中有位布雷德肖(Henry Bradshaw，1831—1886)，他既是目录学家又是文物学

家，他潜心研究出了十五世纪在荷兰印刷的古版图书鉴定方法，并且规定了一条重要的原则："让图书自己来说明自己。"主张研究版本者要努力排除主观的臆断，严格尊重图书本身呈现出的证据。要求通过考察古版书籍的纸张、书型、内容组成、装帧形式、手稿说明、收藏者印记等项目。用这样逐项检验的方式来考证版本的真伪与价值。布雷德肖的这项方法后来被英国博物馆的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采用，应用于鉴定英国博物馆和牛津博德利图书馆所藏古籍，从而编制了权威性的《英国博物馆所藏古籍版本目录》。⑥英国人搞的这一套很近似我们的版本鉴定，但它是从属于目录学的。

英国的描述目录中也同样注意版本的著录和考证。如《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解题目录》，是已故英国汉学家翟理斯(L.Giles)费了三十八年的时间编成的一部目录。记载了1907——1908年间斯坦因从我国敦煌拿走的八千一百零二件汉文写本文书。分成四类进行著录：

一、佛教文献；

二、道教文献；

三、摩尼教文献；

四、非宗教文献。

其著录体例，是按照描述性目录的体例来著录的。对该写卷从形式上进行描述，然后摘录一些范例性的原文。尽管内容有些还需要进一步考订，但对于整理校勘古籍，提供了不少方便。此目录是1957年发表的，后来国外的汉学家们还为此目录编制了索引，于1963年发表。⑦这个目录虽非专门的版本目录，但它著录了版本研究所需知道的主要事项，仍是服务于目录和校勘的。我举此一例，意在说明描述目录学派并不忽视版本的研究，而其版本的研究是从属于目录学的。

1970年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目录学》词条中，把苏联目录

学的内容，就其职能分为三个方面：

一、对出版物的挑选、推荐；

二、对出版物的类分；

三、对出版物的鉴定。[3]

其中对出版物的类分，和上述美、英的系统目录学、描述目录学相近似；对出版物的鉴定和美、英的分析目录学、评论目录学相近似。

苏联的分类，使人想起汪辟疆先生四十年前在《目录学研究》一书中按目录之职能，分为四类的说法。汪的四类是：

一、"纲纪群籍，簿属甲乙。"

二、"辨章学术，剖析源流。"

三、"鉴别旧椠，雠校异同。"

四、"提要钩元，治学涉径。"

我以为汪的"四、提要钩元，治学涉径"者正相当于苏联目录学中"对出版物之挑选、推荐"；汪之一、二"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辨章学术、剖析源流"合起来正相当于苏联目录学中"对出版物之类分"；汪之三"鉴别旧椠，雠校异同"正相当于苏联目录学中"对出版物之鉴定"。我的这种类比，也许给人以生吞活剥，强作比附的印象，但我只说是："相当于"，意在通过比较，求同存异，得到一些启发，并来坐实。下边所述，亦本此意，理应申明，免滋误解。

从上述美、英、苏三国的目录学分类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析目录学、评论目录学，对出版物的鉴定等正相当于叶德辉所说的"版本之学"（实际即我们今天所谓的版本鉴定学）；他们的系统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对出版物的类分等，正相当于叶德辉所说的"目录之学"（实际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分类目录学）。这是一种纯属偶然的巧合吗？不，我们应该探索它出现的必然原因。

目录学可以看作是从一个侧面来衡量某个社会文化的很灵敏的尺度。我国目录学的发展过去在世界上曾经处于领先地位。我

们研究的内容、遇到的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后来西方人的研究中，也会同样地反复出现，因而形成了在目录学分类内容上、理论上某些相近与相似之处。但我们也由于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使我们目录学和版本学均未能充分发展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体系。和西方某些对应方面、细密、精确的程度相比较，我们又显然有若干不足之处。就以版本学方面而言，尽管我们起步很早，但囊括一代、体大思精的著作并不很多。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合用的古籍版本目录之类的工具书。目前大家使用的仅有邵懿辰撰、后由其孙邵章续录之《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一书。这部书对各本的源流继承、优劣是非并未认真作出有份量的评价。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孙殿起《贩书偶记》和《续编》也只是零散支离地传递出一些信息，一部全面系统的版本目录仍有待于将来。也许正在编纂中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完成后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但当前的现状同西方目录学的成果相比较，仍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通过中西的比较，所取得的主要启示还不在于发现上述的差距，而在于使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到目录与版本的关系是二而一的道理。版本研究可以成为一门学问，但似乎不能离开，也不应离开目录学而独立。版本学只有作为目录学的辅助学科，才能够存在和发展，也只有服务于校勘，才能充分发挥版本的作用。目录工作者必须精确地研究版本，精通版本知识并把有关版本研究的成果，通过目录，正确地反映出来。我国古代目录学研究者正是如此，西方各国当前仍是这样。我想这就是目录与版本的正确关系。如果背离了这项基本任务，把版本研究局限于鉴定刻本年月、收藏经过，依据行款字体、印纸墨色、藏书印鉴等来搞艺术鉴赏，那样的版本学与清代洪亮吉所讥笑的："第论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日录所深悉"的藏书"赏鉴家"⑨有何区别？这样纵然不能就说是玩物丧志，但其前途是狭窄的，不会有多大生命力的。我们肯定版本鉴定学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研究内

容和方法，只是鉴定的目的归根结蒂是要落脚于校勘，服务于给研究者提供可靠的信息。

当前在古籍整理工作中，版本的研究无疑是从事这项工作者大家都异常重视的一个方面。今后，在工作中对版本著录的质量要求也必然更高、更迫切。所以，就现实问题来考虑，版本研究者也必须从目录编制的要求出发，把版本研究和目录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为当前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近读到内蒙古大学周清澍同志编撰的一部《元人文集版本目录》，⑩ 我感到这正是版本与目录相结合，版本学服务于古籍整理的一个范例。不仅元史研究者对此书的出版，感到鼓舞，全国文献学工作者对此也应受益良多。我们竭诚地希望版本工作者把精力用到这方面来。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今天，知识更新很快，为了适应科技工作的发展，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目录学体系，我们这一代必须要加强信心，在吸收、引进西方新知的同时，回顾过去，从历史传统中探索，发掘一些珍贵的遗产，并很好地运用这些财富，开阔我们自己的新路。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注：

① 钱基博《版本通义・叙目》，古籍出版社 1957 年版第二页。

②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十五页——二十六页。

③ 吴则虞《版本通论》卷四，见《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 年第四期第三十七页。

④ 叶德辉《书林清话》《附录》第三十九页。

⑤ 参阅《Encyclopedia Americana》1980 年版第三卷第七二一页，Bibliography 条。该条作者为 Verner・W・Clapp。

⑥ 以上系参阅《Encyclopedia Britannica》Bibliography 词条之内容加以综述写成。译文参阅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印之《目录学教学参考材料》王津生同志之译文。谨致谢意。

⑦ 参阅冯蒸编著之《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一二三页。

⑧ 参阅上引北大图书馆学系编印《目录学教学参考材料》中孟昭晋同志之译文。谨致谢意。

⑨ 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

⑩ 周清澍编《元人文集版本目录》，1981年《南京大学丛刊》印本。

论版本著录之始

谢德雄

历来认为，最早著录图书版本的书目是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即称："自镂版兴，于是兼言版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近人汪辟疆也称《遂初堂书目》"一书兼载数本，则又开后世版本学之先河，又晁陈二家所未逮也"（《目录学研究》）。至今，凡是言及版本著录之始的许多著作、讲义、教材，也都沿袭此说。但是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四十多年前，姚名达先生著《中国目录学史》，在谈到版本目录时，即曾指出："然古录失传，传者惟南宋初年尤袤之《遂初堂书目》独并注众本于各书目下，说者乃以版本学之创始推之，竟不知其前尚有多数版本专家，何其陋也？"又说："岳珂校刻《九经》，对于版本之选择尤为矜慎。晁（公武）、陈（振孙）之作，亦颇注意版本。"姚先生的意见，惜后人多未注意及之，惟因袭旧说，仍不免于"陋"之讥。本文目的，即在对姚说加以论证。关于岳珂校刻《九经》这里且不提，只就《遂初堂书目》与晁、陈之作略加讨论。

《遂初堂书目》确有对一书多种版本的著录。如著录《史记》，即有川本、严州本；著录《前汉书》，即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著录《后汉书》，也有川本、越州本等等。有的则于书名之上冠

以该书版本，称“某本某书”，如“杭本《周易》”、“旧监本《尚书》”、“高丽本《尚书》”等等。但在《遂初堂书目》之前，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则已有对图书版本的著录，其详细的程度，远远超过《遂初堂书目》。为了说明问题，有必要将《郡斋读书志》中的经、史、子、集各个部分分别举例如下：

经部小学类著录《方言十三卷》，言及该书有“蜀中传本”及“国子监刊行本”，并指出两种版本的异同。同类著录《龙龛手镜三卷》，言此书“熙宁中有人自虏中得此书，入傅钦之家。蒲传正帅浙西，取以刻板”。则其书有“虏中本”、“浙西本”。晁氏著录了该书版本的沿变过程，并指出原本有“重熙二年序”，“今本乃云‘统和’，非‘重熙’”。

史部正史类著录《宋书一百卷》，叙述该书版本有“政和中颁之学官”的“政和颁本”，又有绍兴十四年的“眉山刊本”。这里还详细介绍了有名的宋版“眉山《七史》”的由来始末。

由此，我们又得知宋版《七史》除了有北宋的“政和本”和南宋的“绍兴本”之外，还有“秘阁所藏本”和“宇文季蒙家本”。

子部道家类著录《老子道德经二卷》，说明该书“诸家本”不同者“近二百字，互有得失”；并对“徽宗御注本”中“天下莫柔弱于水”句与其他诸本的文字差异作了对勘比较。子部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十卷重编世说十卷》也注明：“家本有二，一极详，一殊略。”

集部别集类著录《许浑丁卯集二卷》，有“贺铸本”、“沈氏本”、“曾氏本”等，又注明：“予近得浑集完本，五百篇皆在。”

以上举例说明，《郡斋读书志》已经有了关于图书版本的详细记录。这部书目除了有关图书的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的著录之外，有的还著录了墨色特征，如史部实录类著录《神宗朱墨史二百卷》，注明：“以旧录为本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其删去者用黄抹。”此外，著录一书版本掌故的，有如子部释书类著录《法华言句二十卷》，注明：“五代兵乱，其书亡。钱俶闻高丽有本，因贾人厚赂求得

之，至今盛行于江浙。”凡此种种，足以证明《郡斋读书志》已有比较详细的版本著录。

弄清楚了晁志有关版本的著录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晁志与尤目在产生时间上的先后问题。

《遂初堂书目》流传至今已有残缺。《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原书经过传钞，已有所删削，其成书的具体年月已无从考定。但是我们知道，《遂初堂书目》的作者尤袤生于靖康二年（1127），卒于绍熙五年（1194），活了六十八岁。他将平生藏书编成《遂初堂书目》，是在他晚年之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有产生年代可考，其书衢州本晁公武自序的落款署“绍兴二十一年”，即公元1151年，是书最迟在这一年写成。这就是说，《郡斋读书志》成书之时，《遂初堂书目》的作者尤袤只有二十五岁。鉴于尤氏撰成《遂初堂书目》是在他晚年的事情，至早在他二十五岁之后，因此，我认为，《郡斋读书志》产生于《遂初堂书目》之前。因而应该说，开创了目录学史上版本著录之先河者，不是《遂初堂书目》，而是《郡斋读书志》。

但为什么历来认为最早著录版本的是《遂初堂书目》，而《郡斋读书志》对版本的著录反而被忽略了呢？这大概是因为《郡斋读书志》最引人注目的显著成就是它的叙释提要，其对版本的著录夹附于提要之中；而《遂初堂书目》只记书名，没有提要，连每书卷数都没有著录，而对各书版本的著录却非常明显，因而其版本的著录容易被人们所注意。至于这两部目录著作的产生年代谁先谁后的问题，自然也就无人问及了。

与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并称于世的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也有关于各书版本的详细记录，历来也被学者所忽视。今考《直斋书录解题》，其对版本的著录较《郡斋读书志》又更趋完备，其中包括：

一、著录版本的行款格式：如春秋类著录《春秋经一卷》，注明

"每事为一行,广德军所刊，古监本也"。编年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著录:"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此书尝刻于温陵,别其纲,谓之提要,今板在监中。庐陵所刊则纲目并列,不复别也。"这里所说的"大书",即大字,"分注"即小字双行。

二、著录出版时间:如经解类著录《九经字样一卷》注明:"往宰南城,出谒,有持故纸鬻于道者,得此书，乃古京本，五代开运丙午所刻也。遂为家藏书籍之最古者。"地理类《衡州图经三卷》著录:"嘉定戊寅刻"。目录类《真宗御制碑颂石本目录一卷》著录:"乾兴所刊板。"

三、著录出版时间和出版地点:如地理类《晋阳事迹杂记十卷》著录:"治平中太原府所刻本。"别集类上《杜工部集二十卷》著录:"嘉祐中刻之姑苏"。

四、著录出版时间和出版人姓名:如礼类《周礼井田谱二十卷》著录:"淳熙中楼钥刻之。"地理类《吴郡志五十卷》著录:"绍定初,桐川李寿朋倚老为守，始取而刻之。"《同安志十卷》著录:"绍兴十三年太守张彦声始取而刻之。"

五、著录出版地、出版人：如易类《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统论一卷略例一卷又易数钩隐图二卷》著录："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礼注类《四家礼范五卷》著录："建安刘宏刻于金陵。"春秋类《春秋经一卷》著录:"朱熹所刻于临漳四经之一。"

六、兼录出版时、出版地、出版人姓名:如孝经类《孝经注一卷》著录:"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复从袁枢机仲得之，刻于京口学宫。"释氏类《石本金刚经一卷》著录:"南唐保大五年寿春所刻,乾道中刘岑季高再刻于建昌军。"

七、著录版本的装潢、字体、印记等:如春秋类《春秋加减一卷》著录:"此本作小褾册",所谓"小褾册"，即类似于巾箱本、袖珍本。又著录该书"前有'睿思殿书籍'印"。正史类《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著录:"此书旧有杭本，今本用厚纸装褙夹面"，典故类《三朝训

鉴图十卷》著录："盖当时御府刻本也，卷为一册，凡十事，事为一图，饰以青赤。"传记类《崔氏目录一卷》著录该书版本"字画清丽"。

八、考述各本异同，如礼注类《独断二卷》著录："舒、台二郡皆有刻本，向在莆田尝录李氏本，大略与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后错互，因并存之。"这是将莆田李氏本与舒、台二本相比较。等等。

《直斋书录解题》稍后于《遂初堂书目》，但它在版本著录的完备上却是《遂初堂书目》所不能比拟的。

总之，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版本著录以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为开端；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是这一开创时期的杰出代表，是宋代目录学发展的重大成就之一。

附记：

此文系拙著《宋代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中的一节，十年前曾单独发表于上海《图书馆杂志》。近有河北师院王昕先生提出郑樵《通志·金石略》已有"著录图书版本"(《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年第1期)。今案：《金石略》所录，皆古代石刻、器铭、碑志，并非图书目录，其中《兰亭修褉序》碑刻著录亦并非"刻本"。而且，"金石"一略，其著作年代当在"校雠"、"图谱"、"艺文"诸略之后(郑樵《献皇帝书》中未提"金石之学"及著作，"已成之书"似未包括金石著录)，即在绍兴十九年(1149年)之后。

德雄识　1992年6月7日

宋代版本学成就管窥

王　皓

版本学是我国传统学术研究中的一门古老的学科。姑从汉代刘向受命校理中秘图书"广搜异本"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其

中，宋代版本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特色，在版本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从版本研究范围的扩展、版本鉴定方法的初创、版本研究专著的发端以及版本研究对相关学科发展的促进等方面对其成就作一初步考察，以期对版本学史中的某些问题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一

在宋代以前，学人虽已开考求版本之风，但所涉范围还较狭窄。其版本研究，主要为比勘异同、区分优劣。至宋，由于雕版印刷的盛行，图书版本日增，为版本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版本繁多而导致版本问题的日趋复杂，又迫使学人考究版本的意识更为强烈，再加以校勘、目录、金石以及书画鉴赏等专门之学的进步和兴起，也促使人们对版本的价值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这就使宋代的版本研究，在内容的深度和范围的广度上得到了拓展。

宋代的版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异同的比较。版本异同的比较从汉代起就一直是版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然着眼点多限于文字、篇卷、篇第等方面的差异。宋人除继续着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外，还进一步注意到内容增损、编次体例等方面的问题。前者如沈晦比较所见《柳宗元集》旧本四种，其中“曾丞相家本，……有那郎中，杨常侍二行状，《冬日可爱》、《平权衡》二赋，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献家本，次序多与诸家不同，无《非国语》”。① 后者如陈振孙言《汲冢周书》古今本之异：“太康中，汲郡发魏安釐王冢所得竹简书，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诸篇，盖仿孔安国《尚书》”。② 同书异本内容上林林总总的差异，大都已纳入宋人的版本研究中。

2.特征的揭示。随着各类版本的日趋繁杂以及私家藏书的蔚然成风，版本的特征也渐为宋人所注意。举凡字体、行款、讳字、纸

墨、装祯、批校、题跋以及藏书印记等均有所涉猎。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所藏《春秋加减》一书特征："此本作小褙册，才十余板。前有'睿思殿书籍印'，末称'臣雩校正'。盖承平时禁中书也"。又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云："余家藏《靖节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之知信阳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画乃学东坡书。"版本特征的研究，唐人已有措意者。至宋，更有蔚为大国之势。

3.古今的鉴定。为了求真与鉴藏等方面的需要，宋人已开始对版本的古今时代等进行鉴定。如陈振孙所藏《柳柳州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其《直斋书录解题》云："刘禹锡作序，言编次其文为三十二通，退之之志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志文，非当时本也。"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石经尚书》解题鉴定其刻石年代云："右伪蜀周德贞书。经文有'祥'字皆阙其画，而亦阙'民'字之类，盖孟氏未叛唐时所刊也。"版本古今时代的鉴定，是考订源流、比较优劣的基础。对此，宋人已有较明确的认识，并以自己的实践，为版本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课题。

4.真伪的甄别。在宋代的图书传播中，不仅有内容上的造伪，伪本也开始出现。宋初诏访天下图书，制定赏格："有收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一卷给千钱"，[③]"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④]既有厚禄高官之诱，于是就出现了一些"伪立名目、妄分卷帙"[⑤]的伪本。因此，版本真伪的考辨就成为学术研究、图书鉴藏之所需。如朱熹辨《陶潜诗》邵氏抄本之伪："或曰：'形天无千岁'改作'形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经》分明如此说。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芗林家藏邵康节亲写陶诗一册，乃作'形夭无千岁'。周丞相遂跋尾，以康节手书为据，以为后人妄改也。向家子弟携来求跋。某细看，亦不是康节亲笔，疑熙、丰以后人写，赝本也。盖康节之死在熙宁二三年间，而诗中避'畜'讳，则当是熙宁以后书。然笔画嫩弱，非老人笔也。"[⑥]又朱氏《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考《潜虚》泉州所刊足本之伪，楼钥据史实、纸墨、藏印等辨傅钦甫所藏《职贡图》非梁元

帝亲笔而疑为李公麟所摹，[7] 亦足见宋人考辨伪本之功力。

5.源流的考述。随着图书版本的辗转递增、同书异本的大量涌现，版本源流的考订也随之列入宋人版本研究的日程。如张淳《仪礼识误序》考当时《仪礼》各本源流关系："此书初刊于周广顺之三年，复校于显德之六年，本朝因之，所谓监本者也。而后在京则有巾箱本，在杭则有细字本。渡江以来，严人取巾箱本刻之。虽咸有得失，视后来者为善。……监本者，天下后世之所祖；巾箱者，严本之所祖。"此外，由于雕版印本的逐步普及，书籍形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人于此也有初步的探讨。如罗璧《罗氏识遗》卷一说："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迭纸成卷，后以幅纸概粘之，犹今佛老书经。其后稍作册子。"

6.优劣的品评。版本优劣的鉴别与品评是传统的研究课题，但到了宋人手里，不仅倍受重视，而且还有了较为明确的评骘标准——"善本"。欧阳修《唐田弘正家庙碑跋尾》："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从总体上观照，严加校勘、卷帙较足、未加妄改等是宋人评骘版本优劣的主要标准。但版本形式上精粗的考究，也不偏废。如洪迈论五代监本《九经》与蜀石经："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8]

二

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的核心内容。在雕版印刷发明以前，图书以写本的形态传播。对于不同传本的鉴定，主要凭助于校勘。进入宋代，印本与写本并行。人们在版本研究的实践中，对版本的内部特征与外在特征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同时，金石书画研究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给版本鉴定以有益的启发。因此，宋人结合版本实际，除继续以校勘为利器外，又探寻、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鉴

定方法。主要有：

1.据原书序跋鉴定。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吕温集》解题云："右唐吕温和叔也。……刘禹锡为编次其文，序之云：'古之为书，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故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今集先赋诗，后杂文，非禹锡本也。"以今本与刘禹锡《序》所称之编次体例有异，断今本非刘氏所编原本。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释书品次录》解题云："末有黎阳张侔跋，称大定丁未。盖北方板本也。"大定，金世宗完颜雍年号。据跋所称，定为"北方本"。

2.据书中讳字鉴定。如《郡斋读书志》卷二《石经谷梁传》解题云："右其后不载年月及所书人姓氏。案，文不阙唐及伪蜀讳，可讳'恒'字，以故知刊石当在真宗以后。"从文中不避唐与后蜀讳，而避宋真宗赵恒名讳的情况，认定此本刻石时限在真宗即位之后。又卷十六《黄庭外景经》解题云："右叙谓老子所作，与《法帖》所载王羲之所书本正同，而文句颇异。其首有'老子闲居，作七言解说身形及诸神'两句，……且改'渊'为'泉'，改'治'为'理'，疑唐人诞者附益之。"据与《法帖》本勘比文句多歧与文中用字避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讳等情况，鉴定此本有唐人之伪羼。

3.据卷篇变迁鉴定。如《直斋书录解题》卷九《老子注》解题云："魏王弼撰……世所行《老子》，分《道德经》为上、下卷。此本《道德经》且无章目，当是古本。"据分卷变迁，推此本为"古本"。

4.据原藏者题识鉴定。如《郡斋读书志》卷十八《沈亚之集》解题云："此本之后有景文宋公题字，称得之于端明李学士。编次无伦，盖唐本也。"据此本北宋宋祁题识及内容的编次无序，推断为"唐本"。

5.据藏书印记鉴定。如黄伯思《跋元和姓纂后》："政和二年九月初吉，于河南致。首有'镇海军节度使印'，盖富韩公家旧本也。"据卷首钤印记，断为富弼家藏旧本。又赵希弁《读书附志》于《群玉

堂帖》解题云："右嘉定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省札下秘书收省藏。盖韩平原家本也，故卷尾有印曰：'阅古审定法书之印'、'永兴军节度使印'。篇首则三朝宸翰，有玺文，曰：'吴娃之章'、吴氏'书印'、'吴娃翰墨'、'宝章妙墨宜尔子孙世世宝之康寿珍玩'，皆宪圣烈皇后之记也。"此据印记鉴别递藏源流。

6.据书目著录鉴定。如晁说之《曾子后记》云："《汉艺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所传《曾子》二卷十篇，盖唐本也……视《隋》亡《目》一卷，视《汉》亡八篇矣。"与前代书目所录《曾子》的卷、篇数进行对比验证，定所藏为唐本。

7.据纸张墨色、藏书印记、前人题识以及讳字综合鉴定。如《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刘绮庄歌诗》解题云："其本乃南唐故物，纸墨甚精，后题曰'升平四年重题'，印其文曰'建邺文房'，本内'密'字皆阙其画，而'超'字不阙，盖吴时所缮写也。""升平"为"升元"之误，南唐李昪年号；"建邺文房"为南唐后主李煜之藏书印记。此通过对题记所署南唐年号、李煜藏印、文中所避吴主杨行密讳以及纸墨精良等内外特征的综合考察，推断其为五代十国时吴之抄本。

从以上所举来看，宋人鉴定版本所用的方法，虽尚欠详密，但提供了比前人更多的新的东西。作为版本鉴定的一些主要方法，也均为后世版本学家所继承，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三

宋代版本学的另一成就，是出现了版本研究的专著。南宋淳祐年间曹士冕的《法帖谱系》，便是这方面的创始之作。

"法帖"，此指《淳化阁法帖》。北宋淳化三年（992）太宗赵光义出秘阁所藏历代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学士王著编为十卷，摹刻于枣木板上。初拓用南唐澄心堂纸、李廷珪墨，分赐王公大臣。此后内府更定重摹，民间转相翻刻，增补删削、别为卷第，以此

为"祖"而枝分派别，繁衍出各种名目的丛帖。以致使人"得其一二者，未暇详考，往往自为珍异。此是彼非，莫知底止"。[3] 因此，曹氏以平生所见诸本，一一加以考订，撰为是书。

《法帖谱系》一名《谱系杂说》，分上下二卷。首冠《谱系图》，以图表的方式揭示众本的源流关系。卷上录《淳化阁法帖》及其支派《二王府帖》、绍兴国子监本、淳熙修内司本、《大观太清楼帖》、《临江戏鱼堂帖》、利州本、……等凡二十二种(本)；卷下录《绛帖》旧本及其别子东库本、亮字不全本、新绛本、北本、武冈旧本、武冈新帖、……等十四种。每本下或叙摹刻始末、或述出处源流，兼订异同增损、优劣工拙。图表与文字叙述相辅相成，既具形象直观，一目了然之功，又有删繁就简、提纲挈领之效。

对《淳化阁法帖》之类"特殊"图书版本的研究，不始于曹氏，然均为单篇文字(多为短札)，散见于时人的题跋、文集中。因此，《法帖谱系》不仅是一部研究《淳化阁法帖》版本源流的创新之作，同时，又是一部在版本研究领域内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

与曹氏同时稍后，曾宏父所撰《石刻铺叙》二卷，以考《淳化阁法帖》及其翻刻本为主要内容。其作法与《法帖谱系》相同。所收异本较曹氏为少，然梳理考订精详过之。此外，于蜀石经各书，详及册、卷、字数；于《钟鼎彝器款识帖》、《凤墅帖》等尚记字数板(石)片几何，也似属少见。综观全书，虽杂有绍兴石经、《兰亭序》、《集古录》等解题数则，体例欠纯，但从总体上看，也可视为一部版本研究的著述。

四

版本的研究，在宋代已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著名学者在各自所长的学术领域内耕耘，每从版本研究出发或吸收时人版本研究的成果。

以校勘学为例。广搜异本、反复参订固不待言。宋人在校勘底

本的确定与参校本之择"善"上，更是刻意考究。如欧阳修校《黄庭经》，以"石本者乃永和十三年晋人所书，其文颇简，以较今世俗所传者独为有理"，故"删正诸家之异，一以永和石本为定。"[10] 是为通过各本的比较研究，认识到古本的可以据信。而方崧卿援据碑刻十七篇、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谢克家本、李昞本等所校《韩愈集》世号为善本，朱熹则批评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它本虽善，亦弃不录"。故作《韩文考异》"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证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11] 重古本而不迷信古本、晚出近本的不可偏废，这也是通过版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他如在参校取证中，宋人又进一步注意到本书以外的版本资料。如欧阳修之校《韩愈集》每参之于碑刻，沈晦校《柳宗元集》取资于正史、类书，而周必大等校《文苑英华》则"凡经史子集、传注、《通典》、《通鉴》及《艺文类聚》、《初学记》下至乐府、释老、小说之类，无不参用"，[12] 从而使他校材料的取用范围更加广阔。为使校勘叙例的内容更为完备，又有在叙例中增入考述版本源流，说明所据底本、参校本特点等版本资料者。著名的有方崧卿《韩集举正・叙例》、廖莹中《九经总例》等。其中，廖氏《总例》为元初相台岳氏所尽取，使其《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成为饮誉于世的校勘学名著。凡此种种超越前代、昭示后人的成绩，无不得益于版本的研究。

再以目录学为例。在书目的编制中，注意到版本的记录与考辨，从而使书目的内容更为丰富、学术价值大大提高。就解题书目而言，从《玉海》、《直斋书录解题》所引片断来看，北宋官修《崇文总目》，《两朝国史艺文志》以及李淑私撰《邯郸书目》等，已有版本的著录。此三目或残或佚，今已难考见其版本著录的详貌。姑从现存《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赵希弁《读书附志》、高似孙《史

略》、《子略》等观之，可知其于版本，已有篇卷分合、存亡完缺、编纂体例、版刻原委、版刻时地、版刻主人、版本优劣、版本源流、版本特征、递藏沿革等方面的记录与考订。如《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李翰林集》提要云："《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者，李阳冰所录也。今案，阳冰序文但言十丧其九，而无卷数。又乐史序文称《李翰林集》十卷，别收歌诗十卷，因校勘为二十卷；又于馆中得赋、序、表、书、赞、颂等，为十卷，号曰《别集》。然三十卷者，乐史所定也。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杂著，……其本最为完善。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数亦同，……有宋敏求后序，言旧集歌诗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万集本，因裒唐《类诗》诸编洎石刻所传，广之无虑千篇。以《别集》、杂著附其后。曾巩盖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旧藏本篇数，如其言。然则蜀本即宋本也耶？末又有元丰中毛渐题，云：'以宋公编类之勤，曾公考次之详，而晏公又能镂板以传于世'乃晏知止刻于苏州者。然则蜀本盖传苏本，而苏本不复有矣。"由此可见，宋人的解题书目，著录版本已较完备。宋代以降，解题书目对版本的著录虽有些发展变化，但总的来看，却未出宋人规制。就簿录式简目来说，南宋尤袤所编《遂初堂书目》与周应合纂修之《景定建康志·文籍志》在版本的著录上也别具特色。所录版本虽不多，但将版本项列于书名之前，此种体例也似有突出版本的作用。总的来说，此二目的成就与价值不及上述晁、陈等目。但体例既殊，也各得其用。

从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三者相互为用的关系来看，宋代校勘学、目录学的进步，说明宋代的版本研究推动了它们的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又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宋代版本学的成就。

注：

① 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

③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十七。

④ 《玉海》卷五十二。
⑤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十八。
⑥ 《朱子语录》卷百四十。
⑦ 楼钥《跋傅钦甫所藏〈职贡图〉》。
⑧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
⑨ 曹士冕《法帖谱系序》。
⑩ 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
⑪ 朱熹《书韩文考异前》。
⑫ 周必大《文苑英华序》。

从黄荛翁到张菊老

——150年来版本学的纵深进程

胡 道 静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张菊生(元济)曾凭借其经营商务印书馆的条件，收集了大量的善本古籍〔鉴定、抢救、护存〕并加以选粹，利用现代的印刷技术影印出版〔存真、流通〕，为古籍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止是以个人的力量做到了续行清王朝盛期的文化学术工作，而且做到了当时的国家和学者们所绝对不能做到的事。菊老的古籍工作方法，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和规划工作贻留下良好的典范，特别是像《续古逸丛书》那样的"幻为化身"，变孤本为不孤的存亡续绝之举，十分受到当今古籍规划工作领导人的赞赏与重视。

张菊老是我国近代的一位进步思想家，并对我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做了大量的取得实效的工作。版本学的研究与古籍工作，只是他一生中业绩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也是十分重大的，并且在此项工作中深刻地体现了他爱国主义的伟大襟怀。这是得到公众的承认，历史的明确评价的。

《四库全书》开馆以前十一年(乾隆28年,公元1763),黄荛圃(丕烈)生;第一份库书修成之年(乾隆47年,公元1782),黄荛圃年二十年。又后十年,届而立之年,开始了他的版书学的学术活动直到六十三岁去世(道光5年,公元1825)的后半生,不断勤恳耕耘。也许可以说,黄荛圃是版本学的真实的建立者,因为他是O型的功能者,能够掌握全能型版本价值的开创人。他还能够利用他在版本鉴定及校勘上的重大收获,摹刊重要善本古籍,因而承担起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低谷时期的续行任务。

作为一个版本学者的基本修养,是必须见多识广,博学精思,勤于校勘、密于检察。黄荛圃收藏善本之富,称雄于时。若其鉴识宋本《新定续志》,至以"波斯识宝"自诩,诚非过许。所得宋严州本《仪礼》十七卷、天圣明道本《国语》、宋剡州姚氏本《战国策》,皆详密校勘,作成《札记》(虽然校勘工作主要是得其学友顾广圻的帮助),得以肯定这些版本的学术价值。对于宋建安虞氏家塾刻本《老子道德经》,能举出《异俗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之"春登"尚未误倒,与唐开元易州石刻合,"因知其佳也"。对于北宋刊小字本《冲虚至德真经》,能指出《汤问第五》"五山始峙而不动",俗本皆脱"而不动"三字,顾广圻则举刘渊林注《吴都赋》引文亦有此三字以相证,称此"真善本也"。并且发现当世所行明世德堂本《列子》的张湛注文与殷敬顺释文合并,不复可以识别。"卢文弨《群书拾补》以意分之,不若此本未附释文,尤为确然而无误也。"皆于学术上作出贡献,认明了版本的B型价值。

宋元版书,有的刻印绝精,纸墨俱佳,装潢极美,具有艺术价值,与名画法书相等。应当说,这不是版本的主要价值,但不否定版本也具有此项价值。明代晚期的无锡华仲父(夏)、秀水的项子京(元汴)所藏宋元版书,皆以"精妙绝伦"著称,但是他们都不能了

解自己所藏之AB型价值。黄荛圃邃于版本之学，故于艺术价值，亦具赏鉴水平。如所收蜀大字本《史记集解》，惬心悦目；《友林乙稿》，流丽娟秀，"在宋椠中别有风神，未容后来摹仿（指复刻本）。"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荛圃于学术源流，经纶大略，固无深造，徒沉浸于板本学之本身。因此章实斋（学诚）取周兰坡（长发）之言讥其学为"横通"。（《文史通义·内篇》四）然平情而论，荛圃于本业造诣实深，他对版本学全面研究所倾注的努力，开拓了版本学综合细致工作的途径，使得这门学问兴旺发达起来，为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和文化学术的发展尽到了最好的后勤服务。到本世纪初年，产生了近代最杰出的版本目录学家张菊老（1867—1959）。

张菊老的六世祖青在（宗松），家世本富藏书，以刊刻元版李壁注《王荆公诗》著闻于世。菊老素有古典修养，青年时值国步艰难，奋志参加维新运动，力主政治改革。戊戌政变失败后，来沪任职南洋公学，以教育救国为己任。1901年，参与商务印书馆经营工作，建立起编译所，为我国教育文化出版事业的改进与现代化开创了新纪元，不断做出重大的贡献。他有感于编辑工作时"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收藏有自者"（《涵芬楼烬余书录》序），自此为书馆广事搜购珍善古籍，至1909年始建涵芬楼书藏，已而日积月累，富甲东南。所有搜访鉴定之事，都由菊老凭其版本目录学之专长亲自掌握，又得与好友傅沅叔（增湘）、瞿启甲、叶揆初（景揆）、缪筱珊（荃孙）、董授经（康）等专家多所商榷，因而他的版本目录之学，登于高峰，已从荛圃之源，汇为博大精深之巨浸。他的版本目录校勘学术著作《校史随笔》（1938年商务版）、《涵芬楼烬余书录》（1951年商务版）、《涉园序跋集录》（1956上海古典文学版）已成为鉴别之宝典，著录之规范，校勘之例证，为专业学人必当学习的要著。

菊老为涵芬楼搜藏图书，既取善本，又是有目的地为编辑工作

服务，故十分注意经世有用之作。其最初所得铭心精品，有宋赵安仁刊所校之《庄子》，明洪武刊西域海达儿等的《译天文书》。至宋刊元明递修的王充《论衡》，所有的明刊本皆佚去的《累害篇》一叶犹存。影钞明洪武刊之《元朝秘史》、宋景祐刊《汉书》、宋刊六臣注《文选》、宋黄善夫刊《史记》、宋庆元刊《春秋左传正义》、抚州本《春秋公羊传解诂》、明嘉靖重写《永乐大典》有《水经注》等的十余册，相继而得。清代汉学家手校的古籍，如何义门（焯）、卢抱经（文弨）、钱竹汀（大昕）、孔荔谷（继涵）、孙渊如（星衍）、陈仲鱼（鳣）、顾千里（广圻）、王伯申（引之）、黄荛圃（丕烈）、陈硕父（奂）勘定之本，收藏亦富，"丹黄错杂，析疑正谬，前贤手泽，历久如新，是则至可宝贵者也。"

民国之初，菊老锐意收集全国方志，积至 2,600 多种。"此虽不在善本之列，其间珍贵之纪述，恐有比善本为尤重者。"又购太仓谀闻斋顾氏后裔侨居上海者之藏书，得昭文张金吾所辑《诒经堂续经解》钞本数百册。此皆有卓识者始能为。可惜方志与张氏《续经解》悉数毁于1932 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侵沪之役。

《四库》之后，经部要典，经阮芸台（元）集众善本校定《十三经注疏》，并各作《校勘记》。校理工作，完一段落。唯史部要籍，还留下空白。菊老因此决心要汇集《二十四史》的善本，亲加校核，以定取舍，为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做准备。所有各史，除用涵芬楼珍藏善本外，并自全国公私藏家借用，作始于 1931 年，最后在抗战发生的初期完成了此项"乙部"大业。菊老在校核《二十四史》时，与同人共写成《校勘记》一百数十册，乃摘出其重大范例，先成《校史随笔》一书，不但裨益治史学者，亦对从事校勘古籍者多有启发，当与陈援庵（垣）之《校勘学释例》共为整理古籍方法之杰著。

涵芬楼珍藏名贵典籍，凡宋刊93部，元刊 89 部，明刊156部，钞校本 192 部，稿本17部，因在日军侵攻闸北之前移出，得以保存，菊老乃为之撰写书录，严格按照版本学的要求，详作记录，总《铁琴铜

剑楼藏书目录》、《楹书隅录》、《艺风堂藏书记》体例的长处，而考订加密，项目完备。对于宋版书的避讳字和刻工姓名，检录綦详，因此，对刻版时期、刻印地点、是否补版，研索至确。此种精密版本学上的成就，迥越黄荛圃当年所能达到的水平。

低谷时期古籍出版工作的重大成就

菊老以其在版本学上的个人学术成就，动用到古籍整理出版的工作上，文化遗产传播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价值殆无可估量。这方面，他一共做了三件大事：(一)影印出版《四部丛刊》初、二、三编，共收入善本要籍540种；(二)影印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影印出版《续古逸丛书》47种。

菊老于1919年10月撰《印行四部丛刊启》说："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阐明了刊印之原因。1930年3月撰《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序》说："长沙叶焕彬(德辉)吏部语余：'有清一代，提倡朴学，未能汇集善本，重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实为一大憾事，'余感其言，慨然有辑印旧本正史之意。"此即百衲成书之来由。于是可见菊老的襟怀与心志。

特别要叙论菊老利用新法影印之便，传旧本之真，辑印《续古逸丛书》之宏举。虽然摹刻旧本以存真的思想很早就有，黄荛圃曾作出了优异的贡献，但在照相影印技术使用之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摹写后而摹刻之。当然也有做得出色的，如明寒山赵氏(宧光)摹刻《玉台新咏》，据说与宋版无毫发异。清宋翔凤说起一个轶事，云"以少詹事钱先生(大昕)之精审，犹以为赵刻之《玉台》为宋版。"不过，此种摹刻可能只是从原本的艺术价值出发。至于黄荛圃之摹刻宋本《仪礼》(1814年)、《国语》(1800年)《战国策》(1803年)等，是从版本的AB型价值考虑的。数十年后，杨守敬助黎庶昌

刻《古逸丛书》，也还只能使用摹刻的手段。董授经(康)始为宋元本书传真，亦是摹刻，如《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等。至1914年，董氏试用珂罗版影印宋版《刘梦得集》，佳纸精印，给以菊老的印象是深刻的，所以到1922年他对于至属名贵的宋蜀本唐人集七种——《张文昌文集》、《皇甫持正文集》、《李长吉文集》、《许用晦文集》、《郑守愚文集》、《孙可之文集》、《司空表圣文集》，即决定采用照相石印，纸墨俱用上品，开本为大三开，纳入《续古逸丛书》序列，以存杨、黎丛书之名，而现代影印技术，迥非木版影刻可比。自此凡得名贵旧本，一概编入《续古逸丛书》影印，如宋本《武经七书》、宋袁州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大典本《水经注》等。到1938年抗战起后印至46种中断。1957年，又出版最后一种宋本《杜工部集》，把这一优良的版本学成就与新式的传真印刷技术结合起来的方法带进了新中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办公，1982年春举行全体顾问及组员会议时，组长李一氓同志所作《论古籍和古籍整理》的报告中说到"孤本、善本复印。标本就是1957年复印的宋本《杜工部集》，它原是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的第47种。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黎庶昌《古逸丛书》、商务《续古逸丛书》之后，选印《古逸丛书三编》，把不可多得的宋、元本古籍和明刊善本，都选编进去。这样，一方面普及一下清人认为很神奇的宋、元本，一方面也提供一些可供校释和学术研究的资料。"

《古逸三编》的规划，已由中华书局开始执行，迄今已出宋本《金石录》、《忘忧清乐集》等多种。周叔弢生前力赞这一计划，认为不要让商务的《续古逸》"专美于前"；此言的另一方面，也就是肯定了张菊老的这一创造。

谈叶德辉的版本学

刘 国 珺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郎园，又号丽楼主人。湖南长沙人，清光绪十八年进士。他生于"累代檵书"的藏书世家，宋代著名藏书家叶梦得、清代藏书家叶树廉，皆为其先祖。他"喜治目录版本之学"，有《观古堂藏书目》、《郎园读书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等。《观古堂藏书目》是其藏书目录，《郎园读书志》是其收藏各书的题跋，《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则是其研究古代书籍所得经验的总结。兹据叶氏的这些著作，谈一下他的版本学。

论版本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叶德辉重视版本学是与他对版本学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分不开的。他指出："此种学术，将来且光被东西，裨助文化岂儒生占毕之业哉！"① 而版本学在学术考据中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他说："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② 又说："昔贤尝以一字聚讼纷纭，故予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也。"③ 没有版本学知识，不对版本进行考辨，就找不到可靠的版本，考据自然就没有可靠的依据，结论必然会出现谬误。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这一点，已被大量的考据实践所证明。

从以上观点出发，叶氏认为，清代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取得巨大成就，甚至"超轶宋元，皆此三者（按，指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为之根柢"，④ 这当然有些过分，但也还有一定道理。这也反映了他对版本学重要意义的认识。

何为版本?版本学又是怎样产生的?叶氏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解释板本名称说:“雕板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⑤这说明,“本”初指未雕板以前的写本,“板”初指雕板印行的书本,雕板盛行以后,才合为“板本”,专指刻板书本。这是“板本”最初的含义。叶氏认为,版本学是在“板本”出现以后,在目录学中产生的。他指出:

> 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也。……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异本重本也。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监本、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别板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⑥

这段文字,反映了叶德辉对版本学缘起的看法。他认为版本学起于私人藏书目录。由于雕板盛行,印书能力大为提高,出现了“一书多至数本”的现象。这使藏书家在自撰目录中,开始著录异本和辨别板本。这就产生了版本学。南宋初期尤袤的《遂初堂书目》首创其例,南宋末年岳珂的《九经三传沿革例》更加其详。这些都是在私人目录中出现的,也就是说,版本学是在目录学中产生的。当然,叶氏所谈,是指正式著录和辨别板本而言的。他没有谈及在雕板书出现以前,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在目录中著录版本资料的先例(例如刘向校书《别录》),这是版本学与目录学同源的例证。不过,他说的在目录书中正式著录版本起于尤袤是对的,版本学产生于目录学中也是正确的。

叶氏指出，到明代始言宋本、元本，这是版本学的发展。他又指出，版本学的兴盛是在清乾嘉间：

> 自康、雍以来，宋元旧刻日稀，而搢绅士林佞宋秘宋之风，遂成一时佳话。乾隆四十年，大学士于敏中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类，于刊刻时地、收藏姓名、印记，一一为之考证。嘉庆二年，以前编未尽及书成以后所得，敕彭元瑞等为后编二十卷。是为官书言板本之始。⑦

这说明，在清乾嘉间版本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标志：（一）在此期间，不但私人目录中盛谈版本，而且在官书目录中也大讲版本之学了。（二）版本学研究的范围急剧扩大，它不单是著录异本，而且还对版本的时代、刊刻地点、收藏姓名、印记等逐一进行研究。这使版本学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科。从此，版本之学更为人们所重视。叶氏概括这种情况说："自乾、嘉至光、宣，百年以来，谈此学者，咸视为身心性命之事。……大抵所见古书，非有考据，即有题记。"⑧出现了不少有成就的版本学家和大量的版本学著作，研究的范围愈加广泛，用心愈加精细。他们或重考订，或精校雠，或善赏鉴，取得了巨大成果。

从叶氏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其一，他认为版本学与目录学有密切联系，即版本学是依附目录学而产生、而发展的。其二，他认为版本学不等于目录学，它的主要研究任务是考论版本的特征和同异，辨别版本的真伪与优劣。叶氏曾进一步指出："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断断于宋元本旧抄，是为板本之学。"⑨由于研究对象、任务、目的不同，版本学成了一种独立的专门学科。叶氏的这种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论古代印本书的缘起与发展

（一）刻板书的缘起与发展

刻板书起于何时？这是版本学中有待行一步研究的问题。宋朝人多数认为雕板"始于五代冯道"，[10]也有人认为始于"唐僖宗中和年间"[11]；明代陆深则认为"雕板兴于六朝"。[12]叶德辉考证说：

吾以为雕板始于唐，不独如前所举唐柳玭训序可为确证，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衔卖于市井之语。司空图《一鸣集》九，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13]

他从元稹为白居易作序中语，认为刻板书在中唐时期已出现。这种说法，比起宋人的说法来大为提前。他不同意陆深的六朝说，认为那时的"雕板"，不是刻书而是"雕像"。他最后断言："雕刻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14]

叶氏的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很有见地的，由于条件的局限，他不可能考证得更深入。现在有人根据后来发现的历史资料，指出唐贞观间已有雕板书。[15]这比叶氏的说法更准确。但是，这不能抹煞叶氏对此问题的探讨之功。

（二）活字版的起源与发展

① 铜活字版。叶氏推测铜活字版是我国最早的活字版。他说："活字板印书之制，吾窃疑始于五代。晋天福铜板本载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此铜版殆即铜活字版之名称。"[16]这就是说，五代后晋天福间已有铜活字版了。由于没有实物可证，现在一般不采纳这种看法。我们认为，叶氏根据文献记载所提出的这种假设性看法，仍有考察铜活字版起源的参考价值。叶氏认为，铜活字版盛行于明代中叶。他说："明以来，活字板盛行，弘治间，锡山华氏（华坚、华镜）兰雪堂、"（华燧、华煜）会通馆印书尤多"。[17] 同时，他就所知所见两家印书，遍加考证，说明他们的印书是铜活字版[18] 叶氏的这

种看法，与明人陆深的记载相合。陆深云："近日昆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19]"近日"指明弘治、正德间，"毘陵"指常州一带，与无锡相接。这说明叶氏的看法是正确的。

② 木活字版。叶氏认为木活字版起于两宋。他根据前人的记载，详加考证，最后指出："活字印书已盛行于两宋。刻泥刻木，精益求精，此势之必然者。"[20]这说明木活字与泥活字一样，在两宋时期已盛行。这一点，后人均未谈及，是叶氏的独到见解。为进一步研究我国木活字版的起源提供了线索。

（三）颜色套印版的起源与发展

叶氏认为，此种版"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并指出："朱墨套印，明启祯间，有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书最多者也。"同时，进一步列举明末三色套印、四色套印本，及清道光后所出现的六色套印本。[21]这说明了颜色套印版从明至清的发展过程。

在《书林清话》中，叶氏还记述了泥活字版、铅活字版的起源。但多援引前人说法，无甚新义，不再详述。

对版本的考论

考论版本，是叶德辉版本学中一个主要内容。叶氏在谈自己对版本的考论时，曾说过几条经验：其一云："吾所论则纯取之于神理也。"[22]这是说，鉴别版本的真伪，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从书的内在特征上加以考证鉴别。其二云："重在校勘，而不在外饰也。"[23]这是说，考辨版本，要重在校勘文字，而不要只注意外表形式。其三云："书本未经目睹，不可臆断。"[24]这又是说，鉴别版本重在经眼，而不能只靠前人的文字记载而主观臆断。这也是他考证版本的重要指导思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在版本考证中做了以下工作：

（一）比优劣。其一，比较两个时代的刻书优劣。在清代，"佞宋"

之风盛行，有些人对宋版书达到了迷信的地步。叶氏不满此风，他说："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胜于宋刻者，经则元元贞丙申平阳梁宅本《论语注疏》，胜于宋十行本也。…… 史则元大德九年重刊宋景祐本《后汉书》，胜于宋建安刘元起之本也。…… 举此数者以概其余。是不当震于宋刻之名，而谓元明皆桧以下也。"[25] 这说明元刻本也有优于宋刻者，否定了当时元明本皆不如宋刻的说法。这种分析，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反映了他在版本考论中的求实精神。其二，比较一个时代中一类书的优劣。例如，明人胡维新的《两京遗编》，有人批评它"去取绝无义例"。叶氏将它和同时的几种丛书比较，认为它可以和程荣的《汉魏丛书》媲美。[26] 其三，比一书多本中之优劣。例如，他说："《艺文类聚》，有明正德乙亥华镜兰雪堂活字印本，又有万历丁亥王世贞序刻本，二本讹脱，大致相同。自来考据家多重陆采刻小字本及宗文书堂本，以其源出宋椠，文句完全，详于大字活字两本也"[27]。其四，谈一刻之优劣。例如，他对清代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一方面指出他"会萃诸善本从事校勘"之优，另一面也指出此刻"校书不精"、"错字甚多"之劣。[28] 叶氏的这些比较考论，为读书指示了门径。

（二）较同异。在叶氏所收所见书中，只要是有异本者，他都比较各本的同异。文字短者，只有几个字，例如，考清内府刊《日讲易经解》十卷本云："四库同。"[29] 文字长者有数千言，例如，考《说文解字》诸本之同异，长达三千言。[30] 在他的这种考论中，有些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三）辨真伪。叶氏主要是辨别宋元板的真伪。其一，辨伪造宋元板。他认为，宋元刻伪本出现于明朝。[31] 他分析这种情况说："自宋本日希，收藏家争相宝贵。于是坊估射利，往往作伪欺人。变幻莫测，总之不出以明翻宋版剜补改换之一途。"[32] 这就说明了作伪的原因及方式，为后人辨别版本提供了经验。他从明本中辨别出

不少宋元伪本。[33] 其二，辨将元板窃为自刻者。例如，他辨别明胡增、叶景逵广勤堂得元代余板，“改易其姓名堂记”，窃为自刻者就有十几种。[34] 其三，辨被人误认者。如从清《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内，辨别出十余种被误认的宋板书。[35]

（四）别正误。叶氏对他人记载或考证版本的正误做过大量的考证。如德寿殿本刘球隶韵十卷，阮外集载云：“第十卷末行有御前应奉沈亨刊七字，董其昌定为德寿殿本，似未真确。”叶氏按云“董说是也。沈亨当是御前供奉刻字匠人。”[36] 说明董说为正，阮说为误。

（五）述源流。叶氏对一类书或一种书的版本起源与演变多有考述。考一类书者，如对宋蜀刻七史，自北宋经南宋、元、明、清的缺全成毁及板式的变化，考述极为精详。[37] 考一种书者，如对《孔子家语》自汉至明清的版本演变，考述甚为详尽，[38] 这为后人研究这些书的版本源流提供了依据。

（六）定版本。叶氏对所知见书的版本，及他人疑而不定的版本，进行了大量的考定工作。例如，明代无年号刻《王状元荆钗记》，卷末有“姑苏叶氏戊廿梓行”八字，叶氏按云，“此书似是元末椠本以叶氏名戊廿证之，亦元时人名俗尚。”[39] 这是从“人名”、“俗尚”方面的考定。此外，他还从避讳、源流、文字等方面考定过不少版本。

对历代版本风格的论述

（一）字体。叶氏论宋刻字体风格云：“吾谓北宋蜀刻经史及官刻监本诸书，其字皆颜、柳体。其人皆能书之人，其时家塾书坊，虽不能一致，大都笔法整齐，气味古朴。”至南宋光宗后，“渐趋于圆活一派”，“近于今之元体字。”[40] 但同时指出，也有“自为手书”者，与上述风格不一致。[4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记述了宋泥活字的字迹特征。他说：“北宋胶泥活字本《韦苏州集》，字画横竖波磔，皆有齿痕，盖由膠泥锻字，不如梨枣受刀之快利也。”[42] 这说明宋泥活字

与后来木活字、铜铅活字字迹不同，为了解和鉴别泥活字印本提供了参考。其述宋以后刻书字体风格云："有元一代官私刻书，皆尚赵松雪字，此则元体字之所滥觞也。前明中叶以后，于是专有写匠膀宋字之人，相沿至今。"[43]这为我们从字体上鉴定版本提供了依据。

（二）版式。其论宋至明清版式风格的演变云："大抵双线白口多宋版。单线黑口南宋末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书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大抵此类版心，书名衹摘一字，下列数目，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按，指清初）犹然。"[44]其论之精详，前人未有。

（三）牌记。叶氏云："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又云，宋刻牌记，"其文有详有略"，详者近似识语，略者但记出版年月。"以后元明坊刻"。"大要不出此详略二牌。"[45]

除以上外，他还论述了各代书本的纸墨、装订形式、行字之疏密、载写刻工姓名的形式等风格特征。[46]这些为辨别版本提供了线索。

叶德辉版本学的特点与不足

以上所述，是叶氏版本学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它有如下特点：其一，内容广泛。叶氏不但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版本的真伪与优劣（这些是一般古代版本学家所涉及的范围），而且还论述了各种印本书的起源与发展，历代版本的风格特征，及与版本有关的问题，如，书之称册、称卷、称本、称叶、称部、称函的缘起，刊刻之名称，书版知识等。从而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其侄叶启崟说他"在东汉刘班、南宋晁陈以外，别自开一蹊径"，[47]虽不无溢美，但也确实概括出了叶氏版本学的成就及特点。其二，注意从理

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例如，他对版本学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版本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与目录学的关系的论述，是他从理论的高度对版本学所进行的概括。又例如，他对古代印书风格的论述，则是在他鉴别版本实践基础上的总结。这些都是超越前人的。其三，不主门户，独抒己见。叶氏平生"无佞宋之癖"，[48] 对于宋版书，始终持"惜古书并不专于佞宋"的态度。[49] 并主张："惟明刊近刻，他人所不措意者，宜亟亟为之表彰。"[50] 因此，他于宋、元、明、清版本都能用心考论，且多有创获。在版本学上独树一帜，并产生一定影响。

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以及其他原因，叶氏的版本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持论有抵牾处。如，叶氏考板刻之盛行，一处说，"雕板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一处又说，"刻板盛于赵宋"[51]。这就出现了自相矛盾处。又如，他《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板之始》，前引唐柳玭家训序，肯定刻板书始于唐僖宗中和间，接着又云："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立论不一，把自己的观点搞乱了。二，有引文不准确处。如《书林清话》卷八《宋以来活字板》考铅活字云："明陆深《金台纪闻》云：'毘陵人初用铅字，视板印尤巧妙。'此为今日铅字活板之滥觞。"按原文是："近日毘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可见叶氏少引"近日"两字，"铜"一字。"近日"说明出现的时间，"铜铅"说明铜、铅活字是同时出现的。三，对版本考证有失误处。《书林清话》（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附李洣《书林清话校补》，其中举叶氏失误者若干条，可查阅。

（原载《津图学刊》1984年第2期）

注：

①⑥⑦⑧《书林清话》（以下简称《清话》）卷一《古今藏书家纪板本》。

②㉔《书林余话》（以下简称《余话》）卷下。

③ 叶启发《郎园读书志跋》引。

④⑤⑨《清话》卷一《板本之名称》。

⑩ 见《余话》卷上引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孔平仲《珩璜新论》语。

⑪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⑫ 陆深《河汾燕闲录》。

⑬ 《清话》卷一《书有刻板之始》。

⑭ 《清话》卷一《刻板盛于五代》。

⑮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

⑯⑰⑳ 《清话》卷八《宋以来活字板》。

⑱ 《清话》卷八《明锡山华氏活字板》。

⑲ 《丛书集成初编》本《金台纪闻》。

㉑ 均见《清话》卷八《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

㉒㉛ 《清话》卷十《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

㉓ 《清话》卷七《明人装钉之式》。

㉔ 《清话》卷七《元刻书之胜于宋本》。

㉕ 《清话》卷八《明以来刻本之希见》。

㉗ 《清话》卷八《唐宋人类书刻本》。

㉘ 见《清话》卷九《国朝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之优劣》。

㉙ 《清话》卷九《内府刊钦定诸书》。

㉚ 见《郎园读书志》卷二。

㉜㉝ 《清话》卷十《坊估宋元刻之作伪》。

㉞ 见《清话》卷四《元建安叶氏刻书》。

㉟ 《清话》卷十《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

㊱ 《清话》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

㊲ 见《清话》卷六《宋蜀刻七史》。

㊳ 见《郎园读书志》卷二。

㊴ 见《清话》卷五《明人私刻坊刻书》。

㊵㊸ 《清话》卷二《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

㊶ 《清话》卷六《宋刻本一人手书》。

㊷ 《郎园读书志》卷七《韦苏州集》条。

㊹ 《清话余话》卷下。

㊺ 均见《清话》卷六《宋刻之牌记》。

㊻ 分见《清话》卷六《宋刻书纸墨之佳》；卷一《书之称本》、卷七《明人装钉书之式》；卷六《宋刻书行字之疏密》；卷七《明人刻书载书写生姓

名》。

㊼ 见叶启崟《书林清话跋》。

㊽ 《郋园读书志》卷二,《晋书》条。

㊾ 《郋园读书志》卷二,《国语韦昭解》条。

㊿ 见叶启崟《郋园读书志后序》。

(51) 分见《清话》卷一《刻板盛于五代》、《刊刻之名义》。

建国以来版本学研究综述

石洪运　　桂　胜

受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古籍版本研究分委员会的委托,编辑《版本学论集》(第一辑),在阳海清同志主持下,我们查找了 2000 多篇有关版本学的文章。通过筛选、排比、分析、研究、整理,对建国以来版本学研究情况,在总体上有个轮廓性的了解,认为极有必要写一篇综述性的文章,藉此求教于诸位同仁,冀为博洽君子的再研究提供一点帮助。

版本学研究的形势

建国以来,版本学研究的形势发展很快,大体可概括为:研究的温度逐渐上升;研究的范围日趋扩大;研究的成果日益增多。

(一)研究的温度逐渐上升

学术研究的盛衰,往往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和侵略、国运衰微、版本学研究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处于低落时期。在其后一个世纪中,尽管有缪荃孙、张元济等人在版本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个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步步深入,版

本学的功用逐步被人们认识，版本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1957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曾掀起了一股不算小的版本学研究浪潮。可惜，“十年浩劫”给我国文化事业带来了重大的灾难，使方兴未艾的群体性的版本学研究一度停顿。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科学研究带来了春天，也给版本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活力。1978年开始的《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的编制工作，更是加快了版本学研究的步伐，给这门学科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促成了全国性版本学研究的趋势，使版本学的研究不断升温。其主要表现在：

1.国家鼓励和支持进行版本学研究，并成立专门机构予以指导。近年来，版本学已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列入社会科学研究规划。1978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加强版本学研究培养版本学研究人才的意见；并结合《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在北京举办了短期培训班。为了加强对版本学研究的指导，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备成立版本学研究委员会，并于1988年11年底在宁波召开了正式成立的委员会首次工作会议。与会代表结合第三届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会议精神，讨论制定了今后几年的研究计划和活动安排，其中包括：编辑、出版《版本学论集》；组织撰写版本学论文并在适当时候召开第一次古籍版本学学术讨论会。

2.近年来，版本学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全国各地的一些图书情报专业刊物，纷纷将发表版本学论著作为办刊宗旨之一，相继发表了一批文章。湖北的《图书情报论坛》应全国学会古籍版本研究分会之请，专设了“古籍研究”专栏。不少报章也推波助澜，竞相发表此类文章，从而为版本学研究提供了园地。

（二）研究范围日益扩大

建国后至文革前，对于版本学的研究，偏重于版本的特征、版本鉴别的内容与方法等方面。近十多年来，研究的范围由上述客观或局部的研究扩展到对整个版本学多维、多层次的系统研究，其

中既有纵向研究，也有横向研究。

所谓纵向研究，主要是指对版本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演变情况及其异同鉴别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建国以前就有学人曾付诸行动，但成果寥寥，质量参差。建国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在纵向研究方面，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学术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的"触角"伸到了各个历史时期和版本学的各个方面：或研究某一版本学家，或评析某一版本学著作或者流派，或综述某个断代版本风格和特征。就版本学家而言，学者评析了毛晋、黄丕烈、叶德辉等人的版本学思想；就版本学著作而言，重点研究了《书林清话》、《晦庵书话》等；至于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研究，更是不胜枚举，对唐五代本、宋、辽、金、元、明、清及民国本等断代及几个朝代版本的综合研究，产生了诸如《历代刻书考述》、《版本通论》等一批有一定深度和影响的著作。

这些研究，实际上贯穿了自唐代写本以来一千多年的图书版本历史演进过程的各个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学者们文章论著的累积、综合，足可使治版本学者撰写一部《中国版本学史》。目前，还出版了一大批有关中国图书版本发展历史的书籍和小册子，如赵万里《中国版本的发展过程》、魏隐儒《中国雕印发展简史》、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李致忠《中国古代书籍史》等。论文代表作有胡道静《从黄荛圃到张菊老——150年来版本学的纵深进程》等。

横向研究，是指研究版本学同中国文化科学各个有关层面的关系。如版本学与目录学、校勘学的关系，版本学与辨伪学、辑佚学的关系。有人还试图把国外已经或正在实(试)用的、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有关科学的成功经验，用于版本学研究上。如在《言语风格统计与版本学研究》①一文中，作者谈到用数学的方法、通过电子计算机来进行版本学问题的分析与研究。虽然诸如此类的方法暂且还未得到普遍推广与运用，但这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大胆尝试。在对版本学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同时，有的学者还考虑到了

综合社会、历史、时代、政治等因素和中外比照等途径进行横向研究。对版本特征的表述项目、方式和版本鉴定的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的探讨，也是一源百流，呈现一派繁荣的学术景象。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

（三）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

建国以来，版本学研究成果蔚为可观。在专著方面，产生了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戴南海《版本学概论》等全面论述版本学的著作及一大批论著。如魏隐儒《古籍版本鉴定丛谈》、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瞿冕良《版刻质疑》以及北京中国书店集众力编印、可视为"实用版本学"的《古籍版本知识》等。至于有关版本学研究的文章，则更是汗牛充栋。据粗略统计，建国以来发表的不下 1000 篇。

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情况

版本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使这门学科许多关键性问题，如版本学是否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一直没有论定；它与目录学、校勘学、文献学的关系始终众说纷纭。

关于版本学产生的时代，目前大致有以下四种说法，即西汉说、宋代说、清代说、近代说。西汉说者称刘向是"版本学的开创人"。此说反映了版本学与校勘学同源同时产生的情况；宋代说者称尤袤《遂初堂书目》因"一书兼载版本，则又开后世版本学之先河"②；清代说者认为清乾、嘉时期的黄丕烈"是版本学的真实建立者"③；近代说者则以近人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来标志版本学的正式创立。这些看法虽各执一端，倒是叠映出版本学发展史上的几个具有座标意义的阶段。

关于版本学的科学地位问题，由于迄今在清末以前文献中，似未发现有"版本之学"或"版本学"的提法，加之大量的有关版本的

研究成果如书目、题跋、藏书记等，都作为目录学的成果传诸于世，版本学鉴别异本真伪优劣，考镜版本源流的功用，也默默地消融在古籍校勘工作中。在解放前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般同意钱基博在《版本通义》一书中的观点，版本学是目录学的分支，它不能完全脱离目录学而独立。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有关版本学科学地位的争鸣中，形成了三种或相似或相反或折衷的观点，令人莫衷一是。一是版本学独立论。图书馆老前辈顾廷龙在1978年提出，根据研究图书普遍存在的版本差异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需求，“事实上需要加以成立一门科学”，加之我国版本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显著，因而其“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④ 其后，郭松年、李致忠也发表了大同小异的观点。⑤二是版本学相对独立论。这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版本学相对独立于目录学，有人认为，“我国传统的版本学原来（或现在仍）属于目录学的范围，但它本身又是独立的。”⑥ 这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即“指合版本与目录为一的学问——版本目录学。”⑦ 2.版本学相对独立于校勘学。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认为，“自从有了雕版印刷术以后，人们习惯用版、本二字作为印本的代称……并且由原来单纯的书本名称，一变而为学术界的专用名词，于是出现了‘版本学’的专门研究，成为校雠学的内容之一。”⑧ 3.版本学相对独立于文献学，版本学即版刻鉴别学。有不少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同志认为：“版本、校勘、目录诸学科产生并服务于文献典籍整理工作，它们之间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均从属于文献学，是它们的组成部分。”⑨

关于版本学研究的对象，大致也有三说：一为书——书册形态的书，这是一种比较通行的传统观点。二是文献——一切需要整理和利用的文献资料，包括“殷商卜辞、甲骨和其后的简帛书札”。⑩ 三是书——广义的书，“一种书各种不同的本子”，包括“雕版以前的简册、缣帛”和近现代印刷术产生的石印、影印、铅印本等。⑪它

的"折衷"，在于拓宽了"书册形态"的上限（简策、缣帛），又摒除了"文献"说中非书册性的资料（甲骨、卜辞）部分，从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赞同。当然，作为"古籍版本学"或"新书版本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特定"的了。

关于版本学研究的内容，有五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研究版刻鉴别，以《辞海》（1979年修订本）为代表："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这种典型的"版本鉴别学"，有人称之为，"实用版本学"或"狭义版本学"。二是主张研究版本的源流："说明书籍刊刻和抄写流传下来的源流，叫作版本学。"⑫ 三是主张源流和鉴别同时研究："古籍版本学是从古籍的版本源流和相互关系中，研究古籍版本的异同优劣；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评定古籍版本的功用价值并从中总结工作规律和方法的科学。⑬ 四是主张从版本的学术价值、版本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全面研究："鉴定真伪优劣，判断刻印时代，识别完缺异同；进行精细校勘、查漏补缺，解疑辨惑；艺术鉴赏。"⑭ 五是主张进行版本的多维研究，找出其规律，以形成版本学的科学体系。这是近年来有着强烈呼声的主张。⑮ 不少学者都重于此论。如卢中岳在《版本学研究漫议》一文中提出，版本学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大致包括版本学的一般理论、图书版本的内容与形式的研究、图书版本发展过程的研究、版本学史四个大的方面，并为它们开列了详细子目。⑯

关于版本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由于版本学与目录学、校勘学都是为着读书治学而产生并为之服务的，因此在三者的发展史上，有着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在它们三者是平行学科、还是从属关系以及孰主孰从问题上，近年来大致有四种意见。一是认为版本学包括目录学和校勘学，把目录学、校勘学与版刻鉴定一起，作为"构成古书版本学的三根主要梁柱"。⑰ 二是认为版本学从属于目录学、校勘学，认为"版本学只有作为目录学的辅助科学，才能够存在和发展；也只有服务于校雠，才能充分发挥版本的作用"。⑱

三是认为"从近代开始，目录学和校勘学、版本学已经分别发展成为独立的科学"。[19] 与此观点有某种相似的是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一些同志，但他们把这三门各自独立的科学，一古脑地"统一"到"文献学"麾下，认为它们是"'文献学'的三个主要内容"。[20] 四是认为版本学与目录学互为从属。它们二者"既可以独立成学，但亦不排斥其互为从属的关系；言目录则版本为之辅，言版本则目录为之辅"。[21]

关于版本学的研究方法，迄今为止，大约可分为传统的版本之学的研究方法与倡导建立版本学科学体系而提出的方法。有人认为，传统的版本之学，一贯注重版刻鉴别与艺术鉴赏，主张靠实践经验（有些只是介乎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积累，捕捉、识别、研究各种各样的标识，"观风望气"、"鼻嗅手摸"，据以作出判断。这种多少有些经验至上，且视野不甚开阔的方法，虽然不利于版本学科学体系的建立，相反会"把版本学引上了十分狭窄的版刻欣赏和版本认定的玄而莫测，不可捉摸的邪路"。[22] 实际上，在版本学发展过程中，不少研究者已在继承传统，突破樊篱，开拓、尝试着建立一套新的版本学研究方法。近年来，一些学者极力明确地主张把版本学的研究，同目录学、校勘学的某些方面联系起来，以建立版本学科学体系。李致忠提倡借助目录学、校勘学，研究版本学，主张"主要根据书的内容、人物时代、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地理沿革、语言文字以及本书序跋、刊刻牌记等，进行考订；从历代著录、各家题跋加以验证；从审慎的校勘中理出版本源流和版本价值"。[23] 郭松年也强调要借助古籍校勘学和目录学的研究成果，研究古籍版本的发展规律及科学鉴定方法。[24]徐孝宓在《善本辨证及其他》[25] 等文章中，论述阐发了他的观点，即，从目录学的角度，运用考据学的方法，研究版本学。他认为这样可以拓宽版本学研究的视野，探寻版本的源流和价值，使版本学的研究从行格学及单纯版刻鉴定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扎实的科学。有人则从宏观的角度，提出

"尽管版本学的研究方法是多样的，但从整体而言，可采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实验研究法"。[26]

关于近现代版本学研究问题。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今中外图书的各种版本问题。在七十年代前，版本学一直局限在古籍版本研究上。其间，唐弢的《晦庵书话》，主要"谈新书版本"，被叶圣陶誉为"开拓了版本学新天地"，从而打破了在版本学研究中古籍版本独占的一统天下。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新书版本研究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随着版本学研究内容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不少人撰文呼吁："从现在起要注意对近现代图书文献版本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27]引起了版本学界的重视。有人还提出了建立现代文学版本学的设想。[28]

对版本学研究的展望

近年来，版本学研究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但要将其继续全面地向前推进，还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一些学者相继撰文，探讨在版本学研究上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和建设性的建议。[29]综合他们的想法和我们对版本学研究现状的调查的情况，我们认为版本学研究至少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值得注意。

（一）宏观研究上要再下功夫。

建国后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在宏观研究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显得不够。系统科学理论认为，对一个系统要进行多侧面的研究，不仅要研究它的内部结构，还要研究它的外部功能；不仅要研究它的现状，还要研究它的历史。这就要求把单向分析与多维分析，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结合起来，呈现一种垂直思维方式。具体来说，在版本学研究方面，要注意内容与形式的结合，系统与全面的统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相同的历史时期、相同的地域的版本现象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又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其原因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的版本现象有哪些相同的

特征，又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其不同的特征中又有哪些各自不同的特点，为什么？此外还有同一时期不同的地域、不同时期相同的地域的版本现象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二）微观研究上要开拓进取。

宏观研究是建立在微观研究之上的。没有扎实的微观研究就不可能有理想的宏观研究。建国以来，在从书籍制度、版刻风格、版本演变到鉴别整理，乃至图书雕印方式、收藏利用，应该说是比较具体细微了，这是好事。但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对一时代或一地区或某一书的研究，投入精力太多，往往形成千军万马挤于一途的状况。如此"大路货"的研究成果，不仅难免有大同小异的现象，而且有时导致一篇文章在某刊物上发表了，另一篇论述相似但没有什么新颖见解的文章，在另一刊物上又与读者见面。有时还可见到同一人内容相似的文章刊载于相同时期的不同刊物。与此同时，对于诸如少数民族文字典籍版本问题的研究、中国历代版本学家的研究等领域却又问津者寥寥。对诸如同一种版本现象及版本学有关重要名称在不同时代的嬗替、演变的源流等方面，可能被视为"细微末节"又相对地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三）百家争鸣中要摒除门户之见。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为此全国各地、各系统的图书馆应尽量创造条件，为学者从事版本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方便。

同时，一门科学的建立，需要不少人的长期的共同努力。百家争鸣则是形成、完善一门科学的必要前提与条件之一。在学术研究上，应提倡客观、中肯、全面的研究，平等地探讨问题，不要囿于门户之见。

（四）组织力量，协作攻关。版本学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既要开展个人和局部的研讨，更要提倡全局的互通信息，加强学术磋商和成果交流。我们呼吁在一定范围内成立全国和各省（市）版本学研究学会，有条件的地方或

单位建立版本学研究所(室)，培养具有一定质量的版本学研究梯队。要把现在从事古籍整理、图书馆古籍工作及高校图书馆学系的有限人力，采取适当的形式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共同筹划研究规(计)划和攻关课题。目前湖北省图书馆在全国古籍版本研究委员会指导下，正组织人力，编辑《版本学论集》(第一辑)和《1911—1989 版本学研究论文索引》，这是统筹规划、协作攻关的一个可喜开端。它的成果和经验，将引起版本学界的重视。

历史已进入了九十年代，版本学总体研究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在已拉开序幕的广阔舞台上，展示出光彩眩目的累累硕果，成为一个将载入史册的版本学研究的新时期。

引用文献：

① 《语言风格统计与版本学研究》　曹聪孙　载《津图学刊》1988年第2期

②㉗ 《新书版本研究浅见》　徐孝宓　卫扬春　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2年第2期《版本学研究的新天地——读〈晦庵书话〉有感》　鲁海　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3年第4期

③ 《目录学研究》　汪辟疆　1955年5月商务印书馆

④⑪⑮ 《版本学与图书馆》　顾廷龙　载《四川图书馆》1978年第11期

⑤⑬㉘ 《古籍版本与版本学》　郭松年　载《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年第4期

⑤⑰㉗㉘ 《论古书版本学》　李致忠　载《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79年第1期

⑥ 《略论王重民同志对版本学的研究》　杨殿珣　载《图书馆学研究》1982年第3期《古籍版本与校雠》　曹聪孙　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1年第2期

⑦ 《对版本目录学的探讨和展望》　崔建英　载《津图学刊》1984年第4期

⑧ 《中国校雠学分论(上)——版本》　载《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⑨ 《孔子的删订诗书与中国文献学——兼论校雠学、目录学、古书版本学争名之非》　邵胜定　载《广东图书馆学刊》1986年第4期

⑩ 《版本学有广狭二义论——从版本学的对象说起》　邵胜定　载《图书馆杂志》1985年第4期
⑫ 《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　谢国桢　载《齐鲁学刊》1981年第3期
⑭㉙ 《从黄荛圃到张菊老——150年来版本学的纵深进程》　胡道静　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4期
⑩㉖ 《版本学研究漫议》　卢中岳　载《贵图学刊》1982年第2期
⑱ 《版本与目录之关系浅释——中西目录学分类比较观》　师道刚　载《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⑲ 《目录学的对象与任务》　陈光祚　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9年
⑳ 《不要无限扩大古籍版本学的内涵——与李致忠同志商榷》　王文耀　载《上海市图书馆学研究》1981年第2期
㉑ 《版本、校勘考证与目录学——目录学浅谈之七》　来新夏　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0年第4期
㉔ 《古籍版本研究的努力方向》　载《图书馆学研究》1984年第4期
㉕ 载《四川图书馆学报》1981年第4期
㉘ 《唐弢先生的希望——现代文学版本学散记》　陈君隐　载《图书馆学研究》1986年第1期